

黄大年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n elderly man, Huang Danian, looking down and to the left. He is wearing a dark, high-collared jacket.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一个平凡 共产党员的经历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自序	1
往事回忆	3
鄂北老家.....	5
青少年时代.....	9
投身革命	15
武汉参军前后	26
到苏联留学	33
立三路线时期	47
到中央苏区	55
对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	67
护送红七军团过闽江	76
从瑞金到遵义	81
东川之战	90
在大凉山彝族地区.....	104
与四方面军会师.....	109
张国焘反党南下.....	113

西路军的悲壮历程·····	129
新疆三年·····	143
在延安中央党校和整风运动·····	157
战斗在冀察热辽·····	165
在天津工作的十年间·····	179
辽宁工作时期·····	194
十年浩劫·····	206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主犯·····	229
最后一班岗·····	238
文章·书信 ·····	241
在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成	
立会上的讲话·····	243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45
在全国中药普查座谈会上的	
讲话·····	256
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	
运动·····	260
致辽宁工人技术协作委员会	
的信·····	277
致辽宁省总工会的信·····	278
读后心得·····	279

从严治党 端正党风.....	281
给辽宁省总工会领导和其他 同志的信(摘要).....	288
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革命 立场.....	290
读报载《“刀具大王”的辛酸 泪》一文后致总工会主席 信.....	292
重读彭真的两篇文章.....	293
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299
诗·词·歌	303
悼苏枚.....	305
端阳.....	305
春.....	306
歌词.....	306
望夕阳有感.....	307
进古稀.....	307
新村冬夜.....	308
鞍钢颂.....	308
夏——武陵春.....	309
往事回忆.....	309
调寄行香子.....	311

自 序

我是一个平凡的老共产党员，一些好心的同志要我把参加革命以来的往事写一写。我在此写几句话，做为我回忆70年革命生涯的开场白。

我于1901年的阴历五月初五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新市镇杨庄村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幼年时期上过“洋学堂”。在那里第一次听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句话，说它们是像吃西瓜一样，想把中国分而食之。甲午战争后，社会上纷纷流传仇视日本的思想，国内则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在当时环境影响下，一方面发誓决不当兵去为军阀卖命，但又盼望长大后，如果国家要和日本打仗，我一定报名参军。辛亥革命时，民间盛传孙文、黄兴反清斗争的事迹，因此，村里聘请武术教师教练武艺，我也学过武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我正在高等小学读书。教师姚江亭、冯国香经常给我们讲解世界大战情况，也给我们讲过关于“赤俄”、“共产”等等。“五四”时期，我和同学们参加过反日游行示威，还演过宣传反日的话剧。后来，在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当过四年农村小学教师，亲身体会到农村教师极端艰苦的工作和贫困的生活，至今难以忘怀；同时也初步接触到农村地主恶霸为非作歹、欺压农民的种种社会丑恶

现象。这是我青年时代第一次接受到的阶级教育课。以后，受有进步思想的胞弟黄民钦影响，考进湖北省立襄阳第二师范学校，投身学生运动，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从此开始了我70年的革命生涯。

比起中青年人来说，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的几个亲属和老秘书们为我整理回忆录，花了不少力气，总算把我一生中的“破铜烂铁”都挖掘出来了，我本人追忆往事也觉得颇堪回味。我自信是忠实执行了入党誓言的，也是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或者悲观失望。党交给的任务，我总是尽力而为。我就是这样度过了自己平淡的但又是革命的一生。这些真实材料对世人不见得有多少可取之处，权当作我向党组织的一个书面汇报，对老战友、老同事和后辈们的一个交代。我所亲身经历的党的每个历史阶段的斗争史实，尽管有的人名、地名无法核实，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我觉得对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还可以提供一点旁证材料，起到一点微小作用。

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1994年6月，北京医院119房间

往事回忆



鄂北老家

我的老家在湖北省枣阳县，位于鄂、豫交界。1901年的农历端午节，我出生于枣阳北部新市镇杨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

据老辈人说，我家原籍江西，远祖姓王，早年因逃荒来到湖北随县黄家老庄，经黄家招婿后改姓黄。后高祖父黄甲迁居枣阳县桃园村，披荆斩棘，艰难创业，在这里安家落户。桃园村子不大，四面环山，但这里田地出产好，到曾祖父黄士贵手里就发了家，骡马成群，修盖起大瓦房，据说一年要赶上几百只羊到广州去卖。曾祖父有四个儿子，我的祖父黄润行四，也有四个儿子，但此时的家境已日益衰落。我父亲叫黄启程，母亲姓张。父母先后生了我们兄弟姐妹8人，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兄弟中我排行老四。分家后，我们一家搬到新市镇东杨庄村。黄家几房人所居住的村子都是小村庄，姓黄的在村子里又是小户，常受大户的欺负。新市镇有个姓刘的大户，他家出过一个拔贡，又有好几个子弟在武汉念书；镇上的一个大商人和民团团总也姓刘，地方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都掌握在姓刘的手里，后来，连黄家几房的土地也差不多都让刘家并吞了。

东杨庄距枣阳县城75里，在新市镇东约4里。村子地

处桐柏山余脉的山脚下，距主峰约五六十里。村子里只有十来户人家，其中杨、李、孔、傅等几家都是老户。我父亲搬到东杨庄后，很注意和邻居搞好关系，和睦相处。姓黄的虽是小户，但有100多亩地，在村上也算不错的了。但由于地处山区，土地贫瘠。山上树木稀少，一遇山洪暴发，泥沙俱下，河边好地淤积泥沙最深的达一两尺厚，庄稼收成不好，小米、芝麻里混杂沙石很多。村里有句俗话说，每人每年要吃下一个石碾大的沙子。

我父亲搬到东杨庄时不过20多岁，读过四书五经。他自幼身体不好，可是久病成医，懂了点医道，邻居常有人找他看病开药方。我们家有个亲戚，孤苦无依，常年住在我家，他认得草药，经常上山采药。我小时候好跟着他上山挖药材，也认得了不少中草药。我们家墙上挂个分类布药袋，装了百把种中草药，有的是在外地买的，有的就是自己在山上采的。父亲在1927年60岁时去世。

我母亲娘家姓张，是距新市镇以西唐梓山张庄人。母亲为人善良，性格开朗、坚强。因为我们兄妹长大后都外出参加了革命，我家成了秘密接待站，她也为革命做过不少工作。有的地下党同志在家里住不下去了，跑到我家躲上一阵，母亲无不亲切接待。大革命后期，我的胞弟黄贤儒（即民钦）和堂弟黄冠群、黄冠英在鄂豫边一带打土豪得到的钱财，常常由我母亲以走娘家为名，坐大车转运到唐梓山我表弟张慕谦家中，作为购买武器等的费用。张慕谦当时是枣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鄂豫边特委执委。地方民团抓不到贤儒

弟兄，曾两次把我母亲抓去。任凭他们追逼拷打，母亲始终坚贞不屈地说“不知道！你们炮了（枪毙）我吧。”还怒斥他们说：“我的儿子、孙子都是共产党，你们有本事自己去把他们抓回来，抓不着他们，抓我个老婆子算什么本事！”母亲是1962年初患肺癌在沈阳去世的，终年96岁。

我们兄弟姐妹8人。姐姐出嫁后死去。二哥贤任曾参加农民反对地主的武装绿枪会，1927年的腊月二十八遭反动地主杀害。三哥贤侠早逝。六弟贤辅欲奔赴延安未能成行就不幸病逝。我和大哥贤侯（山农）、五弟贤儒（民钦）、八妹海明四人都参加了革命。

大哥贤侯，参加革命入党后取名山农，先后在河南唐河县北张庄小学、枣阳县唐梓山张庄小学、钱岗镇小学和鹿头镇中学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赞成陶行知的教育方针，为人刚直不阿，在当地教育界有一定声望。大革命时期，曾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学习，任武汉市燃料业总工会秘书长。汪精卫叛变后，他潜回故乡，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并掩护过不少在当时无法存身的中共地下党员，因此，曾遭到反动政府两次通缉。根据党的指示，他外走避难，和党组织一直保持着联系。抗战初期，他曾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去延安参加革命，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后曾任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参事室副主任等职。1961年12月因肠癌在沈阳去世。

五弟贤儒，大革命初期在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读书时，接受班主任肖楚女的思想影响投身革命，改名民钦。

1926年曾在武汉的湖北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到应山县开展农民运动。据当时和他共过事的郭绍仪回忆，说他“机智勇敢、刚毅果断，深入群众”，在农民运动中很有威望，有“农民大王”之称。1927年冬，我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时曾接到他的一封信，大意是暗示他们在搞游击战争。1929年冬，我在苏联军事学校学习时，接到枣阳县委当时负责人傅良驹来信说，民钦和冠群、冠英均不幸牺牲。还说了他得到消息晚了，没有能将他们救下来，甚为痛惜等语。我那时还以为他们是被敌人杀害了，读信后，晚间用被子蒙头哭了一场。关于他们三人之死，解放后经枣阳县委多方查证，才搞清楚，原来是1928年夏在我们自己队伍中遭到诬陷被杀害的。当时民钦年仅26岁。他和冠群都是省农民特派员，冠英是枣北武装干部。解放后，大哥到天津看我，还带来了他保存多年的五弟在枣阳二师搞学生运动期间的家书和我从苏联寄回老家的信。五弟的信纸虽破，墨迹清楚，豪气犹存。

八妹海明，原名贤伦。大革命初期，经党组织派赴武汉党务干部学校学习，曾任武汉女工纠察队训练班队长和中央独立师补充第二营女生连连长。1927年和我同赴苏联学习，1931年回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任女工部长。她曾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国共合作后出狱。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后任延安保育院院长。解放后历任山东省妇联主任、山东分局妇女委员会书记、华东局妇女委员会副书记、轻工部副部长和部纪检组副组长等职。

我排行第四，名贤佑，字民孚，后取名河清，在苏联学习时，又改为火青。

我们家庭和睦，兄弟姐妹感情深厚，即使各自成家后也没有改变。大哥对弟妹友爱，但又很严肃，凡事总是以身作则。学校放假期间大家都回家了，他就带领我们劳动，上山开荒、植树，给果树嫁接，修整门前的河流渠道。我们家乡种的苹果树就是他引进种植的，是湖北省最早的良种之一，现在还存活着两棵老树；嫁接的梨树至今仍根深叶茂，果实累累。我们弟兄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天一黑，就聚在屋檐下说东道西。记得大家还议论过，如何把我们家庭这种民主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不分家，当家的由众人选举，领导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配，族中其他人要参加也可以。大哥还曾经把我们这种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设想写成文章，寄给《学生杂志》社的主编杨贤江。

青少年时代

在旧社会，只要有点钱，家里总想叫子弟多念点书，好成为一个扬名显祖、不受人欺负的“书香门第”。我祖父一辈就办过私塾，父亲一辈也愿意念书，却始终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样儿的能写文章的人。到了父亲手里，家境已日趋没落，但他总是尽量设法让我们弟兄念书，就在村子里办起一个

私塾，学生以我家弟兄为主，其他人家的孩子也可以来。

那时我七八岁，十分顽皮，是个孩子头，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都能指挥得动。我们把步枪子弹壳打个眼，装上火炮药引线，能打出去几十米远，用它制作成木枪，每人发一支，我自封队长。二哥、三哥也不愿意老坐在屋子里念书，就盼老师死了才好呢。有一次他们用泥捏了个老师的像，又做了个小泥棺材把像装进去，然后几个人爬到树枝上去唱歌，诅咒老师快死。我妹妹那时还小，看见他们爬树热闹，也闹着要爬。我抱她上树，上去了，坐在树枝上挺好玩。可是，我抱她下树时，树下是个斜坡，我右脚站不稳滑到田里，被蛇咬了一口。刚咬时，没在意，几分钟后一看，脚上起个青疙瘩，据说是毒蛇咬的，便赶快跑回家上了药，肿了个把月。就这样我还拄着个拐杖跳着走，至今还留下个伤疤。

1909年，离我家30里地的泉水寺办起一所小学堂，父亲就叫大哥带着我去上学，二哥、三哥还是在家上私塾。我在小学堂念三字经，学会作文、对对联，常受国文老师李文峰的夸奖。李老师除上课外，常常给我们讲一些外边寄来的报刊上的消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中国版图很大，外国人要一国独占，占不了，因此列强们就开始瓜分中国，像吃西瓜一样切成一块一块的吃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

1911年，大哥又带着我一块到距我家只有100里地的河南唐河县（当时叫唐县）读书，因为河南生活费用较低些。大哥读高等小学，我读高等小学预科，可才读了半年，辛亥

革命爆发,就回家了。1913年,大哥又带了三哥和我到离家几十里路远的枣阳县双河镇小学读书,也只读了半年。

1914年,我们弟兄五人又到河南唐河县读书。大哥21岁,进乡村师范学校,我和三哥、五弟、堂弟黄冠群四人进高等小学校,学制五年。大哥毕业后就留在乡村师范学校附小教书,供给我和三哥、五弟上学。后来,我妹妹也到唐河县上过学。

我在唐河县小学读书时,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穿不起什么好衣服,比不上那些富家子弟,但由于我们弟兄学习好,在同学中还是不错的。此外我喜欢各种运动,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好踢足球,打中钟,有一次差点把腿踢断了。我小时在家练过武术,一般的拳术、刀枪都懂得一点。课间休息有时组织起人马来,分成两小队玩打仗。我七八岁学会游泳,以潜泳见长,一口气能在水下游上百米。我虽然从小调皮,但从不会和人打架。

1919年,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正赶上“五四”运动爆发,全国人民奋起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我们弟兄四人都参加了唐河县学生爱国团,跟大学生们一起,打着小旗子,敲着“洋鼓”,吹着“洋号”到大街上游行,唱打倒列强的歌子,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后来,我们全校学生还专门到县城北边的源潭镇作宣传活动,演过双簧。

小学毕业后,我们弟兄四人都考上了唐河县简易师范,两年毕业。这两年中我认真读了点书,学到些知识。我的数

学、自然科学和地理学得好。我拿起笔能随手画世界地图，学校老师对我们弟兄四人很欣赏，常常称赞“黄氏弟兄”……

我的青少年时期，正当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帝制虽已被推翻，各帝国主义扶植北洋军阀中的各派势力，妄图瓜分中国，各派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我从泉水寺学堂第一次接受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后，我对时事兴趣很高，最爱听国文老师姚江亭讲世界上让人敬佩人物的故事，如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更是爱听报纸上的消息，什么同盟国、协约国的情况和孙文、黄兴一些提倡国民革命的人物。后来又听说有个搞“赤化”的俄国，自己也弄不懂，只是对帝国主义扶植北洋军阀企图瓜分中国感到气愤。我常常思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对军阀混战感到厌烦，认为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自己下决心一辈子不当兵，脑子里充满爱国主义思想，对孙中山很钦佩；二是有种冒险思想，想到外面闯闯，像哥仑布那样，发现点什么。

简易师范毕业后，父亲还要我和五弟民钦念书。我和五弟还有堂弟冠群三人先后投考过河南淮阳第二师范和开封第一师范，但全都名落孙山。那时，正值农村经济衰败，我家生活也是江河日下，欠债不少，一半田地都典当出去了。每到农历年关，讨债的人就坐着不走，只不过给留了点面子，没揭锅砸碗就是了。最后家里决定，大哥、三哥和我教小学，供给五弟和妹妹上学，二哥管家务事。

1921年，家里托人说情，我受聘到唐河县北张庄小学

教书。学校是农村办的，校董都是当地的地主豪绅。他们手里掌握了民团这个统治工具，到处要粮、筹款，欺压百姓，学校老师也一样受气。

1922年我转到枣阳县唐梓山张庄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开始接触到了社会的阴暗面。唐梓山张庄是我母亲的娘家。我一个远房舅爷是当地民团的头头，掌握了十一二枝枪。有一次，县里一个营长要给他妈过生日，全县豪绅都送了礼，我舅爷自己不拿钱，却叫大家捐款买礼物，自己还从中捞了一笔钱。他和土匪也有勾结，互相利用。他有个族侄张同仑，原是石匠，后来当了土匪，有时为了躲风，就到他家来帮忙干点活。有一回县里指名抓张同仑，舅爷把他找去，五花大绑捆起来，花言巧语骗他说，不去交不了差，去了再保他回来。才走到半路，为了灭口就把他杀了。

1923年，我又转到枣阳县钱岗镇上任岗小学教书。上任岗距钱岗镇约七八里地，是镇上恶霸地主任殿煌的老家。在上任岗这段时间最受罪，本来是两个教员，但另一个是姓任的本家，因而有恃无恐，吊儿郎当，经常不来上课，就我一个人顶着干。村上回来个把读书人，到学堂串门，还得应酬，都是地方上有地位的人，不能得罪。

当时，教小学的薪水是一年42块大洋，除去吃用，能剩下10块大洋。教书生活十分辛苦。旧社会我家乡流行一句话：“家有三石粮，不做孩子王”。我教的小学都是“复式”教法，三个不同年级的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室内授课。“生旦净末丑”，一包到底，一个人干，每天四节课，每节一个半小时。

教师要根据每学期规定的各班各项课程进度要求,安排每周授课表。上课之前要准备好各班的功课,嘴巴对一个班作口头讲课,同时又要将另外两个班的作业安排妥当,如默写、认生字、作文、填句或写大字。在对一个班口头讲授告一段落后,让他们复习,抽出时间对另外两个班巡视检查一遍,发现不妥之处,及时指导纠正。回过头来又到前一个班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两节课中间有10分钟休息时间,回到自己房中,往床上一躺,累得一动也不想动。一眨眼10分钟到了,继续上第二节课。下课后疲惫得饭也不想吃。当时我才20岁,晚上还得处理学生当天的作业,改作文、批改算术,学生写的字、画的图画,每篇要划上对或不对,好或不好的符号,有的还要打分数,评定甲、乙、丙,唯恐处理不公道,打击学生积极性,甚至引起议论说老师偏心。学生在这点上寸土必争,家长们有时还要兴师问罪,这碗饭真不好吃!

特别在钱岗镇上任岗小学教书那一年,做饭的大师傅爱赌博,每逢去钱岗镇赶集,他不到下午三四点钟不回来。我上午下课后已是疲倦不堪,没有饭吃,自己又无力去做,只好饿着肚子去上课,好在年轻,还顶得住。当天留的作业处理完了,还得准备明天的四节课怎么上。但我喜欢和孩子们打交道,他们中有些人理解能力之强往往出人意料之外,每当看到我教的孩子学业上的进步,对我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在3年左右的教书生活中,让我最有感触的是,通过自己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初步接触到旧社会的黑暗面,对人

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有了点认识,开始对旧社会现状感到不满,想寻找新的出路。

投身革命

1923年,五弟民钦考上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刚好肖楚女第二次回襄阳教书,担任五弟那一班的班主任。他每逢假期回家,总要向我们弟兄宣传肖楚女如何亲自指导他们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向导》杂志等革命书刊,传播革命思想。

我那时正感到思想苦闷,也想去襄阳上学,但家里供不起两个人念书。我刚结婚不久,岳丈姓郭,是个小地主,我只好向他借了点钱去求学。1924年上半年,我和堂弟黄冠群先到樊城鸿文中学补习功课,准备考襄阳的省立二师。鸿文是一所加拿大人办的教会学校,老校长是个牧师,他的小儿子朗宁,解放后是著名的加拿大友好人士。学校管理很机械,课外想多看点书也不行,星期天还要作礼拜。住了三个月就住不下去了。下半年我和冠群考进了襄阳省立二师。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刚进入省立二师,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襄樊学生运动。襄樊学生运动是从1923年秋肖楚女回到襄阳二师当班主任时开始的,他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25年秋,谢远定到襄阳湖北省立第十中学当教务主任后,就把

革命组织建立了起来。以后，鄂北各县共产党、共青团的创始人和早期革命骨干，大多数都是当年襄樊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从外地回来的是少数。可以说，襄樊学生运动是鄂北革命运动的先驱。

我和冠群考入省立二师时，二师学生正掀起驱逐反动政客、学阀单家桨校长的运动。学校当局已经开除了两批学生，共 18 人，我们考进学校后，虽然只进过一次教室，领了讲义，听了宣布学习计划，还没上过一次课。因为五弟参加革命较早，我和冠群入学后，同他一样，也都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所以，学校又宣布开除的第三批学生中，不仅有五弟，而且居然把我和冠群也列入名单之内。这一批共开除 72 人，除我们弟兄三人外，记得起姓名的有：宋良猷、孙孝承、毛定方、方复生、姚昭德、崔大权、肖家驹、高泽普、严家钰、左觉农、王明昭、王若槐等，其中有一些是高年级学生。

学生们到处发快邮代电呼吁各方支援，我们也曾向襄阳各方面上层人物和开明士绅请求支援。并派代表到武昌请愿，五弟是代表之一，斗争的目的是揭露学阀单家桨，要求学校收回成命，让被开除的学生返校。

那时已是 1925 年 3 月，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重申联合共产党人的决议。学生们就在襄阳市内鼓楼上召集会议表示声援，这在当时北洋军阀统治地区也是一种革命行动。1925 年“五卅惨案”，学生们组织了襄樊学生联合会，成为全国学生联合

会的一个分支,积极进行抵制英、日外国货的斗争。从此,襄樊学生运动就具备了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谢远定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带着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的使命来到襄阳,负责秘密建立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当时国共合作,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并借以改变国民党的成分,对外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名称,对内则同是一个组织。鄂北国民党组织也就是从那时建立起来。

学联发动抵制英、日货,主要是不准运进三种东西:哈德门香烟、壳牌煤油和太古糖,如果一经查出,立即没收。记得没收的东西很多,堆放在汉江堤坡上面,从襄阳小北门到大北门堆了一里多长,有四五米宽,两米多高。有一次,发现52条装运太古糖的货船向老河口方向开去,我们就把货船扣了下来。谁知第二天早晨天不亮他们就偷偷开走了。我们听到消息不约而同地集合起来,向竹条铺方向追去,追不多远就将船截住。船老板给我们说好话,泡糖水请我们喝,我们也不答应,只叫他们把船开回去。他们不肯开,学生们一拥而上把船舱打开,四个人抬一包糖往河里扔,一连扔了三四包,船老板傻了眼,才答应把船开回去,没收的糖堆放在樊城西南角火神庙里。通过谈判,商人认罚款8万块银元,保证以后不再贩卖仇货。我们将罚款交给学联,存入钱庄。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同情,民族资产阶级也支持我们抵制英、日货的斗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还捐钱给我们。

学联有了点钱,就出版了一张油印小报《襄樊学生》,四开版,红色油印的,内容主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

这个报纸由鼓楼北大街一家叫“过盛发”的笔墨文具店代销。“过盛发”原是肖楚女 1924 年离开襄阳以前安排它代销革命书刊的。诸如《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共产主义 ABC》和《社会进化史》、《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各种书刊都可以买到。先是半公开的，谁向他索购，便拿出来，后来买的人多了，就公开摆在店内书架上，书店生意也从此兴隆起来。

省二师学潮闹了十六七个月，对家里人我们只说还在学校念书。一直到二师换了校长，原说要收回成命，让被开除的学生返校，但新校长一到任变了卦，不肯收回，反倒把第十中学开除的几十个学生收进二师填补缺额。这本是校方采取的拉拢一部分学生来打击、孤立另一部分学生的手段。我们不懂得反动派在学生中制造分裂的阴谋诡计，反倒迁怒于十中同学，叫他们是“反动”学生。那时已是 1925 年秋季，学联已经有些力量了，就决定让原来被开除的学生们打回学校去，强迫校长接受我们的条件。当时二师第一宿舍住的是保校长的“反动”学生；第二宿舍住的学生是同情分子，其中有马恕庵、张伯容等；第三宿舍学生是中间分子。我们同第二宿舍的同学商量好动手时间，作了周密布置，他们在宿舍旁边出水洞口放根木棍，我们把木棍一抽掉就表示外边人已到齐，要他们打开学校大门来声援。校外进攻的队伍分成三股，一股从校外借梯子爬上第一宿舍对面屋顶去揭瓦作为武器，冠群参加了这一股；一股跳过操场旁边老君庙的矮墙进入操场，五弟在这一股；一股在学校大门外准备

冲进去，我在这一股。三路人马在东大街关帝庙集合，吃饱喝足后，同时出发进入指定位置，约好的口令是“言包”（讽刺好说话的人用语）。二宿舍值勤的人一见作记号的木棍抽掉了，马上叫起人来冲向大门。一宿舍的人也赶忙拿起杠子之类顶住。我们的人在房顶上揭了瓦向他们甩去，他们就顶着洗脸盆、被子等逃跑了。二宿舍的人来到大门上叫门房交出钥匙开了大门，我们就冲了进去。学校的庶务外号叫邓哈巴的给抓住了，就叫他拿钱出来给我们开饭，学校到钱庄支钱的大印也给夺了过来，以保证我们吃饭问题。那时老君庙旁边西城门守军听见学生吼叫声音，打电话向驻军张联陞报告，参谋长葛润琴说学生闹事，军队不要管。我们又派了几十个人去抓单家燊，他家门口有人拿着棍子守卫，冠群大吼一声，他们就不敢动手。但单家燊早已躲了起来，没有抓到。

我们打回学校后，担心“反动”学生再打回来，大家昼夜在屋顶上站岗放哨，如临大敌。就这样僵持了三四天，襄阳县长来了，带了二十几个打手，说是来调解的。先不让他进，后来让进了。谁知都是新校长勾结校外流氓来里应外合的，来人身上都藏了石头弹子。他们进来后，外面又叫开门，我们不让开，双方就打起来。我们黄家三弟兄都在场。有两个人乘我不备，抓着我的双手，另一个人手握石头朝我胸膛使劲打过来。流氓们打进学校来，我们就都撤退出去了。解放后有一次例行检查身体，才发现我右边肋骨被打断过一根。

一直到1925年秋，二师被开除的学生才陆续被收进第

十中学，闹学潮期间也算学籍，因此我被编入初中三年级。校长叫陆云龙，他想打学联那笔 8 万块大洋的主意，就活动道尹（相当于现在的专员）出面，声称行政长官有权过问这笔钱，要拿一些给学校办图书馆。学联当然不答应，说这是襄樊学联的钱，应当上交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陆云龙等又耍了个花招，学联原先存在钱庄的是大龙票，1 元顶 1 元，1926 年的正月龙票改换成横票，1 元钱只能兑换 7 角钱，他们就和钱庄勾结，扣我们的钱。学生们大闹起来，钱庄不敢不如数归还我们。可是这样一来，第十中学又把我们那批人给开除了。不过没有多久学校又不得不收回成命。

襄樊的学生运动，在鄂西北一带影响很大，它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对我党在鄂西北的建立和发展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襄樊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当时我还是普通的学生，只是积极参加活动，没有参与策划工作，了解的情况有限。但至今回忆起当年学生们蓬蓬勃勃的革命热情、轰轰烈烈的斗争活动，依然历历在目，令人神往。

我在参加襄樊学生运动中，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新青年》等等，初步接触到革命思想，最爱读的是《中国青年》和《向导》。虽然我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比较强烈，但对共产主义只有抽象的了解，只知道要革命，认为三民主义不彻底。1925 年的一天，我在第十中学时，被接受加入国民党。那一天张宗谦通知我到关帝庙去，他和方复生都在那里，张宗谦

叫我填了一张表。以后记得开过两次会，都是秘密的。第一次是到老龙堤开的。另一次在教室里开的，是在刚放寒假准备回家之前的一个晚上。天上只有半边月亮，屋里没点灯，进屋后各人找个地方坐下来，互相不打招呼，气氛很严肃。听声音，靠窗户坐了两排人，约有二三十人的样子。人到齐后，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也来了。宣布开会的是高如松。讲话的是宋良猷，主要叫大家要买书读，回家后每个人要宣传三个人等。我回家时路过枣阳县城，曾经到白水中学向三个学生宣传革命道理。

1926年1月，我在第十中学经地下共青团组织接受加入共青团。那是在1月23日左右，先是谢远定找我谈话，问到我对民生主义的看法。我讲平均地权虽然好，但怎么才能实现呢？他启发我说，平均地权以后还会发生两极分化，不彻底，不如共产主义。他一讲共产主义，我思想就通了，懂得不消灭私有制，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的。从此以后，我就一心一意认定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党怎么决定，自己就怎么执行。入团宣誓是在谢远定的屋子里举行的。

我加入共青团后不几天，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要派我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我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因为在思想上一直把广州看作革命圣地，从前不愿当兵，是不愿自己人打自己人，现在打反动派，干！一同被派去学习的还有一个襄阳人李维臣，也是第十中学的。当天晚上我把要去黄埔学习的事告诉了五弟，他当时可能已经入党，但由于有保密纪律，弟兄之间也不能随便探问。第二天一大早，我拿个白布

包袱包了两件衣服，带了几块钱，就和李维臣一道，按事先规定在校门外等候组织派人带我们去取介绍信。后来十中一个高年级学生来了，带我们去谢远定住处。谢的妻子王文宣把介绍信交给我们，告诉我们信封上写的是假名（好像是梅书渠三字，实际上是“秘书处”），接头人叫李子芬，在武昌大学教书。就这样，我和李维臣就动身去武汉了。我们路经枣阳县城时，住在白水中学，遇见了秦超、王恩、李任达和王震三等几个熟人。这是我第二次到白水中学。1925年寒假，我第一次到白水中学时，该校教师曾用暗号问我，看出我还不是共青团员，这一次路过，一说都是“中学同学”，就明白都已入团了。因为当时“中学同学”就是共青团的代号。

1926年2月下旬，我和李维臣动身去武汉，这是第一次到大城市，心中无数。从广水上火车，在车上和人拉闲话，认识了河南邓县一个跑外的药店店员，叫我们跟他走，住药铺。下火车后叫上一辆车到了大夹街药铺，说我们是他老板的亲戚，早饭后药店店员送我们到码头上船。到了武昌城，在铁路线经过的蛇山洞旁边，找了一家大瓦房的旧客栈住下，才去武昌大学收发室（内部的），交了介绍信，并且，留下我们的地址。两天后，湖北省团委书记李子芬来了，说我们晚了一步，去广州黄埔军校的人已组织成一批出发了。他问我们两个人自己去行不行？如果行，可以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找杨贤江，办理去广州的手续。就我个人说，是一心想去的，但因考虑到李维臣一路上表现胆小怕事，好像额头上写有“共产党”三个字，怕人认出来一样，和他再往前走，经

上海、香港怕出事，又不好丢下他我自己走。李子芬看我们没有肯定回答，就表示不去黄埔也行，秋后就要北伐了，等北伐军打来再说。于是我和李维臣又动身回襄樊。后来李维臣在1927年果然自首叛变了。

回襄樊时途经枣阳县城，又去白水中学，中共枣阳县委（当时还是特别支部）竭力劝我留下来，说枣阳北区需要开辟工作，建立党、团支部。当时，我大哥黄山农虽已不在枣北钱岗镇小学当校长，但在那里还有点旧关系，因此我就同意留下工作，让李维臣带个口信回襄阳，向组织汇报。那时是1926年3月间，我就去钱岗镇小学，以教师为掩护职业，开始了发展组织的工作。我自任国民党区分部常委，对认为合格的人先接受他加入国民党，以后再根据表现发展为共青团员，对象大都是自己了解和信得过的、比较熟识的学校教职员工，还有的是襄阳同学和唐河读书时期的小朋友，这些人思想一致，感情较好。

3月，枣阳县委决定，由县委书记程克绳和委员王平介绍我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叫杨世馥，后改名杨士夫，是唐河县南张博士店附近万庄人，原先和我在简易师范同过学，以后经我推荐到钱岗镇小学教书，和我共事。第二个叫韩顺时，是个摆小摊的小市民，和我家是世交。我们已有三个党员，就建立起钱岗镇党支部，我担任书记。支部归枣阳县中共特别支部领导，工作范围是以钱岗镇为中心，在枣阳东北区和北区活动，以小学所在地关帝庙为基地开展工作。发展的党、团员记得有吴益吾、胡远达、邱麓

亭、李寿亭、闵慈祥、马恕庵、马明则、张含汉和我的堂弟黄冠群、黄冠英、堂兄黄奇泉和舅家表弟张慕谦(张宗让)等,前前后后发展了约有十几个人。再加上发展为国民党员的,如马和亭等,人数就更多了。

钱岗镇小学地址在关帝庙。庙里东面两小间原先是供奉马王爷的,现在由我和杨士夫两人住。两个姓任的住西屋。钱岗镇是土豪恶霸民团团总任殿煌的老巢,他本人是小学学校的校董,两个姓任的教师都是他的同族,一个叫任新启,是穷苦人,另一个叫任继建,是校董的耳目。我们为了工作方便,把这两个姓任的都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五六月间,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看到大会决议,并接到通知叫准备迎接北伐军,要作青天白日旗和农民协会大犁旗。我就去买了点白布,回到杨庄自己屋子里悄悄用比例尺画好,涂上颜色,做了面农协的旗。做好后就把它藏在我家后院靠墙栽的花椒树下墙缝里。前两年据家乡来信说,事隔五六十年,旗子已经查找不到了。记得当年我做好农协旗以后,不懂得怎么着手组织农民协会,就找我二哥民则商量,让他和黄冠群弟兄一起,发动我们家乡山里的农民成立农协。

北伐军占领武汉,北洋军阀赶紧叫各县成立县议会,妄图收买民心,搞贿选,夺取领导权。革命阵营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主张搞议会政治,要枣阳县以钱岗镇为中心和国民党竞选。这时任继建就露出了真面目,暗示说我们游行、喊口号,会引起与民团的冲突。他接受任殿煌命令,出面

代表民团和我们谈判，讲条件。

到七八月，选举还没有搞起来，河南唐河县的绿枪会就打过来了。绿枪会、红枪会都是当时贫苦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一下就开来几千人，向民团要吃的、要枪支。为了做争取团结工作，我们就派党员参加绿枪会，堂弟黄冠群、黄冠英都参加了，堂兄黄奇泉也参加了，还当了绿枪会的一个头头。任殿煌吓坏了，就和襄阳驻军张联陞勾结起来，派了一团人把绿枪会打垮了，退回河南。据说黄奇泉后来一直在红九军二十六师工作。任殿煌赶跑了农民武装，叫任继建来找我，对我说，黄冠群手里还有枪，最好叫他自己交出来。我一方面赶快写信通知大哥，要冠群注意，防备任殿煌下毒手，我在信后特别写了一句话：“路边的草，冬天终归是要枯萎的”，意思是反动家伙最后总是要垮台的。另一方面，我看出来任殿煌一伙已经注意上我了，土豪恶霸是翻脸不认人的。为了防止意外，我向县委汇报了上述情况，恰好当时县委打算派我去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受训，因此我就离开钱岗镇，把支部工作交代给杨世馥。1927年春，我去武汉之前，接到过枣阳县委送来很多份共产党员入党登记表，钱岗镇小学不便存放，我只好把它们送到王大桥交给王跃先保存。

我在钱岗镇工作这一段时间，除开建立党团组织外，主要做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当地没有工人，我虽然在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中做了些工作，但在工农群众中并没有扎下根。

武汉参军前后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政治军事形势很好。10月,湖北省委决定枣阳派两名女同志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受训,县委指名要我妹妹黄海明去。海明当时还没有正式参加共产党,临动身去武昌前才办理了入团手续。十一二月间,省委又让派人去,枣阳县委派我大哥黄山农、五弟黄民钦分别到湖北省工人运动讲习所、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指导农民运动。1927年4月初,县委又决定派我去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受训。我到达武汉那天,正是北伐军继续向北进发的时候。在火车站上遇见一批军队整装待发,整齐严肃地列队坐在铁轨旁边地上,倾听何香凝给他们作动员讲话。何香凝站立在站台上,衣着很朴素,围着长围巾,看上去有40多岁的样子,讲话时神采飞扬,激昂慷慨,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进工人运动讲习所要经过考试。参加考试的共产党员、团员先集中住在汉口友谊街尚德里市团委的房子里,交待做好考试准备。记得是许之桢主持入学考试,地点在德国中学。入学后,我被分在第一所,对外叫工人运动讲习所,实际上是培养县、区级党、团干部的,学员全都是党、团员,地址在汉口黄梅会馆,所长许之桢,学习时间规定为3个月。第

二所设在德国中学，学员是一些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5月1日这一天，召开太平洋劳动大会。我到武汉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参加太平洋劳动大会。大会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大会，地址在武汉跑马场。广场是望不到边的人群的海洋和望不到边的红旗的海洋。我的兴奋心情无法形容，真好像全身的热血都沸腾了一样。我们全体学员列席参加会议，就算是我们的开学典礼。我妹妹海明那时担任武汉工人纠察队训练班女生队长，带着队伍在会场外面站岗，斜挂着一根武装带，看上去满神气的样子。会场内满天红旗飘扬，十分壮观，口号声此起彼伏，令人心情振奋。那天我第一次看见刘少奇，他穿着西装，衣着整洁，风度翩翩，是个青年学生打扮，讲话时好用一个手指头一点一点的，多年后他讲话还是那个姿势。上台讲话的还有英国老的工人领袖汤姆斯。他满头银发，由一个中国青年人叫黄平的为他翻译。共产国际派来的印度人罗易也在会上讲了话。

在武汉这段期间，除五一劳动节召开太平洋劳动大会这件大事之外，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收回英租界。工会组织了几万工人，一声令下，就把江汉路站满了，简直是水泄不通。英国人赶快通知外交部长陈友仁，陈友仁通知英国人把警察撤出来，工人群众就把英租界占领了。中国收回了武汉英租界的管理权，江西九江也就照此办理了。

工人运动讲习所开了学，可还没有来得及上课，5月中旬，突然传来驻鄂西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的消息，其前锋已到纸坊，直逼武汉。武汉政府掌握的军

队大部分开往河南继续北伐去了，后方极为空虚。街上只有靠 3000 工人纠察队队员和 8 万童子团（十七八岁青年）维持秩序，形势危急。武汉国民政府临时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编为一个独立师（侯联瀛任师长，施存统任党代表），会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由当时二十四师师长、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统一指挥，开赴纸坊迎敌。

一天晚上，我们刚吃过晚饭，听见紧急集合的声音，大家正在纳闷的时候，市委组织部魏部长来了，他是个法国留学生，个子不高，穿西装。他对我们讲：因为形势紧张，市委决定除了妇女和少年外，动员大家全部参军。这一下可炸了窝，男同志欢欣鼓舞，女同志急得又哭又闹。有个叫张淑珍的，闹得最凶。我妹妹海明一下子跳到主席台上，痛哭流涕地放了一通炮，说什么革命要讲男女平等呀，为什么男人能当兵，女的不行呀？童子团也跟着起哄，说：“不要我们革命呀，谁不要我们去，谁就是反革命！”这下子不好收拾了，最后决定“都去！都去！”大家才破涕为笑。

当晚，我们乘着月色从汉口出发，由中央军委的周唯真带着我们去营地。街上童子团几十步一岗，手持棍棒维持秩序，没有口令不能通行。我们一直被带着经过粮道街到了武昌胭脂山，从一条斜着的小道走到山上一个庭院待命。中央军委就在这里，农民协会也在那里。周唯真还给大家讲了话。他是四川人，在《向导》上写过文章，可能是法国勤工俭学学生，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我们一直等到深夜，又困又饿。那晚有月亮，半夜里组织上派人送来鸡蛋糕，每人两块，

又喝了点水，体会到了党的关心，心里觉得很温暖。以后又派人来带领我们到平湖门外的一个军营，那地方的老地名叫做“老骑兵团”。我们这批人就在那里住下来，和那里的一部分人汇合起来。同院住的从广东来的农民军编为中央独立师补充第一营，我们武汉来的就编为补充第二营。我们第二营有两个连和一个女兵连、一个娃娃连，我妹妹海明是女兵连的连长，我是第二连的战士。因为中央独立师已经出发打夏斗寅去了，恐怕被人看出虚实，我们部队连夜悄悄开进独立师的空营房，接替军校岗哨，虚张声势，装作独立师没有走的样子。

当时，我们参军就是为了打夏斗寅的，水壶、水杯和背带等都准备好了，非常急切地盼着上前线去。可是等了几天，却说夏斗寅已被打垮，中央决定要我们不回学校去了，叫大家仍留在补充二营。我们二连的党、团员，占90%，一连是85%。也有些人闹情绪，七七八八的不安心，说地方上派我们来是受干部训练的，不是当兵的。那时恽代英任中央独立师政治部主任，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实际负责人，补充营里只要有人闹情绪、闹意见，他就去做思想工作。我们在补充营前后一个多月时间里，我记得他就去过三四次。他一去就集合大家讲话，说大家在补充营不是一般的当兵，是党培养基层工作干部，补充营实际上就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附属学校，不过穿的是当兵的服装，不是学兵服装，我们干革命也不在乎这个，等等。恽代英有点知识分子味道，风度也很潇洒，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讲话不多，但很有针

对性，他在青年中威信高。我自己当时的思想是：服从组织，干革命就得有牺牲，吃得差一点，苦一点，也不在乎。

周恩来也给我们讲过一次话。那一天下午大家在两湖书院也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地集合，靠墙坐在一个走道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他穿着一套干净的旧衣服，态度安详。他是在上海暴动后来到了武汉的，专门为我们做了关于上海暴动经验的总结报告。那时蒋介石命令薛岳进占上海，上海工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党中央和上海总工会为了显示工人阶级力量，抢先组织暴动，并顺利接管了政权，但由于没有管理指挥那样一个大城市的经验，夺取政权后组织工作跟不上，敌人乘虚而入，我们就失败了。此外，中央有一个负责人尹宽也给我们做一次政治报告。

补充营的营长叫刘自志，湖南人，黄埔三期学生，后来听说上井冈山了。连长是江西德安人，黄埔学生，立三路线时我在上海从文件中知道他在领导江西星子游击队，可惜忘了他的姓名，也再没听到他的下落。排长黄魁是湖南人。在我记忆中营部没有设党代表，连部没设指导员，党支部工作就由连排长负责。在二营约一个多月时间，我是党小组长，记得开过两次小组会，一次是生活会，一次是推选去苏联学习的人。

补充营的生活够艰苦的。天不亮上早操，早餐稀饭管饱，还有两个小馒头，四碟子小菜（辣椒、炸黄豆、紫菜等等）。值日排长哨子一吹，一声“开动”，大家一片“呼拉呼

拉”喝稀饭的声音，排长一声“停止”，大家抓起两个小馒头，就往楼下跑，边跑边吃，到楼下排队。那时正是夏天，天天背枪打野操。从平湖门外往洪山跑，有时往珞珈山跑，来回 20 多里路，爬上滚下，天热路远，硬是一个多月没洗个痛快澡，那个流不完的汗和身上的酸臭味呀，别提多难受了。女兵更辛苦，也和男兵一样野操，说一声“下水”，女的男的一样往下跳。午后在操场上操、刺枪、射击、瞄准、擦枪等等。晚上睡也不安稳，有时来个紧急集合，打绑腿可就成了个大负担。睡觉时不解开吧，值日排长查出来算犯纪律，打开吧，又怕突然集合来不及打好。于是先睡一小会儿，等查过铺再悄悄把绑腿打好，一声号令就能集合。有时情况紧急，就传令：“今晚睡觉不准解绑腿，子弹带不准下身子，有情况马上起来。”真是“枕戈待旦”。有一次还闹了一场虚惊。一天晚上饭堂里“叭”地响了一声，好家伙，把大家都惊醒了，一个个都跳起来，抓起枪，爬在走廊两边，准备战斗。后来连长喊道：“你们干什么呵？敌人在哪里啦？”经查看，原来是饭堂里的灯泡炸了。思想上太紧张了。

记得还发过 7 元 5 角钱的国库券军饷，实际购买力等于 3 角钱，我就买点新鲜莲子吃。还有青龙巷的牛肉豆丝，又便宜，又解馋，有了钱我们就去吃一碗。假日允许外出，但要军容整齐。那时我大哥在武汉市燃料业总工会任秘书长，我星期天就老远的跑到他那里去，大哥总是给我几个铜板去打二两白酒，买点花生、卤肉，一块吃吃。

在补充营每天就这样上早操、打野外、上政治课、学士

兵操典和军事理论，紧张地生活了一个多月。直到打垮了夏斗寅的中央独立师凯旋归来，才又回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那时国共关系日益恶化，共产国际指示要中共中央迅速武装 5 万工农，中央军委决定从我们中间选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培养军事干部。各单位都派了人去，我们补充二营选出十来个人，我和妹妹海明被选上了。以后，补充二营编入了卢德铭的中央警卫团，参加了南昌起义。

我在武汉这一段时间不算长，但自己感觉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所提高。从前，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我只是根据自己切身感受到的，在几年小学教师生活中，懂得了地主恶霸是压迫劳动人民的，校董大都是地主、恶霸，他们勾结军阀、官僚为害乡里，是军阀、官僚的统治基础，民团与土匪实际是一回事。经过武汉一段生活，才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掌握政权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当时我们的工会具有半政权性质，武汉三镇有 3000 工人纠察队和 8 万童子军都归工会指挥，工会对汉奸、敌特、工贼、恶霸可以自行决定处以死刑。

我在入党以前，由于痛恨军阀混战，祸国殃民，曾经决心一辈子不当兵，入党以后，认为党中央的政策、主张都是正确的，上级的决定是不会错的，组织怎么决定自己就怎么干。当兵，只要对革命有利，死也光荣。以前我读革命理论书籍很少，只看过一些小册子。我喜欢读报刊，当时我党对国家大事都公开发表主张，我最爱读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我相信共产主义。在武汉时期有时听见一些青年议论，

说在苏联学习的人理论上“行”，但在处理中国实际问题时“不行”，而在国内工作的人，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不行”，等等，自己听听也就算了，不懂得党内还有斗争。那时，有好些同志从法国回来，工作很活跃，我认为他们有干劲，肯实干，不尚空谈，非常钦佩。我认为既然干革命，就应该这样实干。

到苏联留学

1927年6月，我们兄妹离开了军队生活，和补充营其他几个同志准备一起经上海到苏联去。动身之前，大家都脱下军装换了便服。唯独对于我的妹妹一路上怎么打扮才安全，大家开始意见不一致。有些人主张干脆打扮成男孩子，因为她剪的是个男孩子头。后来恐怕露了马脚反而不好，因此决定还是穿女装。她剪的平头，穿件蓝布旗袍，有点不男不女，只好找了顶大帽沿的厚草帽戴上，把平头盖起来。那时她还不到20岁，我已经26岁了。临行前，我们两人去向大哥告别，恰好五弟民钦从应山来武汉办事，大家高兴极了。因为我和妹妹去社会主义的发祥圣地苏联，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兄妹四人最后一次合影，就是那天在黄鹤楼照的。大哥要叫我们带点钱，我们不肯要，认为一切有组织照管，身上只要有三四块大洋，上了船就没事了。

我们这一批被选派去苏联学习的共70多人，上海地下

党组织原准备用5万大洋包一艘船送我们走。当时白色恐怖猖獗，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和公安局长杨虎等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就在我们到达上海头一天，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不幸被捕。这样一来，我们接不上组织关系，狼狈万状。身上有钱的就买船票回武汉去了，身上没带钱的连住店、吃饭都成问题。我因为和妹妹在一起，有个女的，旅馆还照顾一点，让我们住。我们住在四马路和浙江路交界处的大生旅馆，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房间，只一床一桌。我们从武汉动身时编在一个小组的还有组长陈推、组员秦超（又名秦志铭，湖北枣阳人，是枣阳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和李永达三个人，秦、李都是枣阳同学。他们白天在马路上混，晚上就来我们住处，四个人横着睡在床上，脚蹬着桌子。我在箱子里装上包着的砖头，假装有行李；白天到街上就对着水龙头喝自来水解渴，身边仅有的几元钱不敢随便花。住了两三天，旅馆催要房钱，真急人，后悔没要大哥的钱，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上海。忽然想起上海有个枣阳同乡在工厂当工程师，叫刘益元，不如找他借几个钱送我妹妹住学校，或者帮她找个职业也好。我就给刘益元写了一封信，他接信后来看了我们一趟，旅馆掌柜的看见有本地穿西服革履的人来往，对我们态度也就缓和了一些。

值得庆幸的是很快我们就接上了组织关系。组织上发给我们兄妹二人一张10元的钞票，但房租已欠了十四五元。有一天，接到通知叫我们到浦东上船准备出发，我就把报纸卷成10元纸币大小，假装都是10元纸币，外面裹上那

一张真的 10 元钞票去付房租，我当面抽出外面一张真的钞票给他，表示我还有不少钱，其余的下次再付。就这样我们就逃离了旅馆。

通知我们到浦东上船的人因为俄文欠佳，把时间搞错了，船还没有卸完货，就叫我们上船。船是苏联人租英国人的，是一艘叫“恒利号”的 3000 吨货船，老板是苏联人，船员都是华侨。我们几十个壮小伙子，5 人一张船票，在船上等着卸货装货，足足等了三天，幸而还没有暴露。可是船不开就开不了饭，大家又饿又渴，只好买点碎冰块喝刨冰。这时又发生了件意外的事。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正到处抓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华的苏联顾问成了不合法的人。苏联在秘密工作方面，当时可能也没多少经验，几个苏联顾问到外滩公园对面苏州河口苏联驻华领事馆里躲起来，准备搭恒利号返国。船快开时，他们坐在一个拖船舱里，由一艘小汽艇拖着开过来。船舱打开后，6 个苏联人走了出来。国民党特务一见，马上从龙华方面开来一艘快艇，一群当兵的上船搜索，另一批便衣特务也跳上船来。结果把 6 个苏联人带走，把开船的许可证也拿走了，接着就盘查船上的人。

陈推等几个有经验的人，穿了西装革履，躲过了盘查。我和妹妹早就商量好，承认她是个女孩子，我是小学教员，兄妹到哈尔滨道外找开兴隆茶庄的哥哥，送妹妹去上学。什么“道外”、“茶庄”这些话，都是我过去从地理教科书上读到的，这时搬出来应付。那些当兵的交头接耳地仔细端详我妹妹，猜她是男是女，因而引起盘问。一面又说我站立姿势像

个当兵的，我忙解释说我是个体育教员。特务们要我兄妹写哈尔滨茶庄名号时，海明把兴隆写成兴龙，我忙解释说她识字不多，算过了关。所幸那些当兵的口音是北方人，我就和他们拉关系，说都是北方人，是乡亲等等。这帮人走的时候，把我们当中的6个人带走了。有个军官模样的人和那些特务要把我们兄妹也带走，几个当兵的讲话了，说没有证据，不用带，使我们躲过了抓捕。但因开船的许可证没取回来，船还是不能开。

那时正是夏天。天气炎热，船上空气又坏，统舱里装的货是大蒜，我们就睡在大蒜上面。后来实在难受，我和妹妹就从统舱里钻出来，到甲板上坐了一夜，又渴又饿又疲倦。早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天上还有月亮。我一方面担心被抓去的人把我们给供出来，心里七上八下，就怕忽然再开来一艘快艇；另一方面又怕妹妹万一想不开，火气上来，一头栽到大江里去，还得找点闲话给她宽心，说什么月亮照着水面真是好看等等。好容易等到天亮，我花了六七个铜板买了一块冰渣，两人分着吃。从看见外滩路上人来人往，一直到寂然无人，以后又逐渐有人来往……。真是过一分钟像过一年一样。下午，苏联领事馆送来了开船许可证，头天抓去的人也放了回来。

下午1点多钟，海关来查验过船证后，船就开动了。船刚开出码头100多米，大家好像是绝处逢生，光明在望，一下子就都轻声唱起共青团团歌，歌声此起彼伏。到了吴淞口，一艘小炮舰突然向我们驶来，又是一惊。幸而只是来查

验出口许可证的，大家才平静下来，小炮舰一开走，船上就开饭，大米饭、咸肉熬南瓜，管饱。大家都在甲板上观赏海上风光，兴致很高。次晨一出吴淞口，长江的水奔流出去像一条黄色的带子，大海的水冲打过来像一条青色的带子，青、黄两股水来回激荡翻腾。鱼群追逐着货船前进，一群1米多长的大鱼约有几十条，跳起来一丈多高实在壮观。碧海白浪，惊心动魄。但是，很多人开始晕船了，又恶心，又想看，双手蒙着脸，从指缝往外看。头一天还好，第二天更不行了，都晕船，加上这船是运蒜的，货舱里空气很坏。爬到上面甲板上去看看，空气好些，但摇晃得受不住，还得下到统舱里去。结果，大家都呕吐起来，我妹妹到底是女孩子，又吐又哭，叫着我问：“四哥，怎么办？”我那时也晕得难受，心里又着急，顶了她一句：“我还难受呢，有什么办法？”第三天船到日本海，晕得稍轻一些，才能到甲板上走动走动。5天后船到了海参崴，上了岸还感觉陆地像在摇晃。但总算到了苏联，皆大欢喜。海参崴是一个1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国民党驻苏联的领事馆，上岸后，有人通知我们不要到街上乱跑。医生来给我们检查身体，不合格都不能入境，幸好我们这些都合格。医生全是白俄，因为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培养出自己的医生。我们这批人在海参崴住了些天，才坐火车去莫斯科，走了11天才到达目的地。在车上大家拚命学习俄语。

8月底，我们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学校在野营休息，因此我们立即被送到野营营地，和已经来到苏联的中国同志见了面。

我妹妹和另一个女同志张淑贞被分配到共产主义东方大学。我们男同志分配到东方大学中国特别军事政治训练班,主要学军事。对外讲是一个非军事组织,不穿军装,穿一色的青呢子制服,戴帆船型皮帽子,但发枪支。学校校址在普希金广场边上,宿舍在马雅布拉街12号,教室和消息报社紧邻。教室右边是个俱乐部,教室对面隔条马路是个小教堂,也就是我们的食堂。学校共分七个班,每班40多人,各编为一个排,三个排合编为一个连。第一、二、三排为第一连,第四、五、六排为第二连,第七班单独编成一个排。第一连大部分是参加过上海暴动的工人,以及从各地调来的先进分子,如河南农民马长久等;第二连大部分是国共分裂前夕从武汉来的,有工人、士兵和学生,我在二连;第七班主要是国共分裂后送来的,有大学生、黄埔学生和南昌起义失败后的军队干部。负责管理学校的主任是犹太人马尔舍夫上校,副主任是马马也夫,还有一个苏联人专负责教射击。两个担任生活和教学翻译工作的中国人都是参加过苏联内战的,一个姓王,担任射击课程翻译,另一个俄文名字叫萨洛夫,担任生活翻译。连排长都是指定的,二连连长先是张义吾,后来是我。一般不许称呼中国姓名,我的俄文名字是伊劳托夫。

特别军事政治训练班属于短期速成训练班性质。因为当时据说中国革命又进入高潮,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军事干部。不设俄文课,一切经过翻译。除军事课外,政治课也不少,如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

史等。担任讲课翻译的是赵毅敏和刘鼎等。我对学习是满意的,许多东西过去我都没学过,比如这时才懂得布哈林是机会主义,自己感觉在理论上有所提高。我最爱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和射击,记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笔记。射击成绩很好,曾和一个朝鲜同学一起参加过一次全苏非军事学校射击比赛,但没有获胜。学校也训练学员学习一些回国后的掩护职业,如开汽车、修表和照相等。我喜欢修表和照相。修表是一个汉阳兵工厂的工人教我的。

记得有一次野外演习,一般规定气温在零下 20℃就不能打野操,那天城内零下 20℃,一出城过了莫斯科河,气温就低过了 20℃,第二天早晨到了零下 40℃。那一次野操我恰好是演习指导员,简直冻坏了。在温度低时,首先鼻尖、手指和脸皮发白,严重的发黑,说明肌肉已坏死,要开刀,发白的只需用雪摩擦。冻得手脸发白的同学很多,我因脱手套抓雪,手指由发白而僵硬了。

学校对我们很照顾。在文化生活方面,常常能看到电影,还到大戏院看过乌兰诺娃的《天鹅湖》、《睡美人》,也为我们组织过专场话剧演出。可惜我们没有专门学俄语课,听不懂。每个月还发 7 卢布零花,买牙膏之类。吃饭是定量的。

学习期间,曾发生过一次学生闹事。有些小知识分子学员认为在特别军事政治训练班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不够味,想到东方大学正规学习班学理论。当时联共党内批判托派的斗争正在高峰时期,托派分子就乘机在中国留学生中间挑拨闹事。因此发生过一次有百把个人排队游行,到共产

国际东方部请愿的事,我和其他学员对这次游行闹事都很反感。

192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有了变化,认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搞“速成”训练没有用,因此把特别军事政治训练班学员都转入其它正规学校学习。学员中除少数转入中山大学外,绝大多数转入军事学校。1929年“中东路事件”^①发生后,有一批学生调去远东,做东北三省的工作。

特别班学员转入军事学校,一般是由自己申请,组织批准。我和秦超等一二十个人被分配到高级射击学校,另有六七十个人分配到步兵学校。不到两个月,我们这批高级射击学校的学员又都合并到步兵学校,成立“中国连”。在我们去之前,南昌起义后来到苏联的一二十个人也到了步兵学校,其中有我以前襄阳二师同学方复生等。中国连实际上和步校不发生领导关系,直接由共产国际军事部马伊努斯基领导。步校负责主持中国连学员教学工作的是波兰人彼得洛夫斯基上校,他参加过苏联内战,担任副职的是瓦尔特曼中

^① “中东路事件”是1929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由于中东铁路纠纷而发生的一次武装冲突。中东路是沙俄为了侵略目的在中国东北境内修建的一条铁路。根据1924年中苏协定,铁路经营业务由中苏共管。1927年后,国民党政府奉行反苏方针。1929年国民党政府以武力手段强行接管了中东铁路。10月东北军向驻守在满洲里等地的苏军发动进攻遭到失败。经谈判,12月又恢复了中苏共管中东路局面。

校,俄国人。中国连连长干尼科夫少校是苏联籍朝鲜人。连下设三个排,排长都是中国人。一个排长叫王智涛,俄文名字是泽林斯基。一个排长名叫吉合,俄文名字是吉合诺夫,他原名田修德,河南许昌人。还有一个排长是广东人,名字记不清了。担任中国连翻译工作的有伍修权。中国连单独成立党、团支部。在步校一年半的时间,我始终担任党支部书记,秦超担任团支部书记。学校军事课主要学习如何指挥作战,培养团级干部,但都是讲的正规战,如果当时能请苏联老游击队员来讲讲游击战就好了。

步兵学校中国连学员学习认真、刻苦,没闹过事,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校领导的重视。斯大林曾三次安排要接见步校师生,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实现。共产国际对中国连特别优待,伙食标准很高,单独一个灶,这在当时是唯一的特殊待遇。还专门派一个参加过苏俄国内战争的华侨名叫沙考夫的人到海参崴去买中国茶以及酱油等等调料,做中国饭菜,有时还吃饺子。很多学员都会做饭菜,苏联人觉得奇怪,问我们中国同志中怎么有这么多厨师?有好饭菜我们就邀请领导和客人来吃。我也邀请我妹妹和她的同学来吃过饭。她原先在东方大学,后来转入国际共产主义大学,她们那里吃的是苏联饭菜。

1929年,联共党内进行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步校中国连也开展了思想批判和思想斗争。当时我们受“左”的思想影响,批判起来无限上纲,不是实事求是的讲道理。记得有一个叫王一鸣的,原名王和甫,是枣阳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

一，原武昌大学学生，是个老好人，家庭出身是地主。有时他说一两句有点毛病的话，我们就提高到“托派思想”来批判他。1930年初，当我快动身回国时，他有一天忽然不见了，到处找不着。后来听说，半夜里他又回来了，领导上叫他住苏维埃训练班。以后又叫他回国自己找组织关系，没有给他作“反革命”或“托派”的结论，但只发给他回国路费，也没有给组织介绍信。解放初期，我在天津市工作时，接到王一鸣从汉口给我的信，说想当俄文教员。我把这件事和市教育局商量好了，回信叫他到天津来，但他没来信，也没消息。对他的事，我总有些放心不下，感到他在苏联时本来是一个共产党员，由于我们有“左”的思想，怀疑他是托派，使他离开了党。在这件事情上，我有责任据实给他平反。1983年10月，在对襄樊市委党史资料征求办公室的同志谈到鄂北去苏联的人物时，我讲了这件事，并告诉他们如查到王一鸣时应当给他平反，但始终没有确切的消息。

1929年，国内形势有变化，苏区和城市地下工作都有发展。1930年4月某日，彼得洛夫斯基上校找我去谈话，翻译可能是伍修权。一进门，上校就冲着我说：“伊劳托夫同志再见了！”我一下摸不着头脑。他才告诉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我和几个同志回国参加斗争。他把几个人的姓名告诉我，并叫我安排交代党支部的工作，当天下午到特维尔街留克斯旅馆去见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

瞿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像个文化人，说起话来慢吞吞的，讲话不多，也没有架子。他讲：国内形势好，需要

人，凡在苏联的都要逐步调回国去。又问我：回去带一个团行不行？我答说我是教书出身，带一个团有困难。他说：“有人领导嘛！”又告诉我，回去打游击战要搞个“根据地”。

我回步校后，把党支部工作交给艾仪之。他俄文名字叫布京，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后来回国，曾任红二方面军师政委，是个好同志，可惜在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了。

我们第一批回国的共6个人。我们在连队换了便服，就搬到特维尔街一家旅馆去住。恰好邓中夏也住在那里，他是搞工人运动的，很随便，爱说笑，还把他在黑海边休假时照的照片送了我两张。第二天我去看妹妹，她问我想吃什么，我想了想说，吃菠菜。她就给我煮了一茶缸子菠菜，算是饯行。我把我的政治经济学笔记都交给她，叫她有机会给我寄回国去。我回国后在上海工作时，她把笔记本寄到上海一个开小饭馆的人那里，由他转交给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李实。我那时无处保存这些笔记本，就经过李实把它们都送给了新知识书店。很可惜，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我和秦超、童泗等一行6人从莫斯科坐火车到海参崴，离开苏联回国，路上走了十来天。那时候回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秘密的，半夜里坐马车到边境上，有秘密交通站派人接。我们拿的华侨护照，是公开走的，每人发给15美元和两三元中国钱，沿途对我们照顾得很好，有鱼子酱和黄油吃。火车经过伊尔库斯克时，遇上大雪，车开不动。贝加尔湖湖面都冻结了，远远望去，一片银光闪烁，十分好看。我们6个

人从海参崴坐火车进入国境那个山洞时，身份马上从苏联的座上客变成秘密的地下工作者了。

在中苏边境，苏方出入境处检查极为认真细致，中国入境处则只看看领事馆的钢印，对对照片和性别就完了。

那时，绥芬河车站很荒凉，连卖小吃的也没有。从绥芬河坐火车前往佳木斯，路上感到极饿，我们就买了只烧鸡吃。午后2点钟左右到达哈尔滨。到了哈尔滨，我这个北方人就有了用场了，一切由我出面接洽办理。那时山东发生灾害，逃难的人都往北边跑，车站上乱哄哄一片，查问不严，我们趁机混了过去，买了从哈尔滨到长春的中东铁路四等车车票。运难民的火车一开走，车站上空了，我们几个人就显得很突出。往长春去的火车要5点多钟才开，这几个钟头真是难熬，几个人便分头各干各的，以免引起注意。我的身份证是海参崴来的华侨，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等着。车站上的警察没事找事，把童泗训了一顿。

天正下着小雨，广场后面有个小店铺卖酒，我跑过去买了二两烧酒，一包花生米，和小铺掌柜的拉家常。一直磨到天快黑时，火车才开。

一上车，我们赶快把假护照撕了，以销毁是从苏联来的证据。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七八点钟至长春。从长春换乘南满铁路的车去大连，也要在站上等好几个钟头。我和秦超找了一个小饭馆吃饭，多给点小费，尽量磨时间。好不容易到了大连，又因为火车误点，船已经开走，要等两三天才有船去上海。我们只好在车站附近找个旅馆住下，夜里到街上走

走,看看热闹。一直等到5月中,我们才乘坐日本船“奉天丸”去上海。日本人把中国人当成奴隶一样,上船之前要排队等候检查,有病的还不许上船。

回想我从1927年8月底到莫斯科,1930年4月下旬离开莫斯科,前后两年多时间。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中国革命在苏联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很重视的。无论在会议上讲话中,或口号方面都把中国革命摆在重要位置,表现出深切的期望。就我们步兵学校而论,学校虽不算大,但政治上、组织上都受到比较好的照顾。

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对我的安排也是合适的,头一年学政治,又学军事,各方面都获得一些知识。只是俄文一直都没有学好。因为头一年没有俄文课,听课经过翻译,我的俄文没有基础。以后又担任一些负责工作,如当连长、支部书记以及其它一些社会活动,没有时间专门学俄文。因此,到后来对政治课和军事课都只能听懂七八成,不是每个字都听得懂,军事术语可以凑合讲一点。没有想到只学成这样就奉命回国了。

在苏联学习期间,体会最深的是阶级观念。不同阶级的人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迥然不同。无论从课堂教育和社会生活中,都令人深切感到工农大众对我们很亲热,而敌对阶级的人和坏人、流氓则讽刺、辱骂我们,说什么:“我们的面包还不够吃,你们来干什么?”那时,我们每人每年可以有两次去休养所休养,有一次在休养所撞见一个老妇人,她挖苦我们。而另一位老太太则很热情地拉我们到她家吃饭,并告

诉我们那老妇人是个富农。我们去工厂参观，到糖厂，工人就把糖果塞给我们吃，到肥皂厂，就送我们肥皂。这些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此，回国时一过中苏边境，看见中国境内警察拎着棍子赶老百姓，我脑子里立刻联想到：“这是阶级敌人！”并深深体会到，政权是在敌人手里，政权如果在自己人手里，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另一方面，联共那种教条主义、混淆敌我的“左”的思想，容易把思想批判和政治斗争混在一起的作法，对我也有较大的影响。后来在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担任总支书时，我对有的同志批判斗争就有过火的地方。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我在思想总结中写过两句自我批评的话：“疾恶如仇有余，与人为善不足”。这两句话，当时的中央领导都是知道的。

对于联共骄傲自大的“老子党”作风，我们留过苏的人相当反感。当然，第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国家，是值得骄傲的，但什么都是它的最好，就不对了。你要一说苏联什么东西不好，他就说：“无产阶级的还不好？”外国共产党员要转入联共，还需重新履行介绍手续，处处表现高人一等。讲课也不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是按照苏联情况分析问题，这就培养了教条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的坏思想、坏毛病。

立三路线时期

5月21日到上海，船停在杨树浦，正好赶上天下大雨，码头上很乱，没人检查，我们赶快雇了黄包车走了。当初离开苏联时讲好的接头地点，就是我和妹妹赴苏联之前住过的四马路大生旅馆，因此我和秦超就在大生旅馆住了下来。

过了3天左右，和一位大个子姓王的接上头。以后中央派地下交通贺步青和我们联系，让我们换穿长袍大褂，还送文件给我们看。不几天，苏联步校的同学又回来6个人，我们就帮助他们接上了关系。

在上海等候分配工作期间，我曾意外地遇见襄阳二师一起搞学生运动的同学毛定芳和李实。毛定芳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知道我到了上海，可是我并不了解他的情况。有一天，我在上海天蟾舞台附近街上走过，他和李实迎面走来，挡住我的去路，他撞了我一下，说：“不认识了？”我不好说不认识，只支吾了一下，随即反问他住在什么地方，有机会去看望他。晚上，我照他讲的地址去找他，原来和我的住地相距不远，是一排中等旅馆。我去两次他都不在，屋里一个陌生人说他不在家。第三次去，毛定芳听见我的声音，就把我引进屋内，并给我介绍那个陌生人。他们因机关出了问题，临时搬到这个旅馆暂住，我这个不速之客两次来访，把

他给吓坏了。毛定芳向我讲了分别后的情况。他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和方复生分配到叶挺的独立团,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在东江作战中受伤回到上海,方复生到苏联学习,他留在中央军委周恩来身边工作,是一个得力干部。我自从和毛定芳遇见以后,在上海那段期间差不多 20 天总要碰碰头,见一面。李实和左觉农的妹妹左企云结婚,还招待我们在“清一色”餐馆吃了一顿广东饭菜。以后,我和毛定芳在中央苏区重逢时,他仍在中央军委工作,是参谋长刘伯承手下一个管作战的处长。长征中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总参谋部机关的一批干部如曹里怀、张际春、郭天民、毛定芳等都被调到四方面军办的红军大学当教员去了,我被调到党校当政治教员。后来过草地时碰见张际春,我问他毛定芳来了没有,他回答我:“毛定芳在四川炉霍害伤寒病死了!”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毛定芳对党忠诚,工作踏实,善于团结同志,是我党难得的一个优秀党员。

那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立三路线从此开始。

我和秦超的组织关系已由中央军委转到江南省军委。江南省委分管苏、浙、皖和上海一带,省委书记李维汉,军委书记石心,真名李硕勋。

第一次分配我和秦超到安徽宣城北边的广德县游击队工作,据说该游击队 100 多人。交代我们的任务是:占领宣城、夺取芜湖、切断长江。

地方来人和我们接头以后,就介绍一个中学生(同情分子)带我们到无锡,搭船经宜兴到梅渚,又走旱路到三甲镇,再往前走30里就到了郎溪。天下着大雨,他让我们住进一家姓王的客栈。不料这家人的儿子是有名的共产党员,在安庆工作,当晚公安局就来查店,以后又派人传我们去分开审问。公安局长是个黄埔学生,和我谈话时,背着手走来走去,说地方上治安不好,限我们第二天离开郎溪。我和秦超只好回到三甲镇,临走时给客栈老板留个话,如果有人找我们可到三甲镇去找。我们在三甲镇住下,一个人装病不能走,等了三天也没人来找。天下着大雨,我们只好返回上海。

第二次分配我们到苏北红十四军,先是李硕勋和我们谈了军事斗争形势,随后通知我们到英、法租界交界处大中华旅馆开会,听候具体分配。这个旅馆在当时相当有名气,每天房租要5块大洋。参加会议的有红十四军军长李超时(黄埔生)、参谋长李维森和宣传、组织部长刘瑞龙、张爱萍等五六个人。红十四军共三个团,第一团在南通海门,二团在如皋、泰兴,三团在启东。会上决定,秦超任第一团团长,我任一团政委兼参谋长。

谈话中间李维森突然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黄民钦的?说我和他长得很相像,又都姓黄。李说,武汉时期他在魏益三部当政治部主任,驻扎应山县,黄民钦在当地群众中威信很高,外号叫“农民大王”。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听见关于我五弟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

会议上给一团交代的任务是:向西发展、占领金沙、夺

取南通、切断长江，配合南京暴动。当时听了真觉得心中无底。

会后第二天，南通特委委员俞锡和（当地人）给我们交待了通讯联络地址。交通俞三（现据说名俞秀岩）、俞四（现据说名俞秀山）给我和秦超带路，坐小轮船到天生港，天快黑了，又走几十里路就到了游击区。这时已是1930年6月下旬。

游击区西到南通四甲镇，东到余东镇，北到三余镇，南到凤凰桥、麒麟镇。游击队极盛时期据说有600多人，我们去时，多则300来人，少则100多人。大队长蔡振德，是个中学教员，副大队长姓何，是个青年人，有一个中队长叫姜玉堂，还有一个小学教员叫袁胖子，其他人的姓名都记不得了。

游击区群众基础本来是很好的，但在立三路线时期，取消了党、团组织，搞革命委员会，既没有地方政权、群众组织，也没有明确的土地政策。军队中也没有党的组织，没有党的生活，行动都听大队长的。我和秦超虽是军队负责人，但我们都是青年学生，只做过一年多的地下工作，在苏联学的一套又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加上我们对立三路线在南通的一套作法信心不足，自己办法又少，因此只能是组织上服从，一切行动听从当地负责人决定。

那时叫打金沙，可是国民党在那里驻了一个团，简直是开玩笑，当时游击区内外地主武装也很猖獗，到处星罗棋布，有十几支枪的，也有二三十支枪的，在我游击区内也有

活动。但谁要敢说不打金沙，就是“右倾”。我原曾和秦超商量后向特委刘瑞龙提出过建议不打金沙，先在它的周围打几个小仗，以鼓舞士气。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还是坚持打金沙。于是只好说打就打。有一天吃过午饭，队伍大张旗鼓，吼天吼地地出发了。但早有人给敌军通风报信，设下埋伏，到距金沙还有 20 里路左右，遭到敌人伏击。我们的部队只有盒子枪，连步枪都没有，只好掉头就跑，过了一座桥，把桥板撤掉，敌人才没有追过来。后来我和秦超跑到一个镇上，找到了一些盒子枪和步枪。

第二次部队出发也是大白天。吃过饭，说要打汤家苴，那个小村子有民团，敌人从屋子里开枪打我们，又撤退了。

第三次，损失十分严重。吃过午饭，有人说敌人要打过来，得赶快转移。有主张走右边一条路的，有主张走左边的，我和秦超不了解地形，只能听大队长指挥。走不上 5 里路，又中了敌军埋伏，部队跑散，只剩下秦超和我两人。我跑了半里路远，跳过一条小沟，遇见了游击队员。秦超则因受伤过重牺牲了。这样一个思想纯洁、胸襟开朗、朝气蓬勃、组织纪律性强、忠诚、勇敢的好党员，可惜在立三路线时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第四次是去一个叫土地堂的小地方，不了解地形，只凭勇敢，打进去缴获一些子弹。当我一双腿跪在地上，正喊口号叫大家前进时，敌人的子弹打过来，我受伤倒地。战士们赶忙把我扶起来抱到一边，又找了块门板把我抬到凤凰桥，交给地下党负责人一个中学的校长照顾。他在农村中找了

一个懂西医的来看了,用开水洗洗,消消毒,涂了些药。那地方离土地堂只10里地左右,不安全,就给带了点药又把我搬到一个地下交通张三麻子家里。那是一个孤立的村子,四面不靠人家,有一条沟,沟西边有一两户人家。张三麻子家只有一间屋,用篱笆隔开,他家三口人(一妻一子)住一间,我住一间。我每天自己洗擦、上药。这地方正在大堤附近,距离骑岸镇5里地,有一次敌人骚扰,连枪声都听得见。当地照顾伤员工作做得很好,一有情况,就有人来把我抬去放到船上,划进芦苇里,等到没情况了,又有人来把我抬回去。小学教员袁胖子曾经去看过我。不久,又把我转移到姜家营姜老汉家里,他家三间草房,就他一个人。我吃过早饭就看表,盼望天快黑下来。每天随他一起吃饭,生活上没有特殊待遇。我年轻身体好,没过多久就能自己走动了。一次有情况,我就随着老百姓一起跑到一个大水塘子,池中心芦苇丛生,我们藏在里面能听见敌人讲话声音。20多天后,我被转移到秦超牺牲的地方。有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回上海养伤,由地下交通俞四雇车送我,下午到天生港,再买票坐船回上海,住在红十四军驻上海办事处。

我到上海时,中央正在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我第二次见到省军委书记李硕勋,他告诉我,他这个江南省军委书记原是受李立三指挥的。回顾我从6月下旬去红十四军工作,到9月下旬回上海养伤,这段时间正好是立三路线统治时期。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对党、对革命的损失和危害,我深有体会。另一方面,南通

海门人民群众由于我党的长期工作，对党的感情之深厚，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军民关系真正是亲如一家，部队到谁家就吃谁家，打仗时往往和衣渡水，浑身湿淋淋的，到谁家就换谁家的衣服，完全和自己人一样。我负伤后，对我照顾备至，当时群众生活很苦，吃饭多半加点芋头，但有时还到水渠中捞点螺蛳（本地人叫玉肉）洗净给我作菜。

红十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像个公寓，人很杂，不便久住，我写信报告江南军委。三天后来了一个地下交通叫海荆州的，也是留苏学生，他通过办事处负责人转告我，信已收到，另找地方住，以后就搬到浙江路二马路口上的寿阳公旅馆。旅馆老板是上海码头上一个搬运工小头目，房产是老板娘的，一共五六间房子，房租低，伙食好，两项一天一共5毛5分钱，主人和房客同吃。我化名李清山，恰好账房先生也姓李，可以拉拉关系。二马路口有家卖葱油饼的，我常去买饼吃，还学会了做葱油饼。海荆州还介绍我去戈登路一个私人诊疗所换药，买点纱布、棉花，但只去过两次。我把受伤染血的裤子换下来，悄悄丢到旅馆的阁楼楼梯下面。在这个旅馆住了约3个月左右，贺步青通知我赶快搬到别的地方。毛定芳来过一次以后，也告诉我，他不敢再去那个旅馆找我，由于条件好，许多人来住，有“红色旅馆”之说。我还没来得及搬走，就出了事。一天我从街上回来，发现情况异常，老板娘神色不对头，我赶紧走出来，住进附近的其昌旅馆。真巧，我妹妹海明刚从苏联回来，也住在这家旅馆，兄妹重逢，真是喜出望外。贺步青告诉我，不要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因此我

就在那一带的中小旅馆中搬来搬去。

到11月初,接到组织上通知,分配我到法南区(法租界和南市)担任区委委员、工人纠察队特派员,负责训练武装工人。那时我住在卡德路,出门就能看见两江女子体育学校的操场。地下工作中接关系很难,给我介绍了十个关系,我接上头的不过三四个人,一个是黄包车工人老蔡,只有一只眼,住在棚户区,一个是江南造船厂技术员老江;一个是法商电车厂工人;还有一个青红帮小头目。东亚制绸厂的两个关系都没接上头,接上头的也只能讲几分钟话,问问情况。组织上发给我一支盒子枪,叫我训练工人打枪,我没处存放,老蔡的老婆在天主堂牧师家里当娘姨,就托她拿到教堂里藏起来。过了几天,她不干了,叫我取回来。那天我正拿着装枪的鞋盒子在马路上往回走,不巧撞见巡捕拦着行人搜身,我故作镇静,张开两只胳膊让他搜身上,竟混过去了。过了几天我把枪交还组织,实在没法使用。那段时间我成天在街道上到处跑,对上海街道熟透了。

不久,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江南军委书记改由万云程继任,他和我在苏联两度同学,俄文名维特雅肯,纺织工人出身,参加过上海三次暴动。1933年曾在中央苏区担任过福建省军区政委,后牺牲。参谋长唐尺英,黄埔学生,曾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在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中被杀害了。中央军委兵运书记原为傅钟,以后兵运工作交江南军委管,分配我担任江南军委兵运书记,主管外国兵运工作,有四五个越南同志,四男一女。

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纪念日，那时立三路线虽已受到批判，但这个纪念日还是要搞游行。分配我指挥法南区游行队伍。参加游行的人在大马路、西藏路交界处一个跑马场集合，以不扣衣服第二个扣子作为暗号。指挥的人在弄堂口放鞭炮为号，大家一听炮响，就一拥而上，跑上马路喊口号。游行路线是沿着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到山西路交界处，再向右转到五马路中西大药房门口解散。我们一部分人在马路上喊口号，一部分人在沿街楼房上撒传单，撒了就跑，谈不上组织指挥。巡捕也倾巢出动，到处和群众扭打。按事前规定，各区指挥人员还要到四马路民乐茶馆楼上碰头。我正沿着四马路走，发现特务盯上了我，我就转身走进大生旅馆。我从旅馆往外瞧，他正在街口点火抽烟，我趁机溜出来，跑到街对面的茶馆楼上，再往下一看，他还在那里抽着烟等我。我就从茶馆另一道门出来，跳上电车跑掉了。当时上海共有党员3000多人，据说除中央主要负责人以外，那一天差不多全上街了。据后来总结，那次也是立三路线冒险行动的继续。

到中央苏区

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对苏区的工作日益重视。中央军委在上海办了一个苏区党政干部训练

班,地址在沪西务本女子中学附近。组织上通知我去训练班学习,准备到中央苏区。学员有十二三人,都是秘密的,不认得的不准打听。训练班住的是一栋楼房,进去以后就不许再出门。周恩来、聂荣臻主持训练班,曾去过两三次,给我们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讲了立三路线的经验教训,让大家讨论今后如何工作,等等。记得有一次讨论中间,周恩来提到营是否设政委的问题。我根据在苏联学习的体会,大胆提出营是个指挥单位,可以不设政委,只设个教导员,团才设政委。

训练班学习完毕后,分配我和一个叫黄志竞的一起经湘鄂赣苏区前往中央苏区,还给我挂了一个中央巡视员名义。在经过鄂东、鄂南和湘鄂赣苏区时,向他们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黄志竞到湘鄂赣苏区担任红十六军政委,他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曾参加上海三次暴动,1927年去苏联,先后在东方大学中国军事政治特别班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我待出发赴中央苏区之前,我妹妹海明曾在法租界卫生旅馆将妹夫陆更夫(黄浦生,曾任两广省委书记,1932年牺牲)的欧米茄牌怀表给我使用。我一直保存到“文革”以后,才还给他们的女儿、我的外甥女曼曼。

我们从上海出发三次,第三次才进入中央苏区。第一次,是由一个武昌大学四川籍姓夏的学生带着我和黄志竞坐火车到湖北蒲圻县赵李桥站。他下车后一打听,情况有变化,反动地主和民团回来了很多人,我们和鄂南特委接不上关系。他急忙带我们两人顺着铁路往回走了几里,在山坡下

一个修铁路的道班房里住下，叫我们等着，他出去找关系。道班房的工人是个党员，河南人。我们等了两三天没消息，就转回上海。

1931年2月第二次出发，叫我们到汉口一码头背后，找一个摆香烟小摊儿的接头。我们刚上船，突然看见管地下交通的贺步青到了船上，看样子像在寻找我。我忙抬头，他一见我就叫我随他上岸，不走了。后来才知道汉口接头地点遭到破坏，地下党负责交通的吴德峰叫他赶快找我，不能去了。

第三次，是由一位蒲圻县青年农民把我和黄志竞带到蒲圻县城下车。下午，天下大雨，饭后我们打着雨伞出城，过一条小河，向左转，穿过一大片荒滩。交通指给我们看，小河对面的山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叫桃花镇，山坡上是鄂南特委所在地，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特委的同志带我们去和游击队见面，还让我向队员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建立以幕阜山为中心的湘鄂赣苏区的指示，并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做了形势报告。

第三天，太阳还没落山，我们就走，这次是由一位很精干的20多岁的农民同志带路。走了三四十里地，天渐渐黑下来，路过咸宁县境，那里是钱瑛的家乡，群众条件很好。我在苏联的一个同学钱静之，原是咸宁的农民，那时还没有回国。我们在村子里喝点茶，打听一下情况，就动身走了。整夜都是在田埂小道上走。天亮后，交通把我们带到村子中一个共产党员家里。那个同志在外地工作，他的弟弟新婚，和

新娘到丈母娘家去了，只有老母亲在家。我们吃了饭，在新房里睡了一大觉。

到了傍晚，我们起来吃点饭就又摸黑往前走。门外都是平坡，种的茶子树，我们没穿惯草鞋，脚都磨破了。黄志竞跟不上，老叫我走慢点。再往前走就到了柏墩镇，那地方出桂花。镇子下面不到200米远有个小河渡口，据说平时水是齐腰深，那天下大雨，河水猛涨，过不去。柏墩的民团驻地离这里只有一二百米远，我们要从那下面插过去。交通向民团驻地附近一棵大树爬过去，解开拴在树上的绳子，一条小船就顺水漂了过来。我们上了船，黄志竞是江苏人，会撑船，他几杆子就把我们撑过河去了，我们上岸后让小船顺水冲跑。走了三四里路，天已发亮，回头一看，连柏墩民团寨门上站的人都能看见。

这里离鄂东特委的所在地已经不远，交通把我们带到区革命委员会（里面就是苏维埃政府），吃了一顿饭。我在那里遇见一位原在武汉总工会当交通的同志，他认识我大哥黄山农。饭后就爬山，山很高，都是石头路。我们从鄂南来时，怕穿布鞋走泥路滑，头回穿稻草打的草鞋，满脚都打了泡。往上一直到茶栅子，离柏墩寨子有5里地远了，才放下心来。从山坡上往下看，山脚下柏墩寨子门前人来人往，还看得一清二楚。又往上爬了3里路，山顶上是一个草坪。那天是五一劳动节，苏区群众正集合在山顶上游行，向白区示威，约有两三千人，每个人打着一面三角旗跑来跑去。虽说那还是执行立三路线的活动，但我们在白区工作的人从

没见过这种声势，一见之下，心里非常兴奋，腿也不觉得疼了。

再往前走，到了通山县大畈镇，第二天就到了鄂东特委所在地的龙港。龙港属阳新县，原是一个码头，我去时河道已经淤塞，不能通航。特委书记吴铁汉，对外用的名字是胡梓，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他平易近人，生活俭朴，打扮得像个农村教书先生，平时吃的也极其简单，主食是鄂东出产的糙米加上三分之一的红薯干丝，有些薯干已霉烂，菜一般是辣椒，有时炒个青菜。整个特委机关上下吃的全都是一个样，对我们也没有特殊招待。他出门没有警卫，草房门口也没个放哨的，他在特区威信极高，因他蓄了两撇小黑胡子，老百姓都亲切地叫他“胡子”。只要是“胡子”说的，没二话照办。

吴铁汉告诉我，特委原先是以大冶县刘仁坝为中心，地方很富足，后来敌军攻占刘仁坝，特委撤到龙港。刘仁坝和龙港之间有一座山。特委只有一团武装称为独立师，所属县都有游击大队。特区组织民兵师守山地，10个人中只有两三支枪，其余都是刀、矛，敌人却吓得不敢进攻了。独立师师长郭子明，陕西人，一只胳膊打断了，是大冶暴动出来的。吴铁汉还告诉我，山上盛产黄金，有一回吴德峰去了，把10斤金子装在布带里捆在身上，带回上海作地下工作经费。吴铁汉讲起这件事还连连称赞吴德峰“真吃得苦！”

在此期间，我曾到阳新县委所在地阳新镇传达中央指示，县委书记名叫方步舟。我还去过排市，还去过白沙镇一个上百人的兵工厂，看过他们做土火药和修理枪支，并按照

中央指示精神讲了形势。我把特区情况和一路的经过向中央写过报告。以后见到邓大姐，她说中央收到了我的报告。

我在龙港住了大约一个多月光景，湘鄂赣苏区红十六军第七师开到鄂东来了。红十六军有三个师（实即三个团），战斗力最强的是第七师，江渭清就是这个师的。

第七师开来，群众非常高兴，热烈欢迎，自动杀猪、打草鞋慰劳部队，替他们洗、补衣服。红军战士十分感动，说如果不在此地打一个胜仗，对不起老百姓。当时，阳新方面敌人开出两个团进攻鄂东苏区，一团开向木石港，一团开向龙港。第七师和鄂东独立师共同对付进攻龙港的敌人，打下架敌机，活捉 100 多俘虏，还把敌军团长的坐骑也抓住了，后来送给我骑。木石港农民自卫军 1000 多人打败了敌人一个团，也抓了 100 多俘虏。鄂东群众太好了，仗一打完，他们就主动打扫战场，自动组织起来把伤兵转送进部队医院，儿童团把战场上的弹壳捡起来送到兵工厂，战场上再找不到一个废弹壳。鄂东人民群众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在土地革命中从封建剥削下刚刚解放出来的农民生活仍很艰苦，但他们对革命支持，对红军自发的有组织的支援，令人敬佩。

鄂东一仗打完后，我就随第七师出发，经燕夏翻过九宫山，到了江西的三都镇，然后避开当地民团，绕过修水县，沿着修水河到了赣北特委所在地渣津镇。那里是十六军第九师活动地区，师长姓张，是黄埔学生。再往前走就进入湖南省，到了浏阳县的排埠，也即湘鄂赣省委所在地，在附近一

个造纸厂我向省委传达了中央指示。又经排埠到东门镇，过了白云山，就到了平江县的黄金洞、长寿街。我在黄金洞没有过夜就走了，这里是湖南农民协会起家的地方，我们党内许多老干部是黄金洞的人，如张令彬就是。长寿街是后来湘鄂赣省委所在地。我还去过观音堂和达浒等地。我在湘鄂赣苏区一连住了两个月左右，群众好得很。在接触中，观音堂人民热情洋溢，充满胜利信心。我大部分时间住在长寿街。因为没有交通，没有给中央写报告。省委老干部很多，其中以平江、浏阳籍的为最。还记得起姓名的有李宗白、赖汝樵、杨毓麟、涂正坤、米可杨（中国姓名不记得了，留苏同学，汉阳兵工厂工人），此外还有赣北特委张书记、余贲民、刘建中等人。还有一位女同志叫胡筠，黄埔学生，当时名声很大，敌人报刊上多次把她和毛泽东、朱德并提，称为：“朱、毛、彭、黄（公略）、孔（荷宠）、李（求实）、胡（筠）”。

记得我从湖南省浏阳县排埠到长寿街，地里中稻已经收割，正在插晚稻。从长寿街再向中央苏区进发时，路旁的树叶已经开始发黄了。到井冈山下，桔子树上的果实已经成熟。时间可能是1931年9月底或10月初。

我在排埠时，曾经在靠后边山上一个造纸作坊里传达过周恩来的指示，以后在长寿街又传达一次。主要内容是：湘鄂赣苏区应当以幕阜山为中心，和鄂东、鄂南苏区联成一片，占领地区大，便于活动。湘鄂赣省委认为幕阜山地广人稀，没油水。他们可能是因为当地群众条件好，又富足，不想到三省交界的山区去。我那时好比初生之犊，没有水平，只

知道传达，不懂得提意见，也不会说服。回想起来，如果当时能按照中央指示精神，从积极方面考虑，首先占领铜鼓，包围修水，把幕阜山和九宫山连接起来，和鄂东打成一片，活动范围既宽广，声势也大得多了。

后来我和湘鄂赣苏区派往中央苏区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一起，从长寿街出发前往瑞金，有一连人护送我们。我们经过浏阳县的东门镇，沿着山边往江西走，远远望见已被敌人占领的永和市、文家市。进入江西的黄茅镇，向万载县前进，一路上没遇见敌人。从万载经桐木到上栗市，护送我们的一连人才回去。这时，已经夕阳西下，我的坐骑嘶叫起来。我们下了山，在萍乡附近过了淥水河，萍乡县城就在眼底。天亮后到了茶坊店，住下来吃顿早饭。原准备前往莲花，不巧何键已攻占莲花，不能去了。我们一二十个人转向东南翻过武功山，路是石头铺的，到山顶时已经午后1点钟。往山下走四五里地，山半腰露出一块小平原，四面群山环抱，是太山乡苏维埃所在地，据说国民党军队有四五年没来骚扰过，大有世外桃源的样子。我们住了一夜，来到洋溪，街上光有商店没有东西卖。向南走到澧田，那地方白军也是多年没去过，群众太平观念很重。大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情景，女人下田劳动，男人在树下摇扇子哄小孩。东西便宜，一块大洋能买50多个鸭蛋。澧田又出好米酒，三个铜板一大碗。我自从离开家乡以来多年没喝过了，这次一口气喝了两三碗。住了一夜，听说敌人已撤出莲花，我们又回头往莲花走。

湘赣特委驻地 在莲花城外，在那里见到王震、李天柱、王首道、张启龙、林佑生等。他们正在开会。后来我们又转回澧田，和湘赣苏区代表们一起前往中央苏区。到了永新，正遇见开两三千人的群众大会公审 AB 团。在永新住了一两天。独立师师政委王震带了一团人护送湘鄂赣和湘赣两个苏区代表，同行的有独立师师长李天柱、袁德生等人。

从永新出发，经过井冈山下的乌托冈，是赤白对峙地带，十几里渺无人烟，地里蒿草丛生，长得很高。房子里满地青苔，墙壁潮湿，那种阴森气氛，不由得使你想起凭吊古战场文来。这是教条主义者所倡导的明确阶级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湘鄂赣苏区也有类似的情况，一直延续到 1933 年初中央苏区批判“罗明路线”。往南经过黄坳、堆子前，这一带盛产桔子，田地两边桔林如带。再往前是藻林、沙地，属赣县辖区，是个大镇子。在此处正遇见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由赣县北上 去吉安，我们后到，双方没有交锋。从沙地到良口对岸，已是下午了。良口属兴国县，是苏区边境，良口对岸有敌民团放哨，我方也有岗哨。夜里苏区部队派船接我们渡江后，护送我们的一团人就回湘赣苏区去了。我们由良口经过兴国、葛垌和大柏地，最后到达瑞金所属叶坪。此时，正好赶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

11 月下旬，到达瑞金沙洲坝后一两天。中央分配我到工农红军学校工作。学校刚开办，学员是从各军抽调来的教导团、营和队的干部，编为一个步兵团、工兵连和上干队。那时还没有设立政治营。第一任校长是肖劲光，政治部主任刘

畴西(黄埔学生)。我的名义是教育处长,实际上担任全校的总支书记。

12月14日,国民党的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在此之前,该军总指挥孙连仲早就装病跑了,军内共产党组织派袁血卒和王铎来和红军联系,具体安排是:一待部队宣布起义后,红军立即包围宁都城,部队能带出来的就统统带出来,不能带出全部,就带出一部;下策是只能把共产党员带出来。该军起义前夕,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召开干部会,动员大家去做接收工作,说二十六路军有近2万多人,凡北方人能讲些普通话的都要调去做工作,我也被调去了。起义很顺利,部队全带出来了,向南开到瑞金和宁都之间驻扎。

该部队改编成为红五军团。正、副军团长由原二十六路军负责人季振同和董振堂担任,政委肖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下属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十三军军长由董振堂兼,政委何长工。十四军军长为原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十四军下属第四十、四十一两个师(即旅),四十师师长为原季振同部下的团长姓李,师政委李翔梧;四十一师师长边章五,政委程子华。十五军军长黄钟岳,政委左权,下辖两个师。

我们派进去的人帮助建立起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并大力进行政治教育,广泛开展慰劳活动。当时的原则是,原二十六路军官佐愿留下的,一般调到红军学校学习后再分配工作,并动员地方武装充实各军,以改变其原来的旧军队

成分。

十四军驻扎在江西横江。我们初去和士兵见面时，他们一见我们上主席台，就悄悄地说：“蛮子来了！”可一听讲话，原来是北方人。第一步是进行新旧对比，忆苦思甜教育，战士们有的哭了。士兵们说红军没有架子，不打人骂人，官兵吃穿一个样，好是好，就是不发饷没钱花。那时发动全苏区人民慰劳起义部队，杀猪宰羊，敲锣打鼓地演戏。为了扩大宣传教育工作，红军学校还成立了“八一剧团”，由赵品三负责日常工作，我和伍修权、李伯钊、危拱之、贺步青等都是剧团委员会的成员。

我在十四军时，打过几次土围子。一次是打赖村反动地主的土围子，用挖地道的办法，挖通后把炸药装在棺材里运进地道，然后从山上用迫击炮打了三炮，甩了一溜子炸药，只听得轰隆一声，把几丈宽的城墙都炸塌了。红军攻打杨梅头村土围子的时候，开始反动地主死顽固，不缴枪，一听说红军打下了赖村，他就垮了。中央苏区有名的几个土围子都是反动武装的据点，宁都附近有个翠微峰，也是个据点，地形险要，只有一条路通到山上，后来也被宁都起义部队攻克了。

宁都起义半年后，十三和十四两军合编为十三军，董振堂当军长，何长工任政委，赵博生升任五军团副军团长。五军团后来在打赣州、黄狮渡和水口等战役中都能把战斗任务担当起来，长征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于1932年五六月间调回工农红军学校。刘伯承任校

长兼政委，我担任总支书兼国家保卫局特派员，欧阳钦是政治部主任。学校编制已经正规化了，学习3个月为一期。有一个步兵团，团长先后由粟裕、刘少卿和张经武担任。以后又成立一个专门训练政治工作干部的政治营，营长陈伯钧，我任政委，学员是从农村青年团中调来，主要为红军培养指导员。我还兼任政治教员，讲共产国际决议。说来惭愧，那是翻译过来的书，我自己还看不十分懂，但不讲不行，因为自己毕竟还是到过苏联的，义不容辞。

红军学校学员都是各个部队送来的，前方部队经常支援学校粮和肉。学校每天供给每人1斤2两米、1斤菜、3钱油和3钱盐。前方打了胜仗，就派人通知学校去接收肉食。学校还养猪。学校继承了红军的传统，伙食公开，半月分一次伙食尾子，少则人均分7角5分钱，多则可分1元2角钱。分的钱除了买点日用品如肥皂之类，余下的有时就相互请客。当时，红烧肉5角钱一碗，还有田鸡、脚鱼、黄鳝、肉片、猪肝等，一碗炒面两三角钱，一大碗酒两三个铜板，我们常常几个人合股，“推选主席”请客。从前方回来的在上干队当学生的人手里有钱，请个客也不过花一块多点。我们请过朱总司令、博古，也请过邓大姐。以后叶剑英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汀瑞警备司令，他喜欢吃狗肉，周末常买个小狗，约我去吃。

在红军学校时还打过一次仗。有一次福建小军阀卢兴邦从沙县、永安开来一团人占领了清流。当时主力红军不在，中央就叫红军学校去打。下午两三点钟双方接火，敌人

有碉堡阵地，我方伤了几个人，半夜里敌人却偷跑了。红军学校有两个杨梅生，都是团长，那一次都负了伤。部队开回到宁化（县委书记正是贺步青），负伤是要给养伤费的，他们都把钱拿来请客，说给狗子咬几口算不了什么。讲这话的杨梅生后来是红一方面军九军团的团长，另一个杨梅生是三军团的，绰号“爬城将军”。

1933年，红军学校分为四个学校。红军大学，是在原上干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上干队队长何长工任校长，李德（德国人）讲课、伍修权任翻译。第一步兵学校设在距瑞金30里远的九堡，又称彭杨学校，是纪念彭湃和杨殷烈士的，专门培养连、排级干部，陈赓当校长，我是政委。第二步兵学校即公略学校，是纪念黄公略烈士的，校长张经武，政委陈铁生。特科学学校，是以原红军学校工兵连的工兵、炮兵为基础组成的，政委袁血卒。

对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

第一步兵学校刚开学，我就害了恶性疟疾，发高烧。一天夜里，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火青同志，有一个重要任务，中央决定要你去，你马上到军委来。”我回答说：“我正‘打摆子’，发高烧，动不了。”他说：“坐担架也要把你抬来。”我只好搞了副担架，天正下大雨，担架

上搭个布篷，让人抬着走了 30 多里路，一路上不住地哼哼，说胡话。第二天早晨醒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到了军委的。刘伯承把我送到红军总医院。贺诚在那里当院长，一检查说是急性疟疾，给我静脉注射了两针奎宁，住院治疗。我去步兵学校时已和学校服务员刘桂兰结婚，她赶到医院照顾我，住了一个多星期。

烧退后，我就到军委参谋部接受任务，才知道是要派我随潘汉年去福建十九路军做联络工作。

原来在福建事变之前，1933 年 10 月，十九路军曾派三个代表到中央苏区和我党谈判，其中一个叫徐鸣鸿，原为黄埔军校教官；一个叫吴明，原黄埔学生，在党内曾担任过领导工作，两人均已脱党。还有一个叫陈小航，是文化人。和十九路军代表的谈判，是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10 月 26 日秘密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中央派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福建人民政府代表，派我以潘的秘书名义随同前往。因为我患病住院，潘汉年就和徐鸣鸿、吴明先走一步，留下陈小航先后在龙岩、古田等待我同行。潘汉年还代我取了个化名叫黄一青。我动身之前，苏区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教会我如何使用电报密码，以及写密信等技术。当时她负责秘密工作。

随后，我就单枪匹马地出发了。从瑞金到新泉县，走了一整天。新泉地方比较大，温泉很多，距离傅柏翠盘踞的古田区不到 20 里。傅柏翠原在闽西土改斗争中是和张鼎丞、邓子恢齐名的，后来他拉走一部分队伍独霸一方，此时也在

和十九路军拉关系。新泉和古田是赤白交界地区，我在新泉住了一夜，第二天向老百姓打听往古田怎么走，他们说，顺河走就到了。我还记得，河水很清，河里的鱼很大。

到古田找到陈小航，住了一夜。陈小航是云南凤庆县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过编辑，同情我党，同第三国际有关系。以后，在福建人民政府那一段期间，我和他来往较多，比较熟悉。但一直到将近50年后的1982年冬天，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罗稷南。

次晨起床后，陈小航和我开玩笑，叫我看看身后，我回头一看，原来墙上涂写着“消灭共匪”几个大字，两人都哈哈大笑。饭后前往龙岩，他家住在龙岩一个类似机关或招待所的地方，我也在那里住下来。

有一天，傅柏翠召开干部会，大概是要研究中共在和十九路军搞统一战线，他们怎么办？陈小航通知我去参加，但没说开什么会。我本想不去的，但既然通知我，去了解点情况也好。到会的三四十人，围着一张方桌坐着，我就在门边坐下。我的来历，傅柏翠心里明白，其他人却不清楚。在座的有个毛毛躁躁的小伙子陈铁说，共产党现在要到福建来，我们可得注意点。傅柏翠忙把话岔开，匆匆结束了会议。他事前可能不知道我要去。

两天后，陈小航给我搞了一套国民党军装，穿上像个军官的样子，还派了车，叫他的妻弟倪锋护送我到厦门。陈小航这个妻弟是十九路军的一个青年军官，办事利索，很能干。在漳州吃了一顿饭。到鼓浪屿时，天已黑下来。他替我

买了去厦门的渡船票，送我上船后才回去。

第二天，天亮我就到了福州。在南台码头上，旅馆的伙计们都来拉生意，我挑选一家离大桥近一点的旅馆住下。然后赶快按原定联络办法，给潘汉年写了一封信，托徐鸣鸿转。等了两天不见回信，到了第三天，一个副官模样的人开了辆吉普车来接我，一见面就连连道歉，说这两天太忙，让我久等了之类的话。我估计他们是故意“晾”我一下，看我是否到其它地方活动。随后我就搬到十九路军总司令部，和潘汉年同住一屋。我们作为中央苏区政府代表，对外是秘密的，吴明有时来找潘汉年谈谈。当时，福建人民政府尚未正式成立，徐鸣鸿常以秘书长身份前来和潘汉年交谈，我都不参加，没有旁人在场时，潘再告诉我一些事。他是代表，不好到街上跑。我因为穿军装，可以自由出入司令部，白天我就扎上武装带到街上跑跑，看看市面情况，买报纸看看，了解社会动态。那时福州只有一条大街，拉三轮车的工人好些都会讲普通话，因为当年孙中山把北洋海军萨镇冰的部队带到福州，士兵老了，在当地安家，多以拉车为生。市面上物资比较充足，大商店的店员也有懂得北方话的，询问什么他就过来跟你说。和江西平江的印象一样，也是妇女下地劳动，有时能遇见妇女挑担柴禾，穿得干干净净地到商店包金牙。晚间我就和潘汉年去澡堂洗温泉澡。那里有弹子房，他总要让看台的陪他打一阵子才回住地。他还曾设想在外面找个房子，把老婆接来，不在司令部住。

我从瑞金出发时，刘伯承曾交给我一封由福州给他老

婆伍景春的信,说“拜托! 拜托!”叫我在福州把信发出。信发了,但没有回音。我路过汀州时也给老家发了张明信片,写了不到四五十个字,是给母亲的。大意是说我在外经商,身体很好,不要挂念,等等。信是用毛笔写的。署名是我儿时小名“奎”字。后来听大哥说家中接到信很受安慰。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蔡廷锴等在福州发动事变,宣布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会场设在城内一座小山前面的南校场操场,大会约有2万多人参加,还有5架飞机在天空中转了转。我作为游客站在山坡上观看。2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同福建人民政府正式签订了抗日反蒋停战协定。

这一段期间,我们给中央发过两次电报,潘汉年起草,我译成密码后交十九路军电台发出。中央来电报叫我们回去一个人汇报情况。潘同我商量后,决定由我回去。那天一早我坐吉普车到码头乘船,坐的官舱。不巧,遇着台湾海峡风浪大,开始还不觉怎样,后来感到有点恶心,只好回到舱里躺着吃苹果。到漳州找到陈小航由他们派车送我到龙岩。以后我自己沿着来时路线,行经古田、新泉和汀州回到瑞金。

我到瑞金时,张云逸以军代表名义已动身到陈小航处去了。中央因为急于想到福建买飞机,已派了国家银行福建分行行长赖祖烈带上百把两金子出发,没有想到他乘汽车在漳州与福州之间的泉州附近,竟被土匪抢劫一空,后受严重处分。

我向中央汇报福建情况后,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华苏

维埃政府驻福建人民政府大使，我为驻龙漳省（龙岩、漳州）领事。临走前邓大姐问我是否需要漳州地下党的关系，我怕把公开与秘密搅在一起，容易暴露身份，没有要地下党关系。中央还让福建公安局（汀州苏维埃）局长给派了两个警卫员跟我一起出发，两个警卫员一个姓王，上海人，很活跃，是派给潘汉年的；一个叫吴振英，闽西人，是派给我的。吴振英绰号“大姑娘”，平素一句话也没有。解放后跟刘少奇任副官。

从瑞金去龙岩，经过汀州时，恰好遇见瞿秋白进入苏区。我问他有钱没有，能不能请我们吃顿饭。他身上只有3块钱，拿出一块钱请我们吃了一顿，留下两块钱他自己零花。

我在龙岩找陈小航时，张云逸也在那里，他的身份是中央军事代表。当时蒋介石即将兵分五路进攻福建人民政府，买通海军陆战队一个旅驻在南平作内应，时局已较紧张。张云逸告诉我，中央认为福建人民政府的主张欺骗性大，将来麻烦大，所以当时的方针是叫十九路军打仗先吃点亏，对我们的条件才会放低一些。由于张云逸早年和李宗仁、白崇禧同在广西部队，和两广部队都有关系，和福建军人也熟悉，因此蔡廷锴赶紧派人把张云逸接到福州去。我和两个警卫员在龙岩住了几天，由倪锋护送我们前往漳州。

在漳州期间，我还是以领事身份出面，和汀龙省人民政府秘书长陈小航联系。省长是徐鸣鸿，十九路军驻漳州部队参谋长是周士第（曾参加南昌起义，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

长)。不久，中华苏维埃商业部和银行派了刘秉奎等五个人到漳州，主要是采购物资，我和他们接上了关系。

这段期间，我还遇见两个留苏同学，一个是周士第的侄儿，绰号小广东，是个镶金牙的小胖子，俄文名布多斯肯。他问我要不要见见周士第，我讲以后再说吧。我主要因为和旧社会官场人物来往少，怕多接触，其实当时是应该去的。另一个是河南农民出身的李光，又名谢树德，我们是在街上碰到的，他从背后推了我一把，把我带到他住的旅馆，讲了他的回国经过。他1929年在东方大学学习，“中东铁路”事件发生后，被派到远东工作，在边境巡逻。后来共产国际训练他做秘密通讯工作，这次派他回国是要他设法进入苏区，以便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他在上海找不到人，以为福建人民政府中一定有我党同志，因此跑到漳州来故意暴露身份，被十九路军注意了，他乘机提出要见负责人的要求。记不起是周士第还是徐鸣鸿见了，想留他在十九路军工作，他却一心想去苏区。因此把他放在一个旅馆里住着，无非是加以监视、考查。他遇见我就接上了头。

当时，蒋介石大军压境，形势日趋紧张。我为了做好撤退的准备工作，就找陈小航要了几张空白护照。他一下子给了我一二十张。我先给谢树德一张，让他走了。苏区派来的五个采购人员已经买好做炸药用的硝酸，装了十几个大瓶子，他们身上带了不少金子，必须及早撤退。我给他们每人一张护照，安排他们先走，我留下作掩护。过了两天，陈小航突然来通知我，他们第二天就要向龙岩撤退。我讲：“你给我

几支枪带着好不好？”他一口答应，写了一张条子叫他的妻弟带着我们自己去领取。我和两个警卫人员每人领了一支三八式步枪，带上几百发子弹，随着十九路军撤往龙岩。从漳州到南靖 30 多里地，大路两旁尽是香蕉园和甘蔗林，常有土匪出没。部队走到南靖和龙岩交界的和溪山口处，前面一辆汽车就和土匪遭遇，汽车司机被打死，车上士兵马上还击，并放火烧山赶跑了土匪。我们在后面距离部队里把远，沿途都是前面部队扔下的东西，其中也有军用地图。我知道军用地图在苏区是个宝贝，就跟在后面尽量捡了一些，背回苏区。

到了龙岩，苏区五个采购人员已先期到达。这时，蔡廷锴也已撤到龙岩。陈小航来找我，问我要不要和蔡廷锴见个面，谈一谈。当时局势紧张，我们摸不透十九路军负责人的思想动向，我虽答应第二天去见见，但又担心他可能会把我留作人质。因此，我马上安排五个采购人员中四人先把货物运走，并告诉刘秉奎我先到大池圩帮他们安排一下，交代他留下来掩护我先走，随后再跟上来。谁知他胆小，我带着吴振英等晚饭后出发，前脚走了不到 10 分钟，他后脚就跟上来了。到了大池圩已是次晨八九点钟。为了摆脱十九路军队伍，避开傅柏翠辖区，我们不走从大池圩到古田这条路。吴振英是闽西人，路熟，他领我们向西斜插过去，翻过一座山就越过赤白交界地区。山上有座凉亭，我们就把身边带的罐头打开吃饭。凉亭附近有小纸厂，工人们看见我们穿的国民党军装，就走过来盘问。我们因为已进入苏区，心放下来

了,就和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是来投降的,不想引起了小小的误会,他们将信将疑。我们下山后走了三四里路来到乡苏维埃政府,解释说我们是苏区的,要回瑞金。乡苏维埃主席见我们身着敌军军装,背着步枪,讲的却是苏区行话,感到蹊跷。晚上,保卫科长也来了,要检查。幸而20里远有个军分区司令部,司令员夏亥原是红军学校的学生,我和他通电话讲明情况,这才消除误会,也不检查了。第二天出发,到了福建军区所在地白砂,军区正到处找我,说中央军委来电报,指令我和闽西独立师政委黄甦带一师人返回古田大池圩一带山上,对十九路军进行统战工作,对方将领如能起义过来,可给以军团长名义。我还没找到黄甦,中央又来电话说,十九路军已向广东方向走了,令我仍回苏区。

至于其他几个人,张云逸是在随十九路军撤退到云应霖旅部驻地,云应霖派人护送他回苏区的。潘汉年从福州取道香港再转入苏区。周士第是在十九路军撤退时,携枪骑马到苏区的。

回顾“福建事变”这一段历史,我党在对待福建人民政府问题上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有深刻教训。蒋介石兵分五路进攻福建:一路从江西抚州经邵武、光泽指南平,由李默庵指挥,我记得很清楚;一路大概从浙江江山经浦城;东边两路从闽江口直指福州;一路从海上进攻漳州、厦门。而在当时我党最大的目标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主要敌人是蒋介石,我们的拿手好戏是打运动战。蒋介石对我根据地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毛泽东主张打出去,在闽、浙、

赣另辟新区。但“左”倾教条主义采取了错误的方针，结果十九路军孤立无援，一打就垮。十九路军一溃退，敌人转而集中兵力向我进攻，我们的根据地就受到包围。如果我党当时能按照和十九路军签订的“抗日反蒋”协定办事，一是反对内战；二是一致抗日；三是组织抗日联军共同作战，集中兵力先把李默庵的部队吃掉，再和赣东北红十军配合，打垮从浙江来的敌军，则十九路军不致溃退，敌人的五次“围剿”也就有可能被我粉碎。十九路军站住了，广东的陈济棠也会站出来，南方几个省的反蒋统一战线也就会建立起来，国内政治形势必将发生新的变化，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必将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个很深刻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决议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护送红七军团过闽江

我们回到瑞金已经是1934年春天。当时中央是博古负责，李德管军事。毛泽东住在沙洲坝，不掌实权。我见了毛泽东，他问我关于福建人民政府情况，我谈到当时我们应该支援十九路军，出兵和国民党军队打一仗，他没有表示反对，似表赞同。那时，正值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我去参加庆祝晚会，散会后，王稼祥叫住我，带着半开玩笑的口气，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长名义撤销我驻福建人

民政府龙漳省领事职务，再以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名义，委派我担任第一方面军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接着，发给我一张正式委任状。这张委任状 50 多年来跟随着我历经沧桑，至今还保存在书柜里，也可以算得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了。

红九军团是以红三师为基础建成的，原归红一军团建制，底子是瑞金一个独立团又称模范团的地方武装。扩编为瑞金师即红三师后，政委为伍修权，总支书庄振风（后改名庄田）。以后为了便于作战，改建为九军团。1933 年冬，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正式成立，下辖两个师，即瑞金红三师和宁都地方武装改编的宁都师，即十四师。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第三师没有指挥机关，由军团指挥机关兼任；十四师是在江西广昌战斗前夕才交九军团指挥的，师长是张宗逊，政委朱良才，参谋长袁良惠。

我原不愿离开红军学校，组织上既已决定，就服从调动。我先到周恩来、刘伯承处汇报了去福建的情况，就在朱总司令办公地点住下。后回到红军学校和妻子刘桂兰告别。过了两三天，我就带着委任状去九军团报到，原来我是接替政治部代主任兼保卫局局长李湘龄即李涛的职务，广昌战役后他才调走，卜盛光任保卫局局长。

那时，敌人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九军团在中央苏区反“围剿”过程中担任外线作战，打游击，牵牛鼻子是很有名的，先驻扎江西广昌的康都，后开到广昌以北的甘竹、白合地区。当时，有消息说敌人要向该地区进攻，部队就天天虚

张声势，和敌人磨时间，经常打仗。地方工作部长负责筹粮，每人每天保证1斤2两米，但没菜没盐，吃扫帚苗和竹笋。有一天警卫员打死一条蛇，有1米长，没有水洗它，剥皮煮熟就吃。那是我第一次吃蛇，馋极了。

博古和李德的作战方针叫作“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们到达广昌那一天，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全部集中，来个大会战。敌军开来五个师，步步为营，修筑堡垒，九架轰炸机进行“地毯式”轰炸。我方没有大炮，不能有效攻克碉堡，又没有正规作战经验，我军主力受到很大损失，广昌这一仗把九军团的第十四师打垮了，只剩下百把人。

广昌大会战后，中央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于1934年7月将红七军团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九军团担任护送七军团渡过闽江的任务。我军团当时实际只有一个师的兵力，约4000多人。7月初，在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等来我军团驻地广昌南新安镇，研究战斗行动计划，规定我军团在七军团后交错前进。我们随即召开排长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宣传掩护红七军团北上抗日的光荣任务，并定名为“东线行动”。7月7日整装出发，向南经驿前、石城，转而向东进入福建的宁化、清流到连城的小陶、嵩口。此时七军团已将永安城包围。我军团经安沙接替七军团包围永安任务。永安城只有敌军一个团，消灭该敌，占领县城，倒不是什么困难任务，但怕拖延时间影响渡江，所以只是虚张声势，实际上不让他阻碍我军

前进。对福建地方部队卢兴邦的老巢尤溪也是如此办理。我军团撤永安之围后，经西洋、桃源、芝坑、龙门到达尤溪，又经十四都于8月1日占领闽江沿岸重镇樟湖板。当时红七军团在尤溪江东已胜利渡过闽江，占领黄田、水口二镇。我军团即以樟湖板为中心，沿江上下展开，占领尤溪口、南源、十四都等地，以确保七军团能够继续前进。七军团过江后，一举击溃了敌军王敬久部，于8月7日占领罗源县，并向浙江方向进发。我军团护送七军团过闽江的任务至此胜利完成。

我军团在尤溪口缴获敌军仓库中黄色炸药3万多斤，食盐5万多斤和许多军用物资，又截获自福州开来的一艘货船，载有烟土20多箱和布匹等商品数十箱，消灭了守护船只货物的小股敌人。

我军团进入白区后，全军动员展开群众工作，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实行土地革命等口号。从永安属的西洋到闽江畔的樟湖板，群众到处挂红旗欢迎我军，特别是樟湖板群众更是热情，商店照常营业，行人熙熙攘攘。我军在樟湖板召开庆祝南昌起义7周年大会，把没收来的物资尽量散发给群众。部队在那里整整住了10天，进行大休整和改善生活，士气高涨。

后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要将所缴获的炸药、食盐全部运回苏区，不能丢掉一斤，因苏区食盐奇缺。一块现洋一两。我军从军团首长起，每人背35斤盐，每匹坐骑驮200斤，战士们轮流挑，三个人挑两担或者四个人挑三担，全军组成了浩

浩荡荡的运输大队。8月11日从樟湖板出发，翻山越岭，好在沿途没有重大敌情，不管天气怎么炎热，山怎么高，路怎么险，人人精神旺盛，一心要完成任务。返回路线基本上是原路，只在富才圩、仙樟、大田、温泉和石峰等地，向东绕了一点路，大田几百民团望风而逃。后接到中央电报，已派少共国际师和民工数千人到连城的朋口前来接运。消息传开，苏区已近在咫尺，连日来的疲劳顿时消失，大家脸上都露出了胜利的喜悦。8月28日到了古田，休息一天，整顿军容，准备回家见亲人。一进苏区，战士们蜂拥奔向邮局，把自己随身另外携带的一小包一小包盐作为礼物寄给家里。红九军团这次深入敌人统治区，历时50天，往返行程1800余里，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交付的军事和经济两大任务。这次“东线行动”后来经常为我军团指战员所津津乐道。1985年3月，福建省党史资料征委会闽浙赣办公室曾来信问起，对抗日先遣队应如何评价，以及是否为“左”倾错误的产物的问题。根据我的了解，七军团原属赣东北苏区建制，来中央苏区进行补充整顿后，以抗日先遣队名义，渡过闽江，归还建制，从未听说评价此事得失的问题。我想即使七军团留在中央苏区，在当时中央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下，也挽救不了严重的历史性挫败。

9月上旬，敌人从东面进攻中央苏区。中央用地方武装充实部队，命令福建省第二十四独立师归九军团指挥，在福建连城附近阻击敌人。

敌军占领朋口，我军在朋口西南的涂坊和敌军激战。在

夺回山头战斗中,我七团政委刘华香受重伤,九团团长王玉洪不幸牺牲,大家都很难过。王玉洪 1929 年参加红军,是个好同志。尔后部队奉命撤到距汀州 90 里远近的钟屋村休整三天,准备掩护主力部队的行动。

在此期间,有一天清晨《红色中华报》来了,上面载有洛甫写的文章,大意是说,要消灭敌人不一定非在苏区不可,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消灭他们。蔡树藩读报后,就打电话把我找去,和罗炳辉、郭天民等人闲聊,认为可能是要撤离中央苏区,去打贵州。

10 月上旬,中央为了加强九军团领导,在长征前派凯丰和王首道率领地方工作团来我军团工作,共有三四十人,包括原兴国县委书记朱明、团支书吴保山和团中央的张继之等。我军团开到瑞金、于都、会昌之间的白鹅镇。中央命令原归九军团指挥的第二十四师留下,另将会昌工人师(又称二十二师,政委朱良才,有 4000 多人)改归九军团建制。九军团第三师也补充了兵员,两个师合起来共 9000 多人。

部队在这里集中训练了几天,开始进行长征准备了。

从瑞金到遵义

1934 年 10 月 10 日,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行军序列是:第一、第三军团为左、右前锋;第八、第九军团

两翼掩护；第五军团殿后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一直到遵义都是这样。

长征中红九军团担负着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前进的艰巨任务。由瑞金出发后，过于都向南，到了江西南端的信丰县安西镇。当地驻有粤军一个团，我军只加以监视，没有打算消灭它。谁知该敌害怕，在拂晓前突然以攻为守，派出两个连出击掩护主力从南门撤退了。我政治部一个小指导员赵炳梓受了伤，军司令部作战科长郑伦牺牲。我军遂即沿安远西南的“三南”（定南、龙南、全南）边境前进。当地出产钨矿石，群众也很好。10月底，又向西北进入广东的乌径。此地为粤赣交界处，公路交叉，粤军陈济棠部追来，我军连夜急行军先开过去了，没有交战。到了江西上犹县，住了一夜。从聂都翻过湘粤赣交界的西华山，白天行军，午后在西华山吃饭。此地出产锡矿，我党有工作基础，矿工对我军非常热情。再往前，到了广东南雄以北的长江，没有进城，只记得城外鹅鸭很多。往西到城口，情况紧急，也是从城外绕过去，好继续赶路。进入湖南省向文明司、宜章方向前进时，在寿圩和敌人遭遇，打了一仗。敌军是湘军何键部王东原的四个团。这一带原是革命老区，群众条件好，中央打算在此消灭敌军，以便红军长征队伍可以在湖南停下来稍事休息。由于主力部队离开江西，长途跋涉十分疲劳，只想摆脱敌人，没能打败敌人。十五师即少共国际师的任务是掩护九军团通过，但也没能堵住敌人。粤湘之敌从两面向我军团夹攻，我军近万人要从相距约30里中间钻过去，白天不能走，

只好夜里走，用铁丝绑着松枝点燃照明。正值天下大雨，一脚踩下去要陷进黄土泥有半尺深。就这样在泥泞中整整走了一夜。前面走不动，后面也动不了，我很奇怪，为什么休息这么长时间？赶到前面一看，大部队已经往前走了，只有几个炊事员背着大锅睡着了，挡住了去路。后面部队只好摸黑向田埂上被踩有稀泥脚印的方向追赶，追了一两里地才跟上前面部队。一夜只走了三四里地。

后来中央改变部署，叫九军团掩护十五师撤退。部队临时拉上去，从午后打到天黑。打完仗往前走，有个小土坡路很滑，人又饿，人往上爬像背了几百斤重的东西一样。到了山上的凉亭里，战士们包括团长杨梅生都睡着了。我拿块竹板在墙上敲打，好不容易才把大家闹醒。山下就是敌人，又没水喝。往前走，天又下雨，遇见前面掉队的战士抱枪坐着不动，一叫不应，一摸已经死了。中央叫五军团来接应我们。刘伯承在山下等，左等右等不见来。天亮他跑上山一看，九军团战士正爬着往山下走，真是又饿又累。七八点钟才和五军团接上，继续赶路，掉队的，都顾不上了。

我们从广东北部的九峰到湘粤边境的白石渡，只有30来里路，湘粤军队距我也只有30里路远近。粤军从连县、连山方向追来，南面是陈济棠的部队，后面是国民党中央军，北面是何键部。中央命令红九军团进占临武县，虚晃一枪，迷惑敌人，争取时间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通过。我军白天打进去，晚上又出来，城里没有敌军。敌人探听到红军进占临武，不免要花点时间研究我军动向，等他研究好，我军

早已开走。后一度占领蓝山县，也是早上进去，晚上撤出来。

经过进入湖南后紧张的行军征战，二十二师人员已所剩无几，大约只有千把人。正值中央纵队抬机器的人也多半掉了队，就把二十二师余下的人员调去抬机器。这样一来，九军团只剩下一个师也就是九军团本身了。

11月下旬，广西部队也开了过来，它并不是要和我拼实力，而是要“保境”。中央命令九军团进占永明（现名江永）、江华。我军夜渡沱水（湘江上游），敌机在头上轰鸣，江水深及胸部，我们把衣裤捆在头上，手挽手过了沱水。进入永明后，没收了当铺，由地方工作部的同志把当铺里东西都从窗子里扔出来，叫群众认领回去，老百姓纷纷来抢东西，一下子就扩大了200多个红军战士，多是瑶族和苗族。此外还没收了大批蓝色土布，发给战士，当地人喜欢拿它来包头，一些本地的战士包起头来都很得意。到江华时天已经黑了，城里有条河，有桥可以通行，第二天早上撤出时我们把桥炸了。

中央命令八军团先去占领广西湖南交界的龙虎关，掩护九军团进占广西灌阳，但龙虎关被敌人抢先占领了。天将亮时我们赶到，八军团只剩下一两千人，正在路旁壕沟里等待我们，给我们看了中央的电报，内容是叫九军团掩护八军团从灌阳东北面过永安关，并指示我军：中午12点以前如能过去就赶快过去，如过不去，就自己单独打游击去。这是第二次叫九军团单独行动了。我军当时还没有吃早饭，就叫八军团先动身，我们吃顿早饭，带顿中饭就走。另一方面派

侦察连向道县方向警戒,摸清敌人动向。中午12点以前从容地过了永安关。那地方并不险恶,是一个土山包,小山口。过关进入广西境后,天将黑时,敌机5架追袭而来,看得清清楚楚。我当时真想把它打下来,我对自己的枪法是很有把握的。敌机丢下炸弹,八团政治部青年干事谢镗忠头部受伤,在路旁走不动。他担心自己会被留下来。我就叫八团必须把他抬起走,有困难时又让他骑我的马。这样,一个干部就给保存了下来。

我们夜行军到了广西北部、全州以南的沙田村,已经是次晨七八点钟了,极为困乏,可是敌机在头上不断轰鸣扫射,无法入睡。吃过饭后,我带上警卫员和马夫到政治部宿营地前面菜园子中的一个草棚子里休息。我们都睡着了,去时又忘了告诉别人。午后四五点钟,我军撤退,中央叫十五师掩护九军团,部队要出发,找不到我,只好走了。十五师隔河与敌人对抗,离菜园子四五里地远,飞来的子弹啸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警卫员跑去一看,队伍已经出发了。我们赶快追赶,赶了四五里地才追上。部队前后传话说:“主任来了!”

部队向西走到界首,再向西到苗儿山住了一夜。山顶上有个村子,很穷。夜里有个小宣传员上厕所点火照亮,不小心把老百姓的草房给烧着了。凑巧前一天广西军队曾伪装红军烧房子。现在出了这件事,政委蔡树藩发了火,说在困难时期破坏纪律,叫我和保卫部部长卜正光跑步去,说烧房子的查清了要枪毙,政治部必须向老百姓道歉、赔钱。

次日下午下山，往北进入湖南境内，到了湘西南角上的通道县。这个县小极了，顶多一条巷道长。县长原是黄埔学生，是我们沿途遇见过的最反动的县长。他搞坚壁清野搞得很厉害，填井、破坏碾磨，把老百姓全赶走，只留下老年人和聋哑人。幸好还有些稻子，我们就到处找瓦片、木板来搓谷子吃。连周恩来也是自己用手搓谷子吃。

从通道出发，穿过一个面积很大、树木矮小的森林，是侗族聚居地区，然后进入贵州。中央在黔东南的黎平县召开政治局会议，迫于形势，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改变战略方向，摆脱敌人，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前进，从而使中央红军避免陷入绝境。会后中央先行出发，经黄平、石岭、余庆等地，西渡乌江。

九军团没有进黎平，是从锦屏沿清水江到剑河，没有进城，在野地里宿营。贵州多雾，敌机能见度低，有利于白天行军，基本上结束了从瑞金出发以来总是夜行军的日子。次晨，集合起来将要出发，苗族的苗王突然带着队伍来袭击我们。本来八团担任警戒，在前面山上放哨，却麻痹大意，把前头哨撤了。苗王率部占领高地向我射击。我中央工作团团员、团中央组织部长、曾留学苏联的上海工人张纪之，中流弹而牺牲。由于敌情不明，我军决定撤走，到适当地点再加以阻击。敌人追出20多里地，我边走边打，一看他不过千把人，我们走出几里路远布置了埋伏，等他一追上来就把他击溃了。午饭后，奉中央命令占领镇远，以阻击追敌西进。我军于当晚完成占领任务。镇远是黔东第一个重镇，靠山，只

有一条街，是九军团占领的第五个县城。我军的任务是：保卫中央渡过乌江。在镇远住了一夜，没收和购买了许多纸烟，按照惯例给中央送了一些去。次晨，我军经施秉向余庆前进，准备跟随中央从余庆渡过乌江。到达余庆已是1934年12月30日，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余庆人民留下良好印象。记得只有两件瓦盆没有归还，都按价赔偿。

余庆距乌江只有30公里。渡过乌江后，党中央于1935年1月9日进驻遵义，我军在湄潭、绥阳及以北的永兴驻扎了12天，警戒遵义。长征中在一个地方停留这么长时间，这还是头一次。

在当地，我们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土豪恶霸，成立贫农团、农民革命委员会、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开办农民干部训练班和召开中小学教员座谈会，等等，宣传党的纲领政策，积极进行扩军工作。当时李富春代理总政治部主任，传达了对地主和工商业家的政策。因为准备建立根据地，政策放宽了，只斗争了群众最仇恨又最有油水的恶霸地主，对富农和小地主基本上是中立政策；在城市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只对政治上有劣迹的才加以制裁。在湄潭城内只没收了一个商会会长家的存盐和一个财政厅长的财产。当地群众没盐吃，而商会会长家存盐上万斤。没收的存盐，先是每人分1斤，剩下的都卖给他们。街上人山人海，营业照常。红军威信很高，苏维埃钱票1块钱当国民党票子2块钱用。宣传扩军，十多天扩大了320多人，成立了新兵营，该营后来

在沙土附近老木孔战斗中曾起过重大作用。湄潭有个大镇叫牛场，我曾经去和贫下中农开过会，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

1月中旬，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随后，中央命令九军团撤离湄潭、绥阳，并指示要留下游击队以阻击川军追击，发动农民斗争，准备在贵州扎根创建根据地。军团领导当即令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王有发留下，领导农民武装打游击战。当时本应给他留下点部队，单靠地方武装是不行的。以后就失掉了联系。王有发是江西太和人，原由红军大学调到红三师七团任营教导员、团总支书记，红九军团成立后，调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我们共事期间，感到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什么困难都压不倒他，这是大家所公认的。

遵义会议前后，九军团领导有些变动。会议期间，蔡树藩调走，何长工接替他担任政委。凯丰也调整回中央，朱明代理中央工作团团长，并接替王有发担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九军团从绥阳经过娄山关来到黔北的习水县。中央纵队正在土城附近地区和川军刘湘部四个团激战。中央原电令红四方面军向西进攻，以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但张国焘不听号令，没有前来接应，因此未能消灭敌人。我军从北面掩护中央纵队撤退，这时川军在后面追击，已经快到习水。我们一面派人警戒敌人，一面赶快吃饭，好追上中央纵队。我们正吃饭，敌人已进到四五里外，人数不多，双方打了

一阵，我们才走。从习水翻过山前往土城，连夜赶路，向川黔边境的赤水前进。有一座山很陡，名叫鸡飞崖，山高路险，没有路，有的地方要在大石头上架上木梯，踩着木梯往上爬，在这里摔死了好几匹牲口。夜行军，又不能打火把，只砍点松枝，点松明照亮。往上爬时偶然回头向下一看，黑洞洞的，事后回想起来身上还有点儿发麻。

1月底，中央红军分几路从猿猴场（现名元厚）、土城西北地区向西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叙永前进。远远看见叙永县城在小山坡上，这一带是丘陵地带。当时川军集结重兵对我进行追堵截击，并加强了长江沿岸的防御，红军就转向云南扎西（即威信）地区集结。敌军逼近扎西，红军又突然掉头东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二次渡过赤水河，指向贵州的桐梓、遵义地区。2月初撤离扎西时，中央决定抽调干部带点队伍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配合红军转移，并创立川滇黔边区新的根据地。余泽洪是当地人，就把他留下了。

九军团从扎西经古蔺向赤水前进时，距离太平渡二三十里地有个栗子坝，是个小集镇，正逢赶场，我们派了几个宣传员去，一下子就有120个人参加红军。在距太平渡两三里地处，发现有个盐仓库，是块盐。我们没收了仓库，发动老百姓来背盐，每人背了三四十斤，并趁此机会做发动群众工作。从太平渡二渡赤水河时，遇见在土城战斗中负伤留在老百姓家养伤的红三军团的一个营长。我们给了那家老百姓一些钱，要他们好好照顾伤员，又另外悄悄地给那位营长留

下些钱，叫他埋在地里以后使用。

中央当时在赤水河东北的鲁班场和敌军万跃煌部激战，命令九军团作为预备队，打到下午四五点钟，攻不下山头，部队撤下来。九军团奉命急行军向东北占领仁怀（即茅台），三渡赤水河到古蔺，用以迷惑敌人。敌军真以为我军要渡江北上，纷纷向川南调动，红军又突然从太平渡四渡赤水河，在遵义和鸭溪之间与敌人展开激战。九军团的任务是在遵义东北方向阻击川军，在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警戒大小道路。午后3时，又奉命跑步增援遵义，但行将接近遵义时，中央电令返回原地，说战斗已告结束。这次战役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

东川之战

3月下旬，中央决定南渡乌江，命九军团前进到枫香坝一带，虚张声势，伪装大军将东渡乌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迷惑敌人，以掩护中央南渡乌江。

中央向南从沙土镇渡过乌江，九军团则从娄山关到枫香坝、马鬃岭，钳制尾追我军主力的敌人，虚张声势。待主力红军渡江完毕后，中央来电指示，九军团务必于次日中午12点以前赶到沙土，随主力过江，如不能赶到，就留下来单独行动。时间紧迫，但又需待天黑方能行军，我驻地距乌江

约有七八十里地。我们从马鬃岭出发，一夜走了四五十里地。下雨路滑，部队首先要从陡坡上滑下来，穿过鸭溪与泮水之间的公路，向导带我们从田埂上走，次日上午七八点钟走到沙土镇，距乌江尚有30里。这一路都是陡坡，是放羊砍柴所经之地，牲口走起来都很吃力，战士们也饥饿难耐，更是艰难异常，于是，一面做饭，一面派一连人前往乌江边上联系，报告九军团已到沙土镇。饭后，把队伍带到山上休息，该处是小丘陵地带，山上毛栗子很多，黑木耳也不少。

派去联系的人回来讲，桥已炸毁，过不去了，要我军单独行动。我军团从此时起又开始单独行动，经川、滇、黔三省十个县一直到西昌才和主力部队会合。

在沙土镇吃完饭后，一看山上地形不利，就下山来在一个村庄休息，研究如何行动。周围高地，都是种木耳的柞树林，没有发现敌人动静。我们向西进到老木孔时，天还没有黑下来。住下后，派人翻山越岭去找土豪打，想搞点给养。派去的人回来报告，泮水发现敌军行动。我们赶紧吃罢饭离开村子，走了十七八里地远，到一座孤立房子，是国民党军一个团长家，人跑光了。我们就住下来，打火做饭，吃一顿还要带一顿。第二天一早，我军又转回沙土镇附近山下那块村庄高地，在丛林中隐蔽。就在这时黔军四个团加上两个营从北面追踪而来。我军又悄悄地移动到老木孔附近，准备与敌人作殊死战斗。

双方接火后，从上午10点打到下午4点，攻上去，打下来，反复激战，互有伤亡，我军在湄潭、绥阳扩充的300多人

组成的新兵营,也开上去和敌人死战。周围村庄老百姓胆大的,还站在山头上观战。最后把敌人全部打垮了,俘虏了1000多人,我军3000多人的部队,伤亡300多人。

老木孔战斗是关系到红九军团存亡的一次战斗。这一地区狭窄,南临乌江,北有金沙、泮水通遵义公路,敌人数量为我军两倍,真是背水之战。战斗中,敌十三师为了赶赴遵义阻止我军东进,跑步前进。它如参战麻烦就更大了。此时已是4月初了。

长征途中,中央曾几次命令九军团如跟不上主力时就单独行动,但每次都跟上了。唯独过乌江这一次,真正脱离了主力,在敌占区单独行动,一切行动全靠自己作决定。老木孔一战获胜,为单独行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仅给了敌人以重大打击,也打破了敌人企图追截夹击我军的幻想。这一仗使九军团转危为安,也减轻了敌军对我主力大军的压力,中央曾来电嘉奖。

打完仗后,第二天从老木孔出发,翻山到泮水,前往长岩。路上有敌军开往金沙,和我军交叉走过,我们只抓了几个掉队的散兵。

当时,我军进长岩是智取,没有交火。事前探听到当地民团有四五十支枪。我军侦察连由科长曹达兴率领前往,命令民团排队出迎,说是中央军,军长马上就到。土豪劣绅和民团不辨真假,整队迎接,我军趁机缴了他们的枪。我在长征中骑的那匹好骡子,就是在长岩缴获的。

第二天进占飘儿井也没有打仗。也是由侦察科长曹达

兴带了侦察连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先行出发。那天早晨有雾,能见度低,对面看不清楚。飘儿井驻的盐警队派一个班放哨,发现我军后问是哪个部队的?我方回答是“中央军”。但他们一看势头不对,转身就跑。我侦察兵开了一枪高喊:“缴枪不杀!”他们就停下来。我侦察连让俘虏带路,跑步进到盐警队驻地时,房里的人还在睡大觉。曹达兴带人首先把队长抓起来,并把他们的320多支枪全缴了。

我军在飘儿井驻扎期间,对苗族进行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因为红军历来重视少数民族工作,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新的考虑,打算在苗族聚居地区,建立一个落脚点,即后方根据地。因为九军团是在掩护主力红军南渡乌江后,由于来不及渡江而被留在黔西北单独行动的。当时主力红军已直奔贵阳,虚晃一枪把敌人吓了吓,就移兵向西,从安顺往云南去了。九军团几个主要负责人商议一下,对于何时能与中央会合没有把握,有必要找一个合适的地点作后方,以便有所依托。我们和苗族来人几次接谈中了解到,苗族聚居地区黔北川南,还跨云南一角,纵横直径各约50里,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后方。苗族人民历来受汉官军阀压迫,痛苦很深,因此我军必须大力对苗族开展工作,建立友好关系。和苗族人民接触由我亲自出面,政治部宣传部和地方工作部的同志们参加。事有凑巧,在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后,就将没收商会会长的盐巴分发给群众,规定每人3斤。我住在盐商头头三面有窗户的房子里,隔街正对盐警队驻地。发盐的第二天下午,我忽然发现有一个身穿花衣服的苗族妇女也夹杂在

群众中间,就让地方工作部的干部抓住时机向她宣传我党我军政策,说明红军和苗族是一家人,民族平等等政策。分给她的盐比给汉人的多一倍,又分给她一些没收来的商品。第二天,来了四五个穿长衫、会讲汉话的苗族同胞,其中一个名叫李少白。他们讲,那个妇女回去有些话讲不清楚,因此特来询问个究竟。我在盐商头头那间房子接待他们,讲了少数民族政策,揭发黔军王家烈的罪行。我陪他们吃饭,临走还送了他们一些布匹绸缎之类作为礼品。后来他们派过一个芦笙队来给部队表演,我们也热情接待,给每个人都送了礼品。第三次来了几个人,其中除两个新人外,其他都来过。他们声称是来看看“黄主任”的,并约我们到苗族区域去开个群众大会,给大伙儿讲讲话。他们聚居区就在“鸡鸣三省”的川滇黔交界处,军团部考虑该处地理位置和群众条件都很好,是一个理想的根据地,也正想去实地看看,并对群众做些宣传工作,因此决定次日由我去参加大会。不料就在当天收到中央军委电报,命令九军团向盘县靠拢,配合中央部队的战斗。因此次日一早我军就从飘儿井出发了,没有能去苗族聚居地区召开群众大会。

部队行进到飘儿井和毕节之间一个小坝镇,恰好处于苗族聚居地区边缘,镇上正逢赶场,十分热闹,曾经在飘儿井接谈过的几个人,包括李少白也正在场上。于是我们就在场上召开群众大会,有两三千人参加。我和地方工作部部长朱明在大会上讲了话,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十大纲领和民族政策,并给苗族人民发了50条枪。会后,芦笙队吹笙跳舞欢

送我军,当天就有20个苗族青年要求参军。还有个50多岁的老头牵了匹马坚决要跟我走,怎么劝他别去也不行。走到第三天,距离他们的家乡越来越远,过了纳雍,快到水城之前,那位老人不愿再往前走了,并且动员那20个青年人和他一起返回家乡。青年人有动摇想回家的,也有愿意和我们继续前进的。为了照顾少数民族政策,我们只好劝他们一起回家乡。如果不是这样,这20个青年人肯定不会离开红军队伍,而会成为红军中少数民族骨干。

离开小坝到达滇黔边境上最险要地方七星峡。经过一个天生桥,是自然形成的桥,河从山下穿过,再往西距水城县东30来里地也有条河,河边有个小山包,可能是个溶洞,洞里藏有地方武装,也有老百姓。我军和他们订了口头协定,我军从这里经过,过这条河,只要卖点东西给我们吃,他们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们。河对面是平原。又走了一两天,大概是4月16或17日,到了一个叫猫场的地方宿营,准备次晨赶紧出发。猫场是群山中一个小集镇,周围都是高山,要穿过悬崖峭壁才能进入猫场。当晚八团负责警戒,半夜哨兵发现毕节方向有大量火光,当即向团部作了报告。八团团长崔建勋麻痹大意,以为是老百姓,未加理会。实际上是黔军两个师准备偷袭我军。部队不知道有敌情,拂晓时照样吹号起床集合。八团刚将所有警戒连队撤下,突然,枪声响了。我军当时毫无准备,敌情不明,临时决定九团政委姜启化带领该团占领前方阵地,掩护部队撤离。这一仗从黎明前开始,一直打到午后四五点钟,边打边撤退。九团新任副

团长利松腿负重伤，寄养在老百姓家，他是壮族。军部科长尹自勇也中弹。政治部青年干事罗洪亮被打散了，后来找到红二方面军才归队。

战斗结束后，我军在离纳雍县 30 里地的一个村庄吃了饭，又向纳雍前进。路上遇见一个送信的邮差，给他作了些宣传工作，又给他钱，请他带路。到了纳雍，他帮我们喊开了城门，城内民团只有百十支枪，我军一枪未发，就将民团缴械。住了一夜，天亮出发。因为要摆脱敌人，必须轻装前进，缴获的枪支都毁掉了，只留子弹。向盘县前进，沿途经过很长一段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坡。到上午九十点钟又经过一个山沟，山沟里有一个土司的炮楼，约有十来支枪。我们从山上走过去，声明我们不打他，红军和苗族是一家人。后来又走到一个地方，两座山崖之间有一小块平原，一间房子也没有，但有人、有牛、有做买卖的，原来是一个“日中为市”的集市。下山后有一条河，部队就在河边大树下休息。在那里抓到一个坏人，是税务局收屠宰税的，附近老百姓纷纷跑来告状，说他克扣穷人，老百姓恨之入骨，因此就地把他枪毙了。

再往前走，人烟稠密。到达盘县附近时，得到前方战斗已经结束的消息，我军主力打龙云的四个团，没有消灭给跑掉了。九军团距主力只有一天路的距离时，中央电令我军向云南宣威方向前进。我军在六（枝）盘（县）水（城）附近，距离盘县 20 里地的水泉子驻扎。从山上看去，盘县县城遥遥在望。七团一个指导员卢金美打电话给我，说：该连驻地的地主家中藏了好几罐醪糟酒，“主任要不要喝？”我叫警卫员去

挑了一担酒回来,让政治部人员喝了。

在水泉住了一夜,次晨向云南前进。距离宣威南面的板桥十几里时,曹兴达仍然率领侦察连先行,伪装国民党中央军,不料民团看出马脚,拿着枪跑掉了。部队到达板桥镇时已经天黑。在板桥停留了几天。

板桥镇有一个彝族教员何老师,他在板桥镇小学教书,带着八九个年岁较大的小学生来参军。何老师为人沉默寡言,吃苦耐劳,后来过雪山草地时,生活异常艰苦,可他一切自理,毫无怨言。在当年我军遭受敌人追堵袭击的艰苦岁月里,一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毅然投身革命队伍,是难能可贵的。可是,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在雅砻江淹死了,叫人深感痛惜。

板桥距宣威只有 18 里。我军一早出发去袭击宣威,路上遇见一位邮差。我们说服他帮助喊开城门,而城内的民团都早已跑光了,只剩下一座空城。部队宣讲政策,发动群众,砸开监狱,释放政治犯,没收土豪劣绅财物散发给老百姓,只住了一天多,就扩大了 100 多名红军战士。宣威盛产火腿,城内好几家罐头工厂,其中有一家最大,厂主是个资本家。但地方工作部的干部误听坏人谣言,将工厂贴了封条。按当时规定,凡贴上封条的就算是没收了,火腿让战士们吃了个够。后来发现搞错了,因行动匆忙未能及时纠正。我的马夫是个有心人,他悄悄把两个猪蹄罐头塞在马搭子里,准备万一路上没东西吃再吃。出城五六里,又发现一家大地主在卖火腿,我们把他的上万只火腿全没收了,散发给了老百

姓。

在宣威得中央军委来电，要我军团迅速离开宣威，准备渡过金沙江，向披沙（今宁南县）前进，如时间允许，可相机占领东川（今会泽县）。5月1日，我军为了继续完成牵制敌人，不致干扰我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的任务，有意离开了叙昆公路，涉水过牛栏江，走小路前进。牛栏江是金沙江支流，江面不宽，但山水冲下来势头很猛，不好架桥，对面山上又有民团若干条枪阻挡我军过河。好在部队机关枪一响，民团就跑了。大家把裤子脱下来捆包好，顶在头上，手拉手涉水向对岸走去。水齐胸高，咆哮湍急，有一个小鬼不幸被急流冲跑了。

过江不远就到了会泽县的者海，者海是一个大集镇，老百姓热烈欢迎红军，并纷纷控诉会泽县姓杨的县长搞什么储备粮，搜刮民间粮食。我军在者海一面开仓放粮，老百姓能背多少就背多少；一面宣传扩军，一夜之间就扩大100多人。者海距东川70里远近，沿途群众都拦路控诉杨县长罪行，大有不共戴天之势。距东川约10里处，我在马上看见左边山坡上有几个人头忽隐忽现，我们大声宣传，“我们是穷人队伍，去打杨县长的。”山坡上立刻奔下六七个人，问队伍要不要他们。一听说“要”，其中有两个人就跑了回去，第二天又带了三四十人来参军。

到达东川城外，天还没有全黑下来，对面能见人。东川是滇东北重镇之一，城墙上民团的壮丁固守。我军把县城包围起来，抢占了制高点，一面准备好爬城的云梯，一面向

守城民团展开政治攻势，叫赶快开城投降。后来城上有人喊话，问我们是罗炳辉的还是彭德怀的队伍。城下答复是罗炳辉的。城上说有信给我军，随即用布匹吊下四个人，带了团防主任张某写给罗炳辉的一张名片，答应和平缴枪。张某原来是罗炳辉的旧相识，吊下来的四个人中有一个中学校长姓高，参加过我党。这几个人回去后，等到天黑城门还是不开。我军在做好谈判和平解决的同时也做了攻城准备，九团姜启化部把云梯靠上城墙，扫射了一排子机关枪，城门才开。

进城之前，经地下党帮助，调查到城外有龙云手下一个姓安旅长的马帮，有60匹骡子和3万两大烟土，还有代商人贩运的许多布匹。除把布匹等货物交还商人外，其余的我军全部没收了。

我军开进城后，老百姓万众欢腾，从城墙上往下一看，城下群众密密麻麻一大片聚在一起，争先恐后地指点恶霸和反动土司的店铺和财产。人民恨之入骨的反动县长杨茂章和大恶霸刘善初（唐继尧的舅父）早已躲藏起来。地下党向我们报告，原党支部书记蒋开榜就是在1934年春、夏被刘善初杀害的。经群众检举揭发，我军把杨、刘二人抓获，5月3日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并根据群众强烈要求，把两人就地枪毙。同时开仓放粮，把反动县长掠夺农民的15仓粮食交给群众背回去，又没收刘家当铺和黄姓反动土司的枪支、财产发给群众。

关于要不要杀杨、刘二人问题，事前军团领导人是有考

虑的。不杀，中央会不会批评我们右倾。而杨、刘都赞成开门欢迎我军进城，还算有功的。最后决定在群众大会上，以军团政治部主任名义宣布予以处决。事后这些年我也曾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从统战政策来讲，对杨、刘似乎也可以不杀。因为最初虽是团防主任自度难于以卵击石，和我军取得联系后力主献城，而杨、刘几经拖延、阻挠，最后才被迫同意开城投降，然而总的说来，算是他们三人一起商量才开城的。但是，他们确实罪大恶极，不杀又不足平民愤。不管怎么说，群众还是满意的。

至于那个团防主任张某，我们对他的家产什物丝毫未动。但在我军撤出东川后第二天，国民党军长李之林就把他抓起来杀了。我军如能在出发之前叫他离开当地也就好了。

东川一役，是九军团和中央失掉联系后单独行动期间最大的一次胜利行动，全军上下无不津津乐道，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也有其独特意义。东川是云南小土皇帝唐继尧的老家。老百姓长期受地主豪绅的横征暴敛、重利盘剥，终年在贫困饥寒的死亡线上挣扎，悲惨万状，迫切要求解放，红军到来以后，镇压了土豪劣绅，开仓济贫，好比一根火柴点着了干柴，革命烈火就会熊熊燃烧。群众懂得了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自发地掀起了拥军、参军的热潮，其情绪之热烈感人，对我军是极大的鼓舞，至今给我仍然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军在东川住了3天，人民欣喜若狂，城外所有道路上行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城内街上更是水泄不通，我几次想去市内观光，都挤不进去。成批成批的人前来报名参军，

简直都有些应接不暇。凡见到有青年人在岗哨前徘徊,你只要一问他是否要当兵,他马上连声说,是!是!一时新兵猛增,政治部全体宣传员都当了指导员,一个人管百把个人,负责新兵的吃、住。我军原只剩下2000多人,东川一役就扩大了一千四五百人。有兵就要有枪,我军进东川时缴了团防队180支三八式好枪,后经群众报告,又在反动土司黄某所经营铜矿的烟筒里起出不少枪支和大量大烟土,于是就把新兵武装起来,成立了新兵营。

九军团在东川的胜利,得到地下党很大的帮助,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地下党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第一次吊下城来和我们谈判的四个人中的高校长,他把敌人内部情况都告诉了我们,使我们心中有数。入城后,又经过他向商会筹款,3天中筹集了8万元镍币(1元合六七角)。高校长后来随我军长征,在四川懋功县不幸牺牲。东川自1930年党支部书记蒋开榜被杀害后,地下党处于无人领导状态,据党员向我们反映,距东川五六十里远的山里有一支反对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有几位地下党员为了逃避敌人追捕,也参预其间。我军团领导当时考虑,和中央一时难于会合,东川形势很好,不如留下来打游击战,因此决定派一名共产党员,带着我军的委任状(如委任某人当游击队长等),前去联系过。后因我军仓促撤离东川,以后情况就不清楚了。

在东川期间,政治部住在城内十字路口。蒋开榜的夫人和另一名地下党员曾来我处见过一面。我们除了安慰、鼓励她,要她抚育孩子成长、继承父志外,并把没收土豪劣绅的

首饰和碎银子等约二三斤和几匹布送给她，叫她找几个地方分头埋藏起来，供儿子读书之用。地方工作部还送了她一些布匹和大烟土。解放后我还给她去过信。

部队出发时正是5月初旬，每连人数多达170到180人，超过寻常编制。清晨出城外集合时，敌机曾来骚扰，在头上转了个圈子，老兵都就地隐蔽，新兵也忙学老兵的样子行事。中午到了热水塘（地名确否待查），站在高地向下眺望，长江宛如一条线呈现在眼前，从山上走到江边，是平坡，不陡，对岸不远是一个名叫乾蓝井的盐场。我们原打算在此地渡江，但盐警队已经把渡船统统调到对岸的四川境内去了，并控制了渡口。我军立即行动打跑了盐警队，但没有渡船，过不了江。还是老百姓好，他们主动报告说江底还有沉船。我们发动船工捞船，找到两只牛皮船。每只可坐两三个人，划过对岸又划回来再带人过去。渡江地点在乾蓝井镇下游不远，记得过江后沿江而上约六七里就到该镇，进入四川境内。我军团过河后天刚黑下来，红军其它部队也在各渡口陆续过了河。河这边是一个叫盐井坪的大集镇，有200多户人家，还有电灯。我们住了一夜，筹款2万块钱，没有没收东西。

中央军委为了防止敌人渡江侧击我主力前进，当晚命我军派出一个加强连。该连由九团政委姜启化指挥，带上两挺机枪和大批款项乘船从乾蓝井至巧家县沿江而下，见到船只就悉数击沉，对击沉了的船只都照价赔偿。姜启化这次行动是九军团单独行动中又一个行动，任务十分艰巨。姜启

化是早年跟随程子华参加大冶暴动出来的，坚强无畏，英勇善战，智勇双全，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干部。

次日，部队出发，迎面遇到一座望不到边际的高山峻岭，山路很陡，头一天只走了60里。半山腰有四川军阀的一所房子，人都跑光了，我们刚好能住下。看见山上隐隐约约有些少数民族群众来回窥探。第二天继续爬山，到山顶时已是午后四五点钟。我们正准备到山下东瓜坪驻扎，可是据前卫报告，川军一营人已开进了东瓜坪。川军大多是些大烟鬼，我们就决定出击。枪声打响时，天还没有黑下来。这一仗抓了100多俘虏，跑了百十来个人，营长也跑了。

我们从东瓜坪沿江向巧家县前进中，遇见了一件十分意外的大喜事——和姜启化会合了。那一天我们在山上走，山下正是巧家县。一看山脚下有部队行动，还有红旗飘扬，就叫司号员吹号，询问是哪一部队，山下回答是九团姜启化部队。大家感到意外高兴，赶紧吹号叫他们归队，山下战士一听，纷纷奔上山来。分别几天后重逢，大家都欣喜万状，互相诉说战果。原来他们完成沉船任务后来到巧家县，敌军早已跑光。姜启化就想出个主意，让部队扛着红旗在大街上游行，雄纠纠气昂昂地走一趟。敌人还误认为红军已经占领巧家县，吃了一场虚惊。

在大凉山彝族地区

到了四川南部的披沙县(现名宁南),进入彝族地区。披沙县地方很小,四面树林环抱,中间一块平地,隔里把路才有两户人家。城墙根上有小商贩在做买卖,部队打算买点粮食和猪肉。我正站在那里观察,政治部一个宣传员一把将我拉开,说城墙垛子上有人用枪口正对着我。我军因急于向西昌进发,不准备在此地打仗,就开走了。我们在城外做饭,饭后天已黑下来,部队就从城外绕过去走了,没有进城。沿途虽然碉堡林立,民团不敢动手,我们也不想打,就穿过去了。往北走是普格县,在离城十一二里地的地方,前面小山坡上有彝族打扮的人往下打枪,约有一营人的样子。我部队正面展开,从左边山坡上绕过去,一开动机关枪,民团就跑了。当晚在普格宿营。普格距西昌60里地,城外是彝族聚居地区,城内汉人多,我军做了些民族政策方面的宣传工作,效果很好。次日部队出发时,彝族头人都来送礼,大头人送羊、送马,小头人送公鸡,我们也送了他们一些东西,并且答应打下西昌后,一定帮忙把他们被国民党抓去的头人放回来。

5月中旬,九军团到达西昌郊区。当时中央已在会理会议后来西昌。我军团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单独行动,现在又

和主力部队会合了，战友重逢，大家都异常高兴。中央给我军团的任务是：接替三军团的防务，包围西昌城，监视西昌守敌行动，掩护主力部队沿大渡河北上。三军团当时一个连才五六十个人。我们把储存的现洋分给兄弟部队一些，战士每人1元钱，干部每人3元钱。

西昌地区物产丰富，人烟稠密，但从城外看去，光秃秃的一座城，没有什么建筑物。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陆续出发完毕后，九军团最后撤离西昌到礼州。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正在此地等待我们。我们找了一家地主的后花园，在四面有围墙的土坡上，他向我们传达会理会议精神，还表扬了九军团的战绩，说中央对我行动表示满意，认为在单独行动中，不仅胜利完成了任务，还扩大了部队。他讲了当时的形势，说：红军已渡过金沙江，把敌人甩在江那边了，现在可以北上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并讲到会理会议上林彪曾说过西进藏区，反对北上的意见。

次日，我军在泸沽宿营。第二天一早，发现川军刘文辉部的四个团追来，我后勤部等非战斗部队先行出发，从冕宁向大桥前进。军团长罗炳辉带部队断后迎击敌人，边打边走。过泸沽桥一二十里后，队伍在路旁小山上埋伏起来，待敌军开过一两个团后，我军突然出击，在泸沽桥口用机关枪扫射，使敌军首尾不能相顾。这次伏击，打死敌军一个团长，俘虏100多人。罗炳辉率部队到大桥时，我们组织了大桥镇汉彝民族的群众出迎，红军声威大振，有的反动头人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我们在对俘虏做了宣传教育工作后，每人发

给3元钱,把他们都释放了。

大桥是一个汉人聚居的小镇,周围山上是彝族聚居地区。红军先头部队刘伯承总参谋长经过该地区时,曾和对面山上的彝族头人歃血结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因此,通知后面的部队也要准备做好统战工作。因此,我们到大桥后,就把一路没收土豪恶霸得来的金银首饰送了许多给彝族头人,由他们去分配,又请头人们喝酒。次日,我军从大桥出发前往安顺场。出镇子不远,上个小坡,就看见彝族同胞约四五千,摆成一个四四方方的队形,手中持枪,不说不动,看着我部队行动。这是绰号大脚板的大头人一种示威性的欢送。有一个头人护送我们,送一段路,又把我们交给另一个头人。沿途有的山上或者河沟边,还有隐藏着的彝族人用枪口对着我们部队。护送的头人只要一声喊,把身上披风衫摇动一下,那些人就跑了出来。部队从“彝海结盟”的彝海边上经过,沿途道路两旁都是森林,中间是沙地,我们就这样顺利通过彝族地区,走到安顺场。

1985年3月,我给四川冕宁县纪念彝海结盟50周年筹委会的亲笔复信中说:

你们准备纪念彝海结盟50周年,这是很有政治意义的大事,我很赞成。

当年红军长征过了金沙江,向川西北进发时,经过彝族地区。彝族人民对我军采取了合作和支援的态度,这对于我军能够顺利到达川西北和四方面军会合,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红军对少数民族工作，历来是重视的。我回忆起当年的一些亲身经历，可以作为纪念会的参考。红九军团从遵义地区到四川西昌，一直是离开主力单独行动的。过了金沙江经宁南(原名披沙)就进入彝族地区，首先到普格，住了一夜，向当地各族人民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和一些彝族同胞有了接触。第二天由普格向西昌进发，行程60里，沿途受到普格人民欢迎。有献哈达的，有送鸡、羊的，有献致敬书文的。离开普格约20里左右，有15个彝族青年由一位长者(名字记不起了)带队前来，表示要参加红军一起前去打西昌城，并送了我们一匹马。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并请那位长者骑了那匹马上路。西昌撤围时，红九军团作为主力军的后卫跟进，这支彝族队伍就随政治部一起行动。进入冕宁后，他们协助我军向当地彝族人民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途中，有些彝族同胞由于对我军政策不了解，躲在山坡上窥视我们。和我们同行的彝族青年把身上披衫掀起来晃一晃，用彝语喊话，山坡上的人就都跑下来了。他们十几个人一直随我们走到安顺场。因为我军要进入川西北，怕他们去了生活不习惯，他们离开彝族地区越来越远，也有怀念家乡之意，因此就把他们送回去了。他们伴随我们前进那一段时间，沿途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估计当年他们中间的人，有的还可能健在。

我军在泸沽大败刘文辉的追兵后，经过冕宁到达大桥时，周围彝族各支的代表每天都有很多人和我们接触，互送礼物。那时已是彝海结盟以后。从大桥到安顺场走了3天，沿途彝族人民对我们很亲近，有的出售土产，个别人还和我们交换东西，我们也送了他们一些枪支。

我们过了大桥坝子，走上一个小坡，便置身于一望无际的郁郁葱葱的森林之中，呼吸着那清新的空气，精神上特别感觉舒畅。当彝海像一面镜子一样出现在眼前时，大家不禁相互议论起刘伯承和小叶丹盟誓的情景，彝海正反映着彝族人民和工农红军的友谊。快走到安顺场的前一天，路过空荡荡的川军刘文辉驻军营房，大家对彝族人民勇敢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无不表示赞扬。

当时，我们很希望能吸收一些彝族青年参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最值得纪念的是，当红九军团进驻云南宣威板桥镇时，镇上小学教师何老师（彝族，忘其名）带领几名学生来参加红军。何老师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长征中走到西康甘孜时，不幸在游泳时溺水而死。另一位姓王的彝族青年，家住泸沽对岸山村里，参军时年才16岁，后来加入共青团。他和我们一直行军到现在阿坝自治州所在地。可惜从马尔康、松岗第二次南下到茂功时，他突然生病，耳鼻出血不治而死。这两位彝族党团

员都很可惜！我还记得，过了彝海那一天，我军驻在一个彝族头人家中。他的一个青年佣人长得很清秀，姓黄，和我同姓。我们给他做了许多工作，动员他跟我一起走，他动摇犹豫，有顾虑，未能成行。

回想当年从普格到冕宁、从大桥到安顺场，一路上彝族人民和红军合作的情景，令人神往。解放后，每当从报纸、电影和广播中看见、听见你们工作中取得胜利时，我都感到高兴。

我们隆重纪念彝海结盟 50 周年，是很有意义的，祝你们成功！

与四方面军会师

5 月底，九军团翻过大雪山山脉最南段的一座大山，进到大渡河西岸的安顺场。在那里遇见十五师的肖华，他和我们开玩笑说：“老九！你们发洋财了，请客！”后勤部同志就拿钱出来，分给他们部队每人一块银洋。安顺场街道不长，洋灰路，有中国式楼房，很清洁。我们住了一夜，听了兄弟部队说说如何渡大渡河的。次日，我军顺着大渡河边走，离泸定桥三四十里路的地方叫摩西面，有个法国天主教大教堂，我们就在那里宿营。没吃的，就挖田地里的土豆吃。幸而我的马夫老孙在宣威时往马褡子里塞了两个罐头，就用火腿煮

土豆吃了一顿。第二天过泸定桥，17勇士抢渡大渡河的英勇事迹就发生在此地。铁索桥上已经由先头部队红二师四团杨成武部铺好门板。桥上九条铁索，每条铁索间隔有一尺多宽，两边都有铁链。站在桥这一头往桥那一头看，心中不由得有些紧张，桥离河面有几十米、上百米，桥下怪石嶙峋，波涛汹涌，巨响如雷。过桥时，人先走过去，马夫把马褡子背上，牵着牲口后过去。过桥后，我们在泸定住了一夜，桥西头还留下部队看守。

中央纵队驻扎在二郎山。和两岸部队会合后，因川军在天全，荥经、雅安和汉源都有驻军把守，不好走，就顺着泸定桥西南绕过，占领了荥经县。天正下雨，山下没有路，遍地泥泞烂草，马蹄陷进去就拔不出来，沿途又没有村落人家，真是十分艰难。幸好我们将在云南东川没收的几十匹骡子和一些物资送交中央，解决了中央当时的一点困难。

当时已是1935年6月初了。中央命令我军走小道去抄袭天全，并在撤离泸定时把泸定桥炸毁。何长工带一个团后一步出发，早上9点钟，按规定时间把泸定桥炸毁。桥刚炸了，又得中央来电，暂不炸桥，因怕二郎山走不了，还要转回走。后得我复电，知道桥已炸毁，没有退路，决定继续前进。九军团向天全进发，沿途都是山间小道，人烟稀少，未被敌人发现，走了两天到达天全。当时红一军团已派部队从荥经向天全进发，川军杨森部一个团在山上布防，九团政委姜启化带了两个营冲上山去，机关枪一响，敌人就跑了。九军团进了城，一军团也进去了。姜启化年轻好胜，他把部队集合

起来，全部三八式步枪，枪上了刺刀，身穿一色服装，从街这头整队走到街那头，显得人多枪好，队伍齐整。兄弟部队连连称赞！

在天全时，周恩来去看望过我们，并加以鼓励说，我军长时间单独行动，不但保存了力量，还补充了人员武装，扩大了队伍，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任务；又给中央送了骡马、银钱，可说是“雨中送伞”。对炸桥事不但没有批评我们，反倒说炸桥帮助中央下了决心。

中央纵队从天全、芦山和十八道水向宝兴前进。我军随后前往宝兴。中央命令九军团开往百丈，虚张声势，扬言要攻取成都，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又命五军团留守宝兴，掩护九军团由百丈回到两河口后，再跟随中央纵队上夹金山。我军还未到达两河口，五军团过早撤离，曾受到中央责备，后来又转回来掩护我军过河。我军由于在百丈一夜行军，沿途没有村庄，一直到了夹金山脚下东南面的大碛，才吃了顿饱饭。该处是藏族地区，山坡地种庄稼，白玉米蒸出来像大米饭一样，香极了。

到了夹金山下，头天晚上在山下宿营，第二天才翻山。夹金山是座大雪山，海拔约 5700 多米，是岷山山脉的主峰。据说，夹金山一上一下 60 里，还“紧巴巴的”。我怕累死骡子，开头 15 里是小平坡，慢慢爬，留点劲往后使。越爬越高，到了一个地方名叫五大拐，“之”字形，一拐就是里把路长，山很陡，没法骑牲口，便抓住骡子尾巴往上爬。我爬到山顶后，向下大叫：“到了！到了！”鼓动大家快上来。山顶上积雪

约有2尺深，雾很大，看不远，山风偶尔吹开雾气，隐约望见远处有牛群和寺庙；山顶上覆盖着白雪，人在雪上行走。下山很快，只有几里地，但很陡，遍是石头蛋子，滑得很，非常难走。山脚下是个小镇叫达维镇，6月中旬，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就在这里会合了。

九军团由达维开赴懋功，住了几天。当地人民生活很穷苦，藏族聚居在山上，汉族在山下。我军经两河口向卓克基进发。卓克基有个藏族头人，是一个洋化了的大土司，汉话讲得好，做买卖，富有钱财，还有100多支枪，一家人占了一个村子，住的大瓦房。一听红军来，他就跑掉了。我们就驻扎在他的大瓦房里，屋里摆设很讲究。住了一夜，次晨将要出发时，发生件不幸的事。原由云南东川随我军行动的东川中学高校长坐在门槛上，藏民从山上打冷枪，他中弹身亡，非常可惜。部队刚走出卓克基，藏族武装约两三百人在山上向我们开枪，我们派了一营人到半山上用机枪一扫射，他们就跑了。

此时，中央纵队和兄弟部队均已北上。我军经由马尔康前往松岗。马尔康树木稀疏，房屋零散。部队没有宿营，兼程前进到松岗住下。松岗的土司衙门，被我先头部队失火烧毁了。街道不成街道，只有点小商店，山下有个大喇嘛寺。司令部住在山上，八团住喇嘛寺，九团住在向东北走15里远的白沙桥。

在松岗一住就是100多天。7月初，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的两河口会议精神，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整编，变更

番号。因四方面军有个第九军，故九军团改称三十二军，归第四纵队指挥。司令员倪志亮，政委周纯全。我军当时约两千五六百人。原九团改称四十四团，团长是洪玉良、政委姜启化；原八团改称四十一团，团长杨梅生、政委辛世修；原七团与四方面军一个营合并，改称四十二团，团长刘华香、政委周生珍。

张国焘反党南下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县东达维北面的八角井胜利会师。双方一吹号，知道是红军，非常高兴。两大主力会师，本来是件大喜事，但由于张国焘这个老机会主义者不执行中央正确路线，闹独立性，最终导致分裂，致使红军遭受重大挫折，使无数革命坚决、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战员遭受不应有的牺牲。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大的血的教训。

早在1932年，张国焘负责鄂豫皖中央分局时，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未经中央同意，即放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率四方面军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遵义会议后，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向川西进攻，以策应一方面军渡江北上，张国焘违背中央指示，发动陕南战役，使敌人得以沿川黔边布防，破坏了一方面军的渡江计划。不久，张国焘又借口配合一方

面军北上,擅自放弃川陕边革命根据地。两大主力会合以前,他就曾在卓克基东南面的杂谷脑(今为理县)召开会议,一句不提中央批评他的话;只讲自己如何正确,中央错了;说中央红军从苏区出发时有8万人,现在只剩几万人,要和中央算帐、斗争。他自称拥有10万人,妄图倚势要挟中央。

6月下旬,两大主力会合后,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统一思想,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边南下的错误主张,并曾对他过去的错误行动进行批评。张国焘不服,会后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贻误了松潘战役的战机。

8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的战略方针,团结北上。会议期间,由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在一、四方面军之间担任联络。会后委任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全军分左右两路,过草地同时北上。

右路军由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领,分为第二、第三纵队,下辖一军、三军、四军、军委纵队、红军大学和三十军第三独立师、第七独立师等,从毛儿盖出发,向巴西、班佑、包座前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率领,分为第一、第四两个纵队,下辖第五(原五军团)、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原九军团)和第三十三等五个军,从马塘、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前进。第四纵队司令为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政委为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纯全,纵队指挥部有一个警卫营。按行军序列,四纵实际上只有三十二军。

左右两路军经过艰苦行军，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到达阿坝和巴西、包座地区。张国焘到此突然变卦，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并企图危害党中央，把红军队伍向南带走。中央决定迅速离开巴西、包座脱离险境，命令一、三军团以上山打粮草为名，跟随中央北上。

三十二军当时在马尔康、松岗。曾接到中央电报，叫我军跟随北上，一切都准备好了，决定次晨出发。夜里忽然又接到一个电报，叫我们原地不动，积极准备粮草。大家都很纳闷儿，心里好似放了一块大石头。紧接着周纯全把罗炳辉找去，可能要压三十二军跟张国焘走。

罗炳辉将军英勇善战，指挥有方，尤其是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运用得很好，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在民主革命战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但在对待张国焘反党问题上犯了错误的。至于何长工，他在遵义会议后接替蔡树藩任九军团政委后，我们合作得不错，对他是尊重的，有事彼此商量。因此，我就和保卫部长卜盛光去找何长工，看他的态度。他正卧病在床，我和卜盛光表示对当前发生的这些意外情况不满意，认为其中有问题，要提防张国焘捣鬼，等等。我们两人讲话直截了当，并明白表示了我们的态度。何长工讲话不多，没有明确表态。但我们两人的态度他是清楚的。罗炳辉从纵队指挥部回来后，就表示坚决拥护张国焘。何长工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张国焘反党南下过程中，罗、何与三十二军指战员经受了一场复杂、曲折和严峻的考验，军团两个主要领导人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令广大

指战员悲愤的惨痛遭遇。

周纯全紧接着来到三十二军召集连以上干部会，惟独不通知我。从此，对我实行政治封锁，不让参加会议，不抄送电报，我完全靠听小广播过日子。会议据说是罗炳辉主持，周纯全讲话，内容主要是反对党中央，提议开除毛泽东党籍，通缉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散会后，政治部的干部拥到我屋子里来，讲述会议情况，非常气愤。按说军队中凡属政治性质的会议应该由政治部主任召集主持，这次会议竟不通知我，可能打算把我当胡底一样搞掉。胡底原是上海特科负责人之一，历史上有过功绩，因为反对张国焘，被张国焘借故杀害。我听同志们讲了会议情况，心情很沉重，但不便当众表态，只讲听听中央指示再说。因为我对政治部干部心中有数，其中也有个别难以相信的人，我最信任的有朱明（地方工作部长）、卜盛光（保卫部长）和王透（宣传部长）。但王透感情冲动时，讲话往往不注意场合，容易为人所乘，因此我当时对王透也只能讲几句安慰的话，不便深谈。

事后，我和朱明、卜盛光三人一起商议，我讲了自己的种种考虑。当时周纯全住在马尔康。中央纵队和第一、三军团已经到了包座，只有三十二军还在松岗。罗炳辉和何长工已经倒向张国焘一边去了，如果由我出面带起队伍来反对张国焘，我们只有2000多人，带走还是有把握的。但考虑到我军所处地势十分不利，向东走有胡宗南30万大军阻击，渡岷江无桥又无船只；向西过大渡河是藏族地区，天寒地冻，孤军深入，死掉一个就少一个；向北进，张国焘的部队堵

住了所有去路。此外,最大的困难是周纯全把电台给带走了。我们没有电台,没有办法和中央联系听中央指示,也无法和驻在党坝的第五军(原五军团)取得联系。五军也有2000多人,军长为董振堂,政治部主任为曾日三,只有政委是四方面军干部。两个军合起来有四五千人,走进藏区也不可怕。考虑来考虑去,只有暂时违心地表示赞成南下,心想到了天全、芦山等汉族聚居地区后,如果张国焘投降蒋介石,我们就带起队伍打游击去。

我曾去八、九两个团了解部队情况。先到15里外九团驻地白沙桥,团政委姜启化、团政治处主任刘学孔和团长都在。姜启化告诉我,刘伯承带着红军学校也被迫跟随南下了,路过白沙桥时曾对姜启化说,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姜启化对我说:主任,你带着我们走吧!我告诉他我的种种考虑,并说最大困难是没有电台在手,有了电台,队伍全部带走是没有问题的。我后来去八团,见到团长杨梅生和政委辛世修、政治处主任刘生胜。杨梅生原是朱总司令带上井冈山二十八团的兵,作战勇敢,曾负伤11次。他对我说,“别的他不懂,但要说毛主席是反革命,他绝不相信,也听不进去。”当时我只能讲,事情以后总会看清楚的。我没有机会和杨梅生单独谈话,但对两个团的干部思想情况心中有了底。以后司令部的管理科长张令彬跑来找我,我也向他透露了我的想法,并表示目前只有表示赞成南下。

我回到松岗,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恰好也来了。他们先去司令部,后来到我住处看我。还没坐上3分钟,罗炳辉

就赶来了，看样子是怕我们讲什么话。后来朱总司令的警卫员潘某(兴国县人)告诉我，张国焘把朱总司令安排在边缘上孤立的房子里，可能有借刀加害总司令之意，伙食方面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只找到几个牛蹄子烧着吃。那时恰好有个土司送我一条奶牛，我就叫警卫员把牛杀掉，烤成牛肉干，叫潘某给朱总司令带去。

10月初，张国焘南下到松岗，导演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卓木碉会议(又称松岗会议，卓木碉就是松岗山坡下面半山腰一间房子，山下是大喇嘛庙)。这次会议却通知我参加了。到会四五十人，主要是企图通过会议煽动大家诬蔑中央北进为“逃跑主义”，赞同他南下的错误主张。在这次会议上，我曾经发言说过赞成南下，本意是想用违心的话来迷惑他们，以免把我调离三十二军。因为我和朱明、卜盛光等曾推测过，张国焘还可能用以下几种阴谋诡计来整垮三十二军：一是并入他的一个军，罗炳辉还当军长；二是调一部分部队和三十二军混编一起，加以监视；三是把不顺从他们的干部调开，另派人来控制部队。

张国焘率部南下到天全后，三十二军划归第四军指挥，军长许世友，政治部主任洪学智。何长工上调后，派了一个名叫李干辉的接替了他的工作。随后罗炳辉通知我调动工作，到芦山总政治部去谈话，实际就是撤职。他问我由谁接替我的工作好，我意识到是要把不顺从他们的人调开，就马上回答说，“就是朱明吧！”果然，朱明没当上几天政治部主任，就换成辛世修了。紧接着，张令彬、姜启化、王透、刘学孔

和卜盛光等都一个个被调走，整个政治部换了班。上面留个辛世修，下面留个朱潘显。供给部部长赵镕也被调走了。

我离开三十二军，经天全西边的沙洲坝前往芦山，那时已是1935年年底。中途经过天全东边的十八道水，红军大学就在那个地方。我去红大看刘伯承校长，他当时处境也很困难，没有约我到他的办公室，而是在收发室接待我。他对外面情况不了解，听到前面在打仗，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他，四方面军和川军刘湘部在名山打仗，没有打胜。刘伯承还把郭天民、张际春等都找来，和我面谈一阵，那时他们都已调到红军大学了。毛定方也在那里。

当晚，我找个地方住下，半夜突发高烧，便血。次日我赶到芦山总政治部找到李卓然，他叫我去张国焘的伪中央所在地住下等待分配。他们把我安排在何长工住房外的走廊里睡。那时我正害伤寒病，没医生看病，没药吃，也没人过问。病了几天，傅连璋听说了，去看了我一次。他也是一方面军的，因为走不了被迫留下的。他看我那天，正是我病情发展的关键时刻。他给我喝了点什么药水，走时安慰我说：睡一夜，明天看吧！我懂得他的意思是说，好坏就在今天晚上了。我生命力强，居然拖过来了，没有死。

那时刘少文（我记忆中他是张国焘的秘书长）对我倒是很关心的，他有时到门边对我说几句话。头一次就告诉我：“那边”（指陕北）有电报来，叫咱们都北上。后来我听说，有人知道他给我通消息，批评过他。部队临出发前他还去看过我，并说走的时候要给我安排一副担架，这话他至少讲过两

次。少文是个好同志，在当时情况下对我那么关怀，实在难能可贵。

我离开三十二军时，考虑到我的警卫员张纪南为人过于老实，跟着我怕他受人欺负，就没有把他带走。我另换了一个警卫员，不料后来竟跑掉了。幸而马夫老孙是老伙伴，一直关心我，照顾我。他是甘肃狄道人，是宁都暴动过来的红五军团战士，当过排长。我那时病得爬不起来，满身虱子，一抓就是几个。马夫帮我抓虱子，叹气说：“瘦成这样了！”我到山边上挖的粪坑大便，大便完了站不起来，还得有人拉一把。后来烧退了，病慢慢好了，身上脱了一层皮，身体非常虚弱。我因为小时候在家乡山上采过药，长征中遇到中药材总喜欢搞一点背上走。九军团到天全之前，打土豪没收过不少鹿茸，政治部的同志知道我爱好中药材，就送些给我，我保存了四五个长的，两三个短的。芦山大病之后，身体虚弱，心想吃点鹿茸丸药试试看。我就告诉马夫老孙拿了鹿茸去找张令彬，请他找个中药铺给我作成丸药。芦山药铺用醪糟把鹿茸泡软去皮，切成小片，放在瓦片上烘干，然后用蜂蜜调和起来，作成指头大的丸药二三十个。头一次试服时，我把一个大丸子劈成两半，分两次吃下去，没事，第二天又吃了一个，也没流鼻血。听说部队要撤退了。临出发时，我还没力气爬上马背，老孙把我抱上，扶我坐稳。我上去了就下不来，还得他搀扶。

部队向北撤退，又要过夹金山。过小铁索桥那一天，老孙先把我从马上扶下来，再把马鞍上的东西一件件放在肩

上背过去，把骡子驮的大米、盐巴也背过去，再回来牵两匹牲口，最后转回来扶着我慢慢过桥，再扶我上马。我因为病后虚弱，过河一趟，全身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老孙愤愤不平地说：“这就是张国焘对你的待遇！”我那时每天吃两个药丸，到了第四五天上，力气就大增了。那时已是1936年春天，我只有35岁，正是青壮年时期，体力恢复很快。

部队撤退时，我不属于任何单位，孤家寡人一个。叫我跟党校一起走。党校校长当时是刘西平，从前我在红军学校担任总支书记时，他是宣传委员，我到步兵学校任政委时，他是政治部主任，我去十九路军期间，他接我的工作担任政委。我们是老相识了，因此，这次我倒是愿意和他一起走，谁知他原来是负责监视我的。到懋功后，顺着大渡河南下到了丹巴。一路上坐在石头上休息时，刘西平问我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九军团是怎么搞的？我老老实实一五一十给他讲了。后来我才知道，刘西平把我的话都向上报告了。

过了丹巴，翻越一座大雪山叫党坝山，山顶上长的是骆驼刺，地上是席拉草，空气稀薄。过雪山严重缺氧，人十分疲倦，走不动，但只要一坐下去就站不起来。我们过雪山有经验的人，就帮助走不动的同志背枪，一翻过雪山，到长着草的地方就都能走了。山那边叫道孚，是康定北面第一个县城，城里有天主教堂，街上还能买到香烟。这时我痔漏化脓、发烧，找个大夫来看，开了一刀，去脓洗净，上个捻子就好了。大夫就是解放后驻外大使陈志方。大夫一走我就睡着了，想不到王透恰好在这个时候来看望我，我们一句话也没

说上。他早已调出三十二军。他来时正撞见康克清和刘西平在我屋里闲聊，说一军团一个团政委因为反对张国焘，跑了，自己去找党中央，被张国焘抓住了的事。王透当场表示，有机会他也跑。不料他这话被刘西平上报了，王透就被四方面军保卫局抓了起来。这是1936年大约3月间发生在道孚的事，我是后来听说的。

那个时期，一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如曹里怀、郭天民、张宗逊等，常在一起议论，认为中央是对的，四方面军南下是错误的。话传到张国焘耳朵里，他正想刹住这股风，就在天主教堂开了一个所谓道孚会议。我先不知道要开什么会。陈昌浩和何长工、李卓然坐在主席台上。会上把一方面军中几个突出人物即曹里怀、郭天民、张宗逊批判了一通，就是没点我的名。那是春天里一个大晴天，气候暖和，我去就在门边蹲着，等着点我的名。会议休息期间，何长工走到我身边，说了一句：火青同志，你不是说都是我何长工的错误，你上台讲讲吧。但会上始终也没见点我的名。有一天早晨，我在散步，遇见卜盛光，他已经调到保卫局曾传六那里去了。他小声告诉我：“正在布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工作。”说完马上走开。我一听就心中有数了。部队从道孚向北，经过一个小山坡叫将军岭，出产黄金，再过去就到了炉霍。当地有个大喇嘛寺，党校就住在寺里，庙宇海拔很高。刚住定，警卫人员（四川人）叫我：“看！王部长给捆起来了！”我赶紧往下一看，正是王透被反绑着手，几个拿红缨枪的人押着他走过去。我顿时心里像油煎火燎一样，难过极了。多好的一个

同志，竟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部队在炉霍住了一段时间。刘西平被提升为党校校长。曾提议我任总支书记未批准。康克清任总支书记，我任总支委。我名义上是校务主任亦即总务处长，实际上当政治教员，负责讲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运动史。讲到有关张国焘错误的地方，我就不指名地批判那件事；如讲到苏维埃时期的“左”倾错误，我就批判那个错误，但不举例子。实际上是要让学员们懂得，他们过去就是这么干的。在讲到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候，我只批判陈独秀，不提张国焘的名字，指桑骂槐。党史课讲完了，刘西平问我，这次南下是不是也应该讲一讲，他是肯定南下正确的，我就让他来讲。有一天，张国焘跑到党校来，是冲着我来的。他在大喇嘛寺阶梯口小礼堂对大家讲话，不指名地批评了一方面军干部，批评我，他说，你们在党校天天老讲思想斗争有什么用，进了西藏要多了解地方的风土人情才对。

我在党校住了上百天。7月间张国焘到甘孜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去了。我多年后在延安见到王震时，他告诉我关于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的事，并说，刘伯承见了任弼时就讲：“要把黄火青要出来。”但当年我在炉霍时并不知道这些情况。

那时候因为康克清在党校工作，朱总司令有时去走走。有一天晚上，朱总司令来到党校，情绪很高，康克清、刘西平和我都在座。总司令说，现在好了，意见一致了，要北上和中央会合。并讲第二天要开个干部会，叫我也去，有话可以在

会上讲。

次日在喇嘛寺开会，到会的有 20 来个干部。陈昌浩宣布，“那边”愿意和我们一起，我们要北上抗战，并宣称南下还是正确的。朱总司令讲话后，我也讲了几句，我不谈路线，只讲团结，都是共产党，为了党的利益要团结，只有敌人是盼望我们分裂的，等等。后来听曾传六讲，我讲话后，有人奇怪我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因为我平时和那些大人物没有往来，大家不认识我。

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之前，可能是为了表示要团结，把我从党校调到四方面军政治部当军人工作部长，作敌军工作。听起来官不小，可是没事干，因为草地并没有国民党军队。总政治部主任是李卓然，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是周纯全、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瑞龙、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宣传科长刘学孔、文工团团团长徐以新，等等。过草地实际上是王新亭带队，周纯全不和我们一道。我这是第三次过草地了。

在炉霍时张国焘办过一个刊物名叫“干部必读”，是用寺庙里的经纸印的，内容都是反党言论。我选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人物和言论的小册子，包起来约有五六寸厚，背上过草地，准备有朝一日批判张国焘时好用。

我的背包里杂七杂八的东西不少，除了“干部必读”，还有熊胆、麝香、一个老虎肾和一本沿途路线调查记录。我一向喜欢调查行军路线，每天把沿途地名、路程、气候和沿途的树木高矮、长不长草、有没有石头等等情况，一一记录下

来。吴永康和我相处较好，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是一个老好人。他带了个寒暑表，我就每天把气候温度变化记下来。这也可算是“黄连树下看牡丹”，苦中取乐。这个记录本子后来过祁连山时丢掉了，实在可惜。我没有警卫员，一切靠马夫老孙，临出发前他搞了一包酥油、炒面和茶叶，用个羊皮口袋装了驮上走，长征中特别在我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对我帮助很大，老孙实在是个难得的好同志。

过草地时，前面的人走着走着，就累得倒下去死了。每到宿营地之前，大家先找干牛粪，发白的才好烧，再找些灰灰菜，要能找到点豌豆苗就算是细粮了。到宿营地，点燃牛粪，先烧一碗水喝，再烧一碗水，抓点盐、抓点炒面和灰灰菜煮在一起吃，就是一顿饭。人们知道我有酥油，都来要，谁要就给谁。部队到了班佑后，陈昌浩吹牛皮，说明天到包座，什么都有得吃，叫大家今天把带的东西吃光。大家真把口袋吃光了。不料第二天我们到了上包座，地里麦子刚出穗，没吃的，连灰灰菜也找不到。我的马夫急了，到处去找，后来在河边发现水里泡了几张牛皮，就拉一张上岸来，先选皮厚的地方割下几块，用火烧烧毛，再用刀拉成半个指头宽的小条条，用开水煮来吃，吃了两顿牛皮，肚子发胀，睡不好。又过一天到了中包座，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刘志坚准备大量的酥油糌巴让我们吃个饱。我吃了两三碗。我和刘志坚是早就认识的，九军团以前驻扎松岗时，他曾带了宣传队十几个孩子去看过我，像白帝城刘备托孤一样把孩子们托给我们照看，说他们是三军团的一点精华。

从包座进入甘肃，经过腊子口到了哈达铺，这里是汉人地区。到达时正是早晨，我还没有住进房子，就撞见任弼时正在村子路上散步。我和他原来很熟，就上前打招呼。他让我进屋去，问我一路情况如何。我说就是气不顺，戴了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他告诉我，头一天已开会讨论过，调我到第六军团，接替甘泗淇的工作，担任政治部主任。我说只要能调到二方面军，当个伙夫我都干。我满以为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谁知第二天李卓然把我找去，说不要去二方面军了，给我一个中央军委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叫我带几个干部到洮州去做少数民族统战工作。我一听，好比当头一棒，大失所望，心里明白他们是怕我到了二方面军，对他们不利，因此有意阻挠。但一想我是一方面军的干部，应当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就表示服从分配。分给我的干部中有魏传统、吴建初等，都是四方面军的知识分子，所谓“白脚杆”的。另外还派了一个警卫班。

头天到野狐桥，离洮州二三十里地，是很大一个村子。我们在店子里住下，找老百姓来调查当地情况，据说村子里有个大地主，于是就派几个战士把他抓来，没收了他的财产和 200 块大洋，两头大肥猪。接着开了个群众大会斗土豪、分田地、分财物。还给警卫班战士每人发了 3 块大洋。把猪杀了，带上半头出发。村里老百姓一直把我们送到洮州。

到洮州后作了些社会调查，了解到此地回、汉民族之间矛盾尖锐，民族间的争斗反复发生过不止一两次。当地有个名叫李仲芳的，曾在冯玉祥部当过旅长，了解地方情况。他

想和我们拉关系,我们也打算通过他了解少数民族情况,并建立一支武装,作为搞统战工作的后盾。他的几个儿子(后来才知道都是土匪)带了百把个人来,跟我们要枪,我们给他们一些枪支。卓尼大土司姓杨,那时才几岁,据说家里有电台,和美国人往来,我们通过李仲芳和他有过信件来往,他还送过我们一匹马。解放后他当了地方人民代表,曾到过北京。新洮州有个麦吾土司,我们也和他联系过。

在洮州还曾遇见五军团干部董振彦的家属。他父亲70多岁了,到部队去打听儿子消息。董振彦是参加宁都暴动的红军师长。第二天他把儿媳也带来了,还送我们一些干馍馍。我们招待他们吃饭,把没收地主的東西也送给他们一些。

张国焘同意北上后,朱总司令来了电话,叫我们做出发前的准备,又交代我们把李仲芳的队伍带走。那时正是七八月间。我们正准备出发,忽然又接电话,叫我们准备粮食,并说后面还有队伍来。我们一听,心中打鼓,又走不成了。当天陈昌浩、李卓然和傅钟等几个人骑马来到洮州,我们倾部队所有,热情招待了他们。他们知道我是反对张国焘的,当着我的面一边吃饭,一边议论,我听出来是不赞成张国焘西去的行动,要和他斗争。原来张国焘中途变卦,不愿去陕北,想渡河西进,在河西搞出个局面,再来和中央谈判,四方面军几个头头中只有周纯全同意他的意见。上述几个人到来以后,张国焘随后也来了。他们在一间大房子(可能是个教室)里开了一天会,还把李仲芳找去调查过河路线,据说李

仲芳告诉他，这一带四面是高山，水流湍急，无处渡河，也没有渡河工具。因此张国焘只好转过头来，前往会宁与中央会合。中央特派陈赓带了骑兵团接他，团政委魏洪亮是我在红军学校时的一个指导员。我们也从洮州来到会宁，我又回到政治部，中央军委办事处的任务算是结束了。李仲芳的队伍随我们只走了一天，就杀了护送他们的两个指导员，把枪拖跑了。

我们一到会宁，就听说中央要组织“宁夏战役”。我在朱总司令处见到陈赓，他当着朱总的面叫我跟他走。我当时心想，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合了，又马上要打仗，从顾全大局出发考虑，一方面军的人此时如果都跑回去了，恐怕不利于团结。因此我就没有表态，想等打完仗再说。

会宁会合后王透被释放出来。有一天夜里他跑来找我，问我要衬衣。我两件衬衣分给他一件，5块大洋给他3块，因为他抽烟。随后他就走了。后来在甘州附近，西路军所谓动员闲杂人员离开部队去做群众工作期间，他和廖月华走了。那是一个月夜，卜盛光送他们走的，走了十多里，在一个庙里住下。以后廖月华又跑回来，但王透从此再没有音讯。

回想起来，当他来找我那天夜里，我如果能去找找李卓然，让他把王透分配和我在一起，也就不会被他们借口赶出部队。再说，如果当陈赓要我跟他走时，我不要过多考虑，而是下决心把九军团几个干部，如刘学孔、卜盛光、王透、姜启化和张令彬等都带走，同到陕北，就可以保存一批干部，他们都是会大有作为的。

关于“宁夏战役计划”，由于张国焘消极避战而受到破坏，中央又发电重申今后作战步骤等，我当时都一无所知，否则，那时我走了也就走了。

西路军的悲壮历程

1936年10月底，中央决定出发打宁夏，要四方面军的三个主力军即第三十军、九军和第五军，加上总部直属队一起西渡黄河。我那时的名义是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长，也随军渡河。由于胡宗南追击，四方面军还有两个军即三十一军和四军没来得及渡河，张国焘只好把他们留下了。

从靖远西渡黄河的时间在10月底，记得那时河边梨树上的梨子已经收摘下来，准备入窖了。渡河后，我这个军人工作部长整天跟着部队行军，不了解军事动向。既看不到电报文件，也没有工作可做，只知道四方面军指挥部改称西路军指挥部，政治部也改称西路军政治部了。解放后才从各方面了解，面对张国焘阴谋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和各种具体情况，中央只得同意将已经渡河部队改称西路军。从此，张国焘和陈昌浩串通一气，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置中央指示于不顾。11月中旬，中央军委曾电令西路军“回过河来”，陈昌浩拒不执行，继续西进。到1937年5月，西路军在西征途中遭受惨重失败，出发时号

称 2.18 万余人，到达新疆星星峡时只剩下 400 多人。西路军的惨痛教训，历史总会做出正确的结论。

行军到景泰附近一个名叫一条山的小镇，我军包围了河西“五马”之一的马骥一个旅。敌人被困在土围子里，周围没有水，也没有援兵，只要再围上一两天，他非缴械投降不可，马匹可以用来武装我们的骑兵师。但听说指挥部指示要讲统一战线，无条件解围。敌军持枪带马由我军欢送走了，转过身来照样打我们。以后又曾在一条山包围过马家军一个团（或营），他们以讲和为名，拖延时间等待援军，援军一来给他们解了围。走到长城边上的西靖，消灭了武威的马家军一个手枪团，几百人，也是无条件的叫他们带枪回去，说是讲民族政策。有的士兵不愿回去，还吹着军号欢送他们。这就是所谓“统战工作”！

部队过河到了河西，好像举棋不定。倪家营子被围后，我听到一方面军干部的小广播传说，中央有电报来，要在部队中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但既没听见传达，也没有布置批判。又听说，中央有电报来讲，如无力继续西进，可再过河东进，中央可派人接应，等等。但部队还是向西走，从武威折回古浪，在古浪一场激战，部队损失很大，又转过去攻占永昌，在永昌住了几天。

古浪激战时，姜启化担任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在战斗中负重伤，抬到永昌城外五里路的大喇嘛寺，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据说他在昏迷中不断叫我：“黄火青同志！黄主任！”直叫了一夜。当时我正在永昌城内，他的马夫打电话

来,我急忙赶去,那时已是晚饭后了。他在庙里的神龛前面躺着,还在叫“黄火青同志!”我急忙答应说,我就是黄火青。但他已听不懂我的话,只是叫。原来在古浪战斗中,八十八师在接应九军撤退时,敌我力量悬殊,姜启化拿起步枪和敌人拼。他头上戴有风镜,敌人一看是个大干部,就向他开枪,一枪从他背后脖子里打进去,负了重伤。我在他身边呆了个把钟头才走,可惜的是没有把他的日记之类带走。由于没有药物治疗,这样一个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坚决反对张国焘反党活动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当天夜里就停止了呼吸。至今,一提到姜启化,我即凄怆满怀。

部队北撤到水泉子。马家军一个骑兵旅从张掖经山丹追来。那地方四面环山,中间一条几十里路长的山沟,部队在那一带埋伏,是很理想的阵地。由于过早暴露目标,枪声一响,敌人回头跑了,失掉了个消灭敌人的难得机会。一次敌机低空骚扰,军长程世才在城门口,叫用枪打,机关枪开动起来真个把敌机打了下来,取得一个意外的胜利。后来,部队绕道往甘州走,到了临泽,又转到张掖附近的倪家营子,住了四五十天。倪家营子是个大村庄,分配给我的住房是在村边很容易遭受敌人袭击的两间房子。其时已是1937年初。第五军一度占领高台,由于孤军无援,又无电台,同敌人进行殊死战斗,以致损失惨重,军长董振堂牺牲。倪家营子没有集市,部队没吃的,只好派人出去搞粮食。九军外出搞粮食时,在梨园堡和马家骑兵遭遇,因寡不敌众,九军政委陈海松又不幸牺牲。九军、五军先后受到严重损失,西路

军能打的就只剩下一个三十军，只好于 1937 年二三月间从梨园堡山上撤退到红万寺，向祁连山深处前进。

从梨园堡撤退时，那时只剩下两三千人，战斗人员很少，大都是后勤人员、妇女团和小孩子。部队分成两股，王树声一股，带了两个连，掩护妇女团、勤杂人员等非战斗人员 1000 多人，从红万寺向西走；以三十军为主加上指挥部这一股向东走，我跟这一股。距红万寺二三十里有个孤立的大喇嘛寺，部队在寺里吃了顿饭，就顺着陡坡下去，过一条小河到对面山下野地宿营。次晨一大早，吃了饭正准备向山上走，马家骑兵追来，袭击左边三十军阵地。曾传六带着我们这批杂七杂八的人员和老弱病残的人在右边山半腰上，既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长枪，只有警卫员在一起，约有百把十人。大家搬石头筑工事迷惑敌人。这一仗打得很苦，直打到天将黑，山脚下有敌人，背后山坡上也来了骑兵，我们这些人被包围在中间。最后决定撤退，从半山腰走，小树丛林遮蔽着我们。从树丛中看出去，山下的骑兵正在我们前面行进，山上也有几个骑兵，可惜我们都只带着手枪，没有长枪，打不了。部队后撤时，山上有段路很不好走，全是雨水从山上冲下来的石头堆积成的路。供给部长郑义斋，工人出身，原是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是个大胖子，走不动，一看形势不好，跑不出去，就把手里皮包交给警卫员，拔出手枪把自己打死了。警卫员也跟着自杀了。同时牺牲的还有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

敌人冲上山口，对面山上徐向前叫他的警卫连还击，敌

人只不过二三十个骑兵，一打就跑了。我们过去和他们会合。我估计，这一仗三十军打得只剩下千把人，加上我们这些人不过一千四五百人左右。后来听说，当晚徐向前和陈昌浩在警卫人员护送下离开队伍，东返陕北，余下的人由六个人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六个人是：书记李卓然，委员李特、黄超、曾传六、李先念和程世才。

部队毫无目的地连夜往祁连山深处前进，战士们又冻又饿，走不动。天快亮时，他们烧火取暖，我说不行，怕敌人发现火光追击，让他们把火灭掉。有一个战士实在走不动，我只好用手推他一起走。那地方没人烟，一掉队就活不成了。我因为腾出手推他，扶他走，把我随身背的黑皮包丢了，发现后又不敢回去寻找。那皮包里装了重要东西，有在炉霍时精心搜集的张国焘反党的刊物“干部必读”十几本；有我过草地的日记本，其中记下每天出发和宿营地点，还有沿途地势、树木、生物以及早晚气候和温度等情况；此外，还有在红军中做地方工作的种种收据、封条；有赵博生送我的一本他亲笔题名的唯物辩证法，我自己绘制的行军路线图和麝香、熊胆、老虎肾、云南个旧的小刀等等。多年来一想起丢掉的那个黑皮包，就感到痛惜万分！

第二天到了祁连山一个小树林地带，停下来做饭吃。我们几个人一坐下来就议论开了。原属一方面军的曾日三找我说，徐、陈走了，搞个工作委员会也不征求我们意见，我们找他们谈谈去。于是曾日三、我、刘瑞龙，好像还有张琴秋，几个人一起去找工作委员会，郭天民做我们内应，质问工委

会是如何产生的?也不民主讨论一下,行动方向到底向东还是向西?等等。好家伙,话不投机半句多。李特、黄超不正面答复我们,反而大骂中央为什么不让四军和三十一军过河来,把西路军的失败原因加在中央头上。我们又质问他们,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徐、陈走后第三天,队伍走到一个有几棵树的平坡地。工委开了会,决定和我们分开走,把我和曾日三叫去,说给我们一连人,自己走。分配我当政委,曾日三当队长,带走张琴秋、刘瑞龙、熊国斌(当过川黔边省政府主席)、苏井观、孙玉清(红九军军长)等几个人,还有魏传统。给了我们一小包西藏妇女的头饰作路费,都是些普通的碎珊瑚珠子,值不了几个钱。而工委带了好多金条。曾日三火了,不要,退还他们。他们人已经分好,忽然李卓然来找我说,要我跟他们一路走。为什么忽然又有改变,我估计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还随身带有甘肃地图,又好调查行军路线,对他们有好处。当然,也有可能是李卓然有意照顾我,因为我是一方面军的,但为什么又不照顾曾日三呢?我就和曾日三商量,既然工委也决定向西走,不如两队合起来一起走。曾日三不干,不愿在他们那里受气。当时我思想上也很矛盾,后来认为,既然组织决定,只好服从,就这样和曾日三分开了。刘瑞龙在出发之前,把他随身携带的许多册“干部必读”扔掉了一些,装书的皮包也不要了。我从他扔掉的“干部必读”中挑选了十多本,装在那个皮包里,用绳子捆起背在身上,准备将来和张国焘算帐。

第二天曾日三一队先动身，随后工委这一队也出发了。我和曾传六带了十三四个骑兵在前面带路当向导。从此地起一直到走出祁连山，都是我们两人在前面带路。我每天早起三四个钟头，我的马夫老孙路上害了伤寒病，我让他骑我的马，他坚决不肯。有一天他落在后面了，叫我先走，说他歇歇就来。结果他一直没有跟上。老孙是甘肃人，他跟我多年，共过患难，大是大非也分得清，他之死使我很难过。多年来常梦见他，可惜不知他的老家在何处，无从悼念。

前进途中，曾经过藏族人的一个大马场。转过山去，正撞见曾日三那队人马，还没有决定前进方向。工委会不知谁讲了话，叫他们跟在工委后面走，但必须相距半天路程，不能靠在一起，曾日三他们当然不干，径自往前走了。我那时在队伍最后头，没有听见讲话情况，等我走到前面时，还看见他们的背影，我赶上去叫他们一起走，但他们一肚子气，不肯回转来。他们都有马，如果一起走，还可以多保护几个干部。曾日三和孙玉清后来是在西宁附近牺牲的。

我和曾传六天天只在前面带路，李先念还把他的指南针给我使用。有一天下午3点多钟，一翻过山，就像一瓢冷水泼在我头上一样，迎面横着一座上百里路长的大雪山，名叫哈刺大坂。3月天气，冰雪已经开始溶化，前面没有路，真像走上了绝路。后来，还是马场那个藏族牧马人带我们从山脚下向右绕过去，并比手势说，此地是几条河的分水岭，一部分流入青海，一部分流经新疆沙漠，名叫疏勒河。彼此言语不通，但“疏勒”二字听懂了，就让他带我们向疏勒河方

向走去。顺着河走，山上积雪返光，前面出现一片草原，灌木丛林环抱，远处隐约还有村落人家，其实都是类似海市蜃楼的幻景。我对照着地图一小片一小片地记载了沿途景物，一直记到安西。

绕过大雪山后，发现自由奔驰的野驴群，一群有上百头，警惕性很高，枪打不着。沿疏勒河走了两三天，天下大雪。多年行军有经验教训了，一路上大家都捡白色干牛粪，到了宿营地，放上点小树枝把牛粪烧起来，围着过夜。我有块油布，原是铺在地上睡的，这次倒过来，把油布盖在被子上，暖和多了。天亮醒来，感觉身上压得很重，一看，油布上积了很厚的雪，先掀开油布，抖掉积雪，才坐得起来。中途遇见过一个汉人张银匠，会说本地话。又请他给我们带路，到了察柯大坂，就不能往前带了，因为一过地界就是另一个民族地区。我们自己往前走了一天，察柯大坂是疏勒河发源地，我们走的是大清河。到了蒙古民族聚居地区，净是红土山岗，找不到东西吃，战士们情绪低落，说再没吃的就要杀马吃。我照指南针的方向走，一路作记号，岔路就用树枝堵住，指示后面部队前进的路，就在路旁画箭头。

天下雪，走了一二十里路，遇见一个40来岁的蒙古人，矮矮胖胖的，养了300来只羊，我们经过解释就把他的羊杀来吃了，并请他为我们带路。后来，在安西让他回去的时候，曾经送给他一些钱财作为补偿。在我向他调查路线时，他不会讲汉语，只比手势。如问到敦煌、昌马、踏实，需要多少天？到安西有多远？走多少天？就用手比太阳出没、睡觉、起身，

有没有柴禾、水、草等等。我只能听懂一句“板纳”，就是“有”的意思，“伊柯板纳”就是很多等等。

我们就这样调查好前进路线，沿着雪山脚下走完了这段路程。前面又出现一座小山，我就一个人跑去调查该怎么走。一看左边有路，前面是一片平原，右边沿着山脚有条小路，我考虑一会儿，决定从右边走。

天已经黑下来，我顺着河沟走回去，忽然发现一个兔子蹲在土坡上盯着我看，我放了一枪没打中，它跑了。回去后，曾传六说他们听见枪声，以为我遇害了。

次日晨，队伍沿着小路前进时，发现山是红石头堆积成的，闪闪发光，山沟的水有硫磺味。捡些石头支起锅烧水，石头都烧化了，可能是硫磺矿。解放后我向地质部长何长工报矿，果然不错。

往前走，野马山头有个野马泉，一股很粗的泉水往沟下冲流，沟有两三米深。队伍就在那里宿营。路上发生一件事，李特原先骑的牲口，让那带金条逃走的警卫员给骑跑了，他看上了程世才警卫员那匹牲口，要调去骑。程世才不理他，一路上他就老是叽叽咕咕发牢骚，说什么不给马就是没有党性，到共产国际去人家要笑话我们没有组织观念，没脸见兄弟党，等等。到了野马泉他就鼓动李卓然召集会议，把我也找去了，约一二十个人。李特就讲什么组织观念问题、党性问题，会上谁也不讲话。我那时也很幼稚，考虑问题也很简单，心想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也不敢杀我了，趁此时机我就站起来大骂张国焘，说要批评没党性、没组织观念，

首先要批评张国焘“南下”，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话音未落，群情大哗，除了郭天民和刘雄武没发言外，大家都冲着我来了，都说南下是正确的。我说，我有我的观点。最后李卓然讲，火青有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我这才算下了台。我在祁连山里放这一炮，不过是出出气而已，毫无实际效果。那天我倒有个小损失，带着用的那个江西小瓷缸喝水，放在地上给踩碎了。后来听刘学孔告诉我，刘雄武对他说，九军团的黄火青和王透真是硬骨头。

走了一两天，到了石包城。地图上的石包城，实际只是空空荡荡的两间房子，一无所有。我的马是野马，不敢进去，别的马先进去了，它才敢迈步。在石包城时，工委会给中央发了电报，这是徐、陈走后和党中央第一次联系。因为修理电台的刘某在战斗中被俘，他了解我电台信号，所以在祁连山不敢和中央电报联系。这次报告主要讲西路军只剩下900多人，准备向新疆走，请示中央。中央非常关心，马上回电，叫我们从北路去新疆，不要走南路。当时不了解原因，后来到了迪化才知道，北路在哈密有个尧乐博士，但力量不大，好对付。南路和田是马仲英的地盘，人多，连盛世才也打不下他。

向踏实前进的途中，经过马家军的马场，有200多匹野马，我军一到，放马人就跑了，但野马性烈，抓不住。在踏实住了一夜。这里是甘肃西部的一个县，往西距莫高窟不过百余公里。

次日决定去打安西县城。一到就打，也不了解内情，原

说城内守军只有 40 人，实际上后来又开进去一个营，还有 40 个骑兵。我们的战士长期行军，十分疲劳，打不下这座县城。当夜就在安西城外宿营。白天敌人向我发起进攻。我睡在一间大房子里门板上，一发迫击炮弹落下来，从屋顶穿过，一直扎到地里去了，但没有爆炸，我安然无恙。攻打安西之役，一个姓钟的团政委牺牲了，他原是瑞金红军学校的司号员，后提升为青年团书记，是一个很能干的小伙子，后来分配到四方面军当了团政委的。

天黑后集合出发，过疏勒河时，为了避开敌人炮台，我们不从正路走，只能从左边绕，到离安西城 15 里地的渡口过河，这里就是西游记上所说的稀泥洞、流沙河。河水不深，但河底泥沙松软，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坑，齐膝盖深，稍一挣扎动弹，人就会整个陷进去。有的马渴了，向水深处奔去，一下子就陷进河底。我们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顺着老百姓走过的脚印，一个紧跟一个走。好在天上有一弯月亮，前前后后还看得见人。

过了河转个弯就是白墩子站。民间谚语说，从甘肃兰州到新疆，中间有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从安西到哈密是穷八站，沿途没有人烟，白墩子就是进入新疆的第一站了，是赶骆驼的人住宿的地方。部队住下，刚煮好开水，还没吃饭，就听见后面有枪声，是敌人靠近了。

那时已是早晨七八点钟，赶紧吃了饭就向红柳园子方向走，那里有个小山包，地形好。快到红柳园时，敌人已经迫近，双方开了火。敌人来了一营步兵，还有一门迫击炮，40

个骑兵。我军还不到 1000 人。这一仗从上午 11 点一直打到天黑，师政治部主任陈智才牺牲了，还剩下杨秀峰和刘雄武两个师级干部。

队伍边打边撤，将近黄昏时撤退到沙滩停下来。工委决定叫刘雄武部顶住敌人，杨秀峰部掩护撤退。李卓然叫人找我去跟他们一起撤退，叫刘学孔也一起走。天一黑，李卓然、李特、黄超、李先念、程世才、郭天民、李天焕、宋侃夫、曾传六、苏井观加上我和刘学孔十来个人，和警卫员一共 20 多人，跳上马向红柳园方向冲去。远看红柳园一片黑，怕有敌人，抽出枪来冲上去，没人。又从山上右前方冲过去，翻了座山，听不见枪声了，刘雄武的部队也从此丢掉了。

向西北方向走了约十来里路，大家又累又渴，就地在山坡上睡了一觉，天一亮又走。当时决定向新疆方向走，但要离开大路，还是叫我带路。给他们当向导，带错了路是要砍头的。我打算从右边绕过去向西北走，再向左转走上大路。第二天上路，走了约 5 里远也找不到水喝。

我走在队伍后面，看见一个山坳里有个小平原，周围是山，地上草长得很茂盛，地是湿的，可能有水，我叫警卫员下去看看，却没有水。前面部队已经往山上走了，郭天民的马夫走在后面，发现山崖边上往下淌水。原来山崖边上有个石头池子，有两张方桌大小，很深，是一池清水，细细的一股泉水顺着崖边往下滴。他们马上把前面的人叫回来，大家洗脸、喝水，就着清泉啃点干粮。吃饱喝足，敌人也被远远抛在后面了，内部却又发生矛盾。李特因向程世才索马未成，气

还没有消，鼓动叫李卓然和他单独走：李卓然是列宁政治大学学生，李特是苏联陆军大学学生，他们都是“吃过面包的”，到苏联吃得开。其余的人都不表态。李卓然指名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忍不住说几句。我说，过黄河时候1万多人，现在只剩下这几个人了，为什么还不能团结呢？有意见，到了新疆再说不迟。李卓然趁机说还是大家一起走吧！

走了一天，又找着一个黄土坡，草很深，还有一池清泉，吃了干粮，平安度过一夜。这时又发生矛盾。因为两天来沿途只见荒芜的原野和沙土积成的荒山，大家不免有点茫然。我根据指南针方向，说还要向北走一段，才能远离公路。有的人就发牢骚，说向北、向北，到底上哪儿去？我是个乐观的人，不在乎这些闲言碎语，只顾往前带路。

这天早晨，我们向西偏南出发，去找由甘肃通往新疆的道路，那时甩开敌人已两三天了。太阳出来后，照见山坡上有雪，太阳照不到的地方，积雪上盖有土灰。原来这是对面上泥石流冲下来形成的一个大河滩，是干的，但在阳光反射下像有河流波浪，还有小树。大家高兴起来，以为向前走会有水喝。谁知这又是幻影，越走越不见有水，走了十几里还是干的，但回头一看，河里又好像有水了。那是1937年4月下旬的事。我走到山高处往下环视，看见左边山上有电线，怕再往前走和敌人遭遇，当即就在山窝窝里躺下，等天黑再走。沙漠地带，天气又热，竟昏昏沉沉睡着了。

马匹也是又饥又渴，挣断缰绳跑去找水喝，果然找到了水，就在那里狂饮起来。我们还不知道，那里离新疆的星星

峡不过一二十里地。盛世才在那里设了一个边防站。先到达星星峡的西路军人员，在收容后面流散的人。一个叫郑乃平的营长正带着人寻找，忽然看见喝水的马匹，就惊喜地大叫起来：“首长的马！”他一面叫人跟着来找首长，他自己先回星星峡报告消息。

我们正在地上睡着，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大片，警卫员大喊一声：“找到水了！”这一声比下命令还有力，大家霍地站起身来。原来离星星峡几里路的地方有一池子长流水，还有小树。大家抢着舀水喝，马匹都跑到水里喝去了。我们折了些红柳树枯枝烧了开水，再煮干粮。吃喝完了正准备出发，从星星峡方面开来了一辆大汽车，为了怕引起误会，车上还插了一面红旗，原来是陈云和滕代远来接我们来了。我们也不要马了，都爬上汽车，多少年没坐过汽车了。

原来，正当我们渡过黄河时，共产国际拨给中国共产党一批军火，是由陈云、滕代远负责接收的。他们把军火带到阿拉木图附近，在那里等待我们，后来到了迪化，他们听说我们已到星星峡，就赶来迎接我们。那时已是1937年4月底了，从此，才算走完了西路军这一段悲壮而又艰难的历程。

新疆三年

1937年4月，我们一行到达星星峡之前，共产国际主管武装暴动的德国人马伊努斯基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决定，接济西路军一批军火武器，有5万支步枪、上百挺轻重机枪和几十门大炮。陈云、滕代远和冯铨、段子俊、李春田等奉中央指示，由苏联护送武器到新疆，中途停留在苏联的阿拉木图等待西路军的消息。

4月下旬，我们一到星星峡，盛世才派驻该处的边防站负责人王效典向迪化报告后，陈云等很快就赶来星星峡迎接我们。我在安西用毡子剪了双袜子当鞋穿，在沙漠地上才走几天，脚指头都露了出来。陈云带来两位苏联医生，尽管医药条件很差，负伤的人总算得到了治疗，大家也穿上了鞋。

我们到星星峡第二天，正是5月1日。那是我一生中度过最有纪念意义的“五一”劳动节了。西路军当时已只剩下450来个人，但我们还保存了一面红旗。当天召开了一个“五一”劳动节纪念会，陈云讲了很多鼓励我们的话，说你们这些共产党员，那样的困难都经过了，人累得不像样子，不投降敌人，还能剩下这些人回来，就算革命胜利了。你们那些破鞋烂袜子，将来都要放在革命博物馆陈列起来。他的讲

话使我们深受鼓舞，整个会场情绪沸腾。

在星星峡期间还有过两件事。一是刘雄武的警卫员和其他掉队的人陆续跟了上来。据警卫员讲，刘雄武受伤，腿打断了，扶到山上去，不能走动。我把刘雄武的经历报告陈云，他原是滇军朱培德部一个排长，1929年带了一个排起义上井冈山，担任过红九军团的团长，在反对张国焘斗争中观点正确，是个好同志。我建议由我带一班人、两挺轻机枪和一辆汽车，去把他找回来。陈云考虑了一会，没有同意我去，另派了刘学孔和刘雄武的警卫员带一排人去了。据他们回来后讲，他们在当地吹号寻找，没有人应声，警卫员又记不清确切地点，没有上山搜查，结果空手而归。要是他们当时先占领一个山头，再派人上山搜查就好了，因为刘雄武既已不能行动，即使听见号声，也无法走出来。

第二件事是哈密的尧乐博士要逃出新疆，投奔国民党。他收拾了大批细软，把苏新贸易公司的汽车扣了三辆，叫自己的副官押车逃走。从哈密到关内有两条路，一条是沿着蒙古边上走，一条是从星星峡走。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就派刘学孔和杨秀峰带一排人，由苏联人带路，在路旁埋伏下来。我方一开枪，苏新贸易公司的车就停下来了，因为司机全是苏联人。就这样，三辆车装的金银细软全部追了回来。

5月4日，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在陈云率领下，离开星星峡前往迪化。第一天住在烟墩。晚上，大家都已入睡，天上有月亮，滕代远原来和我认识，他和冯铨约我去散步，在院里停放的汽车旁边闲聊起来。他们问我西路军到底是怎

么回事？因为他们在苏联，对情况不了解。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张国焘反党活动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们。5月7日到了迪化，开始住在西郊公园附近金树仁时代准备办纺纱厂的地址。我们住在北面，南面空着没人住。平时陈云有事只找原西路军工委几个负责人，不找我。有一天晚上，陈云叫我：老黄到院里“踱方步去”。他和我在中央苏区就认识。我们在南面院子里来回散步，他当面问我西路军有关情况，我又对他复述了一遍。

1937年7月间，西路军余部迁到迪化东门外营房，对外称“新兵营”。我们在那里休整、学习，名义上是盛世才招待。实际是苏联出钱，每人每天有一斤羊肉吃。长时期艰苦行军、战斗生活之后，一休息下来感觉万分疲倦，吃了饭就想睡觉，总觉睡不够，差不多睡了10天。陈云当时的方针是：要大家好好休息，不谈过去的事，怕谈起来影响同志关系。我和曾传六在祁连山一起打前站带路，比较熟悉了，他是党委成员，我和他同住西屋，其他人住在一排三间的上房。我有时就和他谈谈党的政策、党的历史和苏维埃运动中的失误，只是不提张国焘的姓名，但说明党内问题总是要搞清楚的。看样子他内心非常苦恼但从不表态。

我把随身带的那些“干部必读”之类张国焘反党的小册子清理出来。有一天我同郭天民去看陈云，他听说我带了些刊物，叫我交给他。我检出一份比较完整的交给他，重份的我留下，买个练习本子，把小册子上的文章的重点摘抄下来，封面写上“旧事重提”四个字，有空就看看，准备将来系

统批判张国焘反党罪行之用。那个期间由于用脑过度，我曾发生过一次严重失眠，几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后来还是苏井观（原在上海学医，后进入苏区的）告诉我一个办法，每天早晨、晚上散步 1 小时，高兴了还可以跑跑步，但不要过累，睡前用冷水洗洗脸，第二早晨不洗脸就散步，也是一个钟头。我没地方散步，就在屋后雪地上像驴推磨一样，绕着圈子走。此外，滕代远还教会我骑自行车，有时上街，撞见卖烤羊肉串的，就停下来烤上几串，骑在车上吃。

陈云和滕代远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经常和我们联系的是冯铨，他对外名义是新兵营政治处主任。有一天开个什么会，我们十来个人加上陈云等五六个人。李特和黄超又在会上发泄对党中央、对共产国际的不满。会议中间他们忽然冲着我说，听说黄火青同志对过去的事还有意见，什么“旧事重提”！平时陈云告诉过我别讲话。这天开会叫我可以讲。我就站起来说，我有意见不自今日始，过祁连山时我就讲过，我是反对张国焘反党行为的，有意见我还要讲。陈云表示，黄火青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这个会就算结束了。

1937 年 11 月下旬，陈云回延安去了。至于我们留下的这些人，是去苏联还是回延安尚待决定。

后来，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要留下一些干部在新疆工作。12 月，李卓然、曾传六、李天焕、李先念和郭天民等奉命调回延安，我奉命留新疆。我改用年轻时代的名字，黄民孚，算是留下来的干部中地位比较高的一个。西路军留下来工

作的干部还有汪小川、黄义明、周纯麟、潘同(后叛变)和胡东等几个人,其他人员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以后又从延安先后派来两批干部,如林基路、高登榜等;还从由苏联回来路过新疆的干部中留下一些人,如毛泽民等。李宗林也是从延安来的。

陈云离开新疆后,中央派邓发接替他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并负责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新兵营的工作。在新疆工作、学习的同志,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领导。党在新疆是按苏联的政策办事的。干部分配工作时,邓发就交待过,在新疆要执行六大政策,帮助巩固盛世才政权,不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进行党的组织活动。这些实际上都是苏联和盛世才商定的,而苏联在新疆也是这样执行的。邓发还交代,我和毛泽民、徐梦秋(后叛变)三个人,在一定时期可以由我召集,碰碰头,交换意见、研究情况,但并没有党小组和党小组长的名称。其他人员和邓发有联系而没有组织关系。

当时,掌握新疆军政大权的是地方军阀盛世才,他是1933年利用政变上台的。原来的省主席金树仁被赶跑后,盛世才倚仗手中兵权,在苏联支持下当上了新疆边防督办,收容了一批从苏联回来的原东北军苏炳文和马占山的部下,控制了军政大权。他上台时地位不稳,处境困难,西北五马之一的马仲英部乘机从达坂城打到妖磨山,占领了飞机场和北门外的阵地,包围了迪化。盛世才走投无路,向苏联求救。苏联大力支援,不仅派飞机轰炸马部阵地,又派出号

称阿尔泰的部队,身著盛世才部队服装,把马仲英的军队一直赶到和田,解了迪化之围,救了盛世才的命,因此,盛世才才对苏联感激涕零。1935年苏联人派了一批华人王寿成(即俞秀松)、陈中、张义吾到新疆,帮助盛世才政权建设工作,并给他无偿的巨额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选派了经济、军事专家;并由苏联红军第八团驻扎哈密,以保证中苏之间国际运输线的畅通。苏联方面的用意是想扶持盛世才,使新疆政权和苏联友好,保持这一段中苏边境的安定。而盛世才则企图利用苏联的力量巩固并扩大自己的势力,稳住统治地位。他标榜反帝亲苏,对苏联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予以采纳。他在苏联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制定了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作为新疆的施政纲领,并允许阅读马、恩、列、斯的著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大部国土,新疆就成为我国安全的大后方,也成为我国与苏联之间物资、人员往来的国际交通要道。我党当时在新疆工作,就以“六大政策”为政治基础,努力发展和盛世才的统战关系。盛世才也想借助中共力量,炫耀进步,取得苏联信任,作为向国民党闹独立性的资本。至于苏联,则是希望中共和盛世才建立并发展统战关系的。总之,我们在新疆的工作,均由苏联、盛世才和我党代表决定,就是执行苏联在新疆的政策。这些陈云最清楚。因此,1937年10月,我党在迪化建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

1938年初,我党应盛世才实际上也是苏联的要求,从

新兵营抽调一批干部到新疆政权中工作，我也就在那时候出任官办的群众性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我们的同志主要分配在政府机关的财贸和文教口工作，盛世才是不愿意我们到军队去的。以后，可能苏联方面讲了话，妥协的结果，在军队里安插了几个人。同志们组织纪律性很强，大家虽然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但始终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已，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为新疆各族人民谋利益，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毛泽民对新疆币制、税收的改革，对新疆财政方面贡献很大；如林基路、汪小川、李宗林等在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主张，激发青年爱国热情，团结进步分子等方面成绩卓著。在和群众接触中，人家一看你没有官气，一看你的风度好，他嘴里不说，可心里明白你是中国共产党员，这就给新疆人民留下了良好印象。

民众反帝联合会在新疆的政治地位很高，因为会长是盛世才本人，副会长是省长李溶，规定政府厅长等都必须加入。汪小川、李宗林当时是《新疆日报》正、副编辑长，反帝联合会在《新疆日报》上占有一个版面，我们就利用这张报纸来宣传“六大政策”，实际上是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张。林基路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

新疆政府各个系统都有苏联顾问，财政部门的顾问是总负责人。各专区设有苏新贸易公司，名义上是商业来往，实际上起领事馆的作用。

在西路军余部还未到新疆之前，盛世才曾制造过阴谋暴动假案，把金树仁时代留下的许多官僚抓起来，准备开庭

审判,其中,有些原是替苏联工作的,因而苏联就派了五个顾问参加审判,并要我们派人当审判长,我被派去兼任审判长。两个副审判长都是盛世才的人。实际上我们是帮苏联讲话,释放了一些人,其中有的是比较重要的人物。

还有一次,盛世才设计栽赃,把新兵营派到喀什苏联驻军中当少校骑兵连长的一个红军军官周纯麟抓起来,带回迪化审判。冯铨去找我,叫我在审判时要释放他,但没有给我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虽不明白其中原委,但开庭后,就把他释放了。

尽管中共党员没有公开自己的政治面貌,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政治影响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扩大,生性多疑的盛世才对中共的疑惧也就越来越深。陈云善于处理统战问题,他在新疆时和盛世才关系处得比较好,他离开后就不同了。开始,盛世才为了表现积极,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党婉言谢绝了。1938年秋,他跑到苏联见了斯大林,提出想加入联共,斯大林也表示拒绝,回来以后他就翻了脸。1939年初,他将我党在迪化工作的干部陆续调出迪化,有的甚至赶出新疆,妄想以此限制我们的行动和影响,还提出一个口号“注意新来的人”。1939年5月间,我被调离反帝联合会秘书长职务,改任阿克苏行政长。我还没有到任,该地区已经在宣传“注意新来的人”了。

苏枚是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时留下来的,在迪化当中学教师,我们是在迪化结婚的,后来同去阿克苏专区,她在师范附属中学高级班任教。

我在阿克苏工作期间，受到盛世才的密探、公安局长曹天爵的严密监视。他在我身边安排了两个特务，起初我一点也不知道，是当地苏新贸易公司的人告诉我的，其中一个叫蒋泽中，原在迪化民众反帝总会当科长，他的父亲曾任省府办公厅主任，被盛世才逮捕关在监狱中。我任审判长时，在审问中认为他没什么问题，就作决定把他释放了。我到阿克苏时就把蒋泽中带去当秘书，不料公安部门把他收买了，命令他监视我。他趁我不在家，去找苏枚借阅马列主义书籍，故意表现“左”，以便接近我。我回来听说，马上让苏枚去把书要了回来，以免蒋泽中耍什么阴谋诡计。以后盛世才组织了个南疆调查团来到阿克苏，团长王宝乾（即赵石）是从前和我一同从武汉去苏联学习的，后在新疆工作。我告诉王宝乾，蒋泽中是给盛世才干事的，以后蒋泽中就被调走，到一个县里当副县长去了。另一个安插在我身边的特务叫买买提，维吾尔族，给我当秘书主任，天天送文件来，念给我听后，我再批办。

我在阿克苏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城区附近，想出去巡视，到外县跑跑，都不行。有一次我和苏新贸易公司经理讲好了，坐车到库车县看看林基路，还没走上几十里地，当地军区司令员孙庆龄拿着盛世才的电报叫我回专署，问我为何出门不请示督办公署，擅离职守。这个孙庆龄原是苏炳文的少将衔教导队长，对我一向冷淡，我也从不找他。后来我离开新疆回延安，他兼任阿克苏行政长。

行政长的工作主要是处理民间纠纷，如土地、婚姻等问

题,老百姓打官司,是哪个县告的,就批交那个县去办。在地方建设方面,我有好几件事情想办,由于条件限制都没有办成。如水利,那里荒地多,开水渠可以使粮食增产,有一条水渠只要开挖加长就可以灌溉 1 万多亩土地,但专署无权,只好作罢。

我那时只能以反帝联合会阿克苏分会为基础,和林基路共同在文化教育、宣传工作等方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教育改革、充实和扩大公立的汉族及少数民族学校,开设并增加国语、算术、政治、常识、地理、历史、体育和歌咏等新的课程。还开设教员训练班,特别是培养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为阿克苏行政区解决师资缺乏问题。平时,我还在行署会议室给青年职员们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利用机会宣传马列主义。有时举办电影晚会、文艺晚会,演话剧,演反法西斯和抗日救国的文艺节目,组织歌咏比赛,举办运动会等等,为此,我们在行署旁边修了一个砖基、土木结构的俱乐部,能容千把人。

行署有点官地,每年农民收庄稼后,向公家交一部分粮食。有个科长姓韩,人很好,我叫他找上两个人一起管理那些粮食,按人头分给工作人员,包括警卫队和大师傅等共四五十个人。我是自己买粮食吃的。还有个果树园,种了苹果等等,我让人修了条路,叫学校学生们游园时可以随便摘果子吃,但不能带走,最后剩下的给工作人员分,这也算是一点福利。我住房后院有个园子,园里有个小水池,春天买三四十只小鸭放养,秋后杀了腌起来吃。还用 12 元钱买了只

小鹿在园里放养。按规定我有两匹好种马和一辆马车，有时我还带上枪，坐上马车出去打猎。当地风俗，六七月间果子熟了，有钱人家要请地方长官“浪”（当地土语，即游玩之意）园子，吃烤羊肉串、喝茶，玩上一天，这对主人来说是很体面的事。有个大阿訇伊布拉伊，100多岁了，清朝年羹尧“打回回”的时候，他已经出生了，在地方上很有威望。他过生日那一天我还去过他家。

遗憾的是，我没有抓紧时间学维吾尔文，只能讲一句半句维吾尔族生活习惯用语。想做点调查工作又走不出去，每天只能和阿克苏报总编辑陈清源玩玩，他有收报机，可以收听外国的新闻广播。离阿克苏30里地的温宿有个叫程九柯的，是温宿县财政科员，偶尔也去我处。平时，我有空就和学生、工作人员们一起打打乒乓球、台球等。

中央驻迪化办事处和我没有直接联系。有一两次办事处曾间接地给我送点情况资料，经苏联领事馆送交阿克苏苏新贸易公司转给我。这期间，我意外地收到过一封家信，是寄到延安后，转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由办事处转到迪化，最后才送到阿克苏的。这是我离家十多年后第一次收到家书，信内还附了我老母亲一张照片。大哥的信充满感情，他说多少年来只收到过我从福建寄出的一张明信片，“虽寥寥数语”，但得到很大安慰；并说多年来天天看报，随时留心我的消息，等等。我看着老母亲的照片，像是在做梦一样，脑子都发晕了。

1940年七八月间，周恩来从苏联回延安，曾路过新疆。

9月间，盛世才突然给我来个电报，说我母亲病重，要我回家探望，他为照顾我母子之情，准予离职，等语。我心里明白，可能是中央调我回延安。

我去苏新贸易公司辞行，他们听说我回去没有车，就派了一辆载重汽车送我们一家三口去迪化。头一天住在库车县，林基路夫妇热情招待了一番。第二天到迪化，住在招待所，冯铨去看望了我们。我到办事处见陈潭秋，那时他已接替邓发的工作。他告诉我，调我回延安的经过。原来周恩来在迪化时，对盛世才讲了中央要调我回延安。据陈潭秋说，中央准备派我到湖北担任新四军五师政委，接替陈少敏的工作。

那时候苏联和重庆之间有条航线。我在迪化住了几天，就坐飞机出发。冯铨到机场送我，盛世才也去了。我是1937年5月初到迪化的，前后在新疆住了3年多，其中有1年多是在南疆。

飞机飞经甘肃凉州和兰州之间的乌鞘岭时有云雾不能通过，临时在凉州降落。飞机场有国民党特务监视窥探，我找一个机会把刻有“黄民孚”三字的图章扔在一口水井里，因为盛世才给我的护照上写的是“八路军少校参谋黄和青”，不是黄民孚。当晚住在苏联招待所，第二天到了兰州，住在苏联空军招待所。然后我们坐上吉普车，对外声称是送电影片去检查的，车一开就开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见到伍修权。在办事处住了几天，我们从不出门一步。

几天后，买票坐汽车去西安。国民党特务也跟着我们上

了汽车,想和我们搭腔,试探我们是否从新疆来的。车开到华家岭住了一夜,次晚宿平凉。早晨上汽车后,看见有个戴眼镜的人挟着皮包进了汽车站,向屋里走去,样子有点像张国焘模样,他只顾和车站上的人谈话,没看见我,我赶紧把脸掉过去,心里有点紧张,没开车前的那几分钟真难熬。到了西安,一进城门,就让我们下了汽车。我们就雇了黄包车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见到了林伯渠。

回溯我在新疆那段期间,从1939年秋,国际国内形势开始出现逆转,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蒋介石加紧和我党闹摩擦,掀起反共高潮,因而盛世才也就越来越背离“六大政策”,接连制造各种阴谋案件。1940年我离开新疆时,盛世才和我党关系已经非常冷淡,经常闹别扭。因此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苏联忙于打仗,我党也正处于空前困难时期,盛世才便背信弃义,乘机下手,一下子把中共在新疆工作、学习的人抓起来投入监狱,残酷迫害,以此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见面礼。

事后来看,我党同盛世才那一段统战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误之处,的确值得认真加以总结。苏联没有料想到蒋介石会拉拢盛世才,但我们早就应该预料到的。在延安总结新疆工作时,我曾向邓发讲过这一点,他是否向中央反映过就不得而知了。我认为最大的失误有以下几点:

第一、当尧乐博士叛变逃跑,哈密的职位空出来时,盛世才曾有意叫新兵营派人接管,把哈密交给我们,如果我们当时把哈密拿到手,后来形势发展会大有不同。哈密地理位

置重要，东与蒙古接壤，南与陕甘宁边区邻近，黄河一上冻结冰，来往很方便。我们如控制了哈密，可利用多种关系到甘肃绥州、二米子河开辟工作。从经济上说，我以商业形式出现，把新兵营的刘崎（原一方面军的，解放后曾任交通部顾问）派到酒泉做买卖，新疆有盐，苏联有布，这都是当地人民所需要的。从政治上说，我们利用这个点扎进去，团结地方人士，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争取知识分子，办个抗大式的学校，再把学员派回新疆内地工作。这样由西向东逐渐发展，河西走廊可为我所有。再把工、青、妇组织起来，在绥州、甘州建立个民主政权。从军事上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绥远、内蒙古，我可派人与西北五马联系，绥州、甘州、兰州、凉州和青海各有一马，可和他们搞统战关系，共同抗日。盛世才的部队只要汉族人，我党可组织各个民族的抗日队伍加以训练，再派回地方工作。只要我们掌握了一支好的武装，蒋介石就进不去，因为他要进新疆只有经过哈密这条道。大门堵住了，盛世才也就不敢轻易背叛了。

第二、1939年日军进攻包头，战火烧到五原，蒋介石耽心苏联援蒋军用物资的通道被切断，曾命令盛世才派两个团到二米子河。他无兵可派，我们却有兵不派，坐失良机。当时我们有100多个干部，400多名战士。后来苏方派了第八团8000人，全是机械化部队。如果当时由我方派兵，就可以在酒泉设立办事处，打通河西走廊，和苏联联接起来，不怕蒋介石后来打我们。

我们在新疆时，中央的重要文件、书刊，到办事处是可

以看到的,但却不能根据中央指示讨论和布置工作,而要按苏联政策办事,苏联那一套做法,我们也不是没有意见。

那段工作如何总结,很值得研究。

在延安中央党校和整风运动

我们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林伯渠。办事处派车送我们去华清池洗澡,还到附近公园看了看。

我们从办事处坐汽车去延安,一行十多个人,除了几个搞文化工作的就是女同志,其中有郭靖和一个外号叫“卢沟桥”的女同志。大家选我当车长。头天晚上住洛川,国民党特务来查店,把我们的护照全带走了,第二天开车时才取回。当晚宿甘泉,已经是陕甘宁边区的地方。次日一过三十里铺,就到了延安。那时已经是1940年10月初了。

到延安后,分配我住在中央组织部,正好在陈云隔壁的窑洞里。他那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告诉我,要等到交通方便时才能去新四军五师。一两天后他通知我,毛泽东要见我。我是在杨家岭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着我,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知道,你黄火青是不反中央的。他对我说,新四军五师现在去不了,是不是到学校里学习学习。我说我已经快40岁了,怕学不进去。他笑笑说,他比我大8岁,还在学习呢。他又问了问新疆和盛世才的情况,各少数

民族人数和军队数量。我告诉他，盛世才部队，包括后勤人员号称 3 万人，其中战斗兵员不过万把人。我们只要有 1000 骑兵，有电台和苏联联系，背靠天山打游击战，完全有把握打垮盛世才。就这样随随便便谈了一阵，我告辞走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关照我一句话，有两个人叫我一定要去看望一下，就是王明和高岗。我体会他的意思是顾全大局，从团结出发。王明住在杨家岭，我去了一趟；高岗新搬住处较远，我和他又素不相识，没有去。周恩来、朱总司令和任弼时我都一一去看望过。

我在组织部住了十多天，就是看看文件，没有太多的事，于是就向陈云提出来，我还是愿意搞军队工作，想搬到总政治部去住，部队熟人多些。得到他的同意，我搬到了总政。

开始和总政秘书长彭加仑住一个院，后来搬到军人俱乐部后面的窑洞，和杨勇住隔壁。我们两家相处很好，我和杨勇性情相投。他的妻子林彬和苏枚也合得来。他也有个小女儿。那时我很馋，想吃油荤，有一回买了个大猪头，十来斤重，两家分着吃。又有一次我和杨勇出去打猎，想打只野鸡解解馋，跑了半天，什么也没打到。返回途中，凑巧在新市场看见有卖野鸡的，就买了一只，见人就说是打猎打到的，装装门面。回家后让警卫员给揭穿了，因为他们在拔掉鸡毛后，找不到枪眼，一看就知道是在电线杆上碰死的。解放后我们两人见面，一谈起这件事还不免哈哈大笑。还有一次组织到枣园春游，我和陈云、邓发等四个人在枣园梨树下面

玩“都拉克”，玩得很尽兴。那时魏传统在总政当宣传科长，我们比较熟悉。我的长子黄友学、次子黄毅诚、侄儿黄友若和侄女黄友莲、友群，都早已先后在延安工作、学习。我的妹妹黄海明后来在中央党校四部学习。

在总政居住期间，个人生活上意外地遇到过两件不幸的事。一是我的小女儿玛霞因病死了。那年玛霞刚2岁，长得很可爱。傅钟（当时任总政副主任）常说，她和叶子龙的女儿是延安最漂亮的两个小女孩子。那时她已经会说几个单字了。我每次回家，走上石阶刚露头，她一见就叫起来：“爸！”我们在窑洞墙壁上挖个小方洞放东西，她要吃时就会用手指着说：“拿！”她的病是因为缺水，我们没经验，没有及时给她喝水。我把孩子送到中央医院，儿科大夫说，要有两斤葡萄糖才能治，我没有，后来找到傅连璋，给注射盐水，可是已经晚了。这孩子如果还活着，已经40多岁。多年来一提到她的死，心里总有些难过。第二件事是苏枚胳膊被压断了，那是女儿死后的事。我们在窑洞旁山沟边上挖了一个厕所，有一天下大雨，苏枚去上厕所，土崩滑坡，她的右胳膊被砸骨折。那时我没有警卫员，跑到总政找了副担架冒着大雨把她抬到和平医院。

我在总政等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因为去前方的道路走不通了，不能去新四军五师，组织上安排我到军政学院担任副院长。院长是谭政，副院长有方强、张启龙等，院址在大砭沟即文化沟。我只去报了到，还没有参加过会议，军政学院就合并到中央党校了。1941年底，我调到中央党校任

一部主任，副主任刘芝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党校作了整风报告后，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负责领导党校整风学习。我改任秘书长。

中央党校共分六个部。一部学员都是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和少数地委以下的“七大”代表。我改任秘书长后，一部主任由古大存继任，副主任刘芝明。二部学员为“七大”代表以外的县、团级干部，部主任为张鼎丞，副主任孙志远、安子文。三部为原中央研究院，学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较有名气的文化人和文化工作干部，部主任为郭述申，副主任张如心、阎达开。四部学员为原军政学院学员和党校原有学员中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在整风的同时学习文化，学员级别基本与一部相同，部主任为张启龙（后张邦英），副主任程世才、杨尚奎。五部学员以陕甘宁边区的县、区级干部为主，也有一部分经过长征的团、营级干部，部主任为白栋材，副主任强晓初、晁哲甫。六部学员为从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县、区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部主任为马国瑞，副主任谷云亭。全校学员3000余人，加上公务人员共约6000人。校部和一部设在原中央组织部旧址。

中央党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校部和各支部的干部人选，都有意识地吸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干部担任，特别是吸收那些有能力、有威望和有广泛群众联系的干部参加工作。由于他们多系各个方面主持实际工作的同志，这样就便于汇集各方面的经验和意见，又便于传达上级指

示和反映群众的思想动态。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教育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党的建设上的伟大创举。这次整风运动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主要是清算了王明路线,检查了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检查了自己的思想,从而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团结全党的目的。通过整风运动,使干部学习和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党性。当时中央党校是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副校长彭真是从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调来的。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整风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对全党整风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全党工作的开展也有巨大的影响。

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目的在于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 and 党的优良的工作作风。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镌刻在延安中央党校的礼堂正面墙上,要大家记住:要引导中国革命到胜利,在工作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就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中央党校在工作和学习中始终坚持三条方针:(一)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在这次学习之前,参加党校学习的同志,尽管有一些同志参加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但对党内的路线斗争,并不都是那

么清楚。经过在党校系统学习,弄清了党内的路线问题,知道了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加深了对正确路线的理解,统一了对党的历史上路线斗争的是非功过的认识,坚定了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的信心。

党校整风的过程,首先是精读中央规定的 22 个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党校领导对组织学习文件是十分认真的。彭真为《解放日报》写了代社论的文章《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对怎样学习文件作了深刻的阐述。同志们学文件也非常认真,边阅读、边思考、边讨论,并认真作笔记。对讨论中的重要问题,请中央负责同志作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弼时和林伯渠等先后到党校做过报告。为了促进大家认真学习文件,还规定领导人要查看下面同志的笔记,帮助批改,互相借看和传阅。毛泽东曾亲自看了一些同志的学习笔记,改正了某些错字,并加了批语,这对大家鼓舞教育更大。

在领会文件精神实质、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础上,联系实际,检查个人思想、工作和历史,以至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的工作。毛泽东提出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为了检查一个地区的工作,还召开过“山头会议”,由所在地区的领导亲自召集,大家自由发表意见。

1943 年 10 月,我们又转入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学习文件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厚厚的两大本。

彭真有个想法,要在校部和各个部中,都找一些能代表

各个方面、和群众有联系的高级干部来负责，如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面军、各个根据地和白区地下党等，便于联系群众，深入实际。但他对苏区和红军干部情况不很熟悉，在这方面我多少知道一点，可以帮他的忙。因此，我名义上是秘书长，却不管行政事务，作的是干部管理工作，类似组织部长，陈养山那时担任组织科长。

整风学习期间，一部各支部天不亮就来找我汇报学习讨论情况，9点钟我再去向彭真汇报。我那时才42岁，记忆力强，何人何事，何时何地，头头尾尾都记得很清楚。那段时间，夜里开会往往开到凌晨两三点钟，我刚躺下要睡觉，汇报的人就来了，真是十分劳累。苏枚老实，不好意思挡驾请他们晚一点来，只好搬个凳子门口坐着，干着急。

在党校这一段期间，我自己在思想上也有很大收获，提高了路线觉悟，并认识到只有从思想上建党，才能统一认识，团结全党，过去我只知道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不是服从，就是处分。我在学习总结中自我检查，曾有这样两句话：“疾恶如仇有余，与人为善不足。”我的这个自我检查中央领导也知道。彭真对我思想提高是有帮助的。

1943年夏，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党校也受到很大影响。但这种不正常情况很快就被党中央制止了，校领导乃至支部领导是随时如实地、不折不扣地向中央反映运动中发生的情况和问题，因而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错误能及时得到纠正。虽然如此，也伤了

不少同志的感情。

党校的学习是十分紧张的，学校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也是组织得不错的。学校校务部在牟泽衍、吕其恩、傅振声、伍能光等领导下，自己动手养猪、种菜、纺线、烧炭和开作坊，克服了种种物质条件的困难，保证了学员的生活需要。边区有名的两种香烟，一是曙光牌，陕甘宁边区政府生产的，另一个是金星牌，就是党校生产的。后来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三五九旅去南泥湾开荒种地，党校随后也派人去了。许多学员来自前方，有的带了警卫员和马夫，就组织这些人员去南泥湾开荒、种地、养猪。党校学员也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纺线、种菜、开荒、积肥，学校生活日益改善。文娱方面也很活跃，齐燕铭、刘芝明和杨绍萱等领导排演了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舞台上以人民为主体，而不是以帝王将相为主体，曾得到毛泽东的赞扬，说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

经过整风学习，大家认识统一了，把历史上的是非弄清了，一致承认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就为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作好了思想准备。“七大”是1945年4月23日在杨家岭召开的。我是出席“七大”的代表，并为出席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之一。

战斗在冀察热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那天刚吃过晚饭，大家欣喜若狂，举起脸盆当锣鼓敲，拔掉西红柿架子来烧篝火，整整闹了个通宵。学员们纷纷议论，抗战胜利了，中国将向何处去？我党应当怎么办？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又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党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我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12月下旬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同时调派大批干部赶赴东北，也向黄河以南派人。彭真率先飞赴沈阳。党校学员都兴高采烈、满怀豪情地奔赴前线。中央组织部新任部长安子文曾调我去主管调配干部工作，前后约有一两个月时间。在这个期间，有一次黄欧东带着老婆孩子出发，没牲口，急得要命。我给他搞到一匹马，他一家才得以动身。解放后我到沈阳，他提起这件事就落泪，很感激我。

说起马来，记得长征中九军团政治部司务长郭永清病了，不能行走，我就把我的马给他骑。解放后他在空军担任负责干部，这两年春节来看我，总提起那段经历，……

1945年11月底，中央决定派我去东北。我是和中央社会部陈刚一批走的，他带了电台。我和苏枚带上黄鲁（毅

诚)一起走,张鼎丞的女儿小名九九也跟我走。黄鲁十五六岁了,能跑跑腿,办点事,给牲口喂草、喂料。

一路经过青化砭、清涧、绥德和米脂。在碛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我们一行在一个山坡下面的大村庄里住了一夜。合作社招待吃喝,我第一次尝到山西老陈醋的滋味,香得很。次日上午,到临县三交镇,这是一个大集镇,街道很窄。往前到了兴县,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谭政文在那里当公安局长,他和他老婆姜鹏招待我们大吃一顿,住了两三天。以后经过苛岚,这个地方很小,我们没有停留,直接前往左云。左云地方很大,显示出一种地方重镇的气魄,城内有个钟鼓楼,专署还招待我们看了回晋北梆子戏。到了右玉,在一个富农家住宿,他看见我们吃大米,提出来他父母年老,想尝尝大米味道,想用粮食和我们换一点。我们送了他两三斤大米。第二天早晨他招待我们吃荞麦面饸饹。告诉我们不能吃太饱,还要喝点面汤。饸饹很好吃,从没吃过,我们没经验,吃得急,又吃得饱,忘了喝面汤,出发后感到胃胀才想起来,不敢骑马,只得靠走路消消食。往前走到了丰镇,这里已经解放了,驻军陈正湘将军盛情接待了我们。翻过山去就到了阳高。由阳高坐火车到张家口。

那时张家口归察哈尔省管辖,吴德在那里当铁路局局长,许建国任公安局长。我们先住在招待所,以后搬到山上公安局的房子,这里原是个教堂,我们在这里住了好几天。聂荣臻和吴德峰夫妇也在那里。纵队司令员郭天民、政委李天焕和市府秘书长李坚都是熟人。我去看望郭天民,他拿出

五六个狐皮筒子让我选一件,我没有要,那时觉得用不着。又去看李天焕,大家闲吹了一顿。区党委请我们吃一次烤鸭,大概是做得不好,像牛皮一样咬不动。我们一行在张家口过的春节。当时北平和张家口之间常有人来往,因此过春节时还能吃到新鲜黄瓜、青椒和蒜黄之类,大家高兴极了。

我在张家口逗留期间,还遇见一起留苏的张义吾,他和几个苏联人住在我们对面的楼房里,是给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有一天他从楼上看见我,就告诉许建国,说认识我。许建国问我可否和他见一见,聂荣臻正在座,说既然认识,不见不好,还是见见吧。这样,有一天早上我就去看望他。他是湖北孝感县三湾人,我们同在武汉新兵营当过兵,他在一连,我在二连。以后又同赴苏联学习,同在东方大学中国特别军事训练班,他是四班,我是五班,两人先后当过一个连的连长。这一次在张家口不期而遇。解放后他在大连做日本的情报工作,和我国情报部门也有联系。后来苏联方面派他去香港,他带着妻子儿女到了广东。北方人在广东生活上有很多困难。他打听到我在天津,就提出孩子们在广州读书有困难,言语不通,要我在天津给找所房子,让孩子们在天津读书时居住。我答应下来,在重庆道给找了所房子,像照顾自己家属一样照顾他的家属。当时应该先请示中央,批准后再帮助他办就好了。开始,他一年半载回天津一趟,中苏关系恶化后,他就回天津定居,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籍。他的妻子陈英是维吾尔族,也入了党。“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狠狠地整了他,也整了我。前些年,我去天津两次,都去

看望过他。他身体衰弱,行走困难,1986年逝世。许多人对他的经历不了解,我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将他作为一个无名英雄的历史功绩作了一些介绍,据说葬礼还是隆重的,悼词中对他也作了相应的评价。

1946年2月底,我离开张家口动身前往东北。一到四海我就病倒了,发高烧、便血,和长征时候害的病一样。第二天勉强支持着坐汽车经汤河口、虎什哈、滦平和张百湾,到了承德,在离宫住下。找个日本大夫一检查,说得了满洲伤寒病,危险期11天。战争环境困难多,没好药,也没好房子,在一间小屋子里拖了11天,算拖过来了,就开始参加工作。

承德当时是冀热辽中央分局所在地(张家口沦陷后改为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受晋察冀中央局领导,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是聂荣臻。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是程子华,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克。1946年3月下旬,通知我担任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分局秘书长为欧阳钦;组织部长原为吴德,他调任冀东区党委书记后,组织部长一职由我兼任;宣传部长赵毅敏;高自立(曾任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主管全区财贸工作。李运昌还兼任热河省省长,胡锡奎任热河省委书记,主管群众运动和土地改革等工作。那时冀热辽中央分局就我们这几个人。

1945年国民党反动派搞假和谈,伺机发动内战,于1945年底1946年初向东北和热河大举进攻。敌军占领锦州、朝阳、凌源、平泉等地后,便向冀热辽边区扑来。当时我

还没有到职参加工作,据后来听说,我方由于占领了承德,一度有和平幻想,分局领导内部在和与战问题上意见有分歧,方针不定,行动犹豫,贻误了战机。实际上当时在热河我军主力部队很多,有几个纵队(杨得志、苏振华、黄永胜、黄守法等部),还有许多独立旅。敌人进攻平泉时,杨、苏纵队还击,很快把敌人消灭了,敌军军长石觉急得在屋子里哭。但在这关键时刻,有的领导却强调要讲统战,放松了进攻,致使敌人得以占领平泉,进攻承德。再就是当石觉调一个师开赴远离平泉 90 里的党坝时,分局领导没有采纳军区副司令陈奇涵的意见,调平泉西面的杨、苏纵队去攻打,而是低估了敌人,只派四个旅的地方武装去打。地方武装没有作战经验,又缺乏统一指挥,结果只赶跑了敌人,没有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

1946 年 8 月,敌人进攻承德。那时杨、苏纵队已调走,只剩下黄永胜纵队,承德守不住,中央命令撤出。开始有搬家思想,又舍不得坛坛罐罐,想把百十吨生铁搬到隆化,还没搬完,情况已很紧急,这才下了决心,把穿过山洞的铁路破坏了,还把一个大火力发电厂也破坏了,并且发动老百姓实行坚壁清野,给敌人造成困难。

撤出承德向赤峰前进时,我已兼任热河省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段苏权任省军区司令员,杨梅生任副司令员,黄国显任参谋长。我和省委、省军区同志们由大庙向头沟前进,在距头沟几里地的地方吃午饭。杨梅生和黄国显建议绕过头沟从小路走。我们还不知道头沟已陷入敌手,我和马洪

没有走小道，却从右边走大路，结果走到敌人火力圈里去了。敌人已占领头沟，居高临下。突然一颗子弹打在了马洪的手枪上，幸好人没有受伤。以后杨梅生、黄国显从山上冲下来还击敌人，我们才翻山走了。那一次遭遇危险得很。我把皮包也丢了，里面装的是几张地图和日军在承德水泉沟屠杀中国人民的万人坑的照片。

我们从隆化到围场，住了一天，前往新拨。黄永胜部在隆化堵截敌军。次日敌人占领围场，骚扰新拨。我们到达赤峰时已是1946年9月左右，记得地里高粱已经出穗了。我们住在教会的礼拜堂里。赤峰比承德还繁华热闹。危拱之在那里当市委书记。

敌人进攻赤峰，我们经翁牛特旗向林西撤退。那天是夜行军，汽车司机是新解放过来的战士，车开到西拉木伦河南边一个好像叫头道沟的地方，下坡时，司机来了个九十度向左转，开得太猛，刹车出了毛病，一下子就翻了。警卫员坐在右边，被甩下车去，直喊：“政委！政委！”我坐在左边，想去拉他，连我也甩下车去了。河沟里满是河水冲积的大小石头块，我的头正好撞在一块大石头上，一时昏了过去。醒过来一摸额头，湿糊糊的，天上有月亮，一看是流血了。恰好旅政委谢镗忠坐车从后面赶来，他带有急救包，用电筒照着把我头上的伤口包扎好。大家动手把汽车翻过来，继续前进。

敌人此时已占领承德、张家口，到了赤峰就不再前进。我们当时还有林西、林东（巴林左旗）、大板（巴林右旗）、经棚（克什克腾旗）、天山（阿鲁科尔沁旗）和乌丹（翁牛特旗）。

此外热西丰宁、多伦和冀东地区兴隆、遵化、玉田、丰润、青龙、建昌等县城及广大农村，敌人只占了交通要道。

我们到达林西时已是 1946 年 10 月底 11 月初，此时中央命令冀察热地区划归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了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下辖热河省委、冀东区党委和冀察热区党委，3 个军区，15 个地委，两个行署，人口共 1600 万。中央分局领导班子不变。热辽地委书记李东冶，热东地委书记王国权，热中地委书记强晓初，热北地委书记杜星垣。冀东区党委由吴德和李楚离负责，冀察热区党委由牛树才、马天水、杨春圃和段苏权负责。我们把工作安排了一下，各地委都没有变动。军队方面，把黄永胜部一个旅派到热辽地委，一个团派到热东地委，其余队伍由黄永胜带到乌丹北面（五分店）驻扎。热东有个蒙古骑兵师，几百人。冀察热辽边区没有单独的作战部队。

林西城圈子很大，城内空空荡荡，没有什么大商业，过去是汉族进攻蒙古族的重点地区，蒙汉矛盾十分尖锐。我们到时已是冬天，天寒地冻，没有煤烧，靠到牧区拉牛粪烧。军队给养困难，棉衣还可以凑合，没有子弹可是件大事。1947 年 4 月，东北局拨给晋察冀中央局 1500 万发子弹，交代要给冀察热辽分局 500 万发。但事前我们没有接到通知，后来也没有得到这批子弹。东北局说要给我们 12 门炮，搞个炮兵连，叫我们派人去领并学习技术。炮虽小，总比没有好，大家一听说都高兴极了。但东北局同时又派人来，要我们抽调 100 匹战马。我们没有马。程子华执行命令很认真，他叫东

北局来的人在城门口守着，有合适的马就拉走。边区当时实在有困难，没有正规部队，城里连一个营都没有。我们刚到林西时，有一次土匪摸清虚实，准备里应外合来攻城，土匪好几百人，还有骑兵。边区公安厅厅长王凡有保卫工作经验，在查店时发现六个混进城的土匪，一审问，都交代了。一时大家都紧张，赶紧把住在城外三五里地的卫生厅人员搬进城里。实际上城墙也算不上城墙，是土筑的，各机关都加筑了工事。土匪围着城墙转了一夜，没有内应，天亮就跑掉了。

热河是曾遭受日本侵略者占领 13 年之久的地区，日本投降后，其社会基础仍然根深蒂固，没有彻底清算。对此，人民群众中的民族仇恨之深重更是难以言表。1945 年，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后，冀热辽分局和热河省委于 1945 年 11 月 25 日发出《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开展对汉奸特务的控诉复仇清算运动，发动群众彻底清除日伪残余势力。热河省在很短时间内便掀起了暴风雨般的群众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日伪遗留下的社会基础，人民得到翻身解放。1945 年 12 月 28 日，毛泽东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曾对此做法加以推荐，说：“最近热河省委发动群众斗争的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

控诉复仇运动开展以后，部分地区农民开始从大汉奸、恶霸、高利贷者手中夺取土地。为了促使运动深入发展，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确定“土地从高度集中到分散”的方针，即土地改革运动。中央分局干部都到各地区参加土

地改革工作。

我是在林东南面的老烧锅村搞土改的。过去有许多贫苦人家从关内逃荒到东北，大地主们就把他们当奴隶一样使用，年终结算，还欠地主的钱，逼得家破人亡。有个山东人逃荒到此地给地主家种地，把家中带来的15两大烟存放他家，吃穿由地主作价供给，不得自行购买东西。年复一年高利贷驴打滚，农民怎么拚命干活也还不起债而被赶出大门。十冬腊月无处去，全家挤在一个废坑里栖身，地主还把废坑也挖坏。林东寒流常在零下二三十度，全家饥寒交迫而死，只剩下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由全村作保给一个姓宋的作童养媳。这种现象在热河比较普遍，以上仅是一例而已。地主挖地窖存粮，一个窖装满了，在地上种棵榆树作记号。土改时农民把粮食挖出来，都烂成了粉末。这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

过了一段时间，中央分局打算召开党代表会议总结工作，我就由林东回到林西参加筹备工作。

开会之前，我先到热辽地区转了转，经过翁牛特旗向东南方向走，过了老哈河，到了哈拉道口，离赤峰只有90里地。据说前一天敌军曾派一连人到哈拉道口骚扰了一夜后又转回赤峰，我差一点没和敌人遭遇。我在城外住了一夜，第二天从街上走过去，那里属于热辽地区，叫海大道，是一个蒙古王爷的家。过河到新惠县，县长叫李正平。当地鼠疫流行，我从鼠疫中心撒拉坝穿过，背着风走，以免传染。抬头一看，山都像蜂窝一样，尽都是老鼠洞穴。新惠县是热辽地

委所在地。地委书记李东冶住在喇嘛洞，组织部长是范德涛。距喇嘛洞四五里地有一村叫道给营子，我在那里蹲点，调查斗争地主恶霸和土地分配情况。随后又前往北票县委所在地黑中城检查工作。县委工作踏实，了解情况，县委书记叫王云，组织部长宋克南。还到县里小学校去看过。

1947年2月，中央分局通知我回林西准备开会。临走之前，我又到热辽地委新迁的地方，即北票附近的大吉营子看了看。李东冶送我一支苏联制冲锋枪，没子弹。军分区政委兼司令员叫欧阳嘉祥，政治部主任是谢镗忠，他们给冲锋枪配上了百十发子弹，还送了我一匹青色的好走马。李东冶也送了我一匹好马，过新惠时，苏联专门派了几个医生正在那里扑灭鼠疫，县政府改为医院。陪同苏联医生去的是我方医生蒋德耀，他原是长征中一方面军的军医。我也随同他们看了看病房，并对苏方的帮助表示感谢。过老哈河时，已是2月底，天气渐暖，冰已经快融化了，马蹄过处，有时踏出一个小洞来。

我回到林西后参加了筹备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工作。我和马新就是在林西结婚的。

冬季敌人不出动，我们就搞点游击队“破袭”铁路交通。

1947年4月初，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在林西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程子华作政治报告，我作组织工作报告，李运昌讲军队建设，高自立讲财政工作。当时都是根据中央电报来分析形势的。会后，决定开展战略性大反攻，打击敌人。

但从何处下手为好，争论了很久，因为相当一段时间没

有打仗了，头一仗一定要打胜才行。有主张先打围场的，理由是那里靠近冀热察军区，敌军孤立，只有一个营；有主张先攻下赤峰的，因为那里虽有一个团，却是云南杂牌军；也有主张先打叶柏寿，以便切断承德和赤峰之间的联系。最后决定先打围场，冀热察来两个旅，黄永胜的一个纵队有三个旅。以程子华为首组成前方作战指挥部，中央分局工作由我主持，军区工作由李运昌负责。

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一个意外情况。党代会闭幕会，冀东区代表由冀东组织部长苏令严带队回去，黄永胜纵队派一个排护送。走到赤峰西南的柴火栏子，本来应当再走一二十里地到热中地委地界宿营，因为大家累了，麻痹大意，中途住在了大路边上，又没有搞好警戒，半夜来了100多土匪，把苏令严打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军发动反攻后，很快就打下围场，直奔隆化。董存瑞就是在隆化牺牲的，那是在1948年初春。隆化守敌也只是一营人，驻扎在隆化中学，校门口有座桥，敌人在桥头筑了碉堡固守阵地。因为不好进攻，就派班长董存瑞去炸碉堡，去时没有带支棍子，他就用手臂撑举着炸药包，拉动雷管，把碉堡炸掉了，董存瑞也英勇牺牲了。

攻下隆化后，部队开到赤峰和叶柏寿之间，占领了距赤峰70里地的三十家子。赤峰守敌是云南地方部队一个团，团里有几个共产党员，参谋长就是个党员。可是他不但没有给部队做工作，反而在我军迫近后带着队伍弃城逃走了。我军埋伏在三十家子附近堵截敌人，那个参谋长不但不投降，

反和我对抗,后来被我军俘虏。这一仗没能全歼敌人。

解放赤峰后,我军向南进攻叶柏寿,占领叶柏寿就占领了铁路线,这里是铁路交叉点,东到朝阳、西到平泉。承德、平泉都没有大打,敌人(石觉部)就跑掉了。

中央分局从林西搬到赤峰后,部队进行扩编。除原黄永胜的九纵队三个旅外,又成立了十一纵队,司令员陈仁骥,这个部队后来在辽沈战役中是起了作用的。分局后来曾一度从赤峰搬到建平所辖五家村,因发生鼠疫,又转移到宁城县所辖的一肯中村,约在赤峰以南几十里地。

当初,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党代会闭会后,程子华调到九纵队任政委去了。这时接到消息,东北局书记高岗要来视察。我们搬到一肯中时,他来了。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冀察热辽边区的工作说得一塌糊涂。然而,他不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批评,而是在《群众日报》上发表文章,题目是《老牛赶山》,批评我们土改搞得不彻底,工作搞得不好,干部也不好,应当“搬石头”。他标榜反右,实际上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左”了。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各省、区委都派人参加。冀东区是阎达开,冀热察区是马天水,冀察热辽分局我带队。那时正在准备反攻,热河省已经全部解放,10月底地里庄稼也收割完了。我们夜里坐着吉普车从北票出发,一路上遇见大军南下,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派奔腾向前的壮观景象。会议时间不长,主要讨论攻打长春的问题,会议闭幕时长春还没拿下来。

会后，我们返回时经过齐齐哈尔，因尚未打下长春，我们就从白城子回来。天下大雪。原红九军团的辛世修在铁路上工作，他招待了我们。冀察热辽也正积极动员反攻，人民踊跃参军，主力部队人数达到20多万。九纵队、十一纵队已经充实，又组成八纵队，共有3个纵队。此外还有5个独立师，2个骑兵师，1个炮兵旅。地方武装力量也有很大发展。

在支援辽沈战役的战斗中，冀察热辽分局号召“一切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组织了强有力的后勤指挥机构，统一指挥扩兵、筑路、抢运伤兵、供应大军粮菜柴草、碾米磨面、缝衣做鞋和宣传鼓动等各项支前工作。辽沈战役后，又抽调300多名干部随军南下。

1948年6月，东北局决定，黄克诚调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政委。程子华专任军区司令员，并于同年10月奉中央命令率第四、十一两个纵队先行入关，执行新的平津战役任务。中央决定大军入关解放北平、天津。

有一天晚饭时我和赵毅敏聊天，感觉在目前情况下冀察热辽分局已无存在必要，不如各省归各省，干部可以大批南下。黄克诚表示赞成，以后得到中央批准。高岗由于一向对我分局有看法，在撤销分局过程中，他不委派原冀察热辽边区的干部当热河省书记，另派他人。中央没有同意，来电说，热河与辽西（锦州）省委领导班子要由分局组织。我们提了名单，李运昌到热河、胡锡奎到锦州，中央同意了。此后，中央又电令黄克诚和我带领边区干部，并抽调一些地方干

部,准备参加天津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我们就随大军入关,去与黄敬等一大批冀中、天津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会合。

我在冀察热辽根据地工作将近3年,我认为,冀察热辽边区人民在保卫根据地和支援辽沈战役中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日本投降后,冀察热辽是我军部队和干部向东北前进的基地,也是东北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曾讲过,要尽最大力量把东北拿到手,得到了东北就得到了全中国。党中央先后派遣了2万干部和10万大军挺进东北,主要从热河走,因此冀察热辽边区是由内地去东北的桥梁和通道,绝大多数人员、兵马都是在那里通过的,从胶东过海到大连的是少数。有了大批干部和部队才能开展工作,进行战斗。从1947年我军开始战略性反攻到切断北宁线,作战部队达数十万人,而集中进行大战时,部队调动达数十万人,辽沈战役后,四野百万大军经冀察热辽广大地区长驱入关,边区人民保证了部队人马的吃喝、住宿和交通运输,大军才得以突然出现在平津地区。这些事实,不仅和冀察热辽人民群众以及地方党、政、群众组织的全力支援分不开,也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了革命胜利而严格保守军事机密的高度觉悟分不开。边区虽穷,人口也不算多,但在解放战争中出了三个纵队,几个独立师,30多万人,还抽调1000多名干部随军南下,贡献不可谓不大。

至于冀察热辽工作中的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投降后,分局初期在和与战问题上有过分歧,犹豫不决,不仅不利于及时进攻消灭敌人,争取更大胜

利,而且影响到大力清剿土匪。因此,直到反攻胜利后,哈拉道口还有武装土匪骚扰,解放天津后才逐渐平定。

第二,土改是搞得彻底的,但也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一是有的地方杀人过多,二是有的地方侵犯了中农利益。

第三,土改后人民踊跃参军,扩兵成绩很大,但出兵太多了,不免影响生产。热河省当兵的平均占人口的6%;最多的是惠东县,占人口11%。

第四,最后也是最大的错误是,土改后没有及时抓紧生产。农民先是靠挖地主埋藏的粮食过日子,反攻时就发生了饥荒。我离开时,部分地区老百姓已发生浮肿现象。人民养活了军队,我们却没有能帮助人民吃饱。在党的建设方面也抓得不紧,发展党员少了一些。

在天津工作的十年间

1948年冬,平津战役开始。为迎接平津解放,12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敬为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军管会副主任,黄火青为天津市委副书记。市委由黄克诚、黄敬、黄火青、许建国、张友渔、黄松龄、吴砚农、王世英、杨英等9人组成,在河北霸县胜芳村积极着手接管天津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

和华北局先后抽调了 700 多名干部,集中在胜芳村学习。这些同志有的来自华北局、冀察热辽分局,多数来自华北地区,还有渤海区党委、冀鲁豫区党委等不同领导机关和解放区的干部,其中也有长期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这支干部队伍的组成和培训,为顺利接管天津创造了良好条件。

1949 年 1 月 14 日上午,对拒绝投降的天津守敌发起总攻。我们几千名接管干部,冒着炮火和弥漫的硝烟,到达杨柳青附近,随着攻城战斗的节节胜利,与攻城部队一起向市区步步深入,并在天津地下党同志带领下,直奔各自所接管的地区和部门。15 日中午 12 时左右,红军时代当过保卫部部长的许建国,带人首先接管公安局。下午 4 点,军管会及各机关主要领导干部进城。

这时,战斗尚未完全结束,城里还在打炮,我坐在吉普车里,看到许多被俘的蒋军官兵狼狈不堪的像潮水般在街上走过。为防范地雷,街上都有部队测雷后划的粉笔记号。我们一步步安全地到达预定地区。因规定不准住民房,没地方住,就只好住到天津市图书馆里。

尽管天津市人民热切盼望着解放军早点进城,早点把国民党反动军队赶走。但由于过去长期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解放军不免还有些怀疑、观望心理,又怕我们只会打仗,管理城市不行。一些工程师、高级知识分子议论说,共产党拿下天津,是“小鸡吃黄豆”怕咽不下去;资本家则心里嘀嘀咕咕,怕我们没收财产;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认为人民当家作主,自由了,但看到解放军和进城的干部穿得破破烂

烂,又有些看不起;工人们则抱很大希望,想把资本家彻底搞掉,一下子一切都变好。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进城第一件事就是出安民告示,完整地接管城市。同时利用刚接管的国民党电台成立起天津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市人民广播了“约法三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天津卫戍司令部、天津市军管会等重要文告,及《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任务》、《消灭蒋介石,打碎蒋家王朝统治》等宣传讲话。使广大人民了解当前形势和我党我军的城市政策。与此同时,抓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环节,把公共事业机构开动起来,迅速恢复交通、水、电、邮政,鼓励商店营业等。

当时,还面对两件大事。一是吃饭,天津城被围困多日,城里粮食吃光了,要到农村去调粮。第二件事,是国民党的金元券如何处理?简单宣布作废是不行的,只能采取兑换办法。既不让人民吃亏,又不能替国民党背帐。规定一周兑换完毕,过期再换就打折扣。但工人上班不能来换,为了保证工人利益不受损失,决定由工厂负责组织集中兑换。这样城市人民生活、生产,在较短时间里很快地就恢复了正常。这是进城后必须首先抓好的大事。

天津是解放战争开始后,最早解放的大城市,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水陆交通枢纽,也是一个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掠夺摧残的城市。因此迅速恢复天津经济、对支援仍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和探索党的城

市经济工作经验,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讲过,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是没收,而是改造。这是和列宁的不同之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对帝国主义的资本要没收,对民族资本家采取的则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天津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典型,在全国来说是走在前面的。

初进天津,我们这些拿枪杆子出身的人,对城市建设工作确实没有经验,就连过去在天津做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对管理大城市也没有把握。但为了人民群众,为了革命事业,我们干工作是有信心的。党中央指示我们进城后,主要要依靠工人阶级,首先把生产搞起来。大的方向有了,信心就更足了。但一接触具体工作,却碰到许多问题,例如: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如何管理?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切依靠外国、外资,解放了,帝国主义对我进行封锁,对外关系切断,市场没有了,怎么办?地毯厂的产品卖给谁?打蛋厂的冰蛋白向何处出口?猪鬃厂、毛皮厂的产品如何才能卖出去?加工装配靠外国进口原料,如今断绝了原料来源,又怎么生产?工厂开不了工,工人工资发不出;没有货物进出口,码头工人也失了业;战争刚结束,没人盖房子,建筑工人也失了业……。这许多问题都亟待解决。

市委经过认真研究,首先宣布:没收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和财产;保护民族资本家企业;私营工厂中,属于反革命的股份(如曹锟的大儿子是汉奸),应归国家所有;股东中有的死了,有的跑了,其股份由国家代管。这样,我们

在私营工厂中既有资本,还可以派官方代表。上有代表,下有工人,资本家做了坏事跑不了。对于不没收资本家财产,大家没有意见,但在如何搞民主改革运动?如何依靠工人和进行资本家改造?认识上却有分歧。有一种思想是,怕得罪资本家,怕把他们吓跑了或消极怠工。当时工人和资本家双方的思想状况是:部分工人认为共产党解放军进了城,是为工人解决问题,想早一点把私营工厂没收了。而资本家想跑又跑不了,提心吊胆地等着,看看怎么办?即使过去和地下党有联系的人,也觉得心里没底。

对原“国营”工厂没收后,即派人到工厂担任领导职务,又派军代表进厂,成立军管会。在工厂中主要抓工资、原料、生产、销售等。又把五大私营纱厂、天津飞鸽自行车厂、永利、久大碱厂、永明油漆厂等厂负责人找来开会。这些厂子或与地下党有联系,或有地下党员,先稳住这些大厂,进一步了解情况,再进行工作。

刘少奇就是在这个时候到天津来的。他找资本家开了会。对稳定资本家的情绪,起到很好的作用。当时规定保护资本家“三权”,即拥有财产权、工厂管理权和解雇工人权,但工会也有抗议权。这就叫作“劳资纠纷解决条例”。

刘少奇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提出要派强有力的干部,加强工会工作,因此,决定我兼任天津市总工会主席,不再兼任组织部长了。从此,工会工作就成了我在天津工作的重点。与此同时各区包括区委书记,抽调了几百名干部,加强基层工会工作。

当时我把秘书吴方派到一个大纺织厂蹲点，对资本家进行研究，并听取了工人代表的意见。他回来后，写了个“劳资协商会议条例”，我审改后，报市委通过在天津实施，后又推广到全国。条例规定工人和资本家双方轮流担任会议主席，讨论有关问题。一切劳资纠纷都按条例处理。并规定由于各种原因，资本家实在开不了工，要转产的，可搞别的生产；实在无法转产的，可给工人解雇费解雇工人。那些被解雇的工人，可到市劳动局登记，劳动局按月发给救济金。哪些企业需要增加工人，由劳动局统一分配解决。

关于解雇工人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如盛锡福是个生产呢帽的老厂，没有原料，产品又卖不出去。资本家说日子长了养不活这么多工人，要关闭一部分。有的工人不同意，说厂方养得起，不能解雇。厂工会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工会主席顾建德反对解雇，工会书记李玉敏同意解雇。双方坚持不下，要我来解决。我找他们谈到半夜，最后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还是解雇一部分工人，按工龄发给生活费，待业工人到市劳动局登记，由劳动局分配到需要劳动力的部门去。顾建德仍想不通。我对他说，现在还在打仗，国家没有钱，不能把工人工资包下来。资本家能开工，能养活一些工人也好嘛。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更多的工厂维持生产。

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我们进城第一天，就要依靠工人，把生产抓起来。当时困难重重，原有的产供销系统断了，帝国主义封锁，资本家动摇观望，有些行业要改组，许多管理制度要改革等等。我们派人到各大工厂了解情况，工人是

领导阶级，首先筹备将工会建立起来，成为工人议事办事的场所。

接着，就在工厂展开民主改革运动，宣布取消侮辱工人的搜身制，把国民党安插在工厂中压迫残害工人，作恶多端的特务、把头们整了一下。过去工头权力很大，打骂工人，辞退工人，侮辱女工，年关节日、红白喜事，都强迫工人送礼，工人十分痛恨他们。有个叫刘云福的女工诉苦，在旧社会当童工，怕碰见工头，长期紧靠墙边走，把衣服都磨破了。把他们搞掉一些，也有判刑的，工人们非常拥护。这当中，应当有所区别的是对师傅应与对工头不同。他们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虽然有旧思想观念，师傅打骂徒弟，但他们是有技术的，工人要学技术，因而不能用斗争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开展群众性的交心会进行批评。只要他们在群众场合低头检讨，工人满意了就行。

天津开展反封建把头的斗争，搞得很红火。尤其是码头上的恶霸把头，残酷剥削搬运工人，无恶不做。他们拿着印有前清皇帝像的大票，占山为王，装卸运输由他把持，货物自运要买路钱，不准工人自由行动，连工人穿鞋也规定由把头们代购，谁要触动他的霸权，动不动就用跳油锅、跳海河来恫吓、威胁。他们反对组织搬运工会、搬运公司，气势汹汹地扬言说要和工会拼命打架。后来听说我们准备派一个团去和他们干仗，他们不敢闹了。最后还是谈判解决，同意组织全市运输公司，把头按车马入股，照股分红，人员、工资都由工会掌握。工会对搬运工人，采取按等级留用，归工会分

配,搬运工不固定在一个码头,由公司调动,并组织实施了民主管理,这对发展经济是有利的。

还有戏霸、妓院老板、青红帮大头目巴彦庆(天津的黄金荣)、“东、西霸天”、小刀会陈五等等,镇反运动时,把这些无恶不作的恶霸来了个大扫荡、大镇压,枪毙了 400 个,人心大快。

这几件事一办,工人出了气,觉得当家作主了,真正享受到解放的喜悦,情绪很高,满街都听唱《刘巧儿》等戏曲。工人自发地搞起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主动加班加点,搞技术革新。纺织厂把纱锭转速,从每分钟 100 转提高到 180 转……

当时为此有人和我们发生了一些矛盾,引起很大争论。他认为工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应代表工人利益和工厂官僚主义作斗争,加班加点不行,危害了工人利益。可工人不理睬这些,星期天仍偷偷到厂,打开窗户进厂房修理机器,充分体现了解放初期工人们自发的热情。

当时关于工会工作的任务究竟应该怎样做,也有不同认识。有些老工会干部思想跟不上,认为在过去反动统治时代,工会是代表工人利益同资本家、工厂主作斗争的,现在革命胜利了,工人阶级是国家主人,工会任务和国家任务是一致的,工会主要任务是领导工人完成国家生产任务,执行国家法令。当然国家工作人员工作中发生官僚主义,违背国家利益或工人切身利益时,也应坚决与之斗争,但工人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不能用过去对资本家的方式来对付企业

领导者。对于工人的革命热情高涨,自觉自愿的加班加点,应予鼓励,但不要提倡。老工会工作者却认为这是加重对工人的剥削。

当然,在私营企业中,资本家的秉性难改,他们口头上声称服从政府领导,行动中还是唯利是图,一有机会便伸手捣鬼,我们要依靠工人和他们斗争,但和斗争地主、恶霸不同,要掌握策略,有打有拉,又拉又打,除严重犯罪者之外,斗争是应该有分寸的。

关于建筑业工人的就业问题的解决,是先由工会出面搞建筑公司,找几个工程技术人员,由他们揽活,搞设计并找工人来干,使三四千工人就业。规模逐渐大了,赚钱了,就把公司交给政府去办。装卸运输方面,工会发动工人打垮了把头,接着就搞运输公司。这样,整个经济大权,掌握在国家手里,工人就不再受压迫剥削了。

在天津,皮毛出口的加工作坊很多,有几千工人,老板大多是当工头起家的。当时他们自愿交出厂房,自己参加劳动,联合成为合作社的企业,可养活千把工人。

猪鬃厂也有不少工人,活最脏、最苦。经过市外贸局到外地去收购猪鬃,组织少量出口,也救济了一部分工人。

打蛋厂有 4000 多工人,是英国商人办的。香港需要冰蛋,组织冰蛋出口可以维持工人的工资。我们也就想办法使其开工生产。

总之,打开产品销路,想尽一切办法使工人就业。

郊区农村有城市资本家的农场如何办?怕影响城市资

本家,就采取群众背对背地缺席批判,不搞批斗,土地没收,农场仍由资本家经营。对官僚资本家、汉奸、逃亡地主的土地,则实行没收,归国家所有。

按国家规定,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一概由国家收购,原料由国家供应,产品按国家计划生产,工业品不能到市场上去买卖,这样就把工业生产和商业销售的联系割断了。物资掌握在国家手里,他要买,按国家价格调拨。把批发拿到手里,商业资本家只能按国家定价零售。对农村原有的供销社,批商品给他,各种工业原料由国家收购调拨。这样,资本家虽仍有利可图,但却不能牟取暴利了。

当时,不仅对大商业,就连小商、小贩,洗澡堂、理发店……也都管了起来。但统的太死,管不了。

关于淡季和旺季的教训。我们工作没经验,不懂商业上有淡季和旺季之说。1951年春,淡季时节,农民没有购买力,都下地干活去了。但工厂不能停工,天天生产,而产品又卖不出去。国家没经费,不收购(旧社会资本家,这时就低价收购),工厂库存积压。资本家说,你们不收购,资本无法周转,开不了工人工资,我就关门。当时为了解决暂时困难,我们只好让资本家和工人协商,有的工人保留厂籍,暂时离开工厂几个月,等到了旺季再回厂。工人埋怨我们,我们只好说服工人暂时回农村,说国家有困难,吃点稀饭比没有饭吃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说清情况,工人还是接受了。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资本家和我们斗争尖锐。他们搞了个“三五俱乐部”,每星期三、星期五,大小资本家一

起联欢、吃喝，议论如何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

1951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各方面消耗很大，需要大量物资。于是工厂纷纷开工，回乡工人也都回来了。但有些军工单位不经过和政府商谈，直接找资本家订货加工。资本家也乘机行贿，生产中就出现了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等现象，“三五俱乐部”的资本家大发横财。他们称1951年是“难忘的1951年”。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我们先是内部搞“三反”，揭露机关干部与资本家的关系，然后发动“五反”，依靠工人，揭露资本家的罪行，进行批斗。主要是从政治上打垮资本家的威风，在社会上把他搞臭，让他们服从工人阶级领导。经济上要赔偿损失；退赔不起的，算一笔帐，作为国家入股。又把资本家分别定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户和违法户，并找出几个最坏的典型，加以严办；同时，保护几个代表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后来资本家没招可使了，我们提出搞公私合营。

民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时期，有其历史渊源，所以，我们对他们采取利用、限制、改造和赎买政策，而不是没收。具体做法是，首先割断生产与消费的联系，实行统购、包销、代销办法，最后用行业合营，先对工厂固定资产的价值加以核定，国家按价付给利息，资本变成银行存款，按时支息。在这方面，我们党也是接受了苏联的教训。

关于党的建设。天津党的历史久远。彭真为领导人之一，他在1923年就到了天津。解放后，我在天津找到两

个老工人纪兆生和左振玉，彭真接他们去见了一面，两个人都大哭一场。

纪兆生是日本人办的裕大纱厂工人，现在是棉纺三厂工人，曾领导过日本工厂工人罢工，缴了厂警 30 多人的枪，反动政府派了兵去镇压。日本人把他抓来吊打、逼问，是谁领导罢工的？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问他上级领导是谁？他照样回答“我！”最后被开除了，在社会上震动很大。以后黄色工会拉他，他不干，说：“忠臣不事二主”。他靠推车卖菜来养活老母亲，始终没有向敌人投降。

左振玉和彭真同时被捕入狱。1935 年彭出狱后找到左，他那时在替外国人开车。对彭说：“找不到组织，就在我这里暂住，我养活你。”我进天津后就找到了左振玉。后来他被送入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到工会工作。党籍问题也恢复了。

天津解放前后，党的组建：(1)是由刘仁领导的天津工作委员会，人数最多，是主要的，建立的工作关系也比较广泛。也有从农村派进城的。(2)由钱瑛领导的，是经由香港南方局派回来的。都属于知识分子范畴，多在大学开展工作，另外还发展了一些统战关系。(3)冀鲁豫地区派进来的。冀东、冀察热辽地区的也有。进天津时，我们带的干部和他们都接上了党的关系，从各方面展开工作，党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也涌现出来了。1951 年就开始大力发展党员的工作。

天津是全国首先解放的大城市，中央很重视。毛泽东、

刘少奇先后亲自来视察。周恩来和邓大姐对天津有特殊情感。他们的青年时代都是在天津度过的，在天津领导学生运动，对旧天津犹如眼前，对解放后的天津一切尤为关怀。他们生活简朴，为全党的典范。每到一地，邓大姐必亲自找管理员，安排饮食，四菜一汤不许超过。地方党委都想见见周恩来，吃一顿饭，事前先请示得到允许，四菜一汤不变，另加几个菜。他俩在天津有一对青年时代好友，他们请朋友吃螃蟹，我们作陪，一切费用由他们自己开支，我们太不好意思，但也没办法。

天津解放初期的工作，如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以及依靠工人搞好各项工作等方面，一般说，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头的，是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的。

1952年，黄敬调离天津，我任书记兼市长。

经过两三年的工作，工人生活问题解决了。工作有了奔头，工人们要求学文化，而且随着事业的发展，也需要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才。我就安排市总工会宣传部长王林和王义达去办。他们通过市教育局，利用中小学教室办工人夜校，工会出钱请学校教员当老师。后来，夜校发展到几万学生，有不少工人从扫盲到中学毕业，一直上了大学。如工人李兆珍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了系总支书记；工人潘长有担任市劳动局局长等。总之，通过文化学习，给我党培养了不少工人出身的优秀干部。

工会还组织工人歌咏比赛，大唱革命歌曲。还组织文艺演出，自编自演，工人演工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话剧“六号

门”，它反映了天津铁路东货场工人实际生活和工人与封建把头斗争的故事，曾经在全国各地演出，反应强烈，后改编为京剧并拍成电影。

为了工人有一个更好地学习、休息、活动的场所，我们修建了文化宫。第一个文化宫是用过去外商办的回力球场改建成的。一楼大礼堂可坐 2500 多人；二楼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可坐 500 余人；三楼是游艺室、跳舞厅，可容一二千人。第二个文化宫，是我亲自设计的平面草图，从空中看下去是个“工”字。占地 15 亩。在揭幕式上，特别还请了梅兰芳先生来演出。后台的演员休息室比较好，梅先生十分满意。工人们第一次能看到梅先生的戏，更是高兴无比。

为解决工人疗养问题，工会在北戴河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搞了所疗养院。天津有个资本家，在北戴河有房产，工会就出面找他，动员他把房子捐出来，可供几十个工人同时疗养；又有一位共产党员，家在北戴河一所房屋里有股份，工会花了半价把房子买下来，改为疗养院。工会还把法国人的房屋交由工会出面代管，也修建成疗养院。工会又盖了食堂、俱乐部，把疗养区连成了一片。以后在天津市灰堆造纸厂附近，各工会也修了疗养院。

关于工会党的组织领导关系问题，也曾有过分歧，全总主张垂直领导，如天津纺织工会应归全国纺织总工会直接领导。我们不同意，认为天津市总工会应由市委领导，各厂工会由地区党委领导，地区党委通过地区工会，管理各厂工会。这涉及到工会要不要党的领导问题。

1952年以后,我虽担任了天津市委书记和市长,但仍对工会工作十分关心。回想起我刚搞工会工作时,一切都是从头学起,不了解工厂生产工序,就下去看,拜工人师傅为师,弄清粗纱、细纱、织布等生产过程;看看钢是怎样炼出来的;纸是怎样造出来的。看了再开座谈会,因为亲自看过,开会才听得懂,和工人才有共同语言,他们才能把意见、要求提出来。

第一次参加欢迎劳模联欢会,他们是刚出席全国劳模大会的代表,回来后高兴极啦!见到了中央领导,又是有生第一次坐火车,纷纷告诉我说:“黄主席,我们过去从来没坐过火车,那玩意,它跑的可真快!……”尽管我参加过多次联欢会,但只是拉拉手、戏演后就走,座谈会接触的面又太小。怎样才能接触更多的工人,了解更多的情况呢?我想也许是我家门口有岗哨,所以工人不敢进来,于是和我当时的三个秘书蔡文龙、吴方和修正奇商量,把岗哨撤了。可只有几个头头来,一般工人还是不来。后来,我又想到,跳舞是接近群众的好办法。跳舞时或中间休息时,都可相互谈谈,问这问那,了解情况,建立感情。但我不会跳舞,为了工作,我开始认真学起来。逢年过节,我都请工人们来我家玩,常是嘉宾满座。我家离干部俱乐部很近,有时晚上工人们跳舞到深夜,回不去了,就到我家过夜。天亮一看,沙发、地毯上都睡满了人。就这样我和天津的工人们慢慢地建立起深厚友谊。见面我能叫出姓名的、能说出是哪厂的总有几百人。天津的街道、大工厂的地址我都知道……。1958年我乘专车离开

天津到辽宁赴任。当火车慢慢离开天津时，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我到辽宁工作后，还常有工人写信给我，说他们想我了，甚至有人到沈阳来看望我。更有趣的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原天津工人李兆珍来看我时说，“文革”中斗她，说她是万晓塘的爪牙。她反驳说：“你要说我是黄火青的‘爪牙’，我还承认，要说是万的，我不承认。”还有原来的工人潘长有，“文革”后到北京厂桥中组部招待所来看我。当时我虽已“解放”，但还没有分配工作，对我说，“文革”期间，他在河北省工会当主席，造反派斗他，说他是林铁的“爪牙”，他说他也说过和李兆珍类似的话。至今还有不少老工人、老劳模来看望我，畅谈友谊和目前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辽宁工作时期

1958年，中央决定天津与河北合并，当时有调我去河北任第二书记的传说。3月间，邓小平告诉我，准备调我去辽宁工作，要等成都会议结束后再决定。3月下旬成都会议结束时，谭震林找我和黄欧东谈话，通知我们，中央决定调我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任第二书记。

工作决定后，黄先到职，我顺路去三门峡和洛阳等地走走、看看。随后回到河北省住了两天，省里要我回天津传达

一下成都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召开第八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后，我就在北京停留了几天，打算请示一下到辽宁后如何开展工作。曾经和黄欧东一起去找过安子文，黄欧东对安子文诉苦，说宋黎、杜者蘅等几个东北人和他不合作。安子文讲，不和省委书记合作是不对的，应当批评他们。我单独去找了林枫，他是老东北，和上述的东北同志关系都很好；他含糊其辞地表示，是黄欧东领导不起来。我又去找彭真，他的意见是，初到辽宁情况不熟悉，不要先去抓这个问题。从后来事实证明，他的话是讲对了。

我在天津传达成都会议精神时，曾给黄欧东打过电话，叫他先把他讲的那个矛盾端出来，我去后支持他就是了，这样做事情可能比较顺当。

我是6月初去辽宁的。辽宁是重工业城市，中央很重视，特意调了一批干部去加强工作，调一机部副部长杨春圃任辽宁省委工业书记，胡明任大连市委书记，杨士杰任鞍山市委书记。

我去辽宁，精神负担较重。因为进城后我只有过管理天津的经验，那只是一个城市，而辽宁从工业上说比上海还重要，不仅管理城市，还要管理农村。全省人口2500多万，其中农村人口只有1500万，平均一个半农民，养活一个人。当时又恰好赶上中央提出三面红旗，辽宁省工业如何搞大跃进？鞍山钢产量占全国1/3，化学工业占20%，水泥占20%，煤约占1/7多点。何况省委内部还有矛盾，意见不一致。下车伊始，我就面临着几个问题：领导班子内部纠纷、工

业大跃进和人民吃饭问题，心情不免感到沉重。

7月初，黄欧东就在会上提出，要整党解决内部分歧。省委的负责同志对省委过去的情况都是有意见的，他们都表示同意黄的提议。大家叫我作动员报告，我说我初到辽宁，要到外面走走、看看，了解情况，开会动员事交给黄欧东来办。不料黄把事情推给杨春圃，杨发言有些冒冒失失。我批评了他们两个。

我初到辽宁，按我本意是学习管理大城市工作的经验，和省委一班人一起把工作搞好。不料黄欧东另有个打算，看我新来乍到，情况不了解，他躲在背后，利用我出面为他树立个人威信。

解决党内分歧的会议，用了很长时间，前后约两个月，影响了工作。中间我曾和沈约到北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过两次，中央支持开会。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了解，好像大海中的小船，分不清东南西北。有一段时间我不在家，黄欧东搞了些不符合党内斗争原则的事，派人盯梢，我知道后禁止了。有位叫某某的人爱制造是非。黄欧东等要点一大批负责干部的名，我不同意。我制止搞扩大化，有些干部是我坚决保下来的。解决党内干部分歧的会议开完后，结论要我来念，少数服从多数，没法子。以后中央也批准了。

到了1961、1962年的时候，我想找些人谈谈话，转个弯子，把有关人员的工作重新作些调整。把蔡礼调回省监委，以后调抚顺任市委书记。给李均也平反了。和吴铎谈过话，平反了，后来又翻了。郭洪德也平反了，他在抚顺工作表现

好。几个有关的东北老同志中，本来不涉及宋黎，但黄欧东说他是大鲨鱼，以后又点名批评王(铮)、宋(黎)、杜(者蘅)、李(涛)，对此，许多东北同志都有意见——包括林枫在内。我竭力主张个别谈谈，转转弯，以便修改结论，但同志们没有理解我的用意，杜者蘅、王铮和宋黎都想不通。虽然后来大家明白事情原委后，知道并不是我有意要整他们，但总的说来这件事情是处理得不好的。当初如果照彭真意见办，先不去抓这件事，等情况熟悉了再说，就不致于如此。

我虽然在天津工作过，但管理大城市的经验仍然不多。不过我还不是个不懂装懂的人，我抓工会工作，就向工人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如过问税收工作，我就把税务局长找来，了解天津一年税收多少？等等；又如财政方面，也是先找人来讲讲，一年天津市收入多少，上交中央多少，留多少，开支多少，等等。懂了才有发言权。天津当时只一个市，好办，凡事由市政府出面去搞，有争论我可以发言。辽宁就不同了，既要管理城市，还要管理农村，一共43个县，城市面积小于农村。当时正是全国搞大跃进，中央各部都指令各省市要第一书记挂帅，我一个人怎能应付得过来，因此采取了书记分工的办法。中央下达的指示如果属于部门性的、业务性的，主管书记可以自行决定处理，认为必需提交省委讨论的，再交给我。同样，下面地区提上来的问题，主管书记可以自行处理的则自行处理，如发现不应自行决定或处理不当的，就提到省委会上讨论。如此，既有分工负责，也有集体领导，胡亦民最赞成这个做法，认为我“拿得起、放得下。”

工业要翻番。我初到鞍钢，自己不懂就靠大家。大企业是归中央管的，大的任务中央决定下来，要第一书记挂帅完成。中央有同志到吉林，说要翻三番四番才算翻，省委有的书记也嘀咕着要翻。我们当时头脑也都热得发昏，可是，工厂机器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管你怎么喊叫，它只能转那么多转。

农业方面，我早就听说，高级社组织小了，要挖渠光靠生产队自己就搞不开，有搞大社的说法。八九月间盛传两个口号，一个叫搞大公社，要一个县搞成一个大社，盖县就不行，搞不起来。再一个叫深翻地，1尺不够，要深翻5尺，不管你是黑土地还是沙地。那时管农业的同志，在西安会议上批评辽宁保守了，指出粮食任务多少，就要深翻多少。农村夜里搞深翻地，到处火光冲天，实际上是大家在地里睡觉，留两个人值班，以防有人来查看。这么一搞，肉、菜都没有了。1958年冬天武汉会议期间，毛泽东问了辽宁情况，叫广东给辽宁运点蔬菜去，可是，冬瓜、萝卜运到大连，都冻坏了，成了烂泥。

“市管县”的做法，是我那时提出来的。因为地区政府专员只有支配200元的权限，对县无补。我主张由市来管县，市工业方面的残渣剩水可以支援农村，我写了一篇文章，题名“厂社挂钩”。有人反对，说指挥不动市，把已经改为市管县的又退回几个地委去管。但负责农村工作的一些同志倒是赞成我的意见，因为市管县市的力量较大，可以从技术上支援。那时丹东市委书记是肖纯，地委书记是宋克难，市地

合并后宋任市委书记，肖纯调到锦州。

工业方面，1959年鞍钢超产，工业书记杨春圃把钢超产提成拿出办了23个小化肥厂，年产两三千吨化肥。后准备每县办一个，一亩地上20多斤还不够。虽然产品粗糙点，成本高，但也支援了农业。

那时真是“敢想敢干”，搞了好几个小钢铁厂，一年出产十来万吨，本来并不需要搞小钢厂，消费人力物力，但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搞。后来还是把小厂撤掉了，支援外地。

不久，又发现了“铁法煤田”。还有个清原县红透山年可产煤多少万吨。那时铁法煤田的煤不大好，但能用。杨春圃、李东冶把铁路局换下来的铁轨修了条铁路来运煤，从全省调来木材，调民工，来架临时用的辽河桥。那时，邓华是军区司令员，派军队帮忙，小铁路很快就通车了。凤城县赛马有小煤矿（现在是辽宁主要产煤大矿），也修了条小铁路，把煤运给丹东用。从开原到西丰县也修了小铁路，都是用鞍钢不合格的钢轨修的，如再延伸30里路就可以和主要铁路接上。现在，铁法煤矿小铁路已改成大铁路了。

关于分配粮食问题。我先是主张农村把粮食按原办法分了再搞社的合并，但有人主张合并后再分，大背小，富背穷，平均主义的办法，我们也没和群众商量，几个人在屋子里就决定了。

关于城市中是不是搞人民公社，以及如何搞的问题？也有各种说法。焦若愚负责北大关（沈阳的一个区，后改为红旗公社），主张把工厂的边角余料给城市家庭妇女来加工，

搞小加工厂，一月人均收入约 30 多元，不要国家投资，称为城市人民公社，群众欢迎，邓小平还去参观过。全国总工会同志提倡农、林、牧、副、渔和大工厂一起搞大公社，工资待遇照工厂的办，吃国家。他到哈尔滨搞试点，要辽宁也照办，我不赞成。我认为城市是个统一体，不能分割，铁路、电车、公共汽车、自来水、电话如何能分割成几个公社，而且，大家合起来吃国家，也有损于社会主义经济。胡亦民是管城市人民公社的，他支持我的意见，我们没搞。

大跃进中间，搞高估产、高征购。铁岭的群众说讽刺话：“草比苗还高，还说大丰产。”1960 年不少人饿死。搞瓜菜代，吃树皮水草。复县把高粱壳炒焦磨面粉吃。中央从外省调进粮食来救济辽宁。1961 年省委研究，无论如何要力争把庄稼种上。东北的好处是，见苗三分收。首先把耕地这一关抓好，头一次松土，第二次间苗，地锄了两遍，就有点把握，再锄第三遍就完全有把握了。1962 年北戴河会议时，毛泽东问东北情况如何，我们回答说今年好些了。

1960 年办大食堂，关着门在屋子里讨论，我以为和学校学生集体吃伙食一样，人多可以省钱，也就表示赞成。我和强晓初到旅顺口几个村庄看了看，虽然觉得热闹，但心里有点动摇，农民从几里路远跑来吃饭，不合算，是不是办小一点好。第二年春耕前我到易县，红墙大队劳模高青廉找了六个妇女和一个老头来开会，那次好像吴方和我同去的。老头大约 60 多岁了。有个 40 多岁的满族妇女发言说，吃饭有迟有早，尽管有大食堂，家里还得做一点吃的，干活饿了，中

间回来还得添补点。再说，冬天还得烧炕，又做了饭，又暖了炕，到食堂吃就烧不了炕，一冬天怎么过。老头也说，大食堂烧高粱杆，一捆一捆往灶里填，火倒是很旺。可是高粱杆一捆只有十几根，拿来编席卖，一捆卖一块钱。听了老头和妇女们的讲话，我才恍然大悟，办大食堂是大浪费，群众不满意。他们并没有正面反对办大食堂，但却讲出了不应办大食堂的道理，几个老人、妇女给我当了老师。我回去后，在省委召开会议，说明了我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从此就取消了大食堂。

城市工业也是如此，拼命喊提高生产，两个露天煤矿（抚顺煤矿原产800万吨）都落坡了，影响铁道运煤，煤积久了发生自燃。阜新海州露天煤矿上面开盘小，煤石成山，只挖煤，石头都堆成尖山了，煤矿坑因为浅，尚未落坡，“文革”时也落坡了。鞍钢也出了问题，落闸，不张口，钢过不去。大跃进把人的头脑搞昏了，简直发疯了。但尽管出现这些情况，由于“文革”前各级党组织都很有力量，党指挥得动，中央一指出，马上就改了过来。

1959年到1960年，农村搞落（后）改（造）运动。辽宁从海城搞起，有的地方有天主教地下活动，阻碍工作开展，很多农村跟不上。村子落后还有个根源，解放战争时期大军南下，从大连到长春，沿铁路线的地方干部都抽调走了，领导力量削弱，加上沿线城市土改工作搞的不彻底，坏人隐藏下来。搞“落改”补课的约有20%的村子。总的说来是有成绩的。朝阳地区地委书记侯××，我告诉他建平奎德素地区是

个土匪窝子，他一去果然发现政权为地富把持，群众中流传两句话：谈笑皆地富，往来无贫雇。以后群众发动起来，搞出几十支枪，搞的比较好。

1963年底，我们在辽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启发群众觉悟，起来揭发坏人坏事，进行改造，运用正面教育方式，开展群众性批评和自我批评。1964年，中央在农村搞四清运动，号召学习桃园经验，到农村蹲点，我和一些干部去新城铺。在当时的气氛下，“左”的思想对我们都有影响，因为“要搞阶级斗争！”村子里有两家漏划小富农，已经多年了，不改划也可以，但还是给改划了。村支书李某干工作有魄力，但有点强迫命令作风，脱离群众，本来应当对他做点工作，让他检讨一下也就行了，却把他撤了下来，没有做思想工作。那段期间，我们对该村的建设方面倒作了点好事。如把弯渠改为直渠，种了稻田50亩，并建议铁道翻建桥梁以保农田。大队有葡萄园，为了防止大家都白吃公家东西，号召各家各户自己种点葡萄。那时朝鲜送给辽宁一些桑树，因此又号召大家种桑树。新城子一带养蹶子猪，帮助农民圈起猪圈积粪，一口猪的粪尿土一年可上3亩地。把小学也扩大了，办了个初中班。

城市蹲点。周恩来对我讲，天津飞鸽牌自行车搞得好，为什么辽宁不能干。我就带个工作队去沈阳自行车厂蹲点，传达了《二十三条》，和队员们一起干，提出质量第一，研究改进技术，搞了个四二型自行车。带到商业系统征求意见，坚决强调质量。据后来听说，反映还是比较好的。还搞过两

件大事。一是把沈阳工人劳模组织起来搞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由有技术专长的工人主动、无偿地去帮助有困难的厂子解决困难,一个人带动了一大片。这件工作影响很大,无论从解决实际困难,提高生产力来说,还是从发扬工人阶级的无私无畏、助人为乐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来说,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辽宁技术协作运动是全国的先驱,是工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领导加以组织和推广。劳模很多,如吕德顺、吴大有、张成哲、陈富文、王凤恩、吴家柱、林海峰、尉凤英等。

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工人们想主动发挥点作用。有一天,吴家柱看见邻居女工某某愁眉不展,说是厂子要关门了,因为生产的拉锁不合格,国家不收购,产品积压无资金周转。吴大有和林海峰(拖拉机厂工人)去看了看,把机器给修理好了,拉锁能卖出去了。省总工会主席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们认为这是个方向,决定支持工人们这种行动,困难时期,老工人有当家作主精神,运用自己的技术帮助小厂解决困难,这种精神难能可贵。我们决定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取名工人技术协作委员会。这些老工人一打听到哪里有困难,就去帮助解决。辽宁长途电台有的部件过去靠国外进口,现在外国商人卡我们不肯再卖。电台把技协的老工人找去看看,他们研究后制成了成品,不必再买外国货了。抚顺和沈阳交界处有一个朝鲜族农业生产队正要种稻子的时候,变压器坏了,过去请个工人修理要摆酒请他吃喝。现在技协派了工人去,自己带饭盒,修好就走,不吃不喝,农民非

常感激。昌图县有个电动机坏了，是技协的王凤恩去修理好的。现在全国总工会的王崇伦，当年也是辽宁技协的。全省有5万人参加了技协，有专长的工人都活跃起来了。

技术协作运动把有各种专业特长的老工人组织起来了，是很好的共产主义大协作方式。工会搞训练班，组织青年工人向老工人学习，每周几次，技协有人去讲授专长，不要讲课费。技协运动搞了一年多后，彭真去东北，听了我汇报情况后，他很感兴趣，找了二三十个人见了面，鼓励大家，又和焦若愚两人出面介绍有名的金福长参加中国共产党。报纸上一登载，全国都掀起学习的高潮。

吴家柱可能因劳累过度，突然去世。工会主席原打算就在本厂开追悼会。我根据天津市工会劳保部长追悼会的经验，认为地方太小，改在铁路局俱乐部召开追悼大会，大规模吊唁，人民日报发了消息。宋任穷和我都去参加了追悼大会。

关于技术协作还有一个问题。过去在辽宁搞工人技术协作，科学家、教授表示也愿意参加。我当时主张工人和科学家们各搞各的，以免工人精神上受束缚。现在回想，我的想法有点狭隘了。因为电机工人中技协人员多，而轻工业工人就少了。例如如何解决丹东柞蚕丝染色问题就应当由科学家、教授们和工人协作。中国柞蚕丝占全世界70%，而辽宁产柞蚕丝又占全国70%，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1983年我们在丹东见到的大连工学院教授侯毓芬，她发明了阴丹士林染料，还没有完全过关。应该由科学家、教授和工人

们协作,把柞蚕丝染色问题解决好才对。

第二件大事,关于工人生活互助,是由丹东丝绸一厂两个女工发动起来的。1958年车间模范工人韩秀芬看见同车间一个老工人因为妻子刚去世,丢下的儿女又要自己照顾,生产中不免心事重重,精神不集中,织布老是断线,车子老出毛病。有一次索性停了车,叹口气,跑到厕所抽烟解闷去了。韩秀芬看在眼里,非常同情,就趁他不在的时候,帮他把车修好了。老工人回来一看,车修好了,不断线了,十分高兴。韩秀芬为人热情、爽直,乐于助人,她和该老工人商量,干脆把自己的车换给他开。这样一来,老工人生产顺当了,产品质量数量都提高了。而韩秀芬自己工资却降低了30%多。这件事一传开,影响很大,韩秀芬在工人中威信更高了。另外一个女工邓玉芝,她发现一到秋后工人们就发愁,因为天已转凉,而冬天的棉衣被褥还没有拆洗。邓玉芝就串连了一些女工,组成一个十姐妹组,到各家去帮忙拆洗衣服,每到星期天就去帮助孩子多的老年人。后来男工人也参加了,春天谁家屋子漏雨,就去帮助解决困难。省委发现生活互助是个好办法,我就大力加以支持。我调来北京工作后,辽宁省工会副主席聂秉齐有一次来看望我,我对他讲,辽宁省的技术协作和生活互助两面旗帜要坚持搞下去。他后来告诉我,这项工作一直搞得不错。1983年《人民日报》还在第二版登过技协的消息,中央电视台还播放过邓玉芝的镜头,现在已经发展成群众运动了。

关于党建。我去阜新检查农村工作时,发现农村党员太

少。在新城埠蹲点时发现，发展党员有控制数目字，只在干部中发展，群众中很少有党员，一个大队只有生产队长是党员。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我没有来得及解决就到北京治病去了。

十年浩劫

“文革”十年中，1967年4月以前，我在辽宁被造反派抓去批斗。后经周恩来紧急安排，把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煞费苦心地在安全可靠的地方加以保护，我也于4月10日到了北京。1969年10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之前，中央办公厅通知我们各自回省、市检讨。我回到辽宁后，就被造反派“监护”起来进行批斗。1975年7月，我要求到北京治病，7月11日到了北京，当时中央正把一批高级干部集中到北京保护起来。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辽宁。1975年9月对我解除“监护”，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就留在北京工作了。

“文革”的势头来得很猛，叫人晕头转向。但回想起来，也不是毫无先兆可寻。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就曾认为，列宁的故乡搞社会主义几十年还出了修正主义，中国是不是也会出修正主义？他对中国要出修正主义问题不只讲过一次，还曾经说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反对，比

如袁世凯称帝，蔡锷就在云南起义。1964年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其中讲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方有，中央也有，“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观点。我们参加会议的听了心里直打转转，不摸底。后来“文革”运动期间，我总的态度是：首先，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信任的，想不通的地方就不往那方面想。说违心之言是有的，但从没有热心宣传。其次，自己没有作亏心事，没有反党思想言行，也就心里坦然，无所畏惧。再次，无论讲别人还是谈自己，都注意实事求是，在自己检讨时，还有意引用我在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中自我鉴定的两句话：“疾恶如仇有余，与人为善不足”，意在暗示青年人要以我为鉴。

“文革”前夕，1965年9月6日，我在沈阳医学院检查中发现患了胃癌，同志们瞒着我只说是胃溃疡，劝我趁着去北京参加会议之便，提前去北京医院再复查一下。我于9月9日住进北京医院，中央卫生部主管中医的副部长郭子化（妹夫）动员我动手术，儿子黄毅诚也动员我。13日，就由名医曾宪九大夫给我动了手术。手术后因为需要休养一段时间，就住在北京饭店改善饮食。从1966年1月住到3月，后来我才明白是胃癌动了手术，医生讲需要休养两年。

在北京养病期间，听到讲毛泽东批判“二月提纲”的话，还隐隐约约听说是针对彭真，但没有人正式告诉过我。3月间我离京返沈阳，和辽宁省副省长黄达一起乘坐陈锡联安

排的专机，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讲。但回沈阳后，有一天黄欧东告诉我，黄达对他讲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罗、陆、杨的批判和关于批判“二月提纲”的事，说因为我和彭真关系好，所以没告诉我。后来黄达还为此向我做了检讨。

当时东北局分工，宋任穷直接抓辽宁和黑龙江的工作，马明方抓吉林工作。宋任穷指示要在报纸上点名批判思想作风有问题的省委书记。省委考虑来考虑去，决定点名批判周桓。我回沈阳本来是因病休息，不管事。省委工作由黄欧东负责，但他总是每天晚上和书记们来找我唠唠叨叨。4月，中央批发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提出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打掉文艺黑线专政。这就开始了林彪、江青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文化大革命”。5月间，传达“五一六”通知，在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同时，还要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以及文艺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去听了，心中无底，不明白毛泽东有什么打算？也不知从何检查起，只有搜索枯肠，想自己的缺点。5月底，我就离开沈阳去丹东休养，但市委书记们还常去找我，我再三声明我讲的不算，要听宋任穷和黄欧东的。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国务院通知要学校推迟招生，停课闹革命。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红卫兵到处高喊“造反有理”，揪出所谓走资派，很快地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9月间，通知我回沈阳开会，听传达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时宋任穷捎口信来，说周恩来指示，叫我和欧阳钦

到北京养病。我不肯去，因上次在京养病，北京市安排照顾太周到，我怕再去公家花钱太多，于心不安。欧阳钦也不肯去。其实当时走了也就好了。我住在沈阳宾馆，其时运动已经搞得越来越上劲，“造反派”也一步紧一步地把我完全当成敌人看待了。

《我的一张大字报》传达后不久，辽宁大厦一个会计就贴出大字报，说我和欧阳钦在宾馆大吃大喝，由公家报销。白潜告诉了我。为避免无事生非，我给陈锡联打电话，提出到陆军医院去住，吴保山（军区副政委、长征前为兴国县团委书记、长征中在九军团作地方工作）和曾绍山也在那里。我住了一天，次日和两个小护士小吴和小刘前往大连警备区。午后到了大石桥，在三十九军住了一夜。曾绍山打电话叫三十九军派了保卫人员用吉普车护送我去大连。在警备区住下后，我原从天津带到辽宁的秘书刘庸来了一趟，因为他已经是“造反派”了，不得不提防点，因此他一离开，我便马上换了一间屋子。他以后又跑去一次，没找着我，我的警卫员关玉武有意避开，没有理他。

大连警备区招待得很好。保卫部杨干事负责照顾我，有时给讲讲外边的情况。司令员邓岳也很关心，我们都是老红军，彼此来来往往，随便聊聊天，研究形势，早晚还到海边走走。当时全国红卫兵在毛泽东接见后，搞大串连，我们就议论过军队是不是也搞。我曾讲过大串连可能是先把水搅浑，后来清浊自分。我也耽心搞大串连会使火车不能正常运行，物资交流和国家生产受影响。我认为毛主席现在接见学生，

将来农民、工人也要求接见，如何应付得了！后来，刘庸歪曲我的意思，捏造说，“工农都要接见，看你（指毛泽东）怎么办？”红卫兵就都记在帐上，成为后来斗我的罪状。

1966年国庆节前夕，我听说周恩来在一个会上讲，运动到1967年3月就可结束了，我心想，这样一来，工作生产还不致于受太大影响。因此国庆节期间我还坐车到棒槌岛走了走，又到金县县委看看，问问县委书记徐和平春耕工作准备情况。当时真是没有“自知之明”，不想想自己是什么处境，还想安排工作。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造反派叫嚷：“军队不能当防空洞”。当时中央打算把各省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通知我某月某日到机场直接飞往北京，不要再回沈阳城里。我就离开大连警备区，坐中型吉普车向沈阳方向走，随身多带了一些粮、油票，打算先在农村中转转。我在盖县吃了饭，前往大石桥。县长（绰号孙跛子）听说来了个首长，跑来看看。我还向他问了问春耕情况。

那时关玉武已被叫回公安厅去了，派来一个警卫员小王。我和关玉武通了电话，他告诉我，据说北京机场已不接受飞机了，他要我直接去沈阳宾馆，不要回家去：我因为惦记孩子们，想先回家。不料刘庸一听说我已回沈阳，马上通知了造反派。以致我到家还没来得及吃饭，农学院造反派就来把我抓走了，其中有的人安慰我说：“黄书记，放心，不要紧。”他们不让我上楼，原来楼上已经把我的东西摆起来展览，就几件古物字画，都弄破了，一块宋墨也摔碎了。造反派

把我和司机、大连警备区的护士小刘一起抓走。一路上几个头头说这说那，讽刺我，还说已经把我母亲的墓也扒了。我母亲早年在湖北枣阳老家曾多次掩护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帮助转运军用物资，曾受到反动派逮捕、刑讯。解放后来到了沈阳，1962年7月因肺癌去世时，年已96岁，当时我正在北戴河参加会议。她的墓被扒掉，我只是这一次听造反派头头讲才知道，心里当然感到难受，但以后我也没有再问过。

我被抓到沈阳农学院去后，被安排在一间空屋里，三九天，一丝暖气没有。护士小刘提出抗议，说这样会把我冻死。以后才把我搬到学生宿舍，上铺和左右铺位都有人监视我。我几次提出应当把司机放了，没人理睬。后来，司机借口回军区加油，回去了。护士小刘，给我留下七八天的药，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手术后胃消化力差，吃的面条又硬又凉，体重骤降。学校医务所大夫姓孔，对学生们说，我这样下去不能维持多少日子，出了事情不好办。学生们天天大喇叭广播，造谣中伤，说我和刘少奇、彭真摄影不少，和毛主席摄影“一张也没有”。我一本正经地劝他们，讲话要老实点，不能说“一张也没有”。宿舍门上贴了“请看修正主义分子黄火青十大罪状”，我也懒得去看。他们一条条问我，我就一条条回答。天津毛纺厂（长子友学所在工厂）也派了两个造反派来，谈完了要我写，写好还要按手印。我坚决不按，吵得很凶，他们到底也没有达到目的。

有一天，造反派把我揪到体育场开万把人参加的批斗

大会。我刚走下汽车，劈头就给脖子上挂上一个大牌子。后来听说造反派曾叫关玉武上台揭发我，他不上台，哭了。毅诚工作的厂子里有个老红军参加了批斗会，回厂后对毅诚讲大会批斗我的情况，说着说着就流了泪。毅诚后来告诉我的时候，也哭了。那次我老伴马新陪斗，说她是“辽宁的王光美”。在体育馆室内批斗过一次副省长仇又文，我和王良陪斗。学生中好人多，有个监视焦若愚的学生姓金，是已经毕业的学生，又回校来参加运动的，旁边没人时，经他暗示，我看看自己的行李，我才发现行李已被查抄过，幸而没有什么可以作为造反派斗我的材料。

学生们看见我身体一天比一天坏，怕出了事负不起责任，找了南湖医院院长孙静沈来看看。恰好火车出事，通知他去抢救，我就劝他赶快回去，不用管我了。学生们看我这个人没啥搞头，就把我交给南湖医院“寄存代管”。医院安排住在高干病房一号，屋里就我一个人，我和护士们都很熟悉，就出去和她们打招呼，她们赶紧叫我回屋去。第二天就把我换到二号病房，和别的干部住一个屋子，大夫也不全一样，有个姓张的在我面前自言自语：“自家得病自家知道，到处摸摸按按。”我明白她是暗示我自己注意身体，怕手术后癌症转移。另一个姓金，我想换到一个空床位去，她就是不允许。这中间，外面造反派曾有两次要来抓我。一次是九十四中学的杨校长带学生来要人，一次是市运输队来，用汽车把医院周围堵住要人。护士李明很厉害，她大声说：“不行！这是我的病号，要抓，先找我的领导去。”同屋的心脏病人

(省经委干部)和邻屋的病人都吼叫起来,不让半夜三更抓病号,这才没有被抓走。

在南湖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又被转移到中医学院,白潜和黄欧东也在那里。护士长是个“保皇派”。“造反派”头头是个印刷厂工人,还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杂志社编辑,他们对我们很尊重。以后又被搬到北陵休养所的七号楼。

那时是1967年,东北局还能管点事,宋任穷也在沈阳。我就写信告诉他我想去北京治病。东北局和北京通话后同意我去。离沈之前,省委开会对我进行了一次批判,估计这是东北局的意思,批了好走。黄欧东批我时把其他书记都挂上了。

1967年4月10日,我乘飞机去北京。住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造反派派了个姓张的监视我。这是个“小丑”,他完全把我当敌人看待。到了招待所,这才知道原来江华、廖志高、江渭清、高克林、张平化、谭启龙、张体学和曹祥仁等一大批人都住在那里,还按省委书记规格接待,一人一屋。姓张的怕我和别人联系,提出要和我同住,我说这是中央规定,我不能擅自改变。我住223号,他就在旁边一个套间222号住下来,住了两天报不了销,只好还是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住。除了睡觉他都紧跟着我,我去看我妹妹,他也跟着。妹夫郭子化正在练字,我就向他要了字帖和笔砚回来练字。张某还问我被捕过没有,没有被捕过就没事。我说季米特洛夫也被捕过,他无话可答。有一次,姓张的想骗我回辽宁,说4月20日要在沈阳开大会,开完会再回北京。我答复去不去沈

阳要由中央决定，不能擅自行动。辽宁也派了人来要把我搞回去。据说后来周恩来知道了，把张某叫去批评了一顿。

从1967年4月到1969年10月，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都住在厂桥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中央叫把我们这批人保护起来，怕让造反派抓走。那段期间来外调的人不少，每次都是由管事的秘书把我们接到怀仁堂旁边一间屋子里谈话。搞外调的人穿着军装，说话像审问犯人一样，调查材料开头写着“勒令”某某交待字样。那时招待所人也多了，李井泉、杨勇、杨尚奎、朱德海等也都来了。有些年轻一点的如张体学、高克林等有时就发发牢骚。吃饭时候，大家往往借古喻今、讲讲战国时代范蠡聪明，西汉时代张良也聪明，明太祖杀功臣等等。张体学知道自己没有辫子可抓，就随便到街上走走。高克林是“李逵派”，当着造反派孙陵太（周恩来的秘书，派来照管我们生活的）的面发牢骚。欧阳钦也有点“倚老卖老”，发牢骚。1967年冬天，他曾给毛泽东写过信，毛泽东批示叫他去休养。他当着孙陵太的面提出来，黄火青去，他才去。我劝他别讲这种不恰当的话，自己赶快休养去吧！别的人不敢去他屋里，怕他讲不恰当的话不好办，我因为和他是老熟人了常去。

吃饭前照例要念语录，还非叫大家吃个棒子面窝窝头不可。我刚动过胃的大手术，咽不下去。过年叫吃忆苦饭，也叫“革命饭”，是豆腐渣，偏偏做饭的韩师傅是北京四大名厨之一，他用油加上葱花一炒，吃起来倒满有滋味。

那时，不让和家属见面，信件也要受检查。我和马新见

面，总是事前通知她到 301 解放军总医院候诊室等着，我去看病时说上几句话。有一次，我镶补的牙在吃饭时掉下来，咽到胃里去了，到 301 医院住院，把黄毅诚叫去了。他提起沈阳大会斗争我的事就哭了，我妹妹海明也不知哭过多少次。我的棉袄和衬衣都穿破了，毅诚给我买了一双棉鞋，一直穿到现在。侄女友莲叫她女儿难难买了点卤肉送到中南海，再转送到我手里。长孙女小临在“五一”节送来一些罐头，用破布乱七八糟地包扎着。造反派拆开包裹检查后把罐头扔给我，我就拿出来在饭桌上请大家吃。

在招待所期间，我把生活安排得比较有规律，利用时间读书、练字。读《毛选》的重点，是读政治经济学，自己拟了七个题目反复阅读、摘抄，一共摘抄了 17 本笔记，一直保存至今。除开读书写字，就自己搞点体力劳动，把二楼擦地板的事全包下来，每天擦得光可照人。还打扫厕所、打扫洗澡间、修理水管子。我还把自己的体温计提供给大家作医疗用具。那时不许白天到院子里晒太阳，只准在走廊上走走，到了晚间才许在院子里转转。我也写过几句打油诗，如：“满院春光无限好”、“长廊散步寂无声”等，发泄发泄胸中闷气。

正在那个期间，四川的造反派“二老产”上北京来了。它是从“产业军”分化出来的，和北京的造反派还没有挂上钩，住在景山公园内被人揍了一顿，正没好气。凑巧戚本禹听说各省省委第一书记都住在中组部招待所，就下令叫把我们每个人的住房门牌号码都报上去。“二老产”一听，就来揪李井泉。那时正是夏天，我们都在阳台上，各人赶快跑回自己

屋子。李井泉和我住对门，服务员小刘把李井泉的门从外面锁上，不让人进去，造反派打破窗户玻璃硬钻了进去，把李井泉抓走。另外还抓走几个人。招待所原有一批人警卫，此时又打电话调来一营人，但已经晚了。随后招待所就赶紧把我们这些没被抓走的人，送到中南海怀仁堂旁边一排平房里躲起来，听说没事才又接回去。不料刚过两三天，北京造反派“四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又带一帮人来抓人了。我正在理发室理完发等待吹风，别的人都跑上三楼一排房子里躲起来了，就是找不到我。后来服务员老王赶紧带我一口气跑上三楼。一看，江华、江渭清都穿好军装在屋里坐着呢。这时警卫队一连人起来堵着楼梯口，造反派却从他们身上踩过去。我一眼看见其中有两个辽宁来的正在嚷嚷着找黄火青，我就半路上钻进一间空屋子，锁上门，拉上窗帘。造反派敲敲门，见没人应声，就吵吵嚷嚷走过去了。我从窗户里看见他们离开招待所之后，才开门出去，招待所的人正在找我，以为我也被揪走了。那次揪走的有叶飞、张平化和张体学等人。

这次事件发生后，我们这批人在招待所住不下去了。8341部队在南苑机场有一个团驻扎，准备把我们搬去住，说好了晚上动身。大家商量的时候，警卫部队把招待所造反派服务员集中起来讲话，以免他们听到我们的计划。其中的两个服务员看情况不对，想往外通消息，部队就把电话线给掐断了。傍晚我们带上行李刚上车，忽然好像发现了什么事，又叫我们下车，原来李井泉被放回来了。最后，又重新坐

上大卡车，绕着道走，转来转去直到深夜才到达目的地。部队领导通知我们，部队中也有支“左”的，别往外跑，以免暴露。后来，我们又被送回中组部招待所，住在最后一排楼房，住了大约两三个月光景，还可以到街上散散步。那段时间安排我们外出参加劳动，我们有四个人到新华印刷厂，还有一些人到二七机车车辆厂。那时大家都心中无数，朱德海找我问，是不是会重复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说要相信毛主席。

初冬，中央办公厅负责人通知我们各自回省，末了，还和我们握握手。江渭清对我说，我们这手已经一年多没人握了。以后大家就准备分批回省，还吟诵古诗相约：“他日相逢为君下”。我当时认为回辽宁不要紧，军区负责人还比较开朗。倒是江华提醒我说：“现在可不能这样讲了。”后来事实证明，我对形势估计得过于简单了。

1969年10月，沈阳军区派人来接我和黄欧东、欧阳钦。那时候辽宁三派已经大联合，到北京开会时，还通知黄欧东去参加过，他大概心中有数了，颇有些洋洋自得的味道。一上火车，就不让我们三人互相来往。派来接我们的人是军区一个指导员，他含含糊糊地不讲自己姓名住址。事后了解，他是五十一军的，叫程远文，是个好人。车到兴城，就把黄欧东接下去了，那里有个疗养院，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已经下车。火车到沈阳站，站上空无一人，一辆小吉普对准车厢停下来，让我上去，把我交给军区政治部一个黄干事。我弄不清要把我接到什么地方去，就提出要先回家取手

杖。对方的答复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吉普车开出沈阳站后，我估计可能送我到小市附近军区劳改队。车向本溪走，中间还让下车喝了点水。到达本溪后，转向去本溪水洞的路上，翻过山到了小市，又过一座桥，再翻过山就到了朝阳寺侦察连驻地，安排我住下来。

生活方面，每月发给我60元生活费，吃细粮，在院子里行动也比较自由。我住下来后，就给陈锡联写了封信，说我过去工作中有很多错误，希望他能帮助我把问题搞清楚，我还希望能在工作中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哪怕是生了锈的。并盼望他能来和我谈谈，或者派个秘书来也可以。信发出后犹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我给儿子们写的信也都被扣下来，不给发出。

阴历年后，忽然又用车把我搬到山那一边，那里是一片军官宿舍，距本溪水洞约有六七里地。六十四军政委郭玉峰原住在那里，那时调到北京当中央组织部长去了。我住了团级干部宿舍，三间屋子我住两间，另一间名义上是“警卫”人员住，实际上是来监视我的人。不久马新也被接来住在一起，她在本溪县纱厂当临时工，处理废纱。孙女小临和女儿蓓蓓也来了。我订了报纸，在门上钉个小木箱，山东籍战士王中海天天把报纸拿来往里放。有个监视我的人天天向沈阳打小报告。

不久，情况又发生变化。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人，说是沈阳军区的，是来拉我一把的，叫我要端正态度。一个是团政委姜洪德，老好人，只会讲两句话：“分秒必争，时不再

来”。一个姓张的，像是主角，管事的。后来又加上五个人，其中有个戴眼镜的女的，都不暴露自己姓名。他们没掌握材料，只会扣大帽子。我好吃高粱米，还受到他们鼓励，说能吃粗粮。有一天忽然来了一辆中型吉普车，叫我去沈阳。儿子塞蒙和卫津一看车的牌子是沈阳军区的，以为真的把我带到沈阳去了。实际上车到六十四军的小招待所就停了下来，来了两个人和我谈话。一个是辽宁省原省团委书记毕云庭，另一个是军队干部。毕云庭问我有什么认识，我说工作中有错误，自己正在检查。在谈话中凡是我认为错了的，我都表示要提高认识，凡不是我的错的，我就给他解释。那个军队干部讲我知罪不认罪，毕云庭就跑上楼打电话，说谈话“距离很大”，叫我回沈阳还不到时候。第二天来了二十几个人的战斗队，把我搬到警卫连食堂。天下大雪，很冷，生了炉子也不顶事。他们警告我说到院子里上厕所都要带上口罩，不能叫人认出我来，否则后果由我负责。后来听说是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我的去向，每天往我家送报纸的人故意绕着山路走，实际上相去不远。有天晚上我在室外粪坑大便时，遥遥望见山那边我家中有灯光，心里明白马新还住在那里。我还写了首打油诗：“北山闪明灯，灯照我心明。老马卧旧地，黄牛倚青松。”

战斗队斗争我好几天。头一天叫我自己讲。我说明我自己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党组织，并有意提到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自我检讨：“疾恶如仇有余，与人为善不足。”意在告诫他们要以我为鉴。中间休息时，有个叫张洪义的走过来

小声提醒我,为什么不搞个提纲来讲。斗争会主要批判我在天津的问题,但他们只是凭天津来的揭发材料,对实际情况毫无所知。有一次问我1965年在北京动手术后,彭真去看我时两人都谈了些什么。我说主要谈到在北京开的会太多,“老头子”(指毛泽东)对开会代表都要接见,受不了,应当妥善安排组织。战斗队一听就轰闹起来,故意制造高潮。黄欧东的秘书姓温,说我不该叫毛主席是“老头子”,当场痛哭流涕,要揍我,以表自己忠心。有的人拦住他,才没揍到我。过后,又把我搬回招待所和他们住在一起。约摸过了二三十天后,忽然又叫我回家去住。家里人才知道我原来就住在附近,没去沈阳。粉碎“四人帮”后听说,造反派那时曾有过争论,是叫我还是叫黄欧东出来工作,后认为我这个头“不好剃”,不如黄欧东顺手,所以还是叫他出来了。

我在小市住了三四年(从1969年到1973年),这一段时间生活仍然较有规律。除了开荒种地,就是通读《毛选》四卷、看报、练习写大字。我在后山上开荒,挖粪窖积肥。1973年,曾种过170株玉米,种的蔬菜吃不了。吃粮食,我自己运上山。雪后住房周围积水,就挖渠排水、修路。我还曾建议在后山上广植灌木、栽野梨。六十四军的领导对我是不错的,春节时军的侯政委还派秘书来向我致意。马新每天坐班车去纺织厂上班。厂子里有个老女工很同情我们,常来看望、帮帮忙。

1970年起,我身体逐渐走下坡路。5月20日我患了肺炎。部队派了辆载重卡车送我上医院,是一个中等野战医

院，塞蒙在那里照顾我一段时间。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我69岁生日，回家住了一两天，又因病进了医院。这一年虽然我住了三次医院，却既不让我回沈阳，也不让沈阳派大夫来诊治。幸而野战医院主治大夫治病认真，对我很好，总想给我买母鸡吃，好补补身体。我不肯，怕浪费。

1971年，沈阳造反派“辽革站”开始把我揪到农村游斗。先到抚顺，抚顺有条铁路直达吉林，就叫我住在离抚顺几十里地的南杂木站新滨县招待所。斗争会场却设在30里外一个公社礼堂。“辽革派”的人看见农民群众批斗压不倒我，就自己出面批斗，斗完又往回走。我因为患胃癌，胃已切除了2/3，一饿就十分难受。有一次路不好走，车子颠簸得厉害，一下车我就眼前发黑，迈不开步，腰也直不起来，躺在地上直哼哼。造反派叫嚷大家别理我，扬长而去。当时我真是只剩一口气了。幸而军队派一个叫赵焕忠的跟着我，人还不错，老家在青岛附近。他给我喝杯热开水，我才苏醒过来。当时我自觉已无生望，就告诉赵焕忠，我如果死了，托他想办法转告马新，要把儿女教育成人，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共产主义。就这样来回批斗了几天才回抚顺。半路上又叫我下车到一个生产队开批斗会。下车后，我的两条脚简直一点也挪不动了，赵焕忠找了一根已经腐朽的木棍递给我，实际上已起不到手杖作用。好不容易挪到村子跟前，给我个椅子坐下就开始批斗，我简直连说话的劲头都没有了。当天，在抚顺吃完午饭，坐火车到宽甸县，再转乘汽车到太平哨一个公社进行批斗，是因为办大食堂的事。1958年大跃

进时大办食堂，把山上农民都搬下山来，好集体吃饭，后来食堂办不下去了，又让农民搬回山上。批斗内容是说我提倡单干，不该让农民回到山上去。我承认有这回事。接着汽车到了金子沟大队，那里有个农民搬回山上后得病死了，说那也是我的罪行，组织了四五十个人拦路斗争我。有个丹东小伙子喊叫，我要是不检讨，就拉到丹东市去斗。我有气无力的应了声：“好吧！”他们一听，说我在叫好，斗得更起劲了。原说还要去辽阳，不知为什么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叫我到沈阳，住在第一招待所。

在沈阳，大会小会批斗了六七十天。大会由小市那二三十个人出场，小会由“辽革站”的七八个人出面，从头到尾批了一通，一直开到9月下旬，大的批斗算是完了，叫我回小市去。以后就是零敲碎打的搞了，有时叫写个材料，有时来一两个人问问话，敲打敲打。

总起来看，“文革”中批斗我主要是以下几个内容。

在辽宁时期。说我是“刘、邓、彭”线上的人。毛泽东批了鞍钢宪法，我没有开展群众运动来贯彻执行。大跃进中我鼓励农民从山下搬回山上单干。

在天津时期。说我（一）在解决劳资纠纷条例中，资本家有“三权”。这是刘少奇去天津后，黄敬主持制定的，吴方参加了。（二）盛锡福事件。当时盛锡福要解雇临时工500多人，党支部书记赞成，工会主席不赞成，我把他们两人和劳动局长三人找到一起商量，大家一致同意了。解放初期的政策是可以解雇工人的，毛泽东的《为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而斗

争》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不过报纸上发表解雇的通讯写得不好，成了批判工人了。(三)王光英的天津工厂爆炸事故应判刑问题。王光英是全国人大代表，地方司法机关无权逮捕，但不加处理法律上又通不过。报上去后人大常委不批，叫市委全权处理。又因为王光英解放前帮助我党做了许多工作，因此只撤销其厂长职务。小职员判了刑。

历史上关于卓木碉会议问题。我是到会了的。九军团干部知道我是反对张国焘的，罗炳辉和何长工是拥护张国焘的。卓木碉会上，我的打算是以“赞成”南下来缓和张国焘对我的怀疑，他如叛变，我们就到汉人区打游击。但我在会上也违心地说了错话，说南下正确，北上错误。虽然我本心是想对鬼说鬼话，蒙混过去，以免他们把我调离九军团，但无论如何是不该那样说的，是错误的。

关于反林彪。(一)说我曾经讲过，铁路沿线土改搞得不彻底，要补课，搞落后地区改造。这是反林彪，因为东北土改是林彪搞的。这一条最毒辣，是欲置我于死地，这话是省书记处向彭真汇报时说的。(二)在延安中央党校斗争过叶群。实际上是当时党支部找过叶群谈话，了解她在南京那段历史。(三)1949年3月，在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会议上，程子华和我所作的两个报告，林彪说“都是错的。”我们从未听到过这种批评。(四)林彪到大连，省委不管。实际上林彪去大连之前，没有通知省委，只有军区知道。副司令员曾思玉找我叫大连市委第一书记胡明腾出房子，让林彪住。我只好找着胡明，压着他搬了家。林彪去大连，是由市公安局姓叶的负

责保卫工作。外围由公安局管，内部由警备处派人。以后说要内外统一，外围也由军队负责。张铁军有意见，去找我，说军队不相信地方，地方公安部门如何负责。我找了黄欧东、曾思玉、白潜一起商量，决定：军队要管什么就管什么，但公安局长必须住该处听指挥。我为了稳妥起见，在听传达《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还找宋任穷、陈锡联、马明方汇报过上述决定。

这里我还必须补充一件事。“文革”前，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高度尊敬，文化部曾经通知出版毛著要用好纸。凡印刷不合规格的老版书要收回烧掉。“文革”中揭发辽宁烧过30万本毛著，要清查是谁批准烧毁的。那时我住在北陵八号楼。学生们命令赶快查出来，第二天要交代。我和李荒都不知道是谁批的，黄欧东不讲话。后来李荒毅然表示，既然找不出是谁批准的，就由他一个人出面，承认是他批的好了，以免影响整个省委。我当时心中很不安。中午12点，说查出来了，是周桓批的。从这件事看出，李荒党性强，能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

我重回小市后，马新主张我给周恩来写信，想办法托人转去。我不同意，总认为应当按组织原则办事，不要越级。那时我也听见孩子们悄悄议论林彪已经叛逃的事，我为了避免另生枝节，假装没有听见。一直到1972年二三月间，军队一个冯干事来看我，问我报纸上谁的名字不见了，我说不知道。他说林彪叛逃了。我立刻反问他，是军区叫他通知我的，还是他自己的意思。他说是上面的通知。我说如果是中央

讲的,我相信,但我没有看过正式文件。那时也逐渐听到小道消息,说毛泽东讲“高抬贵手”,叫解放老干部等。

我还写了些打油诗,抒发胸中的情感,如“夜梦主席见”、“赞青山犹健”等语。那时已是1972年冬天,天气很冷。有一晚上院子里冰雪满地,天上却是明月当空,我写了几句诗:“冰天雪地水晶宫,寂寞嫦娥舞当空。炭来炼就丹心赤,哪怕寒霜与严冬。”那时我已经了解到造反派想把我拖死,这对他们来说,比把我打死更有利。

马新见我不愿越级写信,她就自己给周恩来写了信。1973年10月,忽然把我们一家从小市搬到盘锦农场。那里原属军队农场,以后划归地方的,比在小市居住当然更自由一些。我住房外面还有一道小篱笆。我可以上街买东西、钓鱼,外出不受限制,但没车,不能走远。也可以同外人接触,但不允许我作农村调查。我就闭门造车自己写点社会调查,如关于教育改革、工资改革以及中医药问题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是凭主观经验和能接触到的材料写的,没有地方可送,就一直搁在箱子里直到如今。那是1974年,我已经73岁了。每天垫平土地,辟园种菜,有时还帮农场抬淤泥,和养猪、养鸭的青年们聊聊天。我院子里的地据说是盐碱地,不长庄稼。我就试验着积煤灰(酸性),好在春天翻了地时上煤灰,还掏陈粪,把底肥施足。又向农场菜园要了种子,不移植,搞直播。西红柿、水萝卜、茼蒿菜、丝瓜和苦瓜等,都长得很好,白菜一棵七八斤,玉米有屋顶高,玉米棒一个尺把长。只有葵花籽粒不饱满,因为当地用农药多,容易把蜜蜂杀

死。原来说地不好长不出好庄稼的人，都服气了。小孩子们没见过，爬在篱笆上指指点点，问瓜菜的名字。我就写了小条子一一贴在园子里。

我在盘锦农场期间，造反派张某等两个人有时跑去嘀咕几句，他们回沈阳后好汇报。我在农场和群众关系搞得很好，但批林批孔不积极。

1974年冬天，我又生了病。头天晚上刮大风，我到院子里给香菜盖席子，着了凉。卫津正好在那里，给我量体温，一量，39℃。他赶紧骑车去找大夫。人们来看我时，我已经说胡话了。大夫来了就输液，11点多钟好些了，喝点面条汤。农场党委怕出事，动员我去住医院。医院是原鞍山市第二医院下放在盘锦的。内科主任说是上呼吸道感染，一个李大夫说是肺炎，留下住院治疗。病刚好，张某又带了两个人去找我谈话，说要“解放”我了。那时中央已派车接宋任穷等到北京，上天安门了。我的打油诗“幼苗生壮苗”、“早霸为殃雷无雨”等是在那时写的，意指有坏人从中作梗，只说不见行动之意。

1975年2月初，海城发生大地震。盘锦离地震中心才90里地，事前曾有点消息，当天早晨四五级小震，没有什么感觉。我告诉马新和卫津，地震发生时谁也别顾谁，能跑出去就跑出去。晚间我们打完扑克，正准备睡觉，忽然听见如雷的声音轰隆轰隆地响起来，卫津猛一下就冲出四道门去了。我和马新跑出二道门，地已经摇晃得很利害。又跑，出了第四道门，在菜园子里扶着铁丝栏杆站着。脚踩在地上像

踩在烂泥上一样，软绵绵的，眼看远处的地都在摇晃。卫津又跑回屋去把我们两人的大衣拿出来。远处一个值班照看小鸡的女孩哭叫起来。地裂了缝，到处往外冒水。我们准备一个人抱着一根木头，以防万一脚下的地裂缝。地震过后，我们在院子里草草搭了个塑料棚，穿上皮大衣坐在里面。蓓蓓恰好第二天由北京到盘锦，正撞见戒严不让进出，她急得哭鼻子。

地震后，我又犯了病，这次才让我回沈阳治病，住在南湖医院。内部通知大夫称我是同志，但当面不得这样称呼。隔壁病房有一个病人是我熟识的一个老民主人士，已经病危，我提出去看望一下，张某两人不答应。4月左右，王震去沈阳，叫通知我去一起吃顿饭，用意是让我在公开场合露露面，冲破封锁空气。造反派推托说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医院，没法找。王震派他的秘书（张爱萍的儿子）坐宾馆的车到处去找。在场的老司机都认识我，就一个新去的小丁不认识，造反派偏就派他开车。小丁是个好人，他心想既是王震要找的，一定也是个好人的，决心非找到不可。找了好几个地方，看看没有多大希望了，决定最后再撞一次看。恰好遇见我在医院院子里散步，小丁估计可能就是他要找的人，上前问了一声，果然是我，就这样把我送到宾馆，和王震见了一面，吃了顿饭。当时我本想提出跟他坐飞机去北京，但因在座的辽宁省负责人只有杨春圃，我照顾到他的处境，恐怕不敢作主答应让我走，因此就没有提。

以后，我就以检查病为理由，在沈阳住下去，不再回盘

锦了。我听说,周恩来曾经讲过:黄火青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出来工作?还有人给我透露消息说,1974年省革委有人报告中央,叫我当丹东市委书记。那时邓小平已经出来管事了,中央答复说,如果黄火青在辽宁省不好安排,可以放到东北其他两个省去安排。实际上,就是在1971年林彪叛逃以后,辽宁的造反派也不肯“解放”我,报纸上天天宣传“辽宁最大的走资派”(指我)和“东北最大的走资派”(指宋任穷)。我70多岁了,他们的居心就是想长期把我拖住,直到拖死,就可以交待了。粉碎“四人帮”后,省委组织部李玉琦(蔡利之妻)告诉我,我住盘锦医院时,大夫曾说过,如果再要斗我,就会发生脑溢血。

1975年7月11日,我从沈阳来到北京,当时中央正把一批高级干部集中到北京。我是要求来治病的,住在中央组织部厂桥招待所,马新也常来住。逢年过节,三个小的儿女都来。

那时我算是“合法”了,常和蓓蓓到海明妹妹家走走。我还常常去王震家,也去看过李井泉,看过杨成武,他也来看过我,一些老同志之间还是互相关心,通通消息。

八九月间,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崔修范和组织部副部长来通知我,中央任命我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一看通知,一共好几个副主任,其他人写的是中央“任命”,唯独我写的是“同意”。我没有去上任。有人说我真“傻”,叫我当个省革委会副主任还不肯干。我给曾传六打电话,他一听见我的声音,高兴极了,还请我在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

马新分配工作比我早些。我曾给毛泽东写信，托汪东兴转，大意是说我身体还好，还可以工作。信发出后没有回音。我也给邓颖超大姐写过信，说我身体还好可以工作，胃癌切除后已恢复正常，并表示希望周总理好好养病，和自己想去看望而不得去的心情。邓大姐给我回了电话，说信收到了，谢谢关心，关于我的工作问题由中央考虑。其实那时周总理的身体已经不行。我不知道朱总司令住处，也没法去。1976年周恩来逝世，我心中非常悲痛。清明节那天，我去北京医院看病，想中途到天安门前看看，就和司机商量让他从府右街绕过去，车经过天安门，看见花圈一直摆到金水桥，松树上都挂着小白花。当时，我难以控制地流下了眼泪。

我住在招待所时，除了读书看报，尽可能参加些体力劳动，打扫自己屋子，擦走廊的地板，自己打开水。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这种生活状况才告结束。

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得以结束。

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前一天，中央通知我，决定恢复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我出任检察长。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项任命。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曾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党的九大、十大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召开的,十一大是1977年8月开的。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我和一些同志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这年5月,我全家从沈阳搬来北京。

我对检察工作没有经验,一切从头学起。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68年12月被撤销,人员离散,财物转移,工作停顿了10年。重建时,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连办公处所都没有。可是恢复检察院的消息一见报,人民来信就蜂拥而来。我是在招待所上任的,一个人不好开展工作,我就把喻屏、张苏和吴芳等人找来,开始搭班子,一面向民政部借了点房子,与中组部商洽调进干部。一边恢复,一边工作,这样才逐步地把工作开展起来。

关于检察工作的恢复和建设,我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修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过去的检察院组织法有些内容是照搬苏联的,权限很大,管辖范围很宽,实际上又管不了,经修订为只对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取消了对于地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的“一般监督”职权;改变了过去检察机关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制,实行双重领导;完善了检察机关内部民主集中制,将检察长领导检察委员会的工作,改为检察长主持检察

委员会的工作；明确了检察委员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等。

(二)健全高检院的组织机构，并协助各地党委组建地方各级检察机关，配备班子。同时，进行各项检察制度建设，使检察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在高检院的组织建设中，原则是，高检院原来的老人有选择地调回来；已在边疆的不调；不要“三种人”。至于建设新的院址，虽已有指标，但到我离开时还没有得到解决，这是我至今引以为憾的。

(三)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国家的宪法、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积极开展检察。

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七个重要法律，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篇章。高检院领导各级人民检察院，抓紧组织干部学习新的法律，积极开展法制宣传，进行实施“两法”试点，并配合有关部门清理了大批积案，保证了1980年1月“两法”的顺利实施。

在其后的3年中，主要是领导与组织贯彻中共中央1981年6月批转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的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和1982年3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犯罪的决定》。

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把整顿城乡社会治安和打击

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作为检察工作的两项重大任务,集中力量,加强领导,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行犯罪分子的方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当时,我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答新华社记者问,进一步阐述和宣传人大常委会决定的重要意义,以及检察机关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还积极开展其他各项检察业务工作,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卫和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紧张和艰难的斗争。

我在检察长任内,突出的一件重大任务,就是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进行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工作。

公开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是我们建党、建国以来发生的罪行最重、为害最烈的案件。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又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既有共同的反革命目的和反革命活动,又有各自的反革命野心和各自的反革命罪行,情况特别复杂。因此中央决定把“两案”合起来审理。

1979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审查处理,组长胡耀邦,副组长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王鹤寿,成员有黄玉昆、于桑、曾志、李士英、郑绍文、刘顺元、张启龙、章蕴和魏文伯。小组成立之前,胡耀邦打算叫我任组长,我因为该案涉

及判罪和党纪等问题，高检院人手又不齐，有困难。以后由他自己出任组长，但后来实际上是以黄克诚和王鹤寿为核心领导。

中央决定，主要审查两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行，总的指导方针是：“严肃对待，慎重行事”；处分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对受审查人员的审查结论，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从1979年8月至1981年11月，曾先后召开过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开始在讨论反革命集团成员哪一些应当判刑时，因为“四人帮”刚被粉碎，党内义愤情绪很强烈，“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与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地区的意见差距很大，例如内蒙古来人甚至提出中央“是要内蒙200万人民，还是要滕海清”的话。当时，会上强调了“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有些问题只能宜粗不宜细，因此有些遗留问题也未作妥善处理。

在第五次领导小组会议上，我提出来，领导小组和其他人意见距离太大，应当听听地方上的意见，把罪行事实查清楚，再统一思想。秘书长刘鸣九表示同意，并说大会上大家一定会赞同我的意见。

讨论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判刑的罪状材料要一定经得起历史考验。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利用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错误进行篡党夺权犯罪活动的，案情特别复杂。虽然到庭受审的名单已经通过，但有关罪状材料则还有争论。1980年3月，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两

案”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他叫于桑把全部文件材料取来，足足有一米厚，他自己一件一件翻阅，把其中完全属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应负责任的挑出来使用，其它一概不用。把这些文件材料和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具体活动结合起来，就有充分证据可以给他们定罪，而且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件事情应该说是彭真的功绩。

关于“两案”是分开审理好，还是合起来审理好，事前也曾经过反复争论。因为林彪和江青都是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搞篡党夺权活动的，他们互相勾结利用，但又各有打算。合起来审判，其罪行活动看起来比较系统和完整；分开审，则显得比较单薄，而且必然重复。最后决定合成一案审理。

关于判刑，是死刑还是死刑缓期执行，也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用“死缓”。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一项特别的决定，宣布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任命我兼特别检察厅厅长，喻屏、史进前为副厅长；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任命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伍修权、曾汉周和黄玉昆为副庭长。特别法庭设两个审判庭，任命曾汉周为第一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为第二审判庭审判长。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检察厅的检察员和法庭的审判员中有许多地方上的同志参加，浙江的王芳和黑龙江的魏之民等也都来了。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曾作过三次动员，提出多派出一些干部参加

这项工作，并在斗争实践中受到锻炼。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最后经中央讨论通过。正如当时《人民日报》社论所说，起诉书是以“如山铁证”，控诉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桩桩罪行，在起诉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人民的血泪”。公审之前，还把起诉书由特别法庭分别送交 10 名罪犯自己看过。

1980 年 11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 10 名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特别检察厅成员和特别法庭成员全部出庭，法庭的空气庄严肃穆，旁听席上座无虚席。

开庭后，由特别检察厅厅长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起诉书有 2 万多字，我和副厅长史进前各读了一半，列举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四大罪状，四十八条罪行，铁证如山，词严义正。10 名被告早已被押进来，站在被告席上，有的神色紧张，有的强作镇静。他们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应该在人民的法庭上接受历史的审判。

首次开庭以后，接着就由两个审判庭分别审理 10 名主犯。第一审判庭设在公安部礼堂，第二审判庭即特别军事法庭设在空军俱乐部。审判过程中第二庭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第一庭对江青等人的审判难度稍大一些，但也还算顺利。江青虽然耍赖狡辩，胡搅蛮缠，但在人证物证面前，她那一套也施展不开。张春桥始终是一言不发，拒不交代，阴阳

怪气，不死不活“豁出去了”的样子，但材料俱在，足以判刑。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进行宣判。法庭里的气氛庄严，旁听席早已坐满了人，大家都屏息以待，等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宣判。10名被告也显得十分紧张。开庭后，庭长江华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判决书很长，江华和伍修权各宣读了一半。最后宣布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以上7名罪犯均各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宣判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当伍修权宣读到“判决被告江青死刑”，还没念出“缓期2年执行”时，平时装腔作势，故作镇静的江青竟沉不住气了，脸色骤变，慌乱地喊叫起来。当法警给她戴上手铐时，全场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难以抑制的欢呼声，真是人心大快。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审理，从1980年11月20日开庭至1981年1月27日，历时两个月零七天，经过42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49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873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证据充分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所犯罪行严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林彪、江青一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罪行最重、为害最烈的反革命集团。这伙罪犯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特别

法庭对他们进行判决所依据的罪状，仅仅是他们全部犯罪记录中很小的一部分。把这伙篡党窃国、祸国殃民、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人民公敌押上人民的审判台，接受人民的审判，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心愿。我担任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检察起诉工作，感觉身上担子很重，加上我刚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不久，从前又没有从事过司法工作，因此惟有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庶几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在处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中，中央一贯强调，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大。对于为首的少数主犯，必须严肃处理。对他们如不判刑，就不能平民愤，也不能昭国法，更不能激发广大人民搞“四化”的信心和热情。但对于首犯以外的人则应区别对待，少判为好。如“文革”初期，“小将”造反是盲目的，青年人有一种革命的狂热性，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革命。在处理“四人帮”案件过程中，不宜轻易使用“造反派”这个名词，以免打击面过大，不利于团结。又如“三支两军”中部队指战员奉命“支左”，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地方情况，容易偏听一面之词，犯了错误，只要自己认识错误并努力改正，是可以保护过关的。特别是有些年轻战士，参军不久，啥也不懂，糊里糊涂就因“支左”犯了错误。所以在讲话和写书面材料中，要避免说“支左”如何如何，以免影响地方和军队的关系。

其次，“两案”人犯中有的人在战争年代流过血、立过功，搞了一辈子革命，最后经不起考验犯了罪，对这种人的

处理,也要和那些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犯人有所区别,否则是不公道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漏网的“四人帮”残余分子的“能量”不可低估。养虎遗患,是最危险的事,他们是埋在我们脚下的定时炸弹,非把他们挖出来不可。必须把他们的面目搞清楚,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

最后一班岗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设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我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第一支部书记,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1991年退居第三线,党的关系仍保留在中顾委,当选中顾委第七组组长(即原来的支部书记)至1993年中顾委撤销为止。

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自感责任重大,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在中顾委工作以来的10年中间,我始终坚持要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无论关于现实生活中的,还是属于历史上的,我都认真思考,查阅有关文件,严肃对待。在每次党的会议之前,都认真准备自己的意见,在会议上和同志们热烈讨论,把自己的意见、看法都明确讲出来,从不隐讳,有些意见还亲自写出书面材料。我的发言,中央有记录,中顾委有存案。我自问已经90

多岁了，在党的领导下干了一辈子，有意见就要讲出来，不能带到八宝山去。

现在，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意见必须讲明白。我认为邓小平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是当之无愧的当代领袖。多年来我对邓小平是非常尊重的。纪念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的文章，是我很早就酝酿成熟的思想，早就想写出来的。我认为，既要宣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战略思想，也要宣传邓小平在党的关键时刻，勇于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伟大意义。

粉碎“四人帮”之后，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社会主义事业？成为摆在我们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使人民从迷惘中看清前进的道路。当此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捍卫毛泽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为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他动员全国几千人参加讨论，并亲自多次找起稿人作指示，最后才写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重要历史文献。《决议》统一了党和人民的认识，明确了今后奋斗的目标，增进了团结，鼓舞了人心。事实证明，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继承、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楷模。历史永远不会忘记邓小平亲自领导和精心制定的这一《决议》的伟大历史功勋。早在苏维埃时期，邓小平就曾因在革命战略思想上和毛泽东一致，而受到过教条主义者的攻击。

最后，关于我历史上有一件事需要记上一笔的，就是我历史上坚决反对张国焘反党、分裂中央的全部经过。我曾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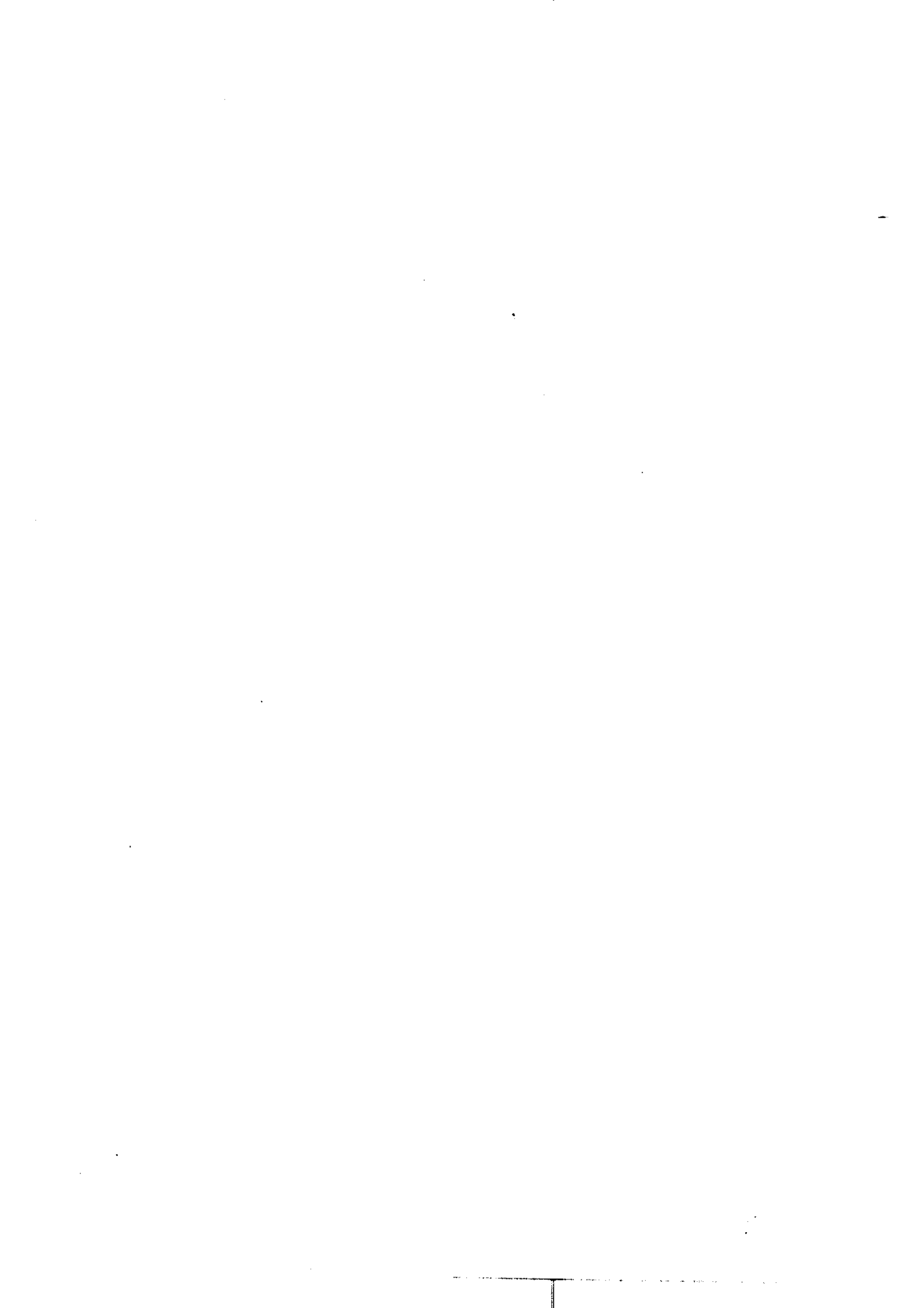
所写的该材料送交中共中央党史部门存案，有档案可查。我是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坚决反对者，也因此受到迫害；是西路军的亲身经历者，曾为此经受无数的折磨、困苦。我对以上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相信终有一天历史会有定论。我始终深刻记得，1940年我从新疆回到延安时，毛泽东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没有反对中央呀！”

10年中间除开上述工作外，我还曾致力于调查研究中国中医药状况。我走访过十个省市，和地方有关负责人以及老中医、老药工都进行了座谈，参观过中药工厂和操作现场，以及中药科研院所和种植中药草的苗圃等等。我曾向中央写过书面调查报告，郑重提出争取抢救国家的宝贵财富，振兴祖国中医药事业的建议。

我一向关心兄弟民族事业，也曾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一些“一得之见”。

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我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心。

文章 · 书信



在职工技术协作 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1982年12月)

辽宁技术协作是工人自发的、得到党和工会支持发展起来的。参加技术协作的工人,都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建设主人翁态度和共产主义风格的人,他们是政治觉悟高、技术有专长的工人阶级代表。

当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沈阳工人吴家柱、吴大午、林海峰几位在一起合计,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来分担国家困难。于是决定串联有技术专长的能工巧匠,把技术送上门,对工厂进行技术改造,支援农业,支援轻工业。吴家柱见到邻居拉锁厂的女工,近来愁眉苦脸,得知该厂产品质量不过关,产品积压,工厂停工。他们马上组织力量,去该厂帮助解决了质量低的问题。以后打听到长途电话总机有个什么零部件坏了,国内不能生产,进口很费事,工作大受影响,他们也给解决了问题。省、市总工会及时支持推广这一重要创举。王崇伦带头在鞍山搞起来,卢盛和、韩秀芬在大连、丹东也搞起来了,全省都动了起来。沈阳有名的劳动模范,如陈富文、金福长、张成哲、吕德顺、尉凤英、王凤恩等都是创始的骨干分子。科技界的工程师、教授也来参加,形成了万人

协作大军。先是送技术上门,以后都找上门来了。彭真去沈阳时专门接见他们,并给予重要指示和热情鼓励。记得在吃饭时,问到金福长未入党,彭真立刻同意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这个介绍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条件够大了。宋任穷当时是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经常关心询问协作委员会的工作,吴家柱逝世,他亲自去参加遗体告别。党中央对技术协作工作,政治上是很重视的。他们行动中支援工厂改进技术,不接受奖金,到农村支援生产队修理农业机械,自买车票,自带饭盒,不接受招待。农民说这真是工人老大哥,帮我们修好机器,连口饭也不吃,实在过意不去。他们对技术交流,培养后代,也很积极。沈阳工人文化宫变成分工种按时上课的大课堂,全省工人学技术的热潮高涨起来了。技术协作不仅对提高技术,发展生产,起着重大作用,他们行动也是很好的政治教育、共产主义教育。

现在在全国总工会领导下,成立全国协作组织,这是大好事。王崇伦副主席就是当时辽宁技术协作的发起人,金质夫是省工会主席,他们二位参加领导这一工作,我表示拥护。祝全国工人技术协作委员会,在党的十二大的宏伟建设纲领指导、鼓舞下,取得丰硕成果。

(本文是致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成立会的书面讲话)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1983年6月7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彭真副委员长的开幕词，完全同意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现在，我就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以来检察机关的工作情况，向大会作一简要报告，请予审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的5年间，是检察机关重新建立和各项检察工作逐步开展的时期。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实现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我国检察机关就是在十年内乱中被砸烂，组织撤销，人员调离，工作停顿10年之后，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于1978年5月开始重建的。5年来，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关怀和领导下，在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下，各级人民检察院一边建设，一边工作，陆续调进了干部，充实了机构，开展了工作。广大检察干部、司法民

警在贯彻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特别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通过学习法律,执行法律,提高了业务能力,增强了依法办案的信心,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现在全国县以上都成立了人民检察院,已经有了一支 11.6 万余名干部、司法民警的检察队伍,基本上担负起了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检察机关的工作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5 年来,各级人民检察院是遵循下列原则进行工作的。

一、从政治经济形势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宪法、法律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各级人民检察院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基本任务,紧密结合政治经济形势,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宪法、法律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积极开展检察工作。从 1979 年 7 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七个重要法律后,各级人民检察院即积极进行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准备工作,包括开展法制宣传,参与清理积案,复查平反冤假错案,进行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试点等。刑法、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后,各级人民检察院即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检察权,及时打击各种犯罪活动。1979 年冬以来,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城市治安会议的精神,把整顿社会治安作为一项中心任务,密切配合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和其他犯罪活动。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打击少数,争取、分化、改造多数的方针,对于极少数杀人

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放火犯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对于一般犯罪分子，则根据犯罪的不同情节和后果，有区别地依法作适当处理。1979至1982年，全国检察机关平均每年批准逮捕的各类刑事案犯为19.7万余人，决定起诉的（包括部分未经逮捕而直接起诉的）案犯为19.7万余人，免于起诉的为1.4万余人，不起诉的为3000余人。从而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气焰，促进了有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的转变、改造。与此同时，各级人民检察院还积极执行党中央有关全党动手，实行综合治理，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指示。通过办案，协助有关单位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堵塞漏洞；对不逮捕、不起诉和免于起诉的人员，协助有关单位落实帮教措施，定期进行考察；进行法制宣传教育；调查研究社会犯罪原因和预防犯罪措施等。几年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社会治安有了明显的好转。

1980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特别检察厅，审理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罪行，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提起公诉，并出庭支持公诉。对江青等罪犯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使他们受到了国家法律的惩处，伸张了正义，平息了民愤；教育了群众，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各地人民检察院还分别审理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各地的其他罪犯的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使他们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实现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发出后,各级人民检察院组织所属干部、司法民警认真学习贯彻上述指示和决定,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协同有关单位查处了大量经济犯罪案件,打击了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5年来的实践表明,检察机关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宪法、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办事,就使检察工作能够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更好地保卫和促进四化建设,各项检察业务也得以顺利开展。

二、严格执行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责,努力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作用。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实施法律监督,不是对所有法律的执行情况都进行监督,而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在一定范围内行使检察权。5年来,各级人民检察院严格遵守这个规定,坚持了对于违反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行使检察权。对于违反党纪、政纪和不触犯刑律的一般违法行为,则由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政府机关处理。

宪法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各级人民检察院切实担负起了审查决定是否逮捕、审查决定是否起诉和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工作,并逐步开展了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以及监

狱、看守所、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的工作。这主要是通过办案,在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工作中,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如有违法行为,即提出纠正;对人民法院的错判或量刑有畸轻畸重情况时,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促请人民法院加以改正;加强监所检察工作,协助主管部门改进监狱、看守所和劳改、劳教场所的管理工作,提高改造质量,减少重新犯罪。1982年,全国检察机关审结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人犯中,批准逮捕的占89.4%,不批准逮捕的占10.6%。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人犯,经检察机关审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占审结数的91%,免于起诉的占7.8%,不起诉的占1.2%。各级人民检察院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已很普遍,出庭率已达99.2%。各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经人民法院审结,改判的占审结的抗诉案件的59%,裁定重新审判的占7.1%。这样,就彻底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我国法制不健全的漏洞,大搞法西斯专政,想抓谁就抓谁,想给谁定什么罪就给谁定什么罪的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使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得到了法律的保护。由于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各政法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办案质量有很大提高,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来发生的冤案错案很少。对于促进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进行四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坚持按照法律规定,积极办理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违

法犯罪案件。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贪污罪、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检察机关重建开始,即已重视这项工作,积极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几年来,各级人民检察院积极办理了一批经济案件。特别是1982年,各级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指示和决定,把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作为一项重大任务,集中力量,加强领导,协同有关部门抓紧查办大案要案。这一年办理的经济案件,是检察机关重建以来最多的一年。这一年中,各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贪污案、行贿受贿案、盗伐滥伐森林案和走私贩私、投机诈骗案等经济案件共3.3万余件,已办结3.1万余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7万余件,法院已审结并作有罪判决的1.1万余件,占审结数的99%。有力地打击了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检察院还立案侦查了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报复陷害、诬告陷害、破坏选举、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等各类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案件共1.4万余件,已办结1.2万余件,依法逮捕了违法犯罪分子,保护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此外,各级人民检察院还受理、接待了大量的人民来信来访,对分工

由检察机关管辖的控告、申诉案件进行了调查处理,维护了法制,伸张了正义,密切了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

四、不断加强检察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

各级人民检察院自重建时起,就坚持边建边干,以干促建的原则,注意加强检察队伍的建设。组织检察干部、司法民警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联系实际,分清是非,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消除余悸,树立敢于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努力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斗争。并抓了各级领导班子思想、作风、组织的整顿,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对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问题,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初步清理。培养和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充实到领导岗位,使各级领导班子得到了加强。对极少数干部、司法民警的违法乱纪行为也进行了严肃处理,进一步纯洁了队伍。同时,各级人民检察院还积极主动,因陋就简,采取多种形式,分期分批地轮训干部。通过整顿和训练,干部的思想、政策和业务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为开展各项检察业务,完成各项任务,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组织保证。几年来,广大检察干部、司法民警在条件差、困难多的情况下,艰苦奋斗,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并且涌现出了一大批立场坚定、刚正不阿、秉公执法的先进人物。有些同志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光荣牺牲,以身殉职。

五、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各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在工作中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各级人民检察院都设立检察委员会,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实践表明,这与过去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检察委员会在检察长领导下,处理有关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比较,更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防止个人主观片面决定问题,对于提高办案质量,防止冤假错案,是十分必要的。

总之,5年来,各级人民检察院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下,严格依照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宪法、法律办事,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国家和人民的权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发展的斗争中,发挥了法律监督机关的作用。但是,我们的工作同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各项检察业务工作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全面展开,法律监督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仍然需要研究改进,检察机关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还不健全,检察干部队伍的素质业务水平还不高,我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还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

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现在,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整个社会一年比一年安定。但是,社会治安还没有根本好转,刑事犯罪问题还比较突出。其中凶杀、抢劫、强奸、盗窃等恶性案件还时常发生,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国家的信誉。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新形势下,社会治安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问题。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的颁布施行,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政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个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检察工作要继续前进,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革,使之适应变化了的新的情况。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坚决贯彻执行宪法,把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各项重要规定真正落实到检察工作中去,维护宪法的尊严,保证宪法的实施。要根据宪法的规定,一方面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在工作中,把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改造犯罪分子,作为主要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认识专政与民主的关系,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问题,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使检察机关的全部工作都纳入法制轨道。检察工作人员都要明确树立法制观点、群众观点、民主观点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在工作中坚持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

原则,秉公执法,不谋私利,不搞特权,做执行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二大和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继续参加整顿城乡社会治安,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分子,积极开展各项检察业务,履行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在整顿社会治安中,要正确地按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办事,认真贯彻综合治理的方针,把惩治犯罪和改造罪犯、预防犯罪结合起来,克服孤立办案的思想和做法。要继续坚决打击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同时要结合检察业务,做好法制宣传、思想疏导和教育挽救失足者等工作。还要加强调查研究,经常分析社会治安动态和犯罪原因,提出防止犯罪的措施和建议。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积极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对于那些玩忽职守,给国家财力物力造成重大损失,给工作造成重大贻误的;对于无视国家法纪,肆意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参与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动的;对于纵容、包庇自己的子女、亲友、下属的犯罪活动的,都要依法追究。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进一步加强和改革检察工作。要从指导思想、业务工作、机构设置、规章制度、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等各个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破旧创新。改革要从实际出发,对适合今天情况的好的传统和一些行之有效的经

验,要继续坚持和发展;对工作中的一些薄弱环节,要努力加强;对一些不适应新情况的老办法,必须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清除“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打破老框框,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检察工作能适应新的情况。在改革中,要继续加强检察队伍建设,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和纯洁队伍,切实抓好干部轮训和在职学习,提高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尽快实现检察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进一步开展各项检察业务,全面发挥对敌专政和保护人民这两个方面的职能,开创检察工作的新局面,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在全国中药普查座谈会上的讲话

(1985年8月9日)

我没有担任过中医中药的有关领导职务,但是我对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是有兴趣的、关心的。今天参加中药资源普查会,发表点个人意见和见解,作为大家的参考资料。

第一,中药工作是很重要的。一般说来,中药工作是中医的一个后勤部,是一个武器库。没有武器不能打仗,没有中药材,中医难为无米之炊,不能治病。反之,没有中医,中药也无处使用,中成药也无从生产。中医、中药互相依存,由来已久,谁也离不开谁。医生是按病情辩证施治,由于当前缺药现象严重(包括品种和质量),医生不得不按药情处方,就必然影响疗效。中药材工作应该在品种、数量、质量上,保证中医治疗。当然,药品条件具备了,治得好治不好病,那就要看医生技术是否高明了。

第二,这次普查是为了摸清中药产供销情况,看看中药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摸清家底,作到心中有数,目的在于解决问题。过去说全国大约缺一百二三十种药,现在的变化不清楚。当前的问题是要查清这些紧缺药品的资源情况,查清问题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查清而查清。有些情况已经清楚的,就要着手解决,摸清一个解决一个,不能等待全部摸清再处理。要把普查和解决紧缺药材品种,发展药材

生产结合起来。哪些药材需要大力发展生产,经过普查后,要搞好规划,加强科研,更好地为中医服务,为防病治病服务。普查的意义就在这里。

第三,在如何解决药品严重缺味问题上,两年来我经过了解一些情况后,有点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我认为,对于一些随地皆是的及不成宗的零星品种,公司不便经营的,可由药店、药房自采自销,议价成交。如长沙的芦根、南京的荷叶、北京的双叶,以及其他如车前草、丝瓜瓢、蝉蜕、龙衣、龟板、鳖甲之类,都是药材公司不便经营的。

其次,属于成宗的地道药材,可以根据全国历来销售量(包括外销),用签订合同的办法把产销衔接好。各地药材公司尽量和药农签订合同,规定数量、品种、规格、价格和交货日期。签订合同的好处是让大家心里踏实,心中有数,减少供求矛盾,也避免药材生产盲目性。如报纸上刊登的,五台山种党参,计划只有三四千斤,结果种了7万斤。甘肃的当归也种多了,卖不出去,药农吃了亏。如果采取订合同的办法,可以根据合同要求制定生产计划,产地和销地都订合同,把供应渠道固定下来。另外,还有个价格问题,必须保证药农的收入高于一般农民的收入,但价格要合理,低了药农不干,太高了,吃药的人吃不起。

第四,要搞好中药工作,必须要有关部门同心协力,共同努力保护和发展药源,加强科研。农、林、渔、牧的关系最大,要有专人负责。我曾到过几个地方看看,这些部门还是比较注意这个工作的。1965年我在丹东疗养,省农业所有

位孙处长陪我参观在山林里培养细辛、五味子。又如南京、昆明、南宁、成都等都有专门的植物研究所(药用)或中药科研院所等,对于识别药味起了很大作用,南京还有新的发现。刚才农牧渔业部和卫生部的领导也都讲了这方面的问题,是很好的。农业、林业部门要为药材生产和药源保护多做些工作,卫生药材部门要为合理用药多做些工作。当然,药材部门要在保证供应和提供药材信息上多做工作。关于加强科研,我认为有很多文章可作,关于炮制机械化,剂型改变,药的性能分析等。解放后,在人工养鹿方面,近年在人工培养牛黄、天麻、麝香等方面都已摸索出一些经验。

现在一些普通药材近处已经采绝,如虫草、贝母、甘柴胡、银胡、桔梗、射干、茅根和夏枯草之类,已逐渐要上高山、远山采掘。也有一个地带采完,转而集中到其他地带采掘的。这类药材,是否可搞种子基地,划地片包干种植,搞林药兼作,野生繁殖。

第五,坚决贯彻中央领导关于卫生工作指示的精神:“卫生部是全国人民的福利部,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老、病、死都要管好。要把为人民健康服务作为卫生工作的根本宗旨。我们不是靠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来积累资金,而是要求这些部门把国家分配的经费利用好。首先要考虑社会效益,同时也要考虑经济效益”。不是唯利是图,只在搞钱上做文章,成立了名目繁多的什么天麻公司、黄连公司、枸杞公司,赚钱的事抢着干,甚至于锯树剥皮,“一锤子买卖”,只顾眼前,不管将来。杜仲是大小一齐破,天麻、金银

花高价抢购。

在片剂与成药比例上,本来规定是先片剂后成药,执行起来却是相反,成药比例大于片剂,因为成药者赚钱多。在内销和外销上,本来应是先内销(包括港、澳、台湾)后外销,但执行起来却是外销挤内销,因为外销财大气粗。后外销这句话最好改成照顾外销。

中医中药中央历来是重视的,但现在存在不少问题,应引起全党全国人民注意。农业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要从重要性来说,药应当提到前面为好。

第六,老药工的定职定薪问题。我这几年跑了不少省市,都发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几十年的老药工,在鉴别药味、加工炮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所受待遇不相称。我在江西看到一些老药工,头发都熬白了,当了四五十年老药工,今天这个“药工”才五六十元一个月。其中有一个相当有水平的老药工,也是这些钱,他的小子、姑娘都不愿继承父业,认为没有前途。我认为老药工也应当算是知识分子,是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知识分子,老药工应当作为知识分子来对待,享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老药工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青年药工的成长,后继乏人,会影响中药事业的发展 and 中药质量的提高。

这次会议很有必要。要把中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都摆出来,并提出解决办法,不要只搞一些死的统计数字。有关部门共同努力,把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善始善终地进行到底。

祝会议成功!

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

(1986年7月26日)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距现在已经44年了。它是在全党范围内,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党的建设上的伟大创举。这次整风运动使干部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团结。这一点,当时参加学习的干部普遍地感到收获很大,至今不忘。

—

在整风运动之前,全党有80万党员,其中90%是抗日战争以来的新党员。这些同志朝气蓬勃,革命热情很高,积极要求参加抗日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我们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在他们心目中,党中央有崇高的威信。但是,在他们当中不少人不自觉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

* 本文是应邀与王从吾、宋时轮、郭述申合写。

产阶级意识,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思想表现相当突出。在广大党员干部当中,很多人受过教条主义的蒙蔽和影响。遵义会议虽已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在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思想尚未为全党普遍所接受;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左”倾和右倾路线还没有受到批判和肃清。在党的负责干部中,许多同志经历过党的发展和挫折,看见过党内发生的许多严重事件,脑子里装着许多问题,需要正确的答案。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处在被敌人严重分割的农村,对敌斗争空前残酷;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严重,工作极其困难,一些同志对革命全局了解较差,对革命胜利的前途心中无底。因此,迫切需要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把全党思想统一起来,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成熟、更加巩固的党,以领导全国人民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当时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利用这个时机,有计划地集中党政军群各级的一些领导骨干,进行整风学习,是完全可能的,完全正确的。

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开展以前,经过了一个充分的准备时期。在这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重要著作,同时中央其他领导也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自1941年起,党中央接着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决定、改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决定以及高级学习组决定。特别是毛泽东在1941年

5月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整风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提高了全党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批判了教条主义也批判了经验主义，并通过“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自然而然地消灭了“山头”，从而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团结全党的目的。

延安整风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飞跃发展和更加成熟起来。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的历史时期。正如邓小平所说：“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邓小平文选》256页）经过整风，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思想，中央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一切都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二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也可以说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一个缩影。中央党校集中了党内各个历史时期的

干部,各方面军的干部,各根据地和白区地下党的干部,还集中了除在延安工作的以外的全部“七大”代表。这样也就集中了党内各方面迫切需要解决和弄清的问题。因此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整风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对全党整风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全党工作的开展有巨大的影响。

中央党校于1942年2月1日开学。毛泽东在开学典礼大会上做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规定了整风运动的任务、目的、方法和指导思想,向全党宣布整风运动开始。

为了领导好整风运动,中央党校进行了改组。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停止党校过去所定的课程,军事学院的高级班合并到中央党校,延安各机关、各学校的高级干部(包括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以300至400人为限,参加党校学习。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彭真任副校长,负责领导党校整风学习。1942年3月11日,中央又做出《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从组织上保证了党校整风学习的正常进行。

党校开始时只有一部。一部的学员是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和少数地委以下的“七大”代表。部主任原为黄火青,黄火青改任秘书长后由古大存继任,副主任为刘芝明。原党校学员中,“七大”代表以外的县、团级干部编为二部。部主任为张鼎丞,副主任为孙志远、安子文。1943年5月4日,中央决定,中央研究院合并到中央党校,成为党校三部。三部学

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较有名气的文化人和文化工作干部。部主任为郭述申,副主任为张如心、阎达开。由于老干部要学习理论,系统总结经验教训,必需有相适应的文化知识,所以,又将军事学院合并来的学员和党校原有学员中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组成了四部,在整风的同时学习文化。部主任为张启龙、张邦英,副主任为程世才、杨尚奎。1944年初,中央根据西北局的提议,决定将西北局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的五部和六部。五部学员以陕甘宁边区的县、区级干部为主,也有一部分经过长征的团、营级干部。部主任为白栋材,副主任为强晓初、晁哲甫。六部学员是从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县、区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部主任为马国瑞,副主任为谷云亭。全校学员3000余人,加上公务人员共约6000人。

中央党校有意识地吸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特别是吸收那些有能力、有威望和有群众联系的干部参加各支部的领导工作。由于他们多系各个方面主持实际工作的同志,这样就便于汇集各方面的经验和意见,又便于传达上级指示和反映群众的思想动态。否则是很难系统、全面地总结中国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教训的。

三

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过程,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

理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是逐步提高干部理论水平，改造干部思想的过程，目的是统一全党的思想。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而在全党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最终肃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和右倾路线的影响。

党校整风的第一步是精读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中央宣传部于1942年4月3日，作出决定，要求对中央规定的文件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组织讨论。

党校领导对组织学习文件是十分认真的。彭真为《解放日报》代写了社论文章：《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对怎样学习文件作了深刻的阐述。参加学习的同志对阅读文件非常认真，逐字逐句地读，两遍三遍地读，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去读，联系党的历史、革命历史去读，一边阅读，一边思考，一边讨论，并认真写笔记。个人学习和集体讨论紧密结合进行，经常提出问题，组织漫谈会、讨论会。漫谈会不拘形式、不限人数、不定内容、不拟题目，少者三五人，多者十余人，在河边、在树下、在山坡上，随处可以进行，参加者可以随来随走。讨论会有小组的，有支部的，也有几个支部合在一起开的。遇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还组织一个部，甚至更大范围的讨论会。对讨论中的重要问题，请中央负责同志做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弼时、林伯渠等都到党校做过报告。为了促进大家认真学习文件，还规定

领导人要查看下面同志的笔记,帮助批改笔记,互相借看笔记,传看笔记,《解放日报》还选登一些好的笔记。毛泽东亲自看过一些同志的学习笔记,改正了某些错字,并加了按语。在学习文件告一段落后,进行了考试。这次考试,也与普通考试不同,不考文句的记诵,而是考对它的领会与运用。考试的题目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如试题之一:“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或预防?”这场考试自1942年6月24日起,共进行了10天。

第二步是联系实际,进行检查。首先是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有一个阶段主要是根据季米特洛夫提出的干部四条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来检查自己。陈云在一次报告中,提出“干部四条标准,不仅是党组织考查干部的标准,同时也是每个干部努力的标准。”在检查中大家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肯定正确的方面,批判不正确的方面,分析错误的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每个同志写出思想总结,经过互相批评,互相帮助,反复进行修改。

从个人思想、工作、历史的检查,进一步发展到对于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的工作检查。为了检查一个地区的工作,还召开“山头会议”,由所在地区的领导同志亲自召集,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包括给领导同志提意见。通过这样的检查,

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经验教训。

第三步，由地区和部门的检查，又发展为学习党的路线。1943年秋，中央决定从10月10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转入重新学习党的历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中央党校的这段学习进行了将近一年。学习文件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这两本文献。大家对中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阶级关系，以及对中间阶级、中间派别的政策，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等，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讨论；对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问题，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政策的得失等，经过充分讨论，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在学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件时，着重讨论了对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估价问题，当时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争论很热烈。为此，周恩来到党校做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帮助大家统一了认识。

在学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文件时，主要清算了王明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和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错误。同志们用大量事实来揭露王明在各个方面的错误和他践踏党的组织原则给党造成的严重危害，并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批判。抗日战争几年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完全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毛泽东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坚

持有理有利有节,以及广泛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开明士绅等一整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

关于党的路线问题的学习,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和彭真在党校的讲话中,都作了正确的结论。接着又学习了六届七中全会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这次学习之前,参加党校学习的同志,虽然有一些同志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但他们对党内的路线斗争,不都是那么清楚的。经过这次系统学习,才弄清楚了党内的路线问题,知道了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加深了对正确路线的理解,统一了对党史上路线斗争中的是非功过的认识,坚定了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的信心。

四

整风运动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树立和发扬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学习方法上是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废除静止地、孤立地、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这是党的历史上思想改造和学习方法改造的根本转变。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亲笔写了“实事求是”四

个大字，镌刻在延安中央党校的礼堂上，要大家牢牢记住：能引导中国革命到胜利，在工作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依靠的就是实事求是。

过去，不少同志由于长期不同程度地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学习和工作中一个基本的缺点就是：主观与客观分离，理论与实际脱节，学与用脱节。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学了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精神实质，以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革命实践。许多同志，一方面大量地记诵马列主义的辞句，而另一方面，旧的思想意识，不科学的态度，仍然照样保留着，因而学习得不到实际成效，言行不能一致，工作没有显著改进。

中央规定的党校的学习文件，是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的马列主义的主要经典著作和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文件。这些文件既是多年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又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学习中不是死记文件的辞句，而是强调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大家认真读文件，又认真用文件的精神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用当时形象的说法就是：“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来钻自己。”“把文件中的道理当做尺码来量一量自己，当做天平来称一称自己，当做镜子来照一照自己。”这种学习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停留在文件辞句的钻研上，而是从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批判王明的“左”倾和右倾的错误中来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并运用学习到的理论来分析现实生活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成功和

失败的经验教训。大家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中，深刻地认识到由于教条主义者的主观主义决策，不调查不研究，主观臆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给整个革命事业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危害！

经过学习，大家真正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到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意义。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武器，是掌握和执行政策，转变工作作风的基本条件，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系统、周密地观察事物的全面，而不能看片面；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是看表面；看问题必须客观，不能主观。如果不能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就不能真正了解事物发展的全局，也就不能正确地掌握和执行政策。

大家认识到要真正扫除主观主义，还必须反对粗枝大叶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因为这种不精细、不周密、不认真的粗枝大叶作风也给我们的革命工作造成过巨大的损害。在学习当中还坚决反对了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坏作风，并演出苏联话剧《前线》，批判了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记者“客里空”的作风，许多同志都说，这次受到的实事求是的教育，是一生中永难忘记的。

五

党校整风运动在组织领导方面的特点是，既实行集中指导下的广泛的民主，又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

中；并在民主集中的指导下，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风运动是一种自觉的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改造的基本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经验证明：只要上面的领导不充分发挥民主，不启发下面的积极性，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能真正开展起来。不能真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敢把真心话尽情吐出来，不敢面对事实和揭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谈不到有的放矢地学习理论，也谈不到帮助有缺点的同志提高自己和教育别人。另一方面，只有下面的积极性，没有坚强正确的领导，又会使批评和自我批评偏离正确的方向。所以，集中领导和发扬民主，二者不可偏废。做到了这点，大家就能消除顾虑，畅所欲言。当时，不管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允许对过去的结论作新的估价，真正体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

党校在整风运动中，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是多样的：既有思想自传、历史自传、反省笔记、读书笔记，又有小组会、支部会、小漫谈会、大漫谈会、个别谈话与全校大会，还有墙报、学习报与学习通讯等。党校二部曾开过一个多月的全部民主大会。会上大家自由报名发言，愿讲什么就讲什么，发言内容十分广泛，有关个人思想、工作、历史方面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工作方面的，以及党的历史方面的问题和看法都讲了。许多负责干部，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都受到了指名的批评。真是把多年没有讲的心里话都讲了出来。话讲出来以后，再发动和依靠大家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面对面地摆事实，讲道理，用和风细

雨，耐心细致，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解决了问题，消除了同志间过去积累下来的隔阂。

对于错误的意见，一方面要容许充分发表，一方面要进行适当的批评和帮助。在学习期间不容许不同的意见，即使是错误意见发表，就会是死水一潭，毫无生气。但对错误的言论，特别是某些原则性错误的言论，不经过认真的辩论，不去作有力的反驳，放任自流，是不负责任的。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对那些以功臣自居，高人一等，骄傲自满，对抗组织，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不帮助其认识改正，对党对本人都是有害的。批评和帮助的时机，过早了不好，这样大家的意见就不容易充分发表出来，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也得不到锻炼的机会；过迟了也不行，这会使党内思想陷于混乱。

党校的集中领导是坚强的。首先是各级领导都同心协力地贯彻执行“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经常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不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地忽视错误或固执己见。第二，特别重要的是，党校整风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校领导乃至支部领导是随时如实地、不折不扣地向中央反映运动中发生的情况和问题，因而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错误能及时得到纠正。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多半是在上级和下级反复商议考虑后形成和进行的。中央领导十分注意及时了解、研究整风运动进行的情况，这对党校各级领导起了带头和启发作

用。这种以身作则的作风教育,使大家受益很大,影响是深远的。第三,党校的整风领导是以大批久经考验的支部领导骨干为基础的。这是当时党校在整风和学习党的路线过程中以及在整风学习阶段以后的审干过程中能够始终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决定性条件。对当时审干中发生的问题,党校领导以严肃的态度及时加以解决,给干部的教育是深刻的。第四,党校在整风运动时期,没有设班主任和辅导员,基层是由支部领导的。许多领导干部,如罗瑞卿、薄一波、陈赓、陈锡联、王从吾、宋时轮、陈奇涵、阎红彦、张平化、钱瑛、赵林、裴梦飞、贺晋年、向仲华、舒同、余光汉、柳运光、于致远、郭子化等都在党校一部任过支部书记或支部委员。党校领导和学员共同学习、互教互学,相互面谈,互相讨论,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善于从众多的意见中,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集体讨论,加以提高,再拿到下面去,引导支部的讨论健康发展。第五,党校在整风和学习党的两条路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自我批评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作风,形成了在高度民主基础上达到言行一致的集中的风气。这是当时行之有效的,大家亲身感觉得到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在整风学习和工作过程中能够随时改正错误,取得成绩的关键。

六

党校在整风运动中，坚决贯彻了毛泽东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最后，真正做到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这一方针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全党，既反对教条主义者统治时期那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反对像庸俗的自由主义者那样的模糊是非，一团“和气”。这个方针的目的是救人，但救人必须治病，病不治则人不能救。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治病不是治人；二是有病一定要治，不能讳疾忌医。实现这个方针的办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教育，同志式的帮助，而不是打击。党校各级领导，包括支部领导，把启发大家自觉地解决思想问题作为整风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强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自觉，而且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能够自觉地解决思想问题的；压服的办法不但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反而会伤害同志，损害团结。因此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与人为善的，而一切冷嘲热讽，捕风捉影，都是不正确的。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想改正、想进步，即使是微小进步，也应该鼓励和帮助，以争取更大进步。由于大家都是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尽管在会上争论得面红耳赤，而会后仍然是有说有笑，亲如兄弟。

党校认真掌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批判从严是

为了维护党的原则，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教育，不能例外。在组织处理上则应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区别对待，从宽处理。对犯错误的人，不能放弃原则，回避矛盾，“和平共处”，维持形式上的团结，也不能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

党校领导经常不断地通过各种会议，个别谈话，互相交心等，深入细致地了解 and 掌握干部的思想、工作和历史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注意掌握是非的标准，注意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分清它是路线错误还是一般错误；是原则性的错误还是非原则性的错误；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还是组织纪律上的错误；是一贯的，还是偶然的；是全部错了，还是某些方面的部分错了。并且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再犯错误，而不是单纯地追究责任。因而，对于每一个干部尽可能做出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这种做法，不仅使党更加清楚地了解干部的全面情况，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同志们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加强了党的团结。

党校的学习是十分紧张的，学校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也是组织得很好的。党校校务部在牟泽銜、吕其恩、傅振声，伍能光等的领导下，自己动手，养猪、种菜、纺线、烧炭和开作坊，克服了困难，保证了学员的生活需要；保证了整风学习的顺利进行。

* * *

我们四人，是当时党校的工作人员和学员，经过这次整

风运动,和大家一样收获很大,并学习和掌握了一套优良作风。所以在七大召开和整风结束以后,大家能够精神焕发,满怀信心地走上各自的战斗岗位,迎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新局面,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

延安整风3年的经历在我们的一生中是永远铭记不忘的,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光荣而宝贵的传统。这种优良作风将永放光辉,而且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保证我们在四化建设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致辽宁工人技术协作 委员会的信

辽宁省总工会并转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

辽宁工人技术协作，是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工人自发地创办起来的。它集中了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们的智慧，解决经济建设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开办业务训练班，向青年们传授各种技术专长。他们不顾辛劳，不取报酬，送技术上门，表现了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的高尚风格，热爱社会主义建设的忘我精神，博得社会广泛的赞誉。

在党和工会的支持关怀下，全省很快形成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当兹技协成立 25 周年之际，谨致以热烈祝贺！希望为实现“七五”计划，经济改革，高举技协光辉旗帜，发扬光大，胜利前进。

黄火青

1986 年 8 月 27 日

致辽宁省总工会的信

辽宁省总工会：

我对辽宁技协工作，确实关心。她的 25 周年，证明了她的强大生命力。谨写了几句祝词，略表心意，我的书法水平太低，题字难以如命。给彭真的信，我已面交本人，想他会满足你们的要求的。金福长写出经验介绍大作很好。动员其他同志也写一些，如“钓鱼迷”吕德顺的电焊，陈富文的翻砂，李贵的切割，韩秀芬和邓玉芝等舍己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都可编印成技协图书，教育后代。当前世界科技，瞬息万变，技协工作，不仅应付于日常实用范围，应向着世界先进行列进军。动员大家学习研究制造新技术，改革旧设备，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不怕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此路不通，另找他途，齐心协力，奋勇向前，绝不灰心丧气，100 个项目中有几项成功了，就是胜利，技协将永放光芒。

敬 礼！

黄火青

1986 年 9 月 5 日

读后心得

(1987年8月6日)

我把《邓小平文选》全部读完。每篇先粗读一遍，用红笔将要点划出。再从要点中理解其精神实质，加上自己的一些感想，作了约4万字的笔记，自己感到很有收获。这些笔记是根据个人的体会，把每篇精辟的部分，摘录下来，并写出个人的理解，发表自己感想。多是有感必发，随读随写，事后也未校对，难免有错误。这些意见或建议，在中央会议上，在中顾委支部会上，在和同志们交谈中，基本上都谈到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现在已过86岁了。这本笔记和近20多年来，所有有文可考的东西，是我思想表现的记载，供党审查参考，也可当作我预先写下的遗嘱吧。

邓小平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主要的参与者，是有贡献的。“文革”中，毛泽东极高地评价并推荐他出来收拾危局，大家十分庆幸。可惜毛泽东未坚持始终，在“四人帮”谰言包围下，又发生了动摇，使邓小平不能发挥作用。但“四人帮”打倒后，又遇到障碍，使他未能及早出来领导工作。经过曲折，在邓小平领导下，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路线纳入正确轨道。《邓小平文选》记载着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是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南。邓小平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在中国革命进行的道路上,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国内国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党和人民的思想水平和组织力量,一步一步地,一件一件地,实事求是地大胆创新,逐步前进。

民主革命胜利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很短的时间,解决了所有制问题,经济生产结构进行了调整,发展使半殖民地的加工装配工业,变为初步的制造业体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具备了。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经验。半封建、半殖民地残余势力,在人们思想里影响不大,小生产者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它会反映在党和人民的思想、行动中。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本身缺乏完全符合其本国国情的经验,我们又把苏联经验搬来,硬套在中国特殊情况的实际上。就当时接受苏联 156 项援建的情况来说也只得如此办理,虽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但急于求成的思想作祟,中央集权过多,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因而走了弯路。必须指出:帝国主义当时对我实行封锁政策,也给我造成建设的困难。

中国革命整个进程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是毛泽东思想忠实的继承人。是他提出从实际出发,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他是全党全国人民拥戴的革命舵手,沿着他指引的方向前进,我们党才有希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学习《邓小平文选》,应是全体党员的必修课。

从严治党 端正党风

(1987年10月27日在
中共十三大的书面发言)

我们这次党的代表大会为举世所瞩目。因为我们的党正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新的伟大的斗争。当着我们考虑实现四个现代化时,当着我们考虑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时,必须密切想着我们的党,把建设我们党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密切结合在一起。

我们的党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66年艰苦而光辉的历程。铁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党是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党的领导是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作为领导中国人民事业的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本身党风究竟怎么样?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熟虑的问题。正如陈云多次指出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严重注意,严肃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采取拨乱反正、制定《准则》、修改党章、进行全面整党等一系列措施,使党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并且认真查处了一批党员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严重官僚主义失职的案件,在不同程度上刹住了

某些歪风，党风确实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转。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解决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经常工作。不可能靠一段时间的整顿解决所有的问题，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出来。”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党风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和阴暗面。据我接触的地方一些同志所反映的问题看，当前广大干部、群众对我们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反应比较强烈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少数党员干部以权谋私。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说：“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我们党正在领导改革开放，也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但是，至今确有一些党员经不起考验。有的心怀私念，见利忘义，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钻改革开放的空子，不择手段地损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谋取自己和家属、子女、亲朋、小团体的私利。有的甚至无视党和国家的纪律，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在外事工作中丧失国格人格，或执法犯法，违法乱纪。在人事干部问题上，有的则玩弄权术，搞厚亲薄疏，任人唯亲。对气味相投的人则互相吹捧，互相保护，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对上级领导则投其所好，进行无原则的吹捧奉承，以求得到庇荫。对少数党员干部的这种以权谋私行为，群众反应十分强烈。

二是极少数领导干部滥用职权。共产党人的一切工作都要向人民负责，正确行使职权。但有的同志却唯心武断，肆意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对中

央的决定,合口味的执行,不合则抵制。搞家长式作风,一言堂,以言代法。在领导工作上自以为是,专横武断。对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不经集体讨论,个人任意决定行动或对外发表,标新立异。对干部管理、财政开支、基建项目等大的问题,乱批条子,乱开口子,乱表态,使主管业务部门无法发挥本身的职能作用。在对待群众上,自以为高人一等,盛气凌人,作威作福,听不得不同意见,压制民主,甚至仗势欺压群众。对“文革”中遭到“四人帮”及其爪牙折磨摧残的干部、群众,毫无阶级同情心,而对有些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严重违法罪行,则不觉痛心,反而保护纵容。

三是官僚主义。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党员是人民的公仆,不能做官当老爷。至今仍有一批党员领导干部革命事业心淡薄,没有政治责任感,尸位素餐,不负责任。办事拖拉,互相推诿,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对国家财产不管损失多大,无动于衷。有些人对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不反对,不制止,不斗争,不报告,回避矛盾,当好好先生。

我认为,对以上三种不正之风,决不能轻视。它严重损害着党的肌体和党的形象,削弱党的战斗力。党内外群众常常对这三种不正的风气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这就使得我们党的作风建设的任务更加突出。我们应当十分重视,切实从严治党,彻底端正党风。

我建议,应当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加强党的教育工作,提高党员政治素质,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这些年来,新党员成倍增加,其中多数

没有受到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和组织纪律锻炼,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知之甚少。有些老党员由于放松学习,忘记了党的光荣传统。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党员思想作风严重不纯。经过整党,有的得到纠正,有的并未纠正。为此,各级党的组织都必须认真组织党员学习党章、宪法和准则,联系实际,逐条对照,发现缺点,立即纠正。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更应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带头检查,转变作风,为增强党性、端正党风做出表率。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体系,是揭示客观规律、指导革命行动的锐利武器。必须在党内建立经常性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制度,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增强辨别是非、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从严治党,首先在思想批判从严,以达教育同志,使全党思想认识一致的目的。组织处理是批判教育以后的事,不能不教而诛,对屡教不改的人,组织处理是必要的。

第二,要高度发扬民主,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此,必须克服党内自由主义倾向,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要做到思想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从严批评,当然不是无限上纲,但也不能只讲处理从宽,不讲批评从严,寻找借口,保护错误。尤其是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更不能轻描淡写地批评,讳疾忌医,必须从严批评,严

肃处理,不能草草了事。为了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对党的领导干部的监督,我建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作为党委和广大群众、干部联系的一条渠道。

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广开言路,虚心广泛听取批评意见。应当提倡和创造条件使下级敢于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不能以任何方式诱使下级说假话,以适合自己的意愿。我们提倡严于律己,特别领导干部要敢于承担责任,所有自己同意的事,办错了,不该把责任往下面推。勇于自我解剖,勇于听逆耳之言,不怕有损个人面子,反对看风向说话办事。更不允许在原则问题面前模棱两可,调和折中,屈从形势,放弃真理。

第三,要维护集体领导,树立和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的体现。任何人的聪明才智和经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集体的智慧才是比较充分、比较全面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维护集体领导,坚持群众路线,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强调特殊情况,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不能擅自决定应由集体讨论的重大问题。要坚决制止和纠正一言堂、家长制、个人专断,以及脱离集体领导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偏向。

强调集体领导,并不是否定个人的作用。要提倡个人负责,又不个人解决重大问题。要发挥组织作用,调动各级组织的积极性。在分工所管的工作中,也要注意运用和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领导者要善于运用他们的专长,弥补

他们考虑不周的缺点,给予必要的指示和帮助。不能过分相信自己,或从个人好恶出发,专横武断,任意批准或否决应由各职能部门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决定的事。对于应由职能部门做决定或应经职能部门研究平衡报请主管领导决定的事,主管领导在做出决定之前,都应先交有关职能部门办理或研究提出意见,不能越俎代庖。

第四,要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人民群众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监督者和评判人,是我们了解实际情况、检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来源和依据。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坚持深入下去,多听取群众的呼声和意见,支持群众公开批评时弊,反对官僚主义。比如当前群众最关心的最敏感的问题是物价和供应问题,作为领导者要考虑群众的意见,不要单看有关部门汇报的材料和统计表,更要到群众中去对话,沟通情况,听取意见,增进互相理解。对于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批评,要善于分析,该吸收的吸收,该解释的解释,要择其善者而从之。

作为领导者应当看到,群众的批评和直言诉说,正表示人民对我们的信赖和爱护,表明群众是愿意向上级领导反映问题的。但我们必须虚心听取,给予处理和答复,才能取得信任。当前所以出现有些群众有话只肯向他们所信任的人讲,以及不敢署名写信反映问题和控诉,就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写匿名信虽然有个别的是属于诬告,但多数还是因为怕打击报复。我们一定要认真听取和处理群众

的意见,不要上推下诿,不许置若罔闻,拒之千里之外,更不准利用职权,打击报复。

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无产阶级政党。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切实从严治党,彻底端正党风,就会大大地提高党的战斗力,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使我们的党更加光荣、伟大、正确!

给辽宁省总工会领导 和其他同志的信

(摘要)

主席并转张成哲、吴大有等技协同志：

看到《人民日报》1月1日第二版正中登载辽宁工人开展技术协作和生活互助的消息，前此中央电视台在《问题与思考》栏里播放了邓玉芝等开创的生活互助镜头，特向你们祝贺工作取得的新发展和新胜利。

辽宁工人技术协作和生活互助，都是工人阶级高度觉悟的自发运动。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她和学雷锋运动是孪生兄妹，将永远昌盛不衰。贵在于他们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当着三年困难时，你们到处寻找能为国家担忧分愁的机会。我记得抚顺市李石寨朝鲜族农村变压器坏了，抽不上水，影响插秧。该市电业局老师傅带着工具和饭盒，骑着车去帮助修理，修完后不辞而去。而生产队已准备招待一番，结果找不到人了。这位老雷锋贵姓大名，至今不为人知。同样，某生产队也是抽水机坏了，王凤恩去为他们修好，分文不取，来回车票还是自己出钱买的。前此报载某厂引进技术出问题，不能运行，经过努力才解决。我当时想技协应起作用。要是技协的作用，报道时为什么不把技协的牌子亮出来？技协集中各家专长绝招，解决生产

中发生的问题,做了伟大工作,同时在工会组织下利用工人俱乐部办起各种技术训练班,培养青年工人,老师傅们传授经验。上课全是义务,不取分文。想想旧社会工人怕失业,绝招是不肯轻易传人的。技协不仅能解决各方生产中的困难,打破外人的封锁,而且是优良传统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学校。

技术协作、生活互助运动开展近30年了,建议你们趁这批创始人还健在,将技协成立以来的经验总结记载下来,留给后人。春节快到了,祝你们节日愉快!

黄火青

1990年1月18日

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革命立场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党内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

(1991年2月28日)

我们党走过了70年历程。她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如今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大为增强,国家进步了,党成熟了。

但是,在胜利面前,我们不能高枕无忧。从国际环境和我们党的建设状况看,我们要居安思危,兢兢业业地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下去,时刻警惕和平演变的侵袭。

要建好党,首先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革命立场,要牢牢记住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在70年的历程中,党有过失误和缺点错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还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共产主义运动也不会一帆风顺,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要特别重视对年轻的党员进行革命历史教育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的革命胜利是浴血奋战取得的,

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摸索到这条路很不容易，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我们就能取得胜利。如果看不到社会主义政权和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一旦政权丧失，一切都会丧失。剥削阶级就会卷土重来。因此，如果有人认为政权可以拱手出让，那就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我们一定要让年轻的党员知道中国人民选择四项基本原则，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我们还应该让年轻的同志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笔谈专栏里的文章，写得很好，我都仔细看了。今后党报党刊要多登这一类的好文章，最好多登一些通俗易懂的理论文章，让年轻的同志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增强识别敌我的能力，坚定革命立场，坚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斗争，和社会上的坏风气、坏习惯作斗争。

读报载《“刀具大王”的辛酸泪》

一文后致总工会主席信

倪志福同志：

看了《报刊文摘》5月28日登载的《“刀具大王”的辛酸泪》一文，颇有感触。金福长是沈阳重型机器厂的退休老职工、共产党员，人称“刀具大王”，你可能也认识他。他文化水平不高，却能用惊人的毅力克服困难，把他多年积累的刀具经验写出来，只为的是教育青年一代，这种精神是难得的。可是拿到出版社出版，要他交4万元押金。天啊！他并不是为挣版权收入而写书的，一个工人怎能拿得出几万元资金！这当然也不能怪出版社，它本身有它自己的规章制度。在我认识的劳模中，天津还有个魏振华。他把自己多年的油脂方面经验，也写了一本书。这些书如果不能出版，实在太可惜了。在旧社会为了保护自己的饭碗，老师傅们的绝活，是绝不肯轻易传人的。现在送货上门，却找不到销路。我大胆建议，总工会可将老师傅们成熟的工艺，编印为丛书，以教育青年，并鼓励老工人们总结和传授经验的积极性。请你考虑。

黄火青

1991年6月7日

重读彭真的两篇文章

(1991年6月14日)

最近出版的《彭真文选》中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一篇是《思想方法问题》。头一篇是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时，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代社论。第二篇是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展思想大辩论后所作的总结性讲话。当时，毛泽东是中央党校的校长，彭真担任副校长。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也可以说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一个缩影，对全党的整风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彭真的文章和讲话，是对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的精辟概括，对当时如何学习，如何解决党内的争论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指导原则。现在看来，对当前干部、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仍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之前，党内的思想状况是比较复杂的。当时，全党有80万党员，其中90%是抗日战争以后的新党员。这些同志革命热情很高，积极要求参加抗日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少人也不自觉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思想表现相当突出。在广大党员干部当中，很多人曾受过

教条主义的蒙蔽和影响，“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肃清。党内对思想建党普遍注意不够，党的建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偏重于组织方面，强调组织原则，有唯成分论的倾向。做思想工作一般是“我说你服”，“我打你通”。对说而不服、打而不通者，往往施以惩办和打击，形成口服心不服，表面拥护，心里不明白。这种办法实际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在党的负责干部中，许多同志经历过党的发展，也经历过党的挫折，看见过党内发生的许多严重事件，脑子里装着许多问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需要正确的答案。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处在被敌人严重分割的农村，对敌斗争空前残酷；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严重，工作极其困难，一些同志对革命全局了解较差，对革命胜利的前途信心不足。因此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中国的实际，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把全党思想统一起来。这是整风运动的目的。这次整风是党内一场思想作风上的革命，把党的建设方针提高到思想建党的水平。

这次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运动。它使干部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成熟和统一。这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

彭真的文章和讲话，提出的指导原则，在整风中是起了

重要作用的。他强调学习文件，贵在领会精神实质，即领会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领会的目的全在于实际应用。他说：如果学而不用，“纵然能把它的字句背得烂熟，甚至像和尚念经一样背得顺口流出，仍然是一窍不通”。能否学以致用，关键在于学习时能否认真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用中央党校当时的说法，就是“能否认真钻研文件精神，并用文件精神来钻研自己”。并真正做到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这是改造思想和改造学习的起点，也是党的组织抓思想建党的起点。因为要取得思想上的一致，必须首先知道思想上有哪些地方不一致。要知道大家在想些什么，并敢于讲出来。否则思想工作是无从做起的。”在这方面，不能害怕暴露矛盾，不能回避问题。毛泽东说过，党内如果没有这样的矛盾与解决这种矛盾的斗争，党就不能存在。党内思想斗争是必然的，是党内正常的生活。所有这些思想矛盾，归根到底，都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党内思想的统一和团结的增强。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倾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要使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必须有良好的民主气氛，使大家解除顾虑，敢说心里话。当时党内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施行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仍心有余悸。因此毛泽东提出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中，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方针，大家确实做到了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对党在各个历史

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抗日战争、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的许多具体政策问题，大家都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全校为此开过不少次辩论会，让各种不同观点充分发表。但是，对暴露出来的问题如何处理，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彭真指出，对如何解决党内思想争论问题，过去党内曾经用过几种办法，一种是对过去工作中犯过错误的，说过错话的，用无情的铁锤给以无情的打击。“这是一个老办法，是苏维埃后期用过的办法。这种办法倒是简单痛快，但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在他心里问题还存在，这次你打击了他，以后谁也不敢讲话了，这会损伤党的民主生活，使党没有生气。这个办法不合毛主席、党中央治病救人的方针”。另一种是对问题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学阎锡山的办法，八面玲珑，脚踏两只船。“这是一种庸俗的市侩态度。要是这样，党内的争论就永远解决不了。这是一种‘养’病的办法，会使错误更加发展”。正确的办法，是实事求是的办法，要“搞清思想，把病治好”。“一是病一定要治，一是治病不是治人”。中国有句老话：“心病还须心药医。”思想上的问题，必须从思想上真正解决，才算解决。扣帽子、无限上纲的办法，只能勉强做到口服，根本去不掉心病。所以我们反对这种办法。但是，对于明显的思想错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怕伤感情，怕意见对立，怕无法处理，而绕开矛盾走；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或雷声大，雨点小，走过场，敷衍了事；甚至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不给予应有的处理，其结果，必然是养痍遗患，使党涣散无力，终有一天要出问题。没有统一的思

想,就不会有真正的团结,党就没有战斗力,就经不起风浪。这是思想上建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为进行思想建党必须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方能分清是非,以理服人。解决思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即实事求是的思想来统一认识。思想方法统一了,认识问题也就容易一致了。彭真不只一次地说过,毛泽东讲的实事求是,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简要的概括。对彭真这句话究竟应当怎样理解?我现在的体会是:对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认识不能简单化,应当有一个完整和科学的理解。如果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述的话,我想应该是:“**实事——求是——实践——完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观察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并不简单。“**第一要客观地看问题,不要主观地看问题;第二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要片面地看问题;第三要看问题内在的联系,看它的本质,不要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即现象上**”。“**求是**”,就是找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用现在人们喜欢用的语言说,就是找出最佳方案或做出最佳选择。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这需要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夫。求出了“是”,不是到此为止,而是要付诸实践,要经过实践来检验。实践检验的结果,是正确的就坚持,是错误的就修正,是不足的就补充,是粗糙的就提炼,这就是“完善”的过程。“**实践**”和“**完善**”是“**求是**”的继续。例如,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所实行的一整套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是我们过去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所求出的“是”。这个“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发现有一些不能适应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的东西,所以就要进行改革。改革就是“完善”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完善就要对实践检验的结果,进行认真的分析,是正确的就坚持,是错误的就修正。不能不加分析,不分好歹,把正确的东西也修正掉,来一个全盘否定。同样的,我们现在学习他国的东西,也要对他们实践的结果进行认真的分析,是正确的就学习,是错误的、腐朽落后的就不要学习。也不能来个全盘肯定,甚至把糟粕当成精华,把垃圾当成珍宝。什么事情全盘肯定、全盘否定都比较容易,要进行认真的、恰如其分的分析,就比较困难了。如果大家学会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思想建党,我们对各种问题的认识就容易一致了。

在延安整风之前,面对着党内那样复杂的思想状况,我们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针,正确地解决了这些思想问题。现在面对着党内外存在的各种思想倾向,我们既不能采取压服的方法,更不能采取放任纵容的态度,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我们仍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讲,重温一下党的历史经验是会有所启发的。

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

(1993 年 12 月 3 日)

今年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抚今追昔,作为一个曾跟随毛泽东多年的老战士,我非常怀念过去的斗争岁月,也更深深感到我们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重大意义。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纪念毛泽东,不仅仅限于缅怀毛泽东个人的光辉业绩和他所倡导的党的优良作用,更应根据当前和今后的国际国内形势,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在长期革命岁月里,毛泽东是我们的领袖,是我们亿万人民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的象征。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人,还是新中国建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都是长期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前进的。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也为我们今天的开拓前进奠定了基础,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讲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48 页)

灾难性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国民经济，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和优良传统，践踏了国家法制，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特别严重的是搞乱了人们思想，造成是非颠倒，社会上出现了不良风气，非常令人痛心。粉碎“四人帮”之后，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社会主义事业，成为当时摆在我们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使人民从迷惘中看清前进的道路。当时有人主张“两个凡是”观点。它脱离实际生活，违背历史客观规律，当然不能服人。也有人感情用事地主张仿照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办法，全面否定毛泽东，说什么毛泽东已经自己否定了自己。这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当然也不能接受。还有人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超越时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未经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经历，搞社会主义太早了。当此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捍卫毛泽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首先支持并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客观地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阐明了高举毛泽东思

想旗帜的重要性。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回想在 1927 年革命失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为了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又亲自领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他组织了强大班子，历时年余，九次发表指示，动员全国几千人参加讨论。《决议》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的错误”。这样评价毛泽东，完全符合革命历程，令人诚服。全党全国人民渴望着听到这样的声音，国际朋友们也期盼着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决议》统一了党和人民的认识，明确了今后奋斗的目标，增进了团结，鼓舞了人心。历史事实表明，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继承、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楷模。人民、历史永远不会忘记邓小平亲自领导、精心制定这一《决议》的伟大的历史功勋。

《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专列篇章进行总结论述，共十一个问题。《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精辟概括，清晰明确，读之如饮甘醪，润人胸怀，百读不厌。它是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纲。建议同志们重温一下这篇重要文献。

封面
目录
正文